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一册

建党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 —— 一九四九）

第一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　央　档　案　馆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 版 说 明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合作编辑的。这部文献集的出版，为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有关专业人员系统地研究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翔实的文献资料。

这部文献集收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至新中国成立以前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重要文献，包括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中央全会等重要会议的文件，中共中央的重要决议、决定、宣言、通知、通告、指示，中央领导人的重要报告、讲话、文章、电报等。全书共二十六册，约一千三百五十万字，收入各类文献三千六百多篇，其中三百余篇为首次公开发表。这些重要文献，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经验。

这部文献集所收入的文献，主要来源于由权威部门编辑出版的选集、文集、专题文集、历史资料集等，还有一部分是依据当时公开发表的或内部公布的文献版本刊印的。首次公开发表的文献，主要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文献的版本和发表情况，均在刊印说明或题解中作了注释。所有文献均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册出版。反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性文献，以“附编”收入第一册中。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力求保持文献原貌，只对个别错漏的文字、标点及衍文、不规范用字进行订正。对辨认不清的字，用“□”表示，遇有辨认不清的字较多的情况则以注释说明。根据本书的体例要求，对部分文献的标题作了必要规范，对个别文献重新拟定了标题。对节选收入的文献，或在标题上标明“节选”字样，或在题解中进行说明。

我们根据文献编辑的需要做了少量的题解和注释。题解排在每篇文献首页的下面，注释附在每篇文献的末尾。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　央　档　案　馆

二〇一一年六月

PDG

目　　录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 (1)
（一九二一年七月）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 (4)
（一九二一年七月）
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 ………………………………………… (7)
（一九二一年七月）
广州共产党的报告 ………………………………………………… (16)
（一九二一年七月）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 (21)
（一九二一年）
和区声白讨论无政府主义 ……………………………… 陈独秀 (25)
（一九二一年八月一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 ………………………………………… (45)
（一九二一年八月）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 (47)
——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
所希望于劳工会的 ……………………………………… 毛泽东 (49)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 李大钊 (51)
（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九日）

《黄庞流血记》序 …………………………………………… 李大钊（59）
（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 ……………………………… 蔡和森（60）
（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 ……………………………………………（65）
（一九二二年五月）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 ……………（69）
（一九二二年五月）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 ………………………………………（88）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
马克思学说 ……………………………………………… 陈独秀（99）
（一九二二年七月一日）
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 ………………………………… 李大钊（110）
（一九二二年七月一日）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答黄凌霜 ……………………… 陈独秀（116）
（一九二二年七月一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宣言 ………………… 王尽美（118）
（一九二二年七月九日）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120）
（一九二二年七月）
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 ………………………（136）
（一九二二年七月）
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 ………………………………（138）
（一九二二年七月）
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 …………………………………（141）
（一九二二年七月）
附：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 ……………………………………………（141）
关于议会行动的决议案 ……………………………………………（147）
（一九二二年七月）

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 …………………………（150）
（一九二二年七月）
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 ……………………………………（156）
（一九二二年七月）
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 …………………………………………（160）
（一九二二年七月）
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 …………………………………（162）
（一九二二年七月）
中国共产党章程 …………………………………………………（164）
（一九二二年七月）
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 ………………………………… 周恩来（170）
（一九二二年八月）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拟定的劳动法案大纲 ……………………（176）
（一九二二年八月）
本报宣言 …………………………………………………………（179）
——《向导》发刊词
（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祝安源路矿工人
罢工胜利函 ………………………………………………………（182）
（一九二二年九月十八日）
附：萍乡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宣言 ………………………………（183）
（一九二二年九月十四日）
造国论 ……………………………………………………… 陈独秀（185）
——以真正国民军，创造真正民国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日）
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 ………………………………………… 蔡和森（188）
——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日）

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 ……………………（194）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
革命与反革命 ……………………………………… 陈独秀（200）
（一九二三年一月八日）
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 李大钊（204）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六日）
中国共产党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
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 ……………………………………（209）
（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敬告国民书 ………………………（211）
（一九二三年二月）
外力、军阀与革命 ………………………………… 毛泽东（214）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日）
怎样打倒军阀 ……………………………………… 陈独秀（217）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八日）
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 ………………… 陈独秀（222）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 ……………………… 蔡和森（229）
（一九二三年五月二日）
《新青年》之新宣言 ……………………………………（236）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五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陈独秀（242）
（一九二三年六月）
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 ……………………………………（248）
（一九二三年六月）
关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案 ………………………（256）
（一九二三年六月）
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 …………………（258）
（一九二三年六月）

劳动运动议决案 …………………………………………… (261)
（一九二三年六月）
农民问题决议案 …………………………………………… (263)
（一九二三年六月）
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 ………………………………… (264)
（一九二三年六月）
青年运动决议案 …………………………………………… (265)
（一九二三年六月）
妇女运动决议案 …………………………………………… (266)
（一九二三年六月）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 ……………………… (268)
（一九二三年六月）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 ……………………………… (270)
（一九二三年六月）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 (276)
（一九二三年六月）
中国农民问题 …………………………………… 陈独秀 (278)
（一九二三年七月一日）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 ……………………………… (286)
（一九二三年八月一日）
对俱乐部工作的回顾 …………………………… 刘少奇 (291)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日）
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 ………………………… 瞿秋白 (301)
（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中国青年》发刊词 ……………………………………… (329)
（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日）
社会主义释疑 …………………………………… 李大钊 (331)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中共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纪要 ……………………（334）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
中共中央局向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
会议的报告 ……………………………………………………（336）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
中共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各委员报告 …………………（339）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
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 ……………………………………（348）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
劳动运动进行方针议决案 ……………………………………（350）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
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 …………………………………………（352）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 陈独秀（357）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
劳动问题的祸源 ………………………………………… 李大钊（369）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四日）
国民党改造与中国革命运动 ……………………… 瞿秋白（377）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中国妇女宣传运动的新纪元 ……………………… 向警予（380）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中央通告第十三号 ……………………………………………（383）
——国民党改组及收回海关主权问题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中国工人状况及我们运动之方针 ………………… 邓中夏（386）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附　编

（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六月）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 李大钊（393）
（一九一九年）
再论问题与主义 …………………………………… 李大钊（431）
（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七日）
马克思主义（Marxism）
（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 ………………………… 杨匏安（438）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月）
蔡和森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给毛泽东的两封信 …………… （447）
（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三日、九月十六日）
《劳动界》发刊词 …………………………………… 李汉俊（462）
（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五日）
谈政治………………………………………………… 陈独秀（464）
（一九二〇年九月一日）
《共产党》月刊短言 ……………………………………… （475）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七日）
论社会主义 ………………………………………… 恽代英（477）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中国共产党宣言 ………………………………………… （485）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
社会革命底商榷 …………………………………… 李　达（490）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七日）
马克思还原 ………………………………………… 李　达（501）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 ………………… 毛泽东（511）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二日）

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 …………………… 李大钊（513）
（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日）
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 ……………………………… 李 达（515）
（一九二一年四月八日）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 张太雷（533）
（一九二一年六月十日）

PDG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一九二一年七月）

一、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二、本党纲领如下：

（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1]，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

（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

（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4）联合第三国际。

三、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2]，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

四、凡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党员的人，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

* 本文译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的俄文稿。

PDG

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

五、接收新党员的手续如下：候补党员必须接受其所在地的委员会的考查，考查期限至少为两个月。考查期满后，经多数党员同意，始得被接收入党。如该地区设有执行委员会，应经执行委员会批准。

六、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

七、凡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委员会。

八、委员会的成员经当地委员会书记介绍，可转到另一个地方的委员会。

九、凡是党员不超过十人的地方委员会，应设书记一人；超过十人的应设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一人；超过三十人的，应从委员会的委员中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章程另订。

十、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的地方组织中党员人数多时，可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3〕。

（十一、遗漏——译者）〔4〕

十二、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十三、委员会的党员人数超过五百，或同一地方设有五个委员会时，应由全国代表会议委派十人组成执行委员会。如上述要求不能实现，应成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5〕。关于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和组织细则另订。

十四、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受此限（这一条在一九二二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引起激烈争论）〔6〕。

十五、本纲领须经全国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代表同意，始得修改。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英文稿此句为“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

〔2〕英文稿在此句之后还有一句：“宣传共产主义。”

〔3〕英文稿此条为：“十、各地在党员增加的情况下，应根据职业的不同，利用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组织，在党外进行活动。”

〔4〕此处为俄文稿原注。

〔5〕英文稿此条为：“在党员人数超过五百，或已成立五个以上地方执行委员会时，应选择一适当地点成立由全国代表会议选出之十名委员组成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如果上述条件尚不具备，应组织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应需要。”

〔6〕英文稿括号内文字为：“此条款引起激烈争论，最后留至一九二二年第二次会议再作决定。”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一九二一年七月）

一、工 人 组 织

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凡有一个以上产业部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在没有大工业而只有一两个工厂的地方，可成立比较适于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

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党应警惕，不要使工会成为其他党派的傀儡。为此，党应特别机警地注意，勿使工会执行其他的政治路线。对于手工业工会，应迅速派出党员，尽快进行改组工作。

拥有会员二百人以上方能成立工会，而且至少要派我党党员二人到该工会去工作。

二、宣 传

一切书籍、日报、标语[1]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的通报、日报、周刊、传单

---

* 本文译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的俄文稿，英文稿标题为《中国共产党关于（奋斗）目标的第一个决议》。

和通告。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

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

三、工 人 学 校

因工人学校是组织产业工会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在一切产业部门均应成立这种学校，例如，应成立“运输工人预备学校”和“纺织工人预备学校”等等。在这种学校里，除非常必要的情况外，不应教若干门不同的课程[2]。

学校管理处和校务委员会应完全由工人组成。党聘请的教员可以出席校务委员会的会议。

工人学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否则，这种学校就无需存在，可予以解散或改组。

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成立工会的必要。

四、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

这种机构应由各个产业部门的领导人、有觉悟的工人和党员组成，应研究产业工会组织的工作方法等问题。

成立这种机构的主要目的，是教育工人，使他们在实践中去实现共产党的思想。应特别注意组织工人工会，援助其他部门的工人运动，研究工人工会以及其他无产阶级组织的情况。

为了更适当地进行工作，这种机构的研究工作应分为以下几类：工人运动史，组织工厂工人的方法，卡尔·马克思的经

济学说，各国工人运动的现状。研究的成果应定期发表，应特别注意中国本国的工人运动问题。

五、对现有政党的态度

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3〕。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

六、党与第三国际的联系

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

在必要时，应派一特命全权代表前往设在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此外，应派代表赴远东各国，以便商讨发展和配合今后阶级斗争的进程。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俄文为："словари"。英文稿译为"百科全书"。

〔2〕英文稿此句为："任何教授数种不同工作的补习学校，除非不得已时不准成立。"

〔3〕英文稿此句为："对现有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

PDG

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

（一九二一年七月）

同志们，北京共产主义组织仅仅是在十个月以前才产生的。此外，加入这个年轻组织的，只是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多半缺乏革命经验。由于时局本身的变化，我们的整个活动遇到阻碍，所以，我们的工作成果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在此次代表大会上，不能向你们谈更多的经验。可是我们殷切地希望这次代表大会能极大地丰富我们的经验，并对我们今后的整个活动作出原则指示。

在报告之前，我尽量简略地向你们叙述一下北京社会生活的情况。

一、大家知道，北京是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近五百年来，又是中国的首都。在清朝时，有许多满族人居住在那里，他们利用与帝王的关系，一直保持着不成体统的生活方式。现在还有将近二十万这样的居民，他们非常忠顺，他们仍然不从事任何固定的职业。除了这些懒汉以外，还要加上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员，以及簇拥在他们周围的各种寄生虫，此外，还有他们的家属，再就是还有约三万干着各种各样可疑职业的人。北京的人口不超过九十三万，可以大胆地说，有一半以上是游手

---

* 本文译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的俄文稿。原文没有署名。根据内容判断，报告者为张国焘。

好闲的人。的确可以说，北京是世界上最奇怪的城市。

正如我们已经谈到的，北京是公认的所谓政治中心，因此，似乎当地居民应该关心一切政治问题，可是，实际上远远不是这样。当中国存在着君主政体时，人们把政治看作是帝王个人的事情。革命以后，则把政治看作是军人个人的事情，即高级将领和普通军官个人的事情，看作是那些在争夺各种特权的斗争中只追求个人目的的各种政客的事情。因此，政治问题仍然不被重视。

为什么北京的居民抱有这种消极态度呢？首先，北京人铭记古代哲学家所说的“搞政治不是下等人的事”，这种宿命思想深深地刻印在他们的脑海里。其次，几千年来，他们处于暴政压制之下，俯首听命和从属依附的情感深深地扎根在他们的心坎上。最后，工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工人中极端利己主义盛行，他们没有集体生活习惯，浸透了保守的传统精神。在茶馆或是饭馆里，常常碰到“莫谈国事”的告示。这种对国家政治问题的一切谈论都加以禁止的作法，好像是对下层阶级设置的社会监督。

在“文学”革命（推行白话文等等）之后，知识分子开始第一次感到需要新的理想、愿望和志向。与此同时，在瓜分战利品的会议上，中日之间因山东问题发生了冲突，这就引起了前所未闻的强大的学生的民族主义运动，即“五四运动”。当时，学生作了很大的努力，想唤起群众对政治事件的兴趣，可是，这种努力一直没有效果。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学生运动就逐渐削弱了。从这个例子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在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知识分子阶层的爱国主义精神还没有在无产阶级中扎下根来。

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大体上可以分为三派：1. 民主主义

运动；2. 基尔特社会主义；3. 无政府主义运动。民主主义运动的拥护者没有任何固定的组织。而基尔特分子只有少数拥护者，因而，影响也小，为了宣传他们的混乱不堪的思想，他们随便地利用已出版的报纸和其他定期刊物，甚至无政府主义者也没有这帮家伙走得远。拿起任何一张报纸，即使是军阀们出版的报纸，都可以找到通篇是各种混乱思想同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学说的大杂烩的文章。当然，这种运动所使用的手段是不会达到目的的。至于说无政府主义者，尽管他们大概已意识到他们向群众发出呼吁是怎样重要，但是他们除了散发他们的小册子和坐牢以外，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例如，在去年[1]五四运动时，无政府主义者小组已集合了三十人，可他们没能在工人中亲自发起组织游行示威，只限于印刷一些周刊，可是又不能像样地组织散发，因此，散发得很不均匀。

知识界的人士认为，改造社会时必定会运用他们的知识，科学事业会使他们获得有影响的地位，因而往往渴望受到广泛的教育。他们把无产阶级看作是很无知的、贫穷而又软弱的阶级，因而可以利用他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知识分子认为自己非常重要，而无产阶级则微不足道，他们的这种倾向极为明显，结果就成了工人革命运动的极大的障碍。

同志们，综上所述，我们面临着需要立即着手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怎样使工人和贫民阶级对政治感兴趣，怎样用暴动精神教育他们，怎样组织他们和促使群众从事革命工作；第二，怎样打消他们想成为学者并进入知识界的念头，促使他们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怎样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

军阀和官僚的政权，一般说来很不稳固；他们的眼界局限

于纯粹自私的目的；他们没有任何固定的政治路线。只要无产阶级努力，这个政权就很容易被推翻。

二、北京的经济状况很简单。北京是政治中心，而不是工业或商业城市，因此，实际上只有百万富翁才在银行里有存款，而企业家一般地说很少，大商业家也不多。某些较大的工厂和企业，如编辑部、出版社、地方的财政部、精密仪器厂、度量衡厂，还有铁路，所有这些都是政府的机关。因此，这里的厂主和雇主就是政府本身。为了加强上述企业和机关的职员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了使他们不停歇地工作，政府向他们解释说，“为了国家富强，应当这样做。”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工作很困难，无论如何要比同资本家厂主打交道困难得多。同志们，请你们注意这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工人中有许多人力车夫，计有五万到六万人。他们虽没有给资本家做工，可是他们来自下层，就其工作来说，又与广大居民阶层有接触，必须寻求向他们积极进行宣传工作的实际措施。

三、欺压人是北京常见的事，外国人侮辱中国人，军官粗暴地对待老百姓，乘客用鞭子或手杖催赶人力车夫等等。我认为不论什么地方，只要一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应当抓住时机，激发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

政府官吏，军人，官僚和警察，他们在压迫平民百姓方面争相竞赛：“重要人物”的汽车可以压死行人，他们可以随意控制交通，他们唆使警察任意镇压平民。某位“重要人物”一出门，摆在首位的就是维护他的尊严。所有这些事例表明，有多少向群众宣传的好时机啊！

现在，再回过头来谈谈北京共产主义组织过去的活动和计划。我们应该看到，在去年十月这个组织成立时，有几个假共

产主义者混进了组织，这些人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分子，给我们增添了不少麻烦，可是由于过分激烈的言论，他们使自己和整个组织脱离了。他们退出以后，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了。我们人手还很少，因此，不能立即提出广泛的战斗任务。我们必须集中全副精力向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在工人中的宣传工作

北京工业还不发达，没有可以把工人联合起来的大工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把工作转到铁路员工方面来。可是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与工人阶级的距离很大，因此，首先应当同他们加强内部联系。为此，我们决定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训练两千名铁路工人。这所学校离北京不远，有三位教员——社会主义者在那里教课。

这所学校看来是我们接近工人的一个途径，我们和工人之间逐渐产生了亲密友好的感情；我们不止一次地向工人提出鼓舞他们的重要建议，结果，我们看到，认为必须提出各种阶级要求，像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成立工会等思想，在工人中间不断增长起来。后来，他们成立了拥有三百四十至三百五十人的铁路工人工会。

同志们，不应当只限于成立工会，工会成立以后，首先应当引导它与企业主交锋，只有这样，工人才会对自己的工会感兴趣，才相信工会的力量。工人群众没有知识，不认识字，十人当中只有一人能看报，因此，印刷宣传工作自然做得很差。可见，我们必须同这些困难做斗争，要不惜任何代价加以克服。

总之，我们在最初一个短时期内所取得的经验是：第一步，在忠实于工人运动的人与工人之间建立友好关系；第二，从工人当中选拔一些领袖；第三，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我们组织的目的，并利用自己的工会同雇主进行斗争，从而使阶级仇恨激化；最后，第四，我们必需利用每一个机会，推动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

自然，开办劳动学校时，我们不能幻想马上提高工人的一般知识水平，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能力差，经费少，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建立学校，力求达到的不过是上述的前两个目的。学校的任务主要是教育工人，并使他们习惯于亲自从他们当中选出有觉悟而又积极的人来管理学校和工会的事情。学生会议能够给你们提供许多合适的宣传机会，而特别重要的是培养这种召开公开群众大会的习惯，这种大会最能使到会者养成共同利益感和严守纪律。

我们教工人什么呢？我们经常不断地向他们说，他们遭受他们的厂主资本家的掠夺，不得不过着牛马般的生活；其次，向他们介绍外国工人运动史。我们不断地向他们指出组织起来的意义和方法，时常给他们讲课，教他们识字，同时，还教他们习惯于用文字来表述自己的思想，让他们写出关于家庭生活和日常生活情况以及工厂里发生的一切不公平事件的书面报告。起初，他们感到有些为难，但后来从他们中间培养出了一些优秀的鼓动员。不过，要找到导师，找到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那是极其困难的。

我认为，没有必要开办所有行业的工人学校，作为第一步，只在那些既没有工人组织又没有工人领袖的地方，才需要建立这样的学校。经验表明，我们不能建立一般的工人学校，应当只开办专门学校，如纺织工人学校和铁路工人学校等等；

这种学校是建立产业工会的必要准备阶段。

在京汉铁路工会方面，我们积极进行活动，以便使这些工人同我们建立密切的联系。我们还特别注意各地所发生的罢工事件。一听说那个地区的采煤工人和其他工人举行罢工，我和罗同志就立即乘火车奔赴那里，想给罢工者以帮助，可是他们不但不相信能够从外人那里得到援助，反而怀疑我们是奸细，害怕我们，因此，我们的尝试没有成功。

我们为工人阶级出版的宣传刊物，大部分篇幅不多。我们经常鼓励工人自己写简讯，并全部刊登在我们的刊物上或一般的报刊上。我们最初出版的是《劳动者》[2]周刊，但出到第六期以后，就被政府查禁了。遭到这次迫害以后，我们的刊物改名为《仁声》，但在第三期以后，由于缺乏经费，只得停刊。我们还出版了一些小册子，如《工人的胜利》和《五一节》，这些出版物传播得相当广泛。可是，我们的主要宣传工作集中在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上，这些要求现在已成为最有效的战斗口号。

我想举个例子来证实工人举行公开示威游行的重要性。正像我已向你们说过的，我们在长辛店播下了宣传工作的第一批种子，去年五月一日，那里举行了示威游行。应该称赞同志们举行的这次示威游行，这一天召开了有千百个工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工人亲自在会上发表了鼓动性的演说，会议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可是仍有一些工人没有来得及发言。群众大会以后，开始游行，由一千五百名工人组成的游行队伍，高举着写有重要标语的旗帜，唱着革命歌曲，喊着“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的口号沿街行进。这个事件过后，在不到一个星期之内，工厂车间里发生了十起使管理人员感到极大不安的小型活动。同志们，请注意，我们不得不同尚且没有纪律的工人一起活动，而

帮助他们的最好方法，据我看就是帮助他们组织罢工和游行。我们要积极采取一切能够加速这一运动的措施。

在知识分子中的宣传工作

我们曾试图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扩大我们的宣传工作，可是现在印刷所受到监视，因此，不能刊印我们的出版物。我们翻译了一些小册子，如《俄国革命和阶级斗争》和《共产党纲领》等等，但我们的译文尚未印出。我们只散发了上海印的《共产党宣言》和《经济学谈话》。《曙光》杂志虽由我们的一个同志负责出版，但不纯粹是我们的刊物，而是一个混合性的刊物。我们刊登了一些翻译文章和原著；当罗素教授在上海讲学，并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时，我们组织了公开辩论，并作为其论敌发表了意见。我们不得不时常公开与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社会党人进行争论，但很少参加笔战，大部分争论是公开辩论或私人谈话。

近几年来，公共的普通教育学校在北京显著地增加了。从前，它们对学生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尽力促使这些学校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并且在这方面获得了部分成绩。

我的报告就要完了，我还有几句话要说一说。虽然我们现在把精力都用在组织和教育群众的工作上，但同时还应当注意对知识分子的宣传工作。同志们，黑暗的政治局势和包围着我们的腐败的社会，许多令人难以容忍的社会不公平以及悲惨的经济生活状况，所有这一切都是易于引起革命爆发的因素。我们能否利用易于激发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能否把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引上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的轨道，所有这一切都将取决于我们高举红旗进行斗争的努力程度。这次成立大会应

PDG

当具体地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任务，并制定实际工作计划。大会的责任看来是不轻的。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此处俄文稿有误，应为“前年”。
〔2〕此处俄文稿有误，应为《劳动音》。

PDG

广州共产党的报告*

（一九二一年七月）

一、去　年

去年，这里没有任何组织，也不可能找到能在广州做组织工作的人。我们回到广州的时候，创办了《社会主义者》[1]日报，但不能说《社会主义者》就是某种组织，它是一个宣传机构。当时广州是在广西人的统治下，他们残暴地镇压各种运动，而这时我们又有财政上的困难，因此，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去年年底，B和佩斯林[2]来到广州，建立了俄国通讯社，对组织工会采取了措施，并在《劳动界》[3]周刊上发表了文章。黄凌霜同志把他们引荐给广州革命界，这样一来，他们就被无政府主义者包围了。尽管组织了共产党，但是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党执行委员会的九个委员当中，七个是无政府主义者，只有米诺尔和佩斯林同志是共产主义者。由于观点不一致，谭平山、谭植棠和我拒绝加入这个小组。他们出版的报纸叫《劳动界》，印数为三千份。这时，广州产生了两个工人组织：一个是机械工人俱乐部，另一个是

---

* 本文译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的俄文稿。原文没有署名。根据内容判断，报告者为陈公博。

宽山[4]工人俱乐部，宽山是离广州五十哩的一个小地方。这两个组织各有四十至五十名工人。因为我们不是该党党员，不能提出关于该党的详细报告。

一月，陈独秀同志来到广州，与他同时来的还有 B[5] 同志。他们进行过非常热烈的争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也就在这时，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于是，我们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并宣布《社会主义者》日报为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的正式机关报。党员共有九人，包括陈独秀，米诺尔和佩斯林在内。

最遗憾的是我们非常需要钱。《劳动界》已停刊，两个工人工会也得停办。因为：第一，经费困难；第二，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工会里已广泛传播。

二、现　　状

目前，我们的宣传机关报是《社会主义者》日报，该报每月需要七百元，很难维持下去。此外，我们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共有八十余人，其中百分之二十是法律系的学生，百分之二十是高等、中等院校的学生，其余的人是各种政治小组和编辑小组的成员。这些小组里没有工人，因为我们很难与他们建立联系。而与士兵群众建立联系，就更加困难。每月从党员的收入中抽出百分之十来维持《共产党》月刊和负担工人夜校的费用。

在上海[6]，我们成立了机械工人学校，我们在该校七个校务委员的帮助下，宣传了我们的原则，并且希望增加学校的数量。此外，成立了由宣传委员会直接领导的宣传员养成所，并委派我为该所所长。这个养成所是广东省进行社会教育的主要

机构，该校很多教员都是我们的好同志。我们希望养成所附设工人夜校和工人组织工作学校。但是这个养成所的存在取决于政治关系，我们只能暂时利用这种关系。

三、今后意见

1. 吸收新党员

广州的党员人数不多，这就使得我们要更多地注意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在工作开始时，我们不愿意轻率地吸收新党员。广州的情况与其他地方大不相同。暂且不谈士兵和工人群众，可以说，大学生都是同情神秘的无政府主义的，或是受国民党所操纵的。因为有这些困难，我们要特别坚定。将来，我们打算从一些马克思主义小组中、从机械工人学校和宣传员养成所中吸收新党员。其他人也希望加入我们党，那是计划之外的事，现在还谈不上。

2. 成立工会

这个问题更是困难，因为去年一年之中，工会已增加到一百多个，但是这些工会都受到无政府主义的熏染，或者为国民党所操纵。关于无政府主义者，用不着多谈，因为他们在广州一共才有五六个人，其中有三个人很快就要去法国。还应指出，一般来说，无政府主义者也没有任何组织。我们与国民党人的斗争要困难得多。因为工人与国民党人的联系已有很长的历史，早在十年以前，他们就设法向工人和士兵群众传播他们的思想和影响，而在去年又鼓动工人罢工，援助陈将军。这个党的许多党员都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设有宣传部，专门做联络工人的工作，特别是做联络五金工人和机械工人的工作。

我们在组织工人方面的首要任务是建立机械工人工会和铁路工人俱乐部。现在，我们正在采取措施组织教师工会。

我们在表面上虽然与国民党人有联系，但仍在极力设法单独组织工会。现时，我们与某些工会，如理发工人工会等有联系；我们在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以便在机械工人工会中产生影响，看来我们的尝试是会成功的。

3. 成立工人学校

①工会学校

成立这类学校的计划是：要求所有的工会各派两名代表，每周到学校来两三次。学校教授的课程有：工会组织法、工人运动史和欧美工人运动的现状，等等。我们认为，经过二三个月以后，这个学校定会取得很大的成绩，许多工会对我们的工作会感到满意。

②工人夜校

目前，只有一所学校是由我们的同志直接领导的，而很多学校是由一些与我们有联系的工人自己筹办的，但是这些学校并不十分出色。在广州影响最大的是机械工人工会，该工会里有许多拥护我们的人。我们在这个学校取得完全成功以后，就会着手去做其他学校的工作。

4. 对农民的宣传工作

马克思主义小组组员褚诺晨[7]同志，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思想，创办了《新村》，我们要千方百计地帮助他扩大影响，扩大宣传。

5. 与士兵的联系

我们特意把这一段放在最后，因为广州没有真正的士兵，而我们军队里的士兵，不是坏蛋就是土匪。他们是危险的，对

待他们要特别谨慎。许多军官在我们当中受到尊敬，不久，我们就要把他们吸引到我们这边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俄文为“Социалист”，应为《广东群报》。
〔2〕B是何人，不详。佩斯林（Леслин），即佩尔林（Лерлин）。
〔3〕俄文为“МирТруда”，应为《劳动者》。
〔4〕音译，俄文为“КванШан”，可能是佛山。
〔5〕即维经斯基。
〔6〕音译，俄文为“Шанхай”，可能是广州之误。
〔7〕音译，俄文为“Ну-Но-Нен”。

PDG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一年）

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1]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现在已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成员。代表大会定于六月二十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参加大会的有十二名代表，他们来自七个地方（包括上海），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

主席张[2]同志在第一次会议上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大会必须制定纲领[3]和实际工作计划。会议拟定议事日程，听取各地小组活动及其总情况的报告。这用了两天时间。这些报告都强调了以下三点：党员极少必须增加，组织工人的方法和进行宣传工作的方法。我们在这里非常高兴地指出，希夫廖特[4]同志和尼柯尔斯基[5]同志出席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给我们做了宝贵的指示。希夫廖特同志在其发言中谈到了他在爪哇的活动，并向我们建议，要特别注意建立工人的组织。

---

* 本文译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的俄文稿。原文没有署名，也没有标明时间。根据内容判断，作者为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成文时间当在一九二一年下半年。

尼柯尔斯基同志把成立远东局的消息告诉了我们，并向我们讲述了他对俄国的印象。在这个报告以后，根据尼柯尔斯基同志的建议，我们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向他们报告代表大会的进程。根据希夫廖特同志的建议，决定选出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用了两天时间起草计划和纲领，这个期间没有开会。

代表大会的第三、四、五次会议专门研究了纲领，有些问题经过长时间辩论以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只有引起热烈争论的一点除外。这一点就是党员经执行委员会许可能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方坚持认为，我们的党员做官没有任何危险，并建议挑选党员做国会议员，但他们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另一方则不同意这种意见。在第三次会议上，代表们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在第四次会议上，辩论更加激烈。一方坚持认为，采纳国会制就会把我们的党变成黄色的党，他们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例子说明如下事实：人们进入国会，就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则，成为资本家阶级的一部分，变成叛徒，并把国会制看成是斗争和工作的唯一方式。为了不允许同资产阶级采取任何联合行动，为了集中我们的进攻力量，我们应当在国会外进行斗争。况且，利用国会也不可能争得任何改善，而进入国会，就会使人民有可能认为，利用国会，只有利用国会，我们才能改善自己的状况和发展社会革命事业。另一方坚持主张，我们应当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不相信在二十四小时内可以把国家消灭掉，或者说，如果我们不相信总罢工会被资本家镇压下去，那么，政治活动就是必要的。起义的机会不会常有，只是在极少数时候才会到来，但在和平时期，我们就应做好起义的准备。我们应该改善工人的状况，应该开扩他们的眼界，应该引导他们参加

革命斗争和争取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斗争，因为公开宣传我们的理论，是取得成就的绝对必要条件。而利用同其他被压迫党派在国会中的联合行动，也可以部分地取得成就。但是，我们要向人民指出：想在旧制度范围内建立新社会的企图是无益的，即使我们试图这样做也是徒劳的。工人阶级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不能强迫他们进行革命。否则，他们就会对国会抱有错误的看法，采取和平时期的方式，而不采取急进的手段。

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不能作出结论。只好留到下次代表大会去解决。至于谈到我们是否应该做官的问题，这个问题有意识地回避了，但是，我们一致认为不应该当部长、省长，一般说不应当担任重要行政职务。在中国，“官”这个词普遍应用在所有这些职务上，不过，我们允许我们的同志当类似厂长这样的官。

代表大会的第六次会议是深夜里在一个同志家召开的。会议刚开始，就有一个侦探闯进屋里，他道歉说走错了，可是终究使我们不能再继续开会。这个侦探的到来，没有使党受到损失，尽管在他来过之后，很快警察就突然前来进行了搜查。在这以后，我们提高了警惕，为了继续开会，只好到附近一个小城市去。我们在那里研究了委员会起草的实际工作计划。在我们对其他政党的态度问题上，产生了短时间的争论。有些人坚决主张，我们应坚持这种意见：无产阶级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应该始终与其他政党作斗争。同其他政党联合行动，并不违背我们党的原则，我们应当团结所有的人，竭尽全力与共同的敌人作斗争，因为我国的军阀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另一些人主张，在行动上与其他政党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同时又在我们的报纸上批评他们，这并不违背我们的原则。我们自己即使不能立即夺得政权，至少可以加强自己，以

利于今后的行动，因为我们的力量会因这个进展而强大起来，而代替当前统治者的那个统治阶级或许不会像封建老爷那样进行压迫。这样，我们就可以集中自己的革命力量，扩大自己的革命活动。这样，即使无产阶级现在不能取得政权，我们也应该联合其他阶级打倒共同的敌人，加强自己，使我们能够领导以后的斗争，推翻那个将要夺得政权的阶级。这样，我们联合其他阶级，仅仅是为了进行破坏性的斗争。但是，会议接受了第一种意见，即实际工作计划起草委员会的提案。

因为党员少，组织农民和军队的问题成了悬案，决定集中我们的全部精力组织工厂工人。为了把好的可靠的同志吸收进来，决定接受党员要特别谨慎，严格审查。鉴于我们的党至今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所以代表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委托党中央局起草党章。选举三位同志组成书记处，并选出组织部和宣传委员会，代表大会在闭会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等口号。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即陈独秀。
〔2〕即张国焘。
〔3〕此处俄文是"Конституция"。
〔4〕即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5〕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PDG

和区声白讨论无政府主义

（一九二一年八月一日）

陈　独　秀

陈独秀答区声白的信

声白先生：

在《群报》上看见你的来信，对于我的意见加以纠正，我很感谢。先生所见也有些和我不同的地方，兹条复如下：

（1）照先生的意见，“在一个团体之内有两派的意见，赞成的就可以执行，反对的就可退出，赞成的既不能强迫反对的一定去做，反对的也不能阻碍赞成的执行，这不是自由吗?”我现在要设一个例，请问先生依无政府主义应如何办法：有一条大街，住户一百，内有数户的住屋，因公共利益的关系必须拆毁，而此数户的住民因为他们自己交通或职业或特别嗜好之关系，决计不愿迁移。这时候若不拆屋，那主张拆屋的多数人之自由在哪里？这时若竟拆屋，那不愿迁移的少数人之自由在哪里？无政府主义既不主张多数压服少数，更不主张少数压服多数，请问上列的这件事如何办法呢？

先生说：“赞成的就可以执行，反对的就可退出”，我现在假定，反对的不取消极的退出手段，而取积极的固执主张，两派的意见绝对不同，而两派都不肯退出。请问先生，无论何种

事业在这种状态之下，依无政府主义如何处置呢？若因为两派有重大的意见，并且由于两派的同意，退出一派，这种不幸的事就是资本主义之下的生产或他种团体也是有的，并不须到了无政府时代才有这种妙法。但是我们要晓得，这不是产业界的好现象。偶一为之，已经不妙，若是事无大小都要人人同意，那不肯同意的少数人，不肯牺牲自己的意见服从多数，除了退出无他办法。照这样常常纷乱起来，大规模的生产团体里，一日之内不知有多少事务，一日之内便不知有多少人退出，多少人加入。在事务和技术的经验上、熟练上、秩序上看起来，非闹到由停顿而破产不止。我所以说无政府主义完全不适用于经济方面。

再进一步讨论，我们的社会乃由许多生产团体结合而成，一团体内各人的有各人的意见，人人同意已不易得；一社会内各团有各团的意见，人人同意更是绝对没有的事。一团内意见不同的分子还可以说自由退出，我不知道一社会内意见不同的分子或一团体，有何方法可以自由退出？

我们要明白，我们无论如何反对我们所生存的社会制度，在我们未曾用我们的力量把现存的制度推翻以前，我们仍旧必然为现存的我们所反对的社会制度所支配。除非自杀或是单独一人逃到深山穷谷没人迹的地方，绝对没有方法可以自由逃出。所以就是对于资本制度深恶痛绝的无政府党或社会党，在社会革命未成功以前，仍然是资本制度支配他们的生活，没有方法可以退出。因此我们应该觉悟，我们唯一的使命只有改革社会制度，否则什么个人的道德，新村运动，都必然是无效果的。因此我们应该觉悟，非个人逃出社会以外，决没有绝对的自由，决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

先生反对个人的无政府主义，又反对无抵抗的无政府主

义，我以为无政府主义已经由先生打得粉碎了。因为我不相信有人人同意及可以自由退出的社会，我更不能相信有不用强力及“绝对不赞成多数压服少数或少数压服多数的”抵抗的无政府主义。

(2) 我所说“要绝对自由就不能联合，要联合就不能绝对自由”的道理，上面已经说过，因为联合无论大小，都要有一部分人牺牲自己的意见，才能够维持得比较的长久一点。若常常固执个人或小团体的绝对自由，自由退出，自由加入，东挪西变，仍是一堆散沙。这种散沙的现象，至少也不适宜于大规模的生产事业。先生举出两个自由组织的例，一个是救火，一个是五四运动，实在是妙想天开了！

先生要晓得，救火是一桩偶然突发的事，他的目的极其简单；五四运动是一时的群众运动，若是拿这两个方法用在社会组织和生产事业来证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联合，无政府主义真是破产了。人间社会是何等复杂，其间感情利害目的是何等纷歧，至于生产事业上时间的适应及分业的错综更是何等麻烦。拿一时突发的状况和群众运动的方法去处置，我以为是常识所不许。因为社会组织和生产事业都必须有持续联合的方法，决不是一时乌合的勾当。

再进一步讨论，即以救火说，七手八脚的各人自由行动是否比有组织的救火会更为有效？五四运动发生之前，各校各班的学生是否有组织，组织时是否人人同意？五四运动发生以后，跟着有许多必然要做的事，是否都是用毫无组织的群众运动做出来的？五四运动后的学生联合是否人人同意，是否有多数同意用法律的形式惩罚少数不同意的事？由此可见，先生所引的自由联合的例，纯然是用在偶然突发的事件和政治问题之群众运动，尚且不尽是自由联合，何况是重组织尚秩序关系复

杂的经济方面，生产事业上自由和联合更是不相容的了。

先生说："至于不顾社会的福利，只要个人有绝对的自由，这是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共产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不敢赞同的。"这几句话我十分赞成。我希望先生认清了这个观念，切勿贪图超越这个观念以上的空想。但先生要注意，先生主张对于不顾社会福利的个人，或扩充至少数人甚至扩充至多数人，在先生仅仅是不承认他个人的自由，在他是个人受了多数人的压服了；先生若说因为他不顾社会的福利，他便说，自古受人压服的人都是被人说不顾社会福利呵！自古压服人的人都是说为了社会福利呵！先生既不赞成这种个人的无政府主义，但不知在先生眼中，不顾社会福利的少数人与不顾社会福利的个人有何分别？依先生所谓共产的无政府主义，对于这不顾社会福利的个人或少数人，一概予以自由，还是加以裁制呢？

（3）先生说："无政府党所不干涉的人，是善人不是恶人。"这句话我也十分赞成。不但无政府的社会，自古以来，无论如何专制暴君时代，也未曾订过一条法律要干涉善人。我们所以不赞成绝对的废除法律，也正为要干涉恶人。先生既不反对干涉恶人，可见也不是主张绝对废除人干涉人的法律。彼此意见相同，便不须讨论了。我们对于法律的观念，是由社会上有选举权的人多数意思，决定几条必要的法律，好维持社会上公共的安宁秩序。先生的法律观念是临时的一种公众意见，这就叫做"自然法"。按自然法多由群众心理造成的，这种法却是万分危险。过去铜板铁铸的法律不适应社会的需要，这种法律当然要修改，但不能拿这个做绝对废除法律的理由。至于先生所谓随时变更的公意，却实在不敢领教了。第一，我们实在没有这种预知的天才能够适合随时变更的公意而不违背；第二，随时变更的公意完全是群众心理造成的，这种公意有时固

然能为善，有时也能作恶。五四运动我们固然可以说是善的，但义和拳和荷兰市民迫害斯宾挪萨，巴黎市民杀死柔勒以及欧洲中古虐杀异教徒，像这类群众心理所造成的公愤，未见得常加于社会上的恶人。若照先生主张用这种盲目的群众心理所造成之随时变更的公意来代替法律，实在要造成一个可恐怖的社会。先生还说是康庄大道，还说是除了盲目的人断不至撞得头破额裂，我们实在不敢附和。

陈独秀再答区声白书

声白先生：

前天在《群报》上看见你的答复，现在再略陈鄙意如下：

1. 先生不赞成个人绝对的自由，我很佩服你的见解比别的无政府党好得多（我在《广州晨报》上见过几篇文章，一面说他们是共产的无政府主义，不是个人的无政府主义，个人无政府主义他们曾反对过；一面却口口声声说："我们主张极端自由，不是多得少得"；"我们既赞成安那其，而要求绝对自由。"），但是先生所主张对于这种个人主义的顽固派之办法，我却有点怀疑：一，你说施以"善良教育，达到无政府共产实现的时候. 一定很少很少。"我请问照你的说法，善良教育未普遍以前，无政府主义是不能实现的了，那末，在私产政府之下，有何法、何人施行普遍的善良教育呢？这才真叫做走途无路了！二，你说"假使遇了这种人，我们准可用诚恳的态度把正当的理由告诉他。"我请问照这样告诉他，他仍然固执，那便怎么样呢？即以你对岭南学生而论，你总用过诚恳的态度把正当的理由告诉他们，效果如何呢？先生说："便甘与群众为敌，虽为众人屏斥亦奚足惜。""不顾公共利益的个人自由，是

自由的大敌。”“既志愿而为一群，则必共守信约。”这些话我们都很以为然，因为若不共守信约，屏斥一群之敌，便不能保这群底组织及利益。换一句话说，信约既定之后，我们便不能容认不顾公共利益的少数人有“主张极端自由”、“要求绝对自由”之余地了。先生所谓信约，也可以说就是法律，不过是名称不同。但先生说信约是共同订定的，法律是几个人订定的，这种全称肯定在逻辑上殊欠妥当。因为自来共同信约不见得尽是全体共同意思，并且有时还是一二人煽动群众盲行的。反之，自来法律底实质多半根据在全社会的习惯及心理底基础上面，至于成立法律底手续，几个人订定法律底时代，不用说欧美，就是中国和日本也过去数十年了。

2. 天下事始而赞成继而反对、始而愿意继而不愿意的情况很多，爱情的夫妇还有决裂离异的时候，何况别的事。先生说：“既然能合起来做事，焉有不履行信约的。”我便问你：若是不履行信约怎么办？若是取退出的办法，那末，一个家庭、一个学校、一个工厂还可以退出，试问社会如何退出？

3. 在这一段，先生和我的意见不甚相差，便不必讨论了。但先生要注意的，我们还以为工团派的组织不适于革命，然在无政府主义看起来，工团派已不免有权力集中的倾向，其实权力集中是革命的手段中必要条件。

4. 先生一方面不赞成个人的无政府主义，一方面又赞成人人同意及人人可以自由退出的社会；一方面不赞成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一方面又赞成不以多数压服少数的社会，请先生自己想想矛盾不矛盾？一切无政府主义都已经打碎了没有？人人可以自由退出社会，这是何等极端的个人主义！抵抗主义中是否含有压服多数人或少数人的意思？（我原文是“我更不能相信有不用强力及绝对不赞成多数压服少数或少数压服多数的

抵抗的无政府主义”，先生改为“不相信绝对不赞成多数压服少数或少数压服多数的、无政府主义”，删去“抵抗的”三字，语意大不相同，请再细心看一下。）

反乎自由的事三种：（甲）一阶级无理的压迫他阶级，一个人无理的压迫他个人，好像资本家之于劳动者，男子之于妇女，这种无论在精神上、物质上都是不应该有的；（乙）为一群或一团体之意见无法一致，而又当不能分裂或不宜分裂的境况，不得已只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丙）为社会公共利害不得不压服少数顽固派，甚至于有时还要压服多数的顽固派。我们所讨论的是（乙）（丙）两种，我在女子师范演说的是（甲）种，先生如何并为一谈呢？自由平等虽是好名词，但不可当做万应丸到处乱用呵！譬如资本家之自由也是先生所不承认的了。

先生所引克鲁泡特金的两段话，仅是说明“联合”之可能，未曾说明“联合而且自由”之可能。欧美各国间在资本家管理之下大规模的生产联合很多，试问其中办事都须得人人同意的吗？都是自由而无强制执行的事件吗？倘然能够这样，便不必无政府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也足令先生讴歌崇拜了！

5. 法律底作用在消极的制止，我们未曾主张并且自古也少有订一条法律积极的要人做一件什么事。广东有两个学生会，是好的现象吗？这正是自由便不能联合底好例，多谢先生举出。一切社会、一切生产机关如果都像广州学生会那样不同意便自由分裂，大团结、大联合如何能成立呢？可见一方面主张人人同意及自由，一方面又说主张大团结、大联合，真是自欺欺人！

6. 先生说人人都有廉耻，受人驱逐的必定走。我要请问：倘若他不顾廉耻坚不肯去，怎么办？我还要请问：驱逐他到什

么地方？

7. 契约是各团体一部分人的私约，法律是全社会众人底公约，范围作用都大不相同。在社会学上，团体、群众、社会这三样大有分别，万万不可以混同。各团体内虽有自由契约的裁制，而无关系之各团体间及个人之于其他团体抵触时，法律的需要便发生了。法律的大作用只是保护社会公共的安宁利益及裁制侵犯他人法律上的自由。至于他的名称，叫做法律，叫做公约，叫做契约，都没有什么大不可。借法律侵害善人，执法者不守法律，法律本身都不受过。凡是这等弊病，就是公约、契约都不能免。因北京政府的法律之无价值，便可以推定现在及将来各国底法律都无价值吗？因为法律不是万能的便可以绝对废除吗？世界上凡不是万能的东西都应当绝对废除吗？无政府主义万能吗？科学万能吗？教育万能吗？世界上何物万能？

8. 有群众便有群众心理，并不是古代或宗教时代特殊的现象。法人杀死柔勒及五四运动和宗教迷信有什么关系呢？群众心理都是盲目的，无论怎样大的科学家，一旦置身群众，便失了理性，这是心理学说及我们眼见的许多事实可以证明的。用一二人可以利用的群众心理一时感情所造成之公众意见来代替那经过长久时间理性的讨论及多数议决之法律，不能说不是无政府主义最大的缺点之一。

陈独秀三答区声白书

声白先生：

你在《民声》上答复我的话，越说越支离了，不能不再详明告诉你一次。

1. 这段里面，有一句原文为“在私产政府之下有何法、

何人施行普遍的善良教育呢?”《群报》上脱了“普遍的”三字。我的意思是：在私产制度之下的教育，无论倚靠政府不倚靠政府，全体，至少也是百分之九十九有意或无意维持资产阶级底势力及习惯，想在这种社会状况之下实现善良教育而且是普遍的，我想无人能够相信。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在北京所办的教育即或假定是善良的，然要靠这一点星星之火，慢慢地达到你所说“这种个人主义的顽固派，施之以善良教育，达到无政府共产实现的时候，一定很少很少”的状况，真是河清难俟了。

据你的话，可见善良教育未曾普遍以前，这种个人主义的顽固派一定很多很多，试问你如何处置他，这便未免是实行无政府主义的大障碍了。如此看来，请你还是快去努力施行善良教育，且慢谈无政府主义。你说“假使善良教育还没有普遍，我们对于不良的分子，就要请他去受善良的教育。因为用教育来训练他，使他悔改，使他觉悟，总比用法律惩治好得多。”你这种说话和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意思相近，但孔子还不过是说政刑之效不及德礼，并不曾主张绝对废止政刑，因为维持社会底方法不限于一端，政刑教化用各有当，不可偏废。我们也相信教育的功效好过法律，我们且相信教育是改良社会底最后最好的工具，但不能迷信教育万能，更不能妄说教育的力量还未灭尽恶人以前即可以教育代替法律，因为若有许多许多个人主义的顽固派一定不肯去受善良教育，请问你又如何办？我想你们无政府党又要说我：“是以现世的头脑去考虑进化的无政府社会，以现世的眼光去观察无政府社会。他所预防的弊病——不可能的证据，完全是被现世的景象骇昏了所致。”这几句话正是你们无政府主义者致命的病根底病根所在。我只简单请问：你们所说进化的无政府社会，

是用人力从这现世的万恶社会渐渐改造出来的，还是用符咒把现世的社会沉到海底，突然另外出现一个崭新的无政府社会和现世的景象没有连续的关系呢？办教育不必依靠政府，现时资本家私立学校都做得到，这并不待无政府党底指教。你所谓“人民的责任”，请问这人民若兼指资本阶级，他们的教育可会有真是善良的一日？这人民若单指无政府党社会党，善良的教育一时又何能普遍？

2. 我问你在岭南的效果如何，不过希望你实地感觉“用诚恳的态度把正当的理由告诉他”，不见得人人都肯听从，因此可以悟得有时不得不用势禁以济理喻之穷（能理喻自然更好），并不是劝你以武力强迫怒目相视对待岭南学生。岭南学生对于你诚恳的传播主义反对宗教等说话果有感情，果然相信吗？这件事何、刘、陈诸君都知道，说谎话是最可耻的事呵！

3. 自狭义的契约说起来，和法律底范围作用都大不相同，前函已说过，你何以未看清楚？但自广义说起来，法律也可以说是一种契约。有人称法律是社会的契约（或称民约），前函所以说：“法律是全社会众人底公约”，可说：“至于他的名称，叫做法律，叫做公约，叫做契约，都没有什么大不可。”你所说的契约和法律底不同，更足证明法律底必要，因为若无国家最高权力所制定统一的法律以为各个人各团体间契约底标准及监督，便必然会发生两个弊病：第一是没有监督无以制裁违背契约底责任者，第二是没有标准无以制裁侵害甲种人权利的乙种人底契约发生。救济这第二个弊病，正是近代发达的国家制定进化的统一的法律之大功，这种法律进化的大功在我们人类进化历史的过程上是断然不应该蔑视的。古代各部落各地方有种种不同的生活状况和信仰习惯，遂有种种不同的法律，因此遂发生种种冲突、种种战争。后来因为国家进化、法律进化，

这种部落的法律、地方的法律含有地方性的国家法律渐渐消灭，国内的冲突战争也跟随着渐渐减少。所以近来颇有人主张建设统一世界的大国家，订立更进化的更统一的有强制力的国际法律（现有的国际法因为非国家最高权力所制定，没有强制力，所以无效），好渐渐消灭国界，消灭国际战争。我们应该承认这个理想是进化的，而且不是不可能的。我们真想不到你们竟然生今之世反古之道，竟然以为全国统一的法律不好，竟然主张使各地方及各团体自行订定自由契约！难怪有人说无政府主义是退化的学说，因为照他的主张实行起来，在经济上必然要回复到手工业时代，在政治上必然要回复到部落时代。即让一步，依你所说，国家所订定违反各地方的习惯心理强制各地方一体遵守的统一法律不好，要依各地方的习惯心理自行订定自由契约才对。我们现在要研究的，第一是这种地方自行订定的契约底性质，第二是他的效能。第一关于性质方面的研究：（一）请问你既然力说法律和契约不同，为什么称国家订定的是法律，各地方自行订定的是契约？（二）你若说有制裁力使人必须遵守的才是法律，我们真不明白任人不必遵守的契约是一种什么东西？（三）若说国家统一的法律是不能尽合各地方的习惯心理的，我请问各地方内、各村落、各团体、各个人间底习惯心理是否都是一样？（四）若以是否经过同意分别法律和契约底不同，代议制是你们不赞成的，那末，个人间团体间的契约还容易经过人人直接的同意，若地方的契约（其实就是地方的法律）要经过人人直接的同意，岂是容易的事？（五）即令可以经过人人直接的同意，试问又如何经过定契约时还未曾出世之人的同意？（六）即说不避麻烦，凡在一个地方范围以内有一个新出世的人都要征求他的同意通过一次，那末对于还不会说话的儿童如何征求他的同意？（七）如果不经

过他的同意，别的契约不用说，关于儿童直接身受的儿童规约，是否也和你所谓只有一方面创制权的法律相同？（八）若说契约底同意权应以相当的年龄为限，现象怪极了，因为你们主张对于未出世的人还不能剥夺他的同意权。试问为什么已出世的人反来要到相当年龄才有同意权，这种规定年龄的契约又是不是只有一方面的创制权呢？第二关于效能方面的研究：（一）在无政府社会里，倘有一地方、一团体自行订定契约准许吸鸦片烟或赌博，别的地方、别的团体对于这种自由契约底效能怎么样？（二）在无政府社会里，倘有一地方、一团体自行订定契约拥戴出一个皇帝或选举出一个总统，别的地方、别的团体对于这种自由契约底效能怎么样？（三）倘有一地方、一团体自行订定契约有损于他地方、他团体底利益或有害于他地方、他团体，他地方、他团体对于这种自由契约底效能怎么样？照以上两层研究，在性质方面，你所说的地方的契约，实质上就是地方的法律，无论他是否好过你所谓全国死板板的法律。这是地方法和统一法良否比较的问题，不是根本上法律应否存在的问题，你拿他来否认法律，算是文不对题。在效能方面，正赖有国家最高权力所制定统一的法律，以为各个人、各团体、各地方契约底标准及监督，才可以维持各种契约底效能。你说立法权是放在几个代议士手中，不在人民全体。请问瑞士及美国都有全民直接投票的创制权，是否立法权都放在几个代议士手中？请问你们所急于实现的无政府制度，是否必须得人民全体底同意？代议制度是永远不能废掉的，你何所证明代议制度在二十世纪已经破产，真是跟着一般浅见的人瞎说！不但没有可以容纳全世界人、全国人、全省人、全城人开会的会场，就是全民投票也不是常常可以举行的事。全国交通开会议时，若全体人员到会，岂不因之交通断绝？又如你们若开全

世界无政府党大会，果能全体党员列席吗？所以除了用代议制度没有办法。你有何种理由可以举出一个中国和日本底治安警察法便全称肯定所有政府制定的法律都不是保护人民的？你说："法律是没有经过守法的人同意，如果法律有经过守法人的同意，为什么守法人未出世以前，法律已先他而存在？"你主张全体同意竟极端到这样可笑，我且问你：你们所急于实现的无政府制度，是否必须一一得到未出世人的同意，是否不许无政府制度先他而存在？你倘没有充分的理由回答我，我便不能不可怜你脑筋坏了！

4. 你说，现在之不顾廉耻，甘犯众怒者，皆因私产制度迫之使然，到了共产之世，这种人当可绝迹。我说，这种人不绝迹如何能够到真正共产之世。我再正告你一次：共产之世仍旧是我们这万恶的私产之世渐渐改造出来的，并不是用符咒把这腐败的旧私产之世沉到海底，突然另外现出一个新的共产之世与旧的私产之世没有连续的关系呵！你说，如果他一定要甘与社会的幸福为敌，极其量我们就用对待资本家的手段对待他便了。我们不知道你所说对待资本家的手段是什么？用手枪炸弹对待他，未免小题大做了；用刑法制裁他，你们是反对刑法的；收没他的财产，那时已无私产了；剥夺他的选举权，你们是反对代议制度的；用诚恳的态度劝告他，他是不听的；拉他到学校去受善良教育，他是不肯去的；送他去到远方，未免是以邻为壑。终是没有办法，只好任他为恶而已。你所说的乃是合一群人而有一种共同的目的、共同的契约，不论人数之多少，都可以叫做一个社会。这是团体不是社会，你是学哲学的人，难道团体与社会还分不清楚吗？一个社会里可以包含许多团体、许多机关，社会和单一的、有界限的家庭、学校、工厂、学会、党派等团体不同，也正和单一的、有界限的监狱等

机关不同，所以不能退出。但若是退出这个社会，跑到远方，远方那里也有社会。除非跑到空山无人的地方或是自杀，才算是退出了社会。

5. 你只看见第二十七条自由自治等合味的名词，你可曾注意到第三条加入底限制及各团体底义务？又可曾注意到第四条所说“本总联合会由一个国民委员会支配之”？又可曾注意到第五条所说：管理委员会是由国民委员会指命的，各团体间底冲突是由管理委员会裁判的？又可曾注意到第九条所说“国民委员会实行各国民大会底决议干涉关于劳动者阶级的一切问题，决议一般性质的一切问题”？这是不是有一点权力集中的倾向？我们正因为他仅仅只有一点权力集中的倾向，而犹迷信各团体底自由自治，未能完全权力集中，所以不适于革命。劳动团体底权力不集中，想和资本阶级对抗尚且不能，慢说是推倒资本阶级了。因为权力不集中，各团体自由自治起来，不但势力散漫不雄厚，并且要中资本阶级离间利用和各个击破的毒计。我所以说，权力集中是革命的手段中必要条件。

6. 我原来知道你不是相信 Stirner 派个人无政府主义的，但你却是相信人人同意人人可以自由退出社会，这种思想仍旧建筑在个人的自由权上面。系这样一面赞成社会的联合一面又主张个人的自由之矛盾思想，不但是你，克鲁泡特金正是如此。我看还是 Stirner 反社会的思想彻底得多、圆满得多，因为有了社会的组织，个人的自由便要减削，社会的组织越庞大、越复杂，个人自由减削的分量越多。我原来知道你也不是相信 Toktoi 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的，但你却是相信不以多数压服少数的。像这样矛盾思想，不但是你，克鲁泡特金正是如此。我看还是 Toktoi 无抵抗的思想彻底得多、圆满得多，因为抵抗便需要强力，便会发生多数压服少数，甚至于少数压服

多数的事。例如主张无政府共产革命的人，在一个社会里无论是多数或是少数，当然要抵抗资本阶级，当然要压服了少数或多数顽强拥护政府及私有制度的资本阶级，然后无政府共产社会才能够实现的。假定我如果相信无政府主义，我宁肯相信斯悌纳和托尔斯泰而不相信克鲁泡特金，因为斯悌纳否认社会的组织，在理论上才算得把个人自由底障碍根本除去了；托尔斯泰看穿了抵抗、强力、政府、国家、法律、军队，这些事是必然相因而至的东西，他又看穿了个人的自由在农业手工业时代多过机械工业时代，大交通、大工业越发达，法律的强制力之需要也跟着发达，个人的自由遂跟着减削，所以他极力反对工业交通等一切物质文明。这两人底学说思想是否向着人类历史进行的线路逆行，这是另一问题，可是他们的学说思想都是一贯的而不自相矛盾，才是真的无政府主义。至于克鲁泡特金，一面迷信个人的自由，一面又赞成社会的组织；一面提倡大规模的交通工业，一面又主张人人同意权及人人自由退出社会；一面主张抵抗的革命的行动，一面又反对强力反对以多数压服少数。这种矛盾的学说，不但不是真的无政府主义，并实在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你若真相信无政府主义，我劝你还是相信斯悌纳和托尔斯泰才对，因为要实行无政府主义，只有求教于反社会的个人主义及无抵抗主义。若离开了个人主义和无抵抗主义，那强力、政治、法律等，一切抑制个人或团体自由的事便必然不免，所以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已百孔千疮的露出破绽来了。我所以说你若是反对个人的无政府主义和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便是把无政府主义打得粉碎。

7. 抵抗必须强力，只这一点已经使你们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露出很大的破绽。你现在说抵抗和压服完全不同，并举朝鲜独立及夺回贼赃为例，请看朝鲜已经抵抗了日本几次。

若不由抵抗达到压服日本的程度，日本如何肯让他独立？你若不能压服盗贼，哪能夺回自己的东西？你既然不敢附和“以暴易暴的办法”，那末，将来推倒资本阶级以后，你们无政府党一定反对以资本阶级压服劳动的办法压服资本家了！难怪有人说无政府党是资本阶级底好朋友！

8. 我在女师底演说是：“我的意思以为物质上的生活，能够做到平等自由，便是正当的人生，因为人人都是人类，不应该受他人的压迫。”这几句话分明是指物质的生活上普通事项而言，前函已分析说明这是属于反乎自由的（甲）类，是指一阶级无理的压迫他阶级，一个人无理的压迫他个人，好像资本家之于劳动者，男子之于妇女，并且郑重告诉你，现在讨论的是（乙）（丙）两种，女师底演说是（甲）种，言非一端，义各有当，你如何仍旧并为一谈？政治上革命者压服顽固党，教育上教育者压服受教育者，和物质的生活上人人不应受无理的压迫，试问有何冲突？在一群之内，人人能为社会公共利益牺牲自己的意见以就他人，那自然极好。我所问你的是：若在一群之内处于万万不宜分裂的境况，而少数的顽固党对于一个关系一群存亡的问题，坚不肯为社会公共利益牺牲私见以就他人，拉他去受善良教育，不但他不肯去，而且也来不及了，请问此时除了压服他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好方法？有史以来革命成功的，无一不是少数人压服了多数人，你有何种证据断定社会上若有多数的顽固派，则社会革命不能成功？又有何种证据断定社会革命后没有多数的顽固派？俄国底十月革命是不是少数人的运动？现在他革命以后，在国民全体上看起来，是不是顽固派仍居多数？我们中国倘有一万万人献身社会革命运动，你想能否成功呢？你是否反对以一万万人压服三万万人呢？

9. 你这一段话我大部分莫名其妙，所说的比方，我想多

数读者也都莫名其妙。我并未曾说你说过惟资本家方能够联合，我只说："倘然能够这样（即指资本家的产业联合而自由，而人人同意，而无强制执行的事），便不必无政府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也足令先生讴歌崇拜了！"我曾问你：克鲁泡特金的两段话仅是说明"联合"之可能，未曾说明"联合而且自由"之可能。欧美各国间在资本家管理之下大规模的生产联合很多，试问其中办事都须得人人同意吗？都是自由而无强制执行的事件吗？你既然理屈词穷，最好是一字不答。我真想不到你竟然说出"既以自由契约而联合，便可依照自由契约而行使他的自由，这是人人都晓得的"这样可怜的含糊搪塞的话来，将我问的资本家生产联合里办事是否人人同意及有无强制执行等话一字未答，并且你自己硬说这种联合有联合之可能，便可以不必再行讨论了。你虽不敢再行讨论，我还是要再行讨论，我还是更严重地问你：资本家生产联合里办事，是否有须得人人同意的自由及无强制执行的自由？倘能够这样自由，便不必无政府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也足令你讴歌崇拜了；倘不能够这样自由，这种联合而不自由的自由联合（近代资本主义之下，自由贸易、自由竞争、自由投资、自由契约、自由联合都是资本家底不法自由。资本家产业联合是自由的，联合起来办事的条规是不能自由的），在你引来证明你"自由之与联合绝对没有冲突"的主张上，试问有何意义？在雇佣制度的资本主义之下，劳动者用去劳力的最大部分是替资本家做工，不但可以解辞职务，就是怠工罢工都是合理的。在共产主义时代，劳动者完全是替社会和自己做工，不但无正当理由不应该自由退出，并且怠工罢工都应该受相当的制裁。你们倘不能了解这个道理，你们倘以为这样不自由的办法比现在雇佣制度资本主义的罪恶还深，你们还是去跪在资本主义脚下享受那奴隶的自

由罢！

10. 广州两个学生会现在已经联合起来没有，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如是：一切社会、一切生产机关、一切交通机关，如果都像广州学生会那样不同意便自由分裂，分裂之后不同意再分裂，分之又分至于个人而后止，如此小团结、小联合都不成，大团结、大联合更怎能够成立呢？即令广州两个学生会已经联合拢来了，这因为他是学生会还不碍事，倘若是生产机关或交通机关，那分裂到再联合起来期间的紊乱损失，谅无人能够否认。我们并非有意反对人人同意自由联合的理想，乃因为这理想在许多事实上分明是不可能的，为大团结、大联合的目的计，不得不承认有强制那不合理的不同意部分服从那合理的部分之必要。这种情实和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邻国及陆荣廷之掠夺广东远非一类，何得举以为喻？

11. 社会和团体不同，不是单一的，不是有界限的，不是有门可闭的。抬出和他有关系的人之团体外头，还是不曾离开我们的社会。若说送到远方，把这种（常不尽责任而且常侵犯他人自由的）人送到远方底社会，岂不是以邻为壑吗？

12. 个人与个人间的契约，尚可望拿道德、名誉、信用来维持，有许多人不顾名誉、道德、信用，还是有法律制裁的必要。至于各团体间及个人与其他团体有冲突时，这便复杂了，便非道德、名誉、信用所可维持的了。找第三者排解，这本是现在的社会中常有的事，正为有恃强欺弱的人不容排解，所以才有法律制裁的必要。照你说“我们就可联合起来干涉他像协约国之对待德国一样”，那末，你虽反对法律的制裁，却很赞成武力的制裁了，因为协约国若不用武力，如何能干涉德国？你说“将来各地方各团体之联合，也如协约国一样，不必要有

一中央统治机关来干涉他的。所以不必要一国压服那一国，一地方压服那一地方”。我对你这段话有三个疑问：（1）协约国果然未曾压服那一国吗？（2）协约国之上倘然有一个中央统治机关——强有力的中央统治机关，国际的强弱吞噬纷争岂不可以减少一点吗？（3）将来各地方、各团体之联合，果然也和协约国一样吗？将来政治上的自由联合，你举协约国为榜样；将来经济上的自由联合，你引克鲁泡特金所举欧美资本家的共同企业为榜样，恐怕有人听了你这些说话，会以为无政府的自由社会已经在欧美各国实现出来了。

13. 可以利用群众心理的一二人，乃是置身群众之外，有自动的意识来利用群众之野心家。大的科学家一旦置身群众中，个人的意识为群众心理所压迫，往往失了理性，被动的、无意识的随着群众走，所以不能利用群众。请问这有何矛盾？我们始终所讨论的，是法律可不可以绝对废除的问题，不是法律有没有万能的问题，这一层你要弄清楚。固定的事，自由契约的力量能维持，那自然无问题。现在的问题，乃是自由契约的力量不能维持时如何办？我对于绝对废除法律的疑问就在这一点。一时的事，或为法律条文未备的，或法律条文已与现社会生活状况不相应而一时未及修改的，也不是绝对没有就公众意见来解决的先例。但这种公众的意见，非万不得已断然不可以轻用，其理由有三：（一）是因为公众究竟是什么？有何标准范围？（二）是因为所谓公众的意见，是否野心家在那里利用群众心理？（三）是因为多数知识浅的人所发表的公众意见，是否合乎其是非也是一个问题。拿这种惝恍迷离不负责任的公众意见偶然来补助法律，已经是非常的革命的现象了，倘拿他来代替有固定性的比较可信的法律，真是大错而特错。天下事虽是千变万化，法律也是进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定法律的

人虽没有预想的天才，但他也不能禁止后人以相当的手续加以修改的。未经相当的手续修改以前，法律自然是应该死板板的不能更改。这种死板板的固定性正是法律的好处。倘毫无固定性，随时都可以由人民自己修改。所谓人民到底是些什么人？多少人？如此野心家烂仔都可随时以人民的名义修改于自己不便的法律，无政府党主张以公众的意见代替法律之大缺点正在此处，你如何反说这是无政府主义最完美的地方？

在以上讨论的范围以外，有二点不得不附告读者：（一）声白虽相信无政府主义，却也极力赞成阶级战争和革命的行动。现在和我讨论的大半是远的将来社会组织问题和终极的法律存废问题，若劳农俄国现行制度，他也认为是革命时代、过渡时代之自然现象，并不加以非难。（二）声白底思想是信仰克鲁泡特金的，不是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所以什么虚无主义、无抵抗主义、个人的无政府主义，他一概反对；他的行为算得是一个纯洁的青年，绝不像一般“下品的无政府党”，我很为中国无政府党可惜少有声白这样的人！

根据一九二一年八月一日出版的
《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刊印。

PDG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

（一九二一年八月）

资本主义在中国各大商埠发展的状态，和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发展的状态是没有分别的，新式的生产制度一天一天的把旧的生产方法毁灭，一天一天的把劳动者集中到工厂里去，叫他们做机器的附属物。一班男女劳工在这种新式的生产制度下面的工作情况，简直是和牛马一样。

他们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剥夺者，换到极少的工钱。他们血汗换来的工钱，多半不能维持自己生活，受饥受冻的劳工，随处都可以发现。还有千万的小孩子们，不分日夜，到纺织等工厂里去作工，工作时间多半是每天十二个钟头起码。他们的健康是牺牲在这剥夺制度之下，他们定不能得受教育的机会。他们从极年幼的时候，就变成了本国或外国资本家的富源开发者并变成了资本家的新式奴隶。这种痛苦的工作状况，加在这班男女工人和童工的身上，一定会迫着他们自己团结起来，向着他们的东家——剥夺者——为有力的奋斗，这是我们敢断言的。

但是劳动者没有组织，或是只有公所和无意义的工会组织，自然这种团结是不能够自卫，也自然是无反抗的能力。而且劳动者把他们自己分成什么宁波帮、广东帮、江北帮等等是不行的。这是把自己分裂的办法，怎样能拿着这种团体来和资

本家奋斗呢？我们只有把一个产业底下的劳动者，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做成一个产业组合。因为这样一个团体才能算是一个有力的团体，要这样的组织法，劳动者才能用他们的组织力，做奋斗事业，谋改良他们的地位呢。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由上海——中国产业的中心——的一些劳动团体所发起的，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的总机关。他的事业是要发达劳动组合，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们的密切关系。但是这些事业是必要大家都来做的，所以我们请求那些已成立的劳动团体加入这个书记部与我们共同进行。

劳动界的伙伴们呀！我们拿外国经历过的事实做比例，知道我们的事业在起手的时候，一定要遇着非常之多的困难。特别是我们这个阶级的知识缺乏，是最大的困难。但是资本制度在中国日见发达，我们极相信劳动者的团体也会日见发达，日见有力；并且我们相信将来的世界一定是工人们的世界。中国的工人们呀！我们赶紧联合成劳动组合呀！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特立[1]等二十六人宣言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即张国焘。

PDG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

——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

同人公鉴：

中央局议决通告各区之事如左：

（一）依团体经济状况，议定最低限度必须办到下列四事：（A）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七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B）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C）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也须有切实的联络；在明年大会席上，各区代表关于该区劳动状况，必须有统计的报告。（D）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

（二）关于劳动运动，议决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唐山、南京、天津、郑州、杭州、长辛店诸同志，都要尽力于此计划。

（三）关于青年及妇女运动，请各区切实注意。“青年团”

* 这个文件是陈独秀起草的。

及“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及章程日内即寄上，望依新章从速进行。

中央局书记 T. S. Chen[1]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即陈独秀。

PDG

所希望于劳工会的*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毛　泽　东

劳工会现在已周年了，我同情于劳工会也一周年了。为什么独同情于劳工会？劳工神圣，一切东西都是劳工做出来的，劳工会是劳工的团结体，谁也应该同情的。劳工会这一年来的艰难缔造，在湖南劳动运动史上已写完了头一叶，现在要开始写第二叶了。我愿这第二叶上写的要大不同于第一叶：材料更丰富，意义更新鲜，章法、组织更美备。因此我就要本我思虑所及，贡献几个希望条件：

（一）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是宗旨所在，希望劳工会诸君特别注意的。

（二）组织上宜一依西洋工会组织，由代表会议产生相当名额之委员赋予全权组织委员会执行会务。旧的行会式的组织固然要不得，职员太多、分部太繁、权力太分也要不得。

---

* 这是毛泽东在湖南劳工会刊物《劳工周刊》上发表的文章。湖南劳工会是黄爱、庞人铨等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长沙成立的，初创时受到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影响。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下旬改组时，接受了毛泽东在本文中提出的建议。

PDG

（三）工会是工人组织的，所以工人应该自己养活工会，更进则准备罢工基金和选举基金，现在不能遽言及此。我以为无论如何第一步要办到凡入会的工人每人必出至低限度的月捐，少至一个铜元都可；第二步办到自己养活工会。这一点很要紧，望劳工会诸君注意。

我所希望的就只这三项。最后我要向工友们简单地说几句话，当一杯酒，热一热诸君的肚子：

不劳动的不得食！

劳动者获得罢工权利！

劳工神圣！

各尽所能，各取所值！

全世界都是劳动者的！

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PDG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九日）

李　大　钊

今天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第一次公开讲演。兄弟得乘这个机会来把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大概讲讲，实在非常荣幸。

马克思的学说很深奥，我固然不能说了解他，我并且不敢说对于他有什么研究，不过乘这机会，同各位谈谈。

大家现在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都很想研究，但是真正能够研究他的很少。不但真正能够研究他的很少，甚至于关于他的著述，仅仅只看过一遍的，这样的人也不能找出。现在已经有个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了这会，想必可以引起大家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兴味。倘若各位能于读书之余去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使中国将来能够产出几位真正能够了解马克思学说的，真正能够在中国放点光彩的，这实在是我最大的希望。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很深奥。根据我所知的，提出他学说中的两大原理：

第一，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之下，资本家把劳动的结果怎么劫去；

第二，现代经济组织之趋势。

在从前，大多数的人根据统计学立论，提出生产的三要素：资本、土地、劳动。既然如此，那么，说到分配，一定也

是三方面。于是资本家利用这样好听的理论，实质上从劳动者的手中劫去所得。我们且看，地主得着“利润”，劳工得着“工银”，外面看起来，好像很公平似的。其实，“资本家得了劳动结果，劳动者仅仅得了他们劳动结果的一部分!”好，从马克思起，揭破了“此中秘密”，他详详细细地讲这“剩余劳动——剩余价值”。

价值是什么?“价值就是劳动的分量”。譬如两件东西，说他们俩的原素相等，意思就是说他们俩的劳动分量相等。例如八时间的工作，便等于八时间的劳动分量。“劳动量与劳动力不同”。例如多少煤的生产等于多少劳动量，而在生产此煤时所需之力，则为劳动力。又如工作十点，须有能够工作十点之力，而此十点工作则为劳动分量。

物品的价值是什么?物品的价值，就是劳动分量，被资本家劫去的便是这个。例如工人工作，一天十点钟，十点钟的工作等于十点钟的劳动分量，资本家仅仅从这劳动分量中拿出一部分给工人，维持他们的劳动力，其余都归自己所得。我且再拿机器作个比方，可以使我们更明白一点。比方，我们去问一个工程师，一副机器得多少钱维持他的生命，倘若说，要十吨煤维持他的生命，这个意思就是要拿十吨煤去维持他的劳力；除掉拿这十吨煤（煤之价值由于劳动分量）去维持他的劳力外，他所生产的都被资本家得着。这正如劳动者作十点钟的工，除拿五点的工作维持他们的生命外，其余五点的工作，都被资本家劫去一样。这被劫去的五点工作，便是剩余劳动，便是剩余价值，便是资本家要想劫夺的东西!——以上所讲，即为“马克思剩余价值说”。

在这资本家靠着资本主义的组织情形之下，劳动者仅仅得着一部分，而资本家则劫去剩余价值，这层已经说过。现在且

讲剩余价值之来源。

马克思把资本分成两种：可变资本，不变资本。不变资本，只能保存其原价，可变资本，除此之外，还可另生价值。Adam Smith 称不变资本为固定资本，可变资本为流动资本。马克思同 Adam Smith 的分类差不多完全相同。其不同者，马克思所说的不变，不是资本的形状不变，乃是他的价值不变，Adam Smith 所说的不变，乃是形状不变，如机器。至其所谓流动资本者，包含着两部分。他把他包含进去的这一部分，就是形体虽变，而仅能保持其原有价值者。马克思把这部分归并在不变资本内，此为马克思与 Adam Smith 分类不同之点。据马克思的意见，这不变资本，在生产程序中，或者不如可变资本之重要。可变资本，除维持劳力外，更能发生新的价值。新的价值之发生，完全靠着可变资本。拿什么去维持劳力？资本家这样：从劳动分量内拿出一部分给工人，去维持他们的劳力。于是劳动的结果，全被资本家劫夺。资本家又利用这生产须靠资本的理论，可变不变的混状，拿他们的障眼法，暗中把劳动所得的结果完全掠夺。我们知道，资本家总是说，生产须靠他们的资本。但是资本又是什么？资本，他是劳动的结果！因为社会上有了私产制度，于是他们也拥有资本。他们有了资本，于是也有机会去劫夺劳动的结果。资本这个东西，在马克思看来，并不如何重要，最可靠的只是劳动者的劳力，因为他能产生新的价值。

有许多人讲，劳工既然是神圣，资本也是神圣的。不错，可以这样说。但是要晓得，资本是劳动的结果，资本神圣是因劳动神圣而来。所以这神圣，应该属于劳动者，而不应该属于资本家。——说到这里，资本家的秘密，我们又可从马克思的学说中把他揭破。

我们不妨再说一说资本家取利的方法。资本家取利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增加劳动的时间，一是减少劳动的工银。增加劳动的时间，便是增加剩余劳动、剩余价值。例如劳动者一天作八点钟的工，只要三点的工作即足维持他的生命，则剩余劳动、剩余价值为五点。倘若要作十二点，则剩余劳动、剩余价值为九点。剩余劳动、剩余价值越多，资本家的利润就越大。所以资本家极力的增加劳动时间。一方面，资本家想极力的增加时间，可是一方面，劳动者想极力的减少时间。在英国，劳动者有九时运动；在世界，劳动者有八时运动。八时运动，现在多已成功，近来又有六时的运动。六时运动，为资本家产业家所倡出，因为他们觉得六时工作于他们更有利。在现在机器时代，机器工作可以日夜不息，人去工作总有疲倦的时候；拿精神疲倦的人去作工，结果生产减少；生产减少，这是于资本家大不利的。所以资本家把昼夜分为四段，教劳动者换班工作。每人只作六点钟的工，自然精神很好；精神好，自然生产多；生产多，自然于资本家有利；于资本家有利的事，他们自然愿意作了。

资本家利在增加劳动时间，劳动者利在减少劳动时间，这层已经说过。但是资本家还有一个法子，是于他们有利的。什么法子？减少工银，减少劳动者生活费。他们利用妇女儿童，雇他们来作工，给他们很低廉的工银。有许多国家为保护妇女儿童的健康，定了一种工厂法，限制工作。但是资本家依然雇用妇女儿童，骗取他们的剩余劳动。从此，更可证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说，揭破了资本主义下之秘密。

根据马克思的学说，一方面资本家骗取剩余劳动，一方面却又有一种新趋势。什么新趋势？“资本集中”。资本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于是资本家获利更厚，而小产业因此凋敝倒闭者

亦复不少。从前在小产业中可以作事的人，既然受了大资本家的压迫，渐渐不能自存，于是小资本家亦不得不去劳动，而变为“无产阶级者”。大都市发生的大产业一天多一天，失业的“无产阶级者”也一天多一天，于是千千万万的“无产阶级者”齐集资本家之下，而形成社会上的两大阶级：

“有产阶级

无产阶级”。

我们知道，从前的劳动者很少集合的机会。自经资本集中，大产业发生之后，于是劳动者得着集合的机会。他们集合的地点，便是资本家的大工厂，他们有了“阶级自觉”，大家联络起来，和资本家作战，和资本家竞争。——这样，发达的资本家他们自己却产生了可以致其死命的敌人——无产阶级。这也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了。

马克思唯物史观讲，在资本主义发达中，产生了一种新势力。这种新势力，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之发生，恰如鸡子在卵壳里发生一样。“社会主义”之想打破资本主义的制度，亦恰如鸡子之想打破卵壳一样。卵壳打破，才能产生一个新生命；卵壳打破，才能产生一个新局面。在这卵壳尚未打破的时期，是一种进化现状。到鸡子已经发生成熟的时期，便非打破这壳不可。“社会主义”也是如此。到了已经发生成熟的时期，便非打破这资本主义的制度不可。打破卵壳，是革命的现象；打破这资本主义的制度，也是革命的现象。有些人，愿意进化而不愿意革命；“但是我们也要知道，革命乃是我们更大的途程”。鸡子在卵壳里，长了眼睛，长了头，长了毛，既然非打破这壳不可，那么，“社会主义”到了他羽毛丰满的时候，自然也非打破资本主义不可。鸡子打破他的卵壳，“社会主义”去打破资本主义，这都是“革命”。——“革命是不

可避免的”。

从马克思学说理论方面讲，虽然有人说，资本、土地、劳力为生产的三要素，但马克思则以为一切生产都从劳力，都是劳动结果。资本、土地都是从劳力生的，都是劳动结果。如水，如煤，他们都没有什么价值。水一定要从海里搬到这地，才有价值；煤一定要从矿里搬到这地，才有价值。怎么去搬？靠劳力。所以一切价值都靠劳力，变地变形而生产之。在从前，虽然一切生产都靠劳力，但分配起来，纯由资本家作主——我们简直可以说，“从前没有分配”。

再从事实方面讲，在资本主义下，才发生“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发生，便要去推翻资本主义。这可以说，“资本家自已，产生了致其死命的东西”。

与资本家相对的便是劳动阶级。劳动阶级，当然是处于不平的地位。到现在他们有了觉悟，有了“阶级自觉”，去集合全世界的劳动阶级，成一“全世界劳动阶级的经济组织”。

有人说，中国劳动阶级没有经济的组织，不能同世界的劳动阶级联合。但我想，这不尽然。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受了外国资本家的影响，华工又散在全世界，不能说中国的劳动阶级不重要——不过有一点可惜，就是我们东方劳动者，没有“阶级自觉”，常常拿很低廉的工银替人做工。因为这个原故，各国劳动者很不高兴，美国已经排斥黄色人种，法国也把华工渐渐底送回。在俄国的华工，现在倒还没有遣送回国。我们想想，世界各国，劳动者与资本家都有一种对垒了的趋势。一些小产业受资本家压迫而变成无产的，他们却有集合的地点，他们却找得着资本家的门同他们对抗。但是中国的劳动者，情形就不相同，他们既没有集合的地点，更找不着资本家的门，同他们对抗！国内的小工业，因受外国资本家经济势力的压迫，

渐就凋敝，无以为生。他们这种受他国资本家间接压迫的影响，比各国无产阶级者受他们资本家直接压迫的影响还要厉害。以至于流离失所，散而之四方，不晓得什么地方可去工作，可去集合。国内是这种情形，有这么多的无产阶级，我们再从全世界着想，还能说中国劳动者与社会无关吗？倘若还说与社会无关，恐怕不甚合理吧！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呵！你们联合起来吧！”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已经说过。现在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他们都有了觉悟，有了“国际组织”。他们为什么要有国际的组织？因为资本家想压制劳工，极力的增加时间、减少工银，劳工反对这种办法，遂以“同盟罢工”为武器起而与之抗，倘若他们没有“国际组织”，资本家便可利用这点去雇用别国的工人，这样，“同盟罢工”就会失败。譬如日本工人罢工，华工就可过去破坏，这便是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国际组织”。

“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不是没有。有“第一国际大会”、“第二国际大会”、“第三国际大会”。“第一国际大会”，到普法战后消灭了。“第二国际大会”，很有马克思的精神，但是欧战一起，里头的会员大多数弃其主义而从事于战事，名虽存而实亡。“第三国际大会”，曾在莫斯科开会，很能承继“第一国际大会”，而有世界革命（World Revolution）的精神，比较的还算进步一点。

近几年来，劳动界的势力渐渐地大起来。英国共产党已经受了“第三国际大会”的命令，而加入国内的劳动党。世界的劳动者，现在差不多渐渐地都联合起来。他们的势力一天巩固一天，革命的时期也一天逼近一天。这完全是受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影响。在中国，有现在的这种情形，也不能不说这是受马克思的影响。

马克思的大著作是《资本论》。第一集在他生时刊行，二、三两集是恩格尔替他刊行。我们要去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只仅仅地读过一遍就不容易。有一个德国人讲，“一个人，倘若他不到五十岁，要说他能研究马克思的学说，这一定是骗子”。而以我要说我对于马克思学说有了什么研究，当然不能。不过稍微知道一点，乘这第一次讲演的机会，来与诸君谈谈。希望诸君听过这次讲演马克思学说大体之后，能够引起点兴趣，去研究他的学说，将来把研究的结果发表出来，指导社会，这是我最盼望的。

根据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晨报》刊印。

PDG

《黄庞流血记》序

（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李　大　钊

黄、庞[1]两位先生的死，不是想作英雄而死，亦不是想作烈士而死；乃是为救助他的劳动界的同胞脱离资本阶级的压制而死，为他所信仰的主义而死。因此，我乃对他们的殉死表无限的敬意！

以前的历史，几乎全是阶级的争斗史。最后的阶级争战，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开始了。黄、庞两先生，便是我们劳动阶级的先驱，先驱遇险，我们后队里的朋友们，仍然要奋勇上前，继续牺牲者愿做而未成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在废除人类间的阶级，在灭绝人类间的僭擅。但能达到这个目的，流血的事，非所必要，然亦非所敢辞。要知道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

中国社会运动史的首页，已由黄、庞两先生用他们的血为我们大书特书了一个新纪元！以下的空白怎样写法？要看我们的努力了！

根据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晨报》副刊刊印。

注　释

〔1〕指黄爱、庞人铨。

PDG

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

（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

蔡　和　森

一、劳动运动的目的与原则

自近世生产的土地、工具、资本日日集中，归最少数人私有后，最大多数的人就不能为他们自己的消费而生产。最大多数的人要维持他们自己的生存，只有向占领一切生产手段的资本家卖力，才能得着少许工钱，去买生活的物质。由此资本主义的工钱劳动制，就成为近世工人的铁锁。工人们不向资本家去卖力就只有饿死一条路！

然则工人阶级的命运，果真只有“卖力”与“饿死”两条路吗？这两条路是谁命定的，是八字或“上帝”命定的吗？不是的，是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命定的。然则工人阶级要从“卖力”与“饿死”两条路中解放出来，就只有根本推翻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将一切生产手段——即土地、资本——收归社会公有，才能打破这把工钱制度的铁锁，而直接过那“为消费而生产”的社会生活。

“一切生产手段收归社会公有”，这就是劳动运动根本的目的。

但是怎样能达到这个目的呢？唯一的方法，就只有实行阶

级争斗与社会革命。请看以下简单的理由，就明了这种方法之适当而且必要了。

近世资本主义的社会，是建筑在“以资本掠夺劳动”的根本冲突之上的。这样的冲突是怎样一回事呢？就是最大多数劳动者的生产品，归最少数不劳动的资本家所占有。近世社会“劳”、“资”两阶级的关系就完全建筑在这样经济事实的根本冲突上面。这样的冲突，只有根本改造社会制度才能解决，调和妥协是万万不能解决的。

譬如“增加工钱”、“减少时间”，这本是劳动运动迫切的急务，但这不过是工人阶级在社会革命未实现以前，为一天一天的生活所压迫，不得不日日从事这种救急的要求运动罢了。每每要求一次，妥协一次，最好的结果，不过是资本家从这方面增加几个工钱，从那方面抬高物价罢了。所以单靠这样的运动，工人阶级是永远不能摆脱工钱的铁锁，逃出“卖力”、“饿死”的圈套的，换过说，就是工人阶级永远不能超出“工钱奴隶”的地位。

故在社会革命未实现以前，一天一天的要求运动虽然是必要做的，但是要以阶级争斗的精神去做，万不要以阶级妥协的精神去做。敌对阶级之间，只有“战胜”与“战败”可言，没有“调和”与“妥协”可言。譬如这次总罢工，要求增加工钱若干，目的达到了，就是一次小胜利，没有达到，就是一次小失败。失败了，固要抖擞精神再图战争，就是胜利了也更要一息不懈，愈接愈厉。争斗一次，就要把范围扩张一次，性质严重一次，战斗力团整并发扬一次，阶级觉悟和阶级抵抗显著一次。由一地方一行业的争斗，酿成全国全阶级的争斗，由继续不停的阶级争斗，酿成总解决的社会革命，实行取消阶级，建筑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共产主义社会，工人阶级从此完全解

放，人类社会也就从此没有“人掠夺人”的罪恶制度了。

“由继续不停的阶级争斗，酿成总解决的社会革命，实行取消阶级，建筑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劳动运动的根本原则。

二、中国资本主义可怕的形势

凡工业后进国的经济生活，未有不受工业先进国的操纵、压迫的，至于被侵略的弱国、殖民地就更不待说了。中国无用说是被国际资本主义侵略的弱国，但中国的资本家是不受害的，受害的只有工人阶级。

资本家不但不受害，而且他们所借以上升的楼梯就是国际资本。原来工业后进国的资产阶级不过是国际资本的附属品。他们必须仰仗国际资本，才能开工厂、开公司、开银行。他们的工业资本、银元资本既须仰仗于外资，所以他们的资格无异就是英、美、法、日资本家的驻华代表。最显著的例，就是旧交通系和新交通系。

但他们以怎样的方法取得与国际资本勾结的地位呢？就是尽先占领国家机关，和夺取政权。譬如新旧交通系各首领，类皆为穷鬼、无赖、留学生出身，他们现在的资本和“财神”资格，都是由他们长期在交通部、外交部、中交两银行以及别的政府重要机关中取得的。国际资产阶级要在中国树立一个保护债权，巩固其长久侵略地位的附属资产阶级，就舍却他们莫属了。

中国的资本家，现在虽然不仅只有新旧交通系，但是最近的将来，一面为国际资本所资助，一面结合野蛮的反动势力，来争夺全政权，以建筑恐怖政治与资本政治于中国的，迟早就

是他们。由此中国的资本主义就将完全形成为“恐怖的资本主义”，质言之，就是“张作霖与梁士诒式的资本主义”。

据欧美各国的历史看来，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总是在资产阶级获得政权和资本政治巩固之中及巩固之后。同样的事情，现在就轮到中国来了。中国资产阶级，现在虽然这样微弱、无能，但是他们的第一举必然是掠夺政权，凭着国家机关，吸收外资，以供私人的产业经营；凭着国家权力、军警、法律、议院以高压工人阶级，他们将以“戒严令”统治工厂的工人，以“枪毙”对待罢工者。

总之，在中国现在半封建的武人政治之下，无论哪派军阀财阀得势所形成的资本主义，总不外是“恐怖的资本主义”。这样“恐怖的资本主义”正是英、美、法、日国际资产阶级要求在中国赶快建设的。

三、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

然则无产阶级怎样对付这种“恐怖的资本主义”呢？唯一的办法，只有无产阶级起来夺取政权，组织工、兵、农的国家机关，没收一切生产手段——地、大工厂、资本——和交通工具为国有，以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发展中国的大生产事业，以建筑共产社会的经济基础。

原来资本主义在中国，无论如何，是不能充分发达而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这是怎样说呢？分两层解释于下：

第一，就是因为国际资本主义始终是要以中国为原料地和销场，而不容许中国为完全的大工业国。假使中国完全变成为工业生产国，不但根本杜绝英、美、法、日的销路，而且中国加倍的价廉物美的商品反将输出于国外的市场，而占国际贸易

的优势，那么国际资本主义无异是养成杀他自己的刽子手了。这是国际资本主义断不容许中国如此的。中国的工业一天发达一天，入口的商品就要一天减少一天，同时英、美、日、法内部的失业问题便将一天扩大一天。这是英、美、日、法的资本家会容许的吗？决不会的。所以希望充分的外资来开发中国的实业，这不过是一种梦想罢了。

第二，然则中国的资本家，可不仰仗外资，而专靠集中“国内资本”来振兴实业吗？集中国内资本，可以办得几个工厂，可以修得几条铁路？这乃是完全不明国际情形和近世产业性质的稚想。自近世资本主义国际化以来，业已把东方隶属于西方了，农业国隶属于工业国了，野蛮国隶属于文明国了，还能成立锁国自立的“本国资本主义”吗？

国际资本既不容许中国生产事业大大发展，而国家资本又如此微弱不能独立经营什么大产业，然则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运命就可想而知了。

资本主义在中国之必然的要倒霉，要短命，就是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的要行运，要快来的对照。故中国劳动运动的根本方针唯有“早日在中国实行社会革命以促成世界革命，用国际共产主义的资本开发中国的实业”。

根据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出版的《先驱》第七号刊印。

PDG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

（一九二二年五月）

全国男女工人们——弟兄们，姊妹们！

资本主义没有不是靠着剥夺工人们的血汗做养料的，他发展的过程，便是工人们受痛苦的过程。所以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结果，使百余万的男女工人们集中在用机器的工厂里或各种企业里，变成一无所有的机器附属物。一班男女劳工在这种新式生产制度下面的工作状况，简直和牛马奴隶一样。所赚的工资，多半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受饥受冻的劳工，随处都可以发现。

还有数十万的小孩子们，在这种制度下面，牺牲他们的康健，他们永不能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他们从极年幼的时候起，就变成资本家的新式奴隶。这些都是我们工人身受的痛苦。我们受了这些痛苦的经验，实在不得不使我们团结起来，共同向着东家奋斗；而且我们从此觉悟，这是救济我们的唯一道路。

因为工人们渐渐明白组织的重要，所以在中国各大商埠已是组织了一些工会，也有了一些为增加工资和改良待遇的罢工运动。虽然这些工会的组织和罢工运动，还只是一个工厂，一条铁路或是一个地方的举动，但是已能证明给我们知道，凡是组织或运动的范围较大的，一定得到胜利。尤其能够证明给我们知道的，就是香港海员的罢工，这次罢工使我们知道工人们

的确具有伟大的能力和工人们是必要有组织，而且使我们知道全国工人们非一致行动不可。从此我们也渐渐明白要是工人们只有公所和无意义的工会组织，是断断不行的，因为这种组织是不能够自卫，更没有反抗的能力。我们也渐渐明白工人们是不可容那些东家或东家的走狗加入工会里去，因为那些敌人们是会破坏我们这个阶级的团体。我们也渐渐明白工人们不可把我们自己分成什么广东帮、宁波帮、江北帮、天津帮等，因为这是使自己这个阶级互相分裂，断不能用这种“帮”的团体和资本家奋斗。

全国劳动大会慎重宣告全国男女工人们说：我们工人们决不要分地域，决不要分党派，决不要分男女老少，只要是赚工钱的工人们，都应该按照产业的分类法，组织在各种工会里；而且要把各地工人们按照产业组织的工会，联络起来，组织各种全国的产业总工会。即使一时不能组织成产业组合的工人们，也应该把他们的工会组织成一个纯粹工人阶级的团体，而且要弄成组织的范围较大和更有统系的团体。

全国劳动大会告诉我们说：我们组织工会并不是无意义的，也不仅仅是娱乐、教育或抚恤的机关，我们组织工会的目的，是要用我们这个阶级的组织力，做奋斗的工作，谋达到改良我们的状况。这次大会又告诉我们说：无论哪种或哪个地方的工人们对资本家的奋斗，都是我们这个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奋斗；我们必定要互相援助，才能得到胜利。

全国劳动大会还告诉我们说：我们前面的敌人是很多的，国际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也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时常压迫我们，杀戮我们的领袖，枪击我们罢工的弟兄，禁止我们的罢工，剥夺我们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我们认定这些敌人一日不除掉，我们一日不能得到些微的自由。我们现在是须要这种自

由的，而且我们不能忍受那种压迫和杀戮，所以我们要结合全国的农人，并与小资产阶级暂时联络，共同向着那些敌人奋斗，争得我们的自由。

还有一层，就是无论外国或本国的资本家，都是我们的敌人，无论哪一国的工人们都是我们的弟兄，因此全世界工人们的联合是最必要的。就拿香港海员罢工的事实来说罢，我们便知道各国资本家与中国资本家怎样联合着压迫我们工人们。但是因为中国海员和各国海员没有亲密的联络的缘故，所以在那次罢工中间有的外国海员是隔岸观火，有的外国海员还破坏中国海员的战线呢。但是资本家剥夺哪一国海员和一切的工人们都是一样的，我们工人阶级哪能坐视那些各国资本家联合着对付各国的工人们，而各国的工人们到不自己联合起来呢。所以全国劳动大会宣告要使中国工人们和外国工人们建立亲密的关系，共同向着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前进。

全国男女工人们！全国劳动大会第一次会议，是由各省各商埠各种工人团体代表共一百七十三人组织而成的，所代表的人数共三十四万余人。这个大会所说出来的话，都是个个工人所要说的话，这次大会所讨论的事件，都是全国工人们的切身问题。而且这次大会是在中国劳动运动史上第一次的会议，这是我们工人们组织力扩大的证明。我们相信以后我们的奋斗工作较前更易成功，因为这次大会已开了全国工人们联合起来的新纪元。

从前我们没有组织的时候，只好忍受种种的痛苦。我们现在有了团体了，全国工人们有了联络了，我们从此以后是再也不能忍受了。我们做工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再也不能为着资本家——我们的敌人——的利益来累死，我们宁可奋斗而死；我们再不能忍住我们的饥饿了；我们再不能让那些外国的或本国

的监工们的手掌打到我们脸上；我们再不能看着资本家驱策那些亲爱的小孩子们死在机器旁边。我们决意也不让我们的自由完全被剥夺。所以我们要即刻联合起来，组成一个阶级的强固的紧密的阵线，向着资产阶级和压迫阶级为不断的奋斗，因为我们再不能不得到地位的改良和自由。

全国男女工人们！全世界的工人们和被压迫阶级是人类中间的最大多数，我们凭借的就是人多势大，人多势大的团体便是使我们成功的要素。所以我们极相信我们这个阶级是会得到最后的胜利的，将来的世界定必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世界。全国男女工人们！我们手携着手大踏步向前进罢！并且在我们前进的行列中，要高呼全国工人们联合起来，

全世界劳动者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

共同向着资产阶级和压迫阶级前进呀！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

（一九二二年五月）

一九二〇年八月某日，上海有八个青年社会主义者，为实行社会改造和宣传主义起见，组织了一个团体，这团体叫做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不久，北京、广州、长沙、武昌等处就有同样的团体发生，与上海的团体相响应。于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就宣告成立。

那时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只不过带有社会主义的倾向，并没确定了哪一派社会主义。所以分子就很复杂：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也有，工团主义者也有，莫名其妙的也有。

因为分子如此复杂，所以凡遇见一件事情或一个问题，各人所提出的解决方法或意见，就不能一致，常常彼此互相冲突。在这种状态下面，团体规律和团体训练，就不能实行。团体的精神，当然非常不振。到了一九二一年五月，看看实在办不下去了，就只得宣告暂时解散！

可是团体虽已解散，而其中一部分有革命精神的分子，却总是时图恢复的。刚巧同志张椿年[1]那时从俄国回来，受了国际少年共产党的命令，要在中国组织少年共产党。拿这事情与

一部分老团员商议。商议的结果，大众都以为不如将社会主义青年团恢复，内容加以整顿。于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就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正式恢复。首先恢复的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各处社会主义青年团统先后恢复了。

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恢复，由于一部分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所发起。他们得了第一次失败的教训，所以恢复的时候，就主张确定主义使分子不至于复杂。于是他们就确定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不过表面上却说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是很短的，至今不过三年左右。可是一面因为受了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和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他面因为先驱者的努力宣传，竟使马克思主义能在最短期间发达起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日益增加起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际此时会，所以竟能很快的发达起来：从恢复到现在，不到六个月期间，地方团成立者有十七处（上海、北京、南京、天津、保定、唐山、塘沽、武昌、长沙、杭州、安庆、广州、潮州、梧州、佛山、新会、肇庆），全国团员达五千余（大多数为工人，次之则学生）。其他各处将成立而未正式成立者尚很多。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既发达到这个程度，就感到从前的组织和训练有不能应付的地方，非另筑更稳固的基础不可。于是上海临时中央局就议决定于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在广州召集全国大会，解决本团根本问题。

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下午一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在广州举行开会式。这一天并同时举行马克思诞生纪念大会和欢迎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与会者除本团各处代表外，达一千五百余人。首由主席张椿年同志致开会辞，继则来

宾、劳动大会代表及本团团员演说。演说者共十六人，多鼓吹社会革命，真是慷慨激昂，使人奋发。直至五时余，始三呼社会革命万岁而闭会。

从五月六日起，就连日开会讨论议案，到五月十日晚上议案讨论完了，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就三呼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万岁而闭会。

这次大会，代表到者有二十五名，代表十五处地方团，又外国代表二名。会议日期共六日，通过议案共六件。现在将大会通过的六件议案正式公布于下：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

在最近十年间的世界情形，完全为欧美资本帝国主义所威胁。这可惊可怕的欧美资本主义大企业日益扩张，其出产品的大部分并不销售在欧美自己的国内，而输出于欧美以外的国家。

结果，每个资本主义的国家都想日日扩张自己的市场，以销售自己国家过剩的出产品，一方面又从欧美以外的消费国中收买原料及半制品。因为要不断的争夺及保护这些市场，所以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对于弱小民族就不得不用武装的侵略和竞争。现今他们竞争最烈的大市场就是亚洲，因此印度、中国和高丽等国就特别受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

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惊天动地的世界战争，其发生的原因完全由于英、法、德、奥互相争夺市场。战争的结果，瓜分了德国的殖民地，毁灭了德、奥、保加利亚的经济基础，使德、奥、保加利亚成为英、法的殖民地，并且把世界的经济秩序完全破坏了。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先后在巴黎、华盛顿及日内瓦会议中貌为和平，心实争夺宰割世界。此等会议中互相冲

突的暗礁，又将为第二次世界战争的导火线。

日、美战争既为最近期间必不可免的趋势，而英、法冲突又将相见于疆场，所以将来第二次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爆发起来，其猛烈凶残必较新近完结的大战为尤甚。

华盛顿和日内瓦会议，不过为苟延将来必不可免的大战时期之一种方法。一方面彼此借此稽延期间充分作战争的准备，他方面又可在此稽延期间尽量吸收弱小国和殖民地底精液，如原料劳力等，以补偿其在大战中的损失，并准备第二次大战的经济基础。

上次大战的结果，使英国、日本对于东方各民族的侵略愈加厉害，如英国侵略印度，每年约有百万印度劳苦人民死于饥饿；日本侵略高丽，更是一口吸收其所有精液一滴不漏。

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对于侵略中国又另取一种形势。中国最足为资本帝国主义在世界上贪婪掠夺的写照。各资本主义的国家，都以中国有广大的肥美土地，多量的贱价原料和多数的消费人口是一块肥美之肉，各想夺取比较他国更优越的权利，遂至互相争夺，而造成中国现今在国际上的特殊状况。

资本主义的列强欲达到其侵略的目的，自然要努力破坏中国的独立和自强，扶植督军武人使之互相争斗，以收渔人之利；同时又因为列强间的互相竞争，各自特别扶植其势力所及的督军武人使之互相争斗，以获得特别的权利。在这种国际资本的支配及竞争之下，遂使中国四分五裂，内政无从整理，于是列强更借为口实而谋瓜分中国或共管中国。所以中国国内的特殊状况，也是国际资本势力造成的。

中国的分裂和内乱既是由于国际资本的扶植，加之又有一班由国际资本养成的外国资本家走狗、汉奸、卖国党，在现在及最近将来更能把中国一切的经济生命尽量卖给外国资本家，

例如种种权利之割让，最廉价的原料之输出，最廉价的劳力之供给等都是。

国际资本的压迫日甚一日，中国农民与无产阶级之失业和贫困也就跟着日甚一日。他方面，大都会里又产生了欧化的资产阶级，这种资产阶级也采取外国资本家同样的形式用资本压迫中国的无产阶级。

在最近的中国，这种欧化的资产阶级虽有相当的势力，仍未得着充分发展的机会；而组织中国社会的最多数最重要的分子，还是农人、小商人和小工厂主或工厂主以及知识者等小资产阶级。

这种小资产阶级，受了国际资本和国内武人两重压迫，日在恐慌崩坏之中，于是其中的开明分子为自身生存与发展起见，遂发生反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抗本国封建武人的压迫这两种愿望。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二年义和团事件，正是资本帝国的势力压迫中国，使中国人民心情狂乱而反动的表现。一九一一年武昌革命事件，正是资本帝国的势力压迫中国，使中国人起来直接反抗封建帝政以铲除革新障碍，间接革新内政以反抗国际资本帝国势力的外患之表现。

这种反抗封建的民主革新战争，在政治和经济进化之历史的过程上有重大的意义。具体说起来，这种革命战争终局的胜利，是在能够得着对外的民族独立，对内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及普通选举各种权利。这种革命战争现时正在奋进途中。鉴于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我们无产阶级和最苦的农民都应该援助这种革命的争斗，造成无产阶级的真实力量，不应该取旁观或反对态度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但同时我们要知道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无产阶级虽可以得着些自由与权利，然而不能得着完全解放，因为民主派的小资产阶级战胜以后，

他们马上就会变成大资产阶级，而与无产阶级间的资本主义关系——即支配的关系——依然存在。所以接着民主的革命成功，便会发生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这种革命之目的是采用劳农制度，即是将政权归诸无产阶级。这种革命实现之迟速，乃依世界状况及中国无产阶级组织能力和战斗能力之强弱而定。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即为完全解放无产阶级而奋斗的组织。换句说，就是要建设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公有和禁止不劳而食的初期共产主义社会。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方面为改良青年工人、农人的生活状况而奋斗，并为青年妇女、青年学生的利益而奋斗；一方面养成青年革命的精神，使向为解放一般无产阶级而奋斗的路上走。然这种奋斗的道路并非直径的，所以现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特规定下列现时的方针，以期达到最后的目的。

政治方面

（一）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

（二）工人和农人在各级议会和市议会中应获得无限制的选举权。

（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应有绝对的自由权。

经济方面

（一）十八岁以下的青年工人，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过六小时；十八岁以上的青年工人，每日不得过八小时，但应争得平均的工值。禁止十二岁以下的青年作工。

（二）每星期至少应有连续三十六小时的休息；一切节日停止工作。

（三）禁止厂主与艺徒私自缔结契约，应制定保护艺徒的法律。

（四）改良工人卫生，禁止十六岁以下的青年作有妨害健康的工作。

（五）男女工人待遇平等，女子在分娩期两月中应停止工作，并须照常给发工资。

教育方面

（一）关于社会教育　社会主义的青年，应为所在地方的青年无产阶级组织俱乐部、学校、讲演会，以发展他们的知识和社会觉悟，并发刊通俗的日报、月报、小册子。对于青年农人亦应特别注意。又应使年长失学的青年受普通教育。

（二）关于政治教育　社会主义的青年应宣传社会主义于大多数青年无产阶级。其方法或集会讲演，或刊行出版物和小册子，并特别讲述中国政治情形及其他种种情形，以启发并养成青年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及批评力。

（三）关于学校教育　社会主义的青年应运动改革学校制度，使一般贫苦青年得受初步的科学教育，并极力运动建设普遍的义务教育和学生参加一切学务管理。取消宗教关系、地方关系及一切不平等的待遇。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于各种运动，当协同中国各种青年团体共同工作。协同各种青年团体反抗各种迷惑青年阻损青年思想进步之政治或宗教运动。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承认对于解放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问题为世界问题，要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非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共同起来革命不可。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

第一章 团 员

第一条 凡十五岁以上二十八岁以下之青年，承认本团纲领及章程，并愿服务本团者，皆得为本团团员。

第二条 年逾二十八岁者，得为本团特别团员，只有发言权。

第三条 团员入团时，须有团员二人以上之绍介，并须由该地方执行委员会通过。

第四条 团员入团时，须在该地方团书记处登记，并由该地方执行委员会盖章发给团证。

第五条 团员入团时，须缴入团费五角，并须按月缴常费一角，但劳动者入团费得免缴。

第二章 组 织

第六条 各工厂、各学校、各乡村及其他足资活动之机关中，有团员三人以上，即须组织小团体。各“小团体”满十人以上须组织干事会执行事务，任期三个月，但不能组织干事会时须设书记一人。

第七条 各地方组织地方青年团，该地方各小团体属之。选出地方执行委员会，任期六个月（任期内因特别事故缺职时，上级委员会得委派之）。

第八条 区代表大会选出区执行委员会，任期一年。

第九条 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期一年。

第十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五人组织

之，并选出候补委员三人。

第十一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互选书记一人，总理事务。

第十二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要工作分为三部：

（一）书记部——掌理组织财政搜集报告，发给通告等事。

（二）经济部——掌理关于改良青年工人农人经济状况等事。

（三）宣传部——掌理教育及政治的工作，主义宣传及出版事业等事。

第十三条　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之组织，按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之原则组成之，但须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认可。

第十四条　大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之各种议案，地方团得组织各种运动委员会分别进行。

第三章　纪　律

第十五条　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团最高机关。

第十六条　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

第十七条　大会或执行委员会之议决须为该大会或执行委员会多数之公意，少数须服从之。

第十八条　下级执行委员会须服从上级执行委员会。不服从时，上级执行委员会得取消或改组之。

第十九条　对于各下级执行委员会议决有抗议时，得五分之一的赞成者，得提出上级执行委员会判决，但在抗议时期仍须服从各该下级执行委员会之议决。

第二十条　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抗议时，得提出于全国代表大会判决。但在抗议时，仍须服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

第二十一条　团员违背纲领章程或决议案时，得由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开除之。

第二十二条　团员无故连续二次不到会或三个月不缴月费者，得由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开除之。

第四章　会　议

第二十三条　各"小团体"每星期须开会一次。

第二十四条　各地方青年团每月须开会一次（代表会或大会依各地情形而定）。

第二十五条　各区每年须开代表大会一次。

第二十六条　全国每年须开代表大会一次。

第二十七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召集全国临时会议。有过半数区之请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必须召集全国临时会议。

第二十八条　区及地方临时会议亦得照全国临时会议之办法召集之。

第五章　报　告

第二十九条　下级执行委员会每月至少须报告上级执行委员会一次。

第六章　机　关

第三十条　依照各地情形须设立平民学校、青年俱乐部、新剧团、合作社、演讲团、图书馆、出版机关等。

第七章　经　费

第三十一条　经费以团费特别捐及其他收入充之。

第八章　机　关　报

第三十二条　本团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出一机关报，团员负订阅及销售之义务。

第九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章程得由全国代表大会过半数之议决修改之。

第三十四条　本章程由本团第一次全国大会议决，自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日起发生效力。从前各处青年团的章程，一律取消。

“附”议决案五则：

（一）佛山分团由大会议决认为特别区，不适用章程之第二条。

（二）特别团员经所在地方团团员过半数议决认为必要时，并得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同意，得有被选举权。

（三）有三个地方团以上方可组成一区。其划分法，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决定。

（四）不属于区之地方团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直辖，或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托某区兼辖。

（五）前加入本团团员须追缴入团费。

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的议决案

我们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为无产阶级尤其是为无产阶级的青年奋斗的团体，所以我们对于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应

该尽最多最大的力量。此时我们中国青年工人农人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呢？在教育方面说起来，可以说完全没有。在经济和待遇方面说起来，普通工厂尤其是纺纱厂、丝厂、香烟厂、煤矿里为工价低廉起见，雇用多数男女童工，内中还有许多不满十岁的童工，随着大人做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若稍有疲倦的状态或稍有错误，损失原料和工具，便受监工人底毒打。丝厂里毒打女童工尤其残酷。所得工钱最少的仅有铜子六枚，这六枚铜子在大都市里万万不够生活，不过补助一点生活费，衣食住大部分还须仰仗家庭。这班童工的生活状况，完全是我们青年底活地狱。在小工厂及手工作场或店铺底学徒，虽然有一个出身做小工头的希望，但在学徒期内完全是师傅底奴隶：没有工钱，工是代师傅白做的，师傅不过指挥着，出力的笨事都是学徒做；不但替师傅做工，还要替师娘私人服务。做工时间自早至夜没有限定，有许多小铁工作场底学徒，自早晨天明至夜间十二时后，除了吃饭和解大小便，大约一天总有十六小时以上在火炉旁边打铁或是烧火，就在天气极热的时候也是如此。师傅利用学徒替他白做工，所以不肯尽心教授学徒，任意延长学徒出身底年限。因此学徒的生活困苦也不在工厂底童工之下。

青年农人生活状况虽然比都市底工人稍好，然因物价腾贵、地主兼并的结果，青年农人渐渐之由自种变为佣工的地位。佣工底工钱，青年比大人低，而做同样的工作，牧童底工钱更低到每年不过一二元。

依据以上青年工人农人的生活状况，有必须改良之条件如下：

（一）限定童工作工最低的年龄；

（二）无论成年或未成年的男女工人农人，凡做同量的工

作者，须得同量的工钱；

（三）禁止一切监工人、工头或师傅对于男女童工及学徒加以体罚；

（四）限定童工及学徒作工最多的时间；

（五）限定学徒出身最多的年限；

（六）禁止学徒为师傅师娘私人服务；

（七）改良工厂及店铺有害童工或学徒卫生之事；

（八）筹办青年工人农人的义务教育；

（九）争得或设备特别关于青年工人农人的娱乐机关，如青年游戏场、青年俱乐部等。

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于上列各事，或单独，或加入他团体有关系此类运动时，为青年工人农人尽力奋斗。

关于政治宣传运动的决议案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代表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革命团体，所以他的生命在不停的实际活动上面，而不在坐以论道或空谈主义的上面。

在社会革命未实现以前，我们必须以不停的活动引起并指挥种种政治性质的群众运动。无论在任何困难和压迫中，我们必须公开的、半公开的，或潜在的保持并发展与群众的接触。

每一种群众运动发生，尤其是政治性质的群众运动发生，我们必须努力参加其中，占得指导的地位。无论是爱国运动，或自由运动（争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自由权利），只要是能引起群众同情的，我们必须对团员下动员令，一律参加到里面去活动。

我们所发起或参加的群众运动，最初务宜多带普遍的性质，使运动的范围扩大，人数增加。所以开始切戒显出无益的严格色彩，致使群众畏忌不前，而成流产的或孤僻的运动。

每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无论是国内的或国际的——发生，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即须详细加以分析，议决对付和宣传的方针，通知本团全国各机关一律执行。最重要的方法，就是组织种种政治的演说、集会和俱乐部，在必要的时候并须组织普遍的大示威。此外发刊种种定期或不定期的出版物及小册子、传单等，亦为宣传的重要工具。

各公众机关、各团体有公开的政治性质的集会时，本团中央及地方机关必须派人出席演说，务使听众的大多数在政见上成为无产阶级化。

我们最不可放松的宣传机会，就是国会、省议会、县议会、市议会选举的时候，我们必须总动员向群众公开的宣传无产阶级的政见。

关于教育运动的议决案

一、青年工人和农人特殊教育的运动

现在中国大多数青年工人类皆陷于无知的状态之中，而成为简单的劳动机械。工人愈无知识，资本家便愈容易加以掠夺和压迫。我们务必将这样可怕的情形，唤起青年工人为争得教育权利而奋斗，并努力从事于识字教育和阶级争斗的教育运动，普遍的启发一般青年工人的阶级觉悟和争斗能力。

至于乡村青年农人的知识状态，比较城市青年工人更为落

后，所以更容易成为城市资本家廉价收买和容易驯服的劳动后备队。故我们对于青年农人，尤应努力作特殊的教育运动，并使一般稍有助产的农人子弟，明了他们现在所处的经济地位——被资本主义压迫、崩坏的经济地位——之危险，非完全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不能解决。

二、普遍的义务教育和免除学费的运动

在私有财产制之下，普遍一般无产者的子女，都被排除于教育之外，所以我们在教育运动上最要努力的就是要为他们争得普遍的义务教育。我们务宜常常在各大城市指导贫穷不得受教育的儿童组织示威运动，以暴露现社会的野蛮和弱点，俾人人知道这样少数人专利的社会，非革命不可。

现在中国中等和高等的教育只有初级师范和高等师范不收学膳费。除这两种学校外，贫穷子女绝无升学机会。我们为代表贫穷学生的利益计，应为他们努力作免除学费的运动，常常与资本家的教育机关争斗。无论成功与否，至少也可引起全国贫穷学生对于现社会的愤恨和觉悟。

三、男女教育平等运动

在现制度下，女子在经济地位上完全没有立脚地，所以女子的教育权利，几乎全被剥夺。近十余年以来，虽有最少数女子渐渐得受初中级教育，但最大多数的女子还是处于昏天黑地之中，没有机会接迎智识的光明。所以我们务必努力为这样最大多数未受教育的女青年奋斗，以求达到男女教育在同一的水平上面。我们虽明知这样男女教育平等的原则为私有财产制的社会所不能实现，但我们应不停的标揭这种目标去运动、去奋斗，以表现几万万女青年的教育问题非社会革命不

能解决。

四、学生参加校务运动

现在中国的学校都是为学校而办学校，并不是为学生而办学校。所以把学生当作机械看待，绝不容许学生参预校务。故校内一切设施和课程，都由校长、教职员自身的志愿和利害来支配，一点也不合于学生的需要和愿望。我们为代表全国青年学生的利益起见，应努力为他们打破这种官僚式或牢狱式的学校制度，纠合各地方和全国学生作种种要求参加校务的运动。

五、非基督教学生在基督教学校内的平等待遇运动

现在中国教育界到处布满了基督教的势力，以锢蔽青年的思想。而非基督教的青年学生在教会学校里面，常受种种不平等的待遇和压迫。我们为非基督青年学生的利益计，应努力帮助他们在教会学校里面作平等待遇的运动，务使教会学校威胁利诱的假面具尽情毕露而排除其势力于教育范围之外。

六、统一国语和推行注音字母的运动

中国语言文字之庞杂，无非令人感着隔阂不便的痛苦。这样庞杂的语文实是我们宣传运动的最大障碍。我们为排除这样重大的障碍起见，必须努力促进国语统一和推行注音字母的运动。至于促进方法，或加入国语读音统一会和注音字母传习所，或在各地方鼓吹广设这类传习机关，及在各学校中增加这门功课。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议决案

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社会上活动，将与中国现在各团体不得不发生某种关系：有的团体，青年团团员须加入活动，造成中坚势力；有的，在某种运动须与联络进行，以达我们的目的；有的，须无顾惜的披露其罪恶，使青年不致受其迷蒙，并须以实力推翻之。所以青年团对于中国现存各团体须具体的规定其态度。

（一）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成为资本主义的护符，并为帝国主义的先锋，已不可讳言。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以教育、娱乐等利益引诱中国青年使受美国资本主义化。附设商业科为美国银行及商店造就学徒，宣传中美亲善，为美国资本家推广市场。青年会之与中国旧势力结合，又可于彼之与中国官僚互相笼络中见之。所以对于此种团体须用言辞及文字的宣传披露其罪恶，使青年不致受其愚蒙沾染资本主义之毒。于其所设立之义务学校及一切援助劳动者及其他慈善事业，应利用之，但须揭穿其目的及用心。

（二）非基督教及非宗教团体——基督教因其为现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最有势力的工具，所以是我们所必然要反对的。非基督教团体所做的事正是我们所欲做的。非宗教的团体反对一切宗教，因为宗教是桎梏思想，并且在历史上看来是常与旧势力结合的东西。反对宗教，使青年思想自由而趋于革命的路途。因此对于此种非基督教、非宗教的团体应尽力帮助进行，并宜在此种团体内组织青年团同志的小团体，此种小团体应尽量活动以达到指导的地位。

（三）各种学术研究会——对于各种学术研究会，须有同志加入组成小团体活动及吸收新同志，使有技术有学问的人才不为资产阶级服务而为无产阶级服务，并使学术文艺成为无产阶级化。

（四）学生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为学生的结合，为我们在学生中宣传主义的最好场合。在未组有学生联合会及只有有名无实的学生联合会之地方，各学校的青年团同志应提倡组织，或改组之。学生联合会中的青年团体应不停的以活动在其中造成中坚势力，于学生的爱国及争自由等各种运动中得以指导一切。对于学生联合会所设立之平民学校、俱乐部、演讲团、新剧社等，青年团团员应加入其中宣传主义。

（五）童子军——革命的青年应受军事的训练并养成尚武的精神。童子军为预备革命的青年之最好机关，所以童子军之组织于青年团最为重要。中国现今大半的童子军是教会学校或由青年会所组织的，我们对于此种童子军不应为外面的攻击而应为内部的运动，使成为青年团之机关。

（六）工人团体——青年团团员须帮助各种工人团体教育工人，并努力援助一切加薪减时等运动，并在工人团体中极力吸收青年工人加入青年团。

（七）各种社会主义团体——无政府共产主义团体虽于政策上有许多错误的地方，然为富于革命性及为无产阶级的团体。所以我们为无产阶级利益的各种奋斗起见，应与之结成共同的战线。对于其他一切非革命及冒牌的社会主义团体，应无顾惜的攻击，披露其虚伪，使青年不致误解社会主义，而劳动运动得入于正轨。

（八）政党——中国现有的政党，大都为反动的政党。我们对于反动的政党务取攻击的态度，而对于民主革命的政党，

则应取援助的态度。

民主革命重大的作用，就在打倒武人政治，建设民治的政府，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应该援助他。但他决不能解放无产阶级，并且又将自成为新支配阶级，故我们当告诉无产阶级，不可认民主的革命为我们的革命，我们当努力向社会革命的路上走去。

根据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五日出版的《先驱》第八号刊印。

注　释

〔1〕即张太雷。

PDG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

一

中国经过了几千年的封建政治，人民生活基础自来都建设在农业经济上面，在这种政治经济之下的人民，自然缺乏政治上的感觉力与组织力。一直到了十九世纪后半期，世界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发达到任何国家都变了他们的市场，几千年闭关自大的中国也受了这种势力强迫的侵入。自从这种势力侵入以后，中国曾行过几次旧式的反抗，反抗失败的结果，人民一方面因外来的政治力经济力强迫的痛苦，一方面发见了旧政治的腐败与缺点，渐渐觉悟非改良政治组织不足以抵抗外力，于是戊戌变法运动、君主立宪运动、辛亥革命运动渐次发生，这便是人民对于政治上的感觉力与组织力，渐次发展的明证。

因为人民受了外来的政治力经济力压迫的缘故，对于政治上的感觉力与组织力渐次发展，在封建政治下的改良运动便进步到民主革命运动，毕竟推倒了几千年因袭的帝政。那次革命，在中国政治史上算是开了一个新纪元。

二

辛亥革命战争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反对满洲帝政之民主运

动，一个是反对外力压迫之自强运动。自强运动里面包含民族独立及发展实业两个主旨。所以辛亥革命战争，是适应近代由封建制度到民主制度，由单纯商品生产制度到资本家商品生产制度之世界共同趋势的战争，是在历史进化上有重要意义的战争，不幸这种战争在中国，至今尚未能成功；所以未能成功之主要原因，是因为民主派屡次与封建的旧势力妥协。清室退位，袁世凯因为财政困难及名义不正两个原故，十分恐慌，而革命军队反屯聚南京，不敢渡江，革命军领袖竟将政权交付反动派代表北洋首领袁世凯，这是民主派第一次因妥协而失败。袁世凯取消帝制，南方护国军的实权大半落在非革命的民主派手里，遂将政权交付反动派代表北洋首领段祺瑞，这是民主派第二次因妥协而失败。此次徐世昌出走，政权若仍旧归诸反动派代表北洋首领曹吴等之手，民主派若不坚守革命的方针而与军阀妥协，必然是民主派第三次因妥协而失败。民主派若永远不能用革命的手段从反动派代表军阀首领手里夺得政权，必然是永远失败。

民主派失败，便是人民不能脱离国际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压迫的痛苦。因为民主政治未能成功，名为共和国家，实际上仍旧由军阀掌握政权，这种半独立的封建国家，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因为军阀无不欢迎外资以供其军资与浪费，国际帝国主义在相当的限制以内，也都乐以金力借给军阀，一是可以造成他们在中国的特殊势力，一是可以延长中国内乱，使中国永远不能发展实业，永远为消费国家，永远为他们的市场。在这样状况之下的中国实业家，受外资竞争，协定关税，地方扰乱，官场诛求，四方八面的压迫，简直没有发展的希望；小工厂主小商人，受外货及大资本营业的影响，渐次坠入了无产阶级；手工业工人因为手工商品被外来机器品

驱逐的缘故，大半流为失业游民；农民因为物价腾贵的缘故，渐次将自种地卖给地主；所有无产阶级的工人农民以及无力避难的半无产阶级的人，因为连年军阀互争地盘的缘故，无辜丧了无数的生命。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源泉，若没有较新的政治组织——即民主政治，来代替现在的不良政治组织——即军阀政治，这样状况是必然要继续下去的。

三

民主政治当然由民主派掌握政权，但所谓民主派掌握政权，决不是在封建的军阀势力之下选一个民主派人物做总统或是选几个民主派的人物组织内阁的意思，乃是由一个能建设新的政治组织应付世界的新环境之民主党或宗旨相近的数个党派之联合，用革命的手段完全打倒非民主的反动派官僚军阀，来掌握政权的意思。

民国元年孙黄[1]到北京和袁世凯妥协了，由赵秉钧组织内阁，赵秉钧以次的阁员都是国民党党员，号称民党内阁，这是何等滑稽的民党内阁！民国二年宋教仁想依援国会多数党势力组织国民党的政党内阁，结果即不被刺，也必随南方讨袁军同一失败（二年讨袁军虽起于杀宋教仁及免李烈钧等军职，事实上是国民党与袁世凯势力绝对不相容之必然的现象）。国民党失败了，非革命的民主派（进步党）熊[2]、梁等又组织了一个投机的政党内阁，结果只受了袁世凯一场玩弄，徒然失了政党的节操。袁皇帝死了，护国战役中止。便在拥护袁皇帝的北洋军阀势力之下，拿恢复约法国会黎元洪继任总统三件事算是共和再造；张勋复辟失败以后，又拿北洋军阀首领冯国璋继任总统段祺瑞组织内阁为共和再造；这是何等滑稽的共和！我们须

知道：每一个政治战争都有阶级争斗和经济改造的意义含在里面，不单是几个人进退的问题，第四阶级对于资本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此，第三阶级对于封建制度的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如此。我们又须知道：每一个战争所获得的自由，都是极可宝贵的东西，都须有多量鲜血的代价才能够换来的，决不是利用敌人势力鼠窃狗偷可以得来的。所以映在我们眼中的民主派掌握政权，乃是一个阶级推倒一个阶级一个制度代替一个制度的意思，不是一个人代替一个人或是那几个人代替那几个人的意思。

四

真的民主派，必须有两种证据表现于人民面前：（一）他的党纲和政策必须不违背民主主义的原则。（二）他的行动必须始终拥护民主主义与军阀奋斗。在这一点看起来，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他的党纲虽不完全，而表示于公众的三民主义和发展实业计划，都是民主主义的色彩；他们的行为，除了革命运动以外，该党议员民国元二年及六年在国会和敌党抗争的内容以及广州政府不禁阻劳动运动和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废止压迫罢工的刑律等事，都算是维护民主政治的表示。但他们的党内往往有不一致的行动及对外有亲近一派帝国主义的倾向，对内两次与北洋军阀携手；国民党为保存他在民主革命上的地位计，这种动摇不定的政策，实有改变的必要。

五

现在有一派人主张总统复位恢复国会以维法统为解决时局

之中心问题，其实是大谬不然。由根本上说起来，封建式的北洋军阀不消灭，他们自袁世凯以至今日天天怀着牢不可破的“北洋正统”思想统治中国，有何总统国会能够行使职权？由事实上说起来，从前信用未失任期未满之黎总统并未能解决时局，现在之黎元洪在法律上确是任期已满，无位可复；在政治上又万不能不负解散国会酿成复辟的责任，忽然拥他复位，不但不能解决时局，而且将因此增加纠纷。国会不但延期过久已失代表民意的精神，而且其内部分裂，国民党研究系政学会安福部交通系等分子，因政治上之利害感情，互相牵制，六年八年之争持以及辞职取消新补等等议员资格问题，都各有相等的理由无法两全，因此无论在南在北，终于不足法定人数，其自身已成不治之症，将何以解决时局？即让一步说，总统是合法的，国会是可以足成法定人数的；然以一个不负政治上责任的总统和大半份失节败行的国会议员，如何能够创造民主宪法与民主政治？再让一步说，即使他们以后不至于不负责任，不至于失节败行，然而他们的命运都在军阀卵翼之下，绝对不能有有力的民主主义的党派与群众为后援，何能裁制军阀实行民主宪法建设民主政治？

法统之根据在约法，约法是什么？全部约法除了把万世一系的天皇换了由国会选举的总统以外，都是抄袭日本宪法，约法里虽然也载了几条人民之权利，同时又轻轻用“得依法律限制之”七个字打消了，这种法统不但我们不满意，就是最近的广东政府也不建设在护法上面了。况且现在主张“以恢复法统为解决时局之要图”的人，就是当年破坏法统加入讨伐西南护法的人，也就是此时在主张“北洋正统”的人，我们不知道这两个“统”将如何并立？只要有武力在手破坏法统或恢复法统都可以因利乘便自由伸缩，我们不知道这样随军阀爱憎为存亡

的法统，有何神秘力可解决时局？

六

又有一派人主张联省自治为解决时局之唯一办法，其实这办法之内容也决不是解决时局的办法。在第三阶级民主政治的理论上，联省自治自然是没有可以非难的地方，况且民国二年湖口之战，导源于袁世凯任命汪瑞闿为江西省长问题，地方分权确是当时政治上重要争点。国民党失败，袁氏专政，在野的政客几乎一致主张联邦制度，遂致袁氏下令查禁，称联邦为破坏统一——袁世凯的统一——的邪说；六年宪法会议，又因为地方制度问题，国民党与进步党争持甚烈，北洋军阀遂联名呈请总统，以反对宪法上地方分权之故，请解散国会，南北战争由此而起；由这一点看起来，地方分权问题虽然不是政治纠纷之根本问题，自然也算是民国史上政治纷纠之一种，国民党就是始终坚持地方分权，在政党的态度上，我们也不能加以非难。但是我们所认为不违背民主主义的联省自治，是由民主派执政的自治省联合起来，组织联省政府，来讨平非民主的军阀政府，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结果仍是一种民主主义对于封建制度战争的形式；决不是依照现状的各省联合一联省自治的政府和北京政府脱离就算完事，因为这乃是联督自治不是联省自治；更不是联合卢永祥张作霖几个封建式的军阀就可以冒称联省自治的，因如这种联省自治不但不能建设民主政治的国家，并且是明目张胆的提倡武人割据，替武人割据的现状加上一层宪法保障，总之封建式的军阀不消灭，行中央集权制，便造成袁世凯式的皇帝总统；行地方分权制，便造成一班武人割据的诸侯，哪里能够解决时局？

七

又有一派人以为吴佩孚不是反对民主主义的人，和别的卖国军阀不同，而且有力量可解决时局。我们固然承认吴佩孚好过张作霖，但是我们要知道吴佩孚和张作霖都是妨碍民主政治的军阀；我们固然承认吴佩孚是反对亲日派的人，但我们知道吴佩孚的背后也有一种外国势力，曹陆[3]去了，将来又有继起的人为吴佩孚向英美商量裁兵善后的大借款；我们固然承认吴佩孚倒张去徐是差强人意的事，但我们要知道此次战争明白表示的原因，起点于反对梁内阁，实现于奉军入关，乃是为个人或直系受政治上的压迫而战，未尝有丝毫表示为民主政治而战。吴佩孚正在一面用兵对南，一方主张巩固北洋正统，以取得和袁世凯段祺瑞相等的地位；用兵对南是敌视民主主义的行动，巩固北洋正统即是拥护封建式的武人专政；他或者也有力量暂时解决时局，但恐怕更要因此酿成和袁世凯成功后段祺瑞成功后同样更难解决的时局。

八

要解决纠纷的时局，必须由历年许多纠纷的事件里面分析出纠纷的共通病根所在然后才能够找出到真能解决纠纷的道路。依这个方法我们可以列举民国政治史上重大纠纷的事件如左：

元　年　　民主派举兵革命；
　　　　　北洋军阀力助清室讨伐革命；
二　年　　民主派因宋案及地方分权问题讨袁；

北洋军阀拥袁南征；
五　年　　北洋军阀拥戴袁世凯称帝；
民主派起兵讨袁；
六　年　　民主派在国会力争地方权，攻击段祺瑞；
督军团举兵解散国会维持北洋系；
七　年　　民主派起兵护法讨段；
北洋军阀拥段南征；
九　年　　直皖战争；
十一年　　奉直战争。

据上列的事实，民国十一年七次战争，前五次是民主派和北洋军阀之理想及势力冲突，后二次是军阀内讧，这两种纠纷的共通病根就是军阀存在。解决纠纷的唯一道路只有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

军阀一日存在，不但他们对于民主派的战争不能停止，他们自身内讧的战争也不能停止；奉直还正在战争，直皖战争恐怕也就在目前。奉若胜了，张作霖和孙烈臣便又有战争，孙烈臣胜了，和吴俊升便又有战争，直若胜了，吴佩孚和曹锟或冯玉祥都又有战争，皖若胜了，皖与奉便又有战争，皖之中徐树铮与卢永祥便又有战争，其他若甘肃、陕西、四川、湖南、安徽内部争夺督军总司令之战争，都已危机四伏。军阀与战乱如形影不相离，所以军阀不消灭，不但好政府主义者所谓好政府无从实现，军阀自身之坏政府，亦必日在不统一的动摇之中，而全国人民之产业生命，亦必随而动摇而丧失。

九

好政府主义者诸君呵！你们刚才发出“努力”“奋斗”“向

恶势力作战”的呼声，北京城里仅仅去了一个徐世昌，你们马上就电阻北伐军，据中外古今革命史上的教训，你们这种妥协的和平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正都是“努力”“奋斗”“向恶势力作战”的障碍物。军阀势力之下能实现你们所谓好政府的涵义吗？你们现观察现时京津保的空气，能实现你们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和六个具体主张吗？清室倒了，统一党章炳麟等便急急主张和袁世凯妥协，反对继续战争；袁世凯死了，进步党梁启超等便急急主张和段祺瑞妥协，反对继续战争，结果都造成了反动的变乱。你们（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又哪能不蹈此覆辙！

国民党诸君呵！你们本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应始终为民主主义而战，宁可战而失败，不可与北洋军阀妥协而失败。民国元年因袁世凯宣誓拥护共和，你们和袁世凯妥协上了一次当；五年又以恢复约法国会等条件而与段祺瑞妥协又上了一次当；现在不可又以恢复国会法统废督裁兵等条件而与北洋军阀妥协了。在北洋军阀卵翼之下的约法国会将与五六年状况何异？希望军阀自己出来废督裁兵，岂不是与虎谋皮？废督改称总司令，云南四川湖南的现状与前何异？军阀间内讧甚烈，正在互相对垒，互相防制，无论哪一方面都正在增兵，哪一个肯裁兵自灭？从前徐树铮说：“我也赞成裁兵，但必候我的兵练齐了再裁别的兵。”现在张绍曾说：“方今赣州一带战事方殷，豫乱虽平，伏莽未靖，沈辽负固，窃发堪虞，军务既待肃清，各省宜有统驭，就直赣豫等省论，即或曹吴诸帅如自解职，试思四郊多垒，指挥究属何人”；他们在实际上不能裁兵废督的苦心，算是由这两位北洋派代表人物老实说出来了。你们唯有一心完成你们民主革命的使命，勿为这些欺人的好听的空话所误！

农民工人学生兵警商人诸君呵！军阀不打倒，废督裁兵是

不可能的；军阀不打倒，想他们不强索军费不扰乱中史及地方的财政秩序是不可能的；军阀不打倒，想他们不滥借外债做军费政费以增加列强在华势力是不可能的；军阀不打倒，想他们不横征暴敛想他们绥靖地方制止兵匪扰乱是不可能的；军阀不打倒，工商业怎能发展，教育怎能维持和振兴？军阀不打倒，想他们不互争地盘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互争地盘战争一次，农人工人商人的身家性命便跟着牺牲一次，无辜的兵士警察便跟着身罹炮弹一次，他们战争无止期，我们要停止这种无止期的牺牲，只有加入民主战争打倒军阀，没有别种姑息的妥协的伪和平方法可以得到根本的真和平幸福的。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学者政客，根据他们姑息的妥协的伪和平论，来反对民主战争，我们万万不可听从。和平自然是我们所不排斥的，但是虚伪的妥协的和平，愈求和平而愈不和平的伪和平，乃是我们所应该排斥的；战争诚然是我们所不讴歌的，但是民主主义的战争，减少军阀战争效率的战争把人民从痛苦中解放出来的战争，在现在乃是我们不能不讴歌的。

十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但是在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我们目前奋斗的目标，并非单指财政公开，澄清选举等行政问题，乃以左列各项为准则：

（一）改正协定关税制，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特权，清偿铁路借款，完全收回管理权。

（二）肃清军阀，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

（三）采用无限制的普通选举制。

（四）保障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自由权，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压迫罢工的刑律。

（五）定保护童工女工的法律及一般工厂卫生工人保险法。

（六）定限制租课率的法律。

（七）实行强迫义务教育。

（八）废止厘金及其他额外的征税。

（九）改良司法制度，废止死刑，实行废止肉刑。

（十）征收累进率的所得税。

（十一）承认妇女在法律上与男子有同等的权利。

上列各项原则，决不是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之下可以用妥协的方法请求得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因为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战争。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指孙中山、黄兴。

〔2〕指熊希龄。

〔3〕指曹汝霖、陆宗舆。

PDG

马克思学说

（一九二二年七月一日）

陈　独　秀

（一）剩余价值

马克思是一个大经济学者，他的学说代表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和斯密亚丹代表个人主义的经济学一样，在这一点无论赞成马克思或是反对者都应该一致承认。

马克思底经济学说，和以前个人主义的经济学说不同之特点，是在说明剩余价值之如何成立及实现。二千几百页的《资本论》里面所反复说明的，可以说目的就是在说明剩余价值这件事。斯密亚丹也曾说过："在土地未私有资本未集聚的最初状态，劳动者所生产的东西全属劳动者自己所有。"（见《原富》一卷六六页。）又说："劳动者自己享有全部生产品的最初状态，土地私有资本集聚之后便不行了。"（见《原富》一卷六四页。）这两段明明说因为土地和资本私有底缘故，劳动者不能得着所做的生产品全部分，只得着一部分。那剩余的部分归了何人呢？照马克思底学说，这就叫做剩余价值，是归了资本家底荷包，资本家夺取了劳动者底剩余价值，作为他私有的资本，再生产再掠夺，以次递增。资本是这样集聚起来的，资本制度就是这样发达起来的。话虽这样简单，但是要真实明白剩

余价值是什么，以及他是如何成立如何实现和分配的，本是一件很烦难的事，现在不得不略略说明一下。

要明白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是什么，首先要明白马克思所指的价值是什么，其次要明白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价值是什么及劳动价值如何定法。斯密亚丹以来的经济学者，对于凡物之价格都分为自然价格（Natural Price）、市场价格（Market Price）两种。剩余价值所指的价值，是自然价格所表现的抽象价值，不是市场价格所表现的具体价值，我们千万不可弄错。劳动价值也分二种：（一）劳动力自身之价值，即是劳动者每月拿若干工钱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之价值；（二）劳动生产品之价值，即是劳动者每月做出若干生产品之价值。这两种劳动价值是如何定的呢？照马克思底意思是说：凡两件货物互换，这两件货物一定有什么相同的地方。譬如拿若干布匹换若干面粉，这两样货物形式不同，物理的性质不同，用处不同，他们相同的地方只是都为劳动所作的结果，因此所费劳动相等的货物价值亦相等。用十二小时做成的货物，价值比用六小时做成的货物高一倍，一个茶碗价值二角，一个茶壶价值一元，壶底价值比碗大四倍，是因为做壶所用的劳动比做碗的多四倍。所以马克思说："一切用劳力所制造的商品（就是货物）之价值，乃是由制造时所需社会的劳动分量而定。"（劳动分量，就是劳动时间长短的意思。社会的劳动，是与个别劳动不同的意思。个别劳动有个别勤惰巧拙以及工具精粗的差异，所谓社会的劳动，是指在一定时代的社会状况之下，将这些个别的差异都作为平均程度，因此社会的劳动也叫做平均的劳动。）劳动者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因此劳动力自身也是一种商品，所以马克思说："劳动力这种商品底价值，乃是由培养他所需的劳动分量，也就是制造劳动者及其家族生活品所需的劳动分

量而定。”马克思所谓制造一切商品所费的劳动分量，乃是兼“生的劳动”（制造该商品时所费的劳动）和“死的劳动”（制造该商品时所用原料、工具、建筑等以前所费的劳动）二种而言，这也是我们不可忽略的。

马克思的价值及劳动价值公例，略如以上所说，以下再说剩余价值是什么。

剩余价值究竟是什么呢？乃是货物的价值与制造这货物所费的价值（兼生的劳动之价值及死的劳动之价值而言）之差额。例如，费一万元生产一万五千元的货物，在这货物一万五千元的价值中，除去生产这货物所费一万元的价值，所剩余的五千元就是剩余价值。说详细一点，常分为剩余价值之成立及剩余价值之实现和分配二部分：

剩余价值是如何成立的呢？照马克思说：剩余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成立的，不是在流通过程中成立的，这个意思十分重要，我们也千万不可弄错。此话怎讲？因为马克思所指出的剩余价值，虽然要在流通过程中才能够实际归到资本家底荷包，但是夺取底方法和剩余价值底本质，都不是指流通过程中一件一件生产品的卖价，乃是指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为资本家所做“剩余劳动”的价值。“剩余劳动”又是什么呢？是因为近代利用机器，制造业底规模一天大似一天，手工的生产品比机器的生产品货色不好价钱又贵，因此手工业一天衰败似一天。于是由手工工业时代变了机器工业时代，由家庭工业时代变了工厂工业时代，由独立生产时代变了共同生产时代，这就叫作“产业革命”。自产业革命以来，所有生产所必需的工具（土地、矿山、房屋、机器、原料等）都为资本家所占有，资本家以外的人，除了将自身底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便做不成工，便得不着生活费用。资本家给他们多少生活费用（即工钱）呢？照马

克思的价值公例，一切商品之价值常与制造此商品时所费的劳力相等，劳力（也是一种商品）之价值（即工钱）也常与培养这劳力所需的劳动（即制造劳动者所必需的生活品之劳动）相等。那么，譬如一个劳动者每日所需的生活品值六小时的劳动分量，照理他每日做工六小时便已产出他生活品的价值。然而资本家往往要劳动者每日做工十二小时，所给工钱只值六小时的生活品，其余六小时，在实际上劳动者未曾得着工钱，是替资本家白做了，这白做的六小时就叫作“剩余劳动”。生产品之全部价值都是劳动者做出来的，而劳动者所得只一部分与六小时劳动价值相等的工钱，其余一部分由六小时剩余劳动而生的价值，就叫作“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是如何实现和分配的呢？剩余价值虽然成立在生产过程中，但是必须到了流通过程中才能够实现。资本家雇用劳动者产出一定价值的货物，剩余价值的本质及作用固然已经包含在这货物之中，然必待将这货物卖给消费者，把这货物底价值变成市场价格，剩余价值变成货币归到资本家底荷包，这时剩余价值才算实现。譬如一资本家费价值五成的劳动工钱，造成价值十成的棉纱，这时剩余价值五成固然已经由剩余劳动五成在生产过程中成立了，然必待将棉纱卖给消费者，将价值十成的货物变成价格十成的货币归到资本家底荷包，那时五成剩余价值才算实现了。这是因为生产者不能将货物直接卖给最后消费者，中间必须经过贩卖者之手，贩卖者须得一定资本及劳力之报酬，于是生产者不得不在价值以下的价格卖出他的货物。譬如用价值五成工钱造成价值十成的棉纱，因为贩卖者之报酬，价值十成的棉纱至多只能卖得价格八成的货币，因此五成剩余价值中，制造棉纱的资本家只能得着三成，其余二成是归了贩卖棉纱的资本家。制造棉纱的资本家若是向他资本家借

过资本，便须拿一部分剩余价值付他资本家的利息。纱厂底地基若是向地主租的，又须拿一部分剩余价值付地租。剩余价值大概是如此分配的，各种资本家分配所余才是制造棉纱的资本家实际得着的剩余价值。所以说：剩余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成立的，是在流通过程中实现的。

资本家底资本是夺取劳动者剩余价值变成的，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之价值变成的。工作时间越长，剩余劳动越加多；工钱越少，剩余劳动也越加多；出产能力越提高，剩余劳动也越加多。所以资本家想扩张剩余价值，天天在那里提高出产能力，天天在那里反对增加工钱、反对减少劳动时间。拿剩余价值变成货币，又拿货币制造商品、增加剩余价值，再拿剩余价值变成货币，如此利上生利，这就叫作“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资本主义的生产营业底规模一天大过一天，掠夺兼并底规模也一天大过一天，加上交通机关一天便利过一天，殖民地新市场一天扩大过一天，精巧的机器一天增多过一天，大银行大公司便一天发达过一天，从前的小工业都跟随着这些制度之发展，逐渐被大工业吸收了压倒了。这种吸收压倒底结果，便是把全社会的资本聚集在少数人手里，这就叫作“资本集中”。在从前小工业时代，资本不能集中，因此产业不能发达，所以资本集中使生产能力增加产业规模扩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好过以前的生产方法只在这一点。但是在财产私有制度之下，把全社会的财产大部分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里，便自然发生以下各项结果：（一）无财产的佣工渐渐增多；（二）生产能力增加而无产佣工的购买能力不能随之增加，因此造成“生产过剩”的结果，生产过剩又必然造成“市场缩小经济恐慌”和“工人失业”两种结果。合起这几项，结果，无产佣工的困苦一天比一天沉重，而他们的人数却一天比一天增多，他们的团

结也就一天比一天庞大。这个随着资本集中、产业扩张而集中而扩张的无产阶级，必有团结起来，夺取国家政权，用政权没收一切生产工具为国有，毁灭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一日。

像以上所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怎样利用机器对手工业起了产业革命，怎样夺取剩余价值集中资本，怎样造成大规模的产业组织，同时便造成了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又怎样造成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革命之危机，这种种历史上经济制度之必然的变化，在马克思学说里叫作“经济的历史观察”，又叫作“唯物的历史观察”。

（二）唯物史观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学说虽然没有专书，但是他所著的《经济学批评》、《共产党宣言》、《哲学之贫困》三种书里都曾说明过这项道理。综合上列三书中所说明的唯物史观之要旨有二：

其一，说明人类文化之变动。大意是说：社会生产关系之总和为构成社会经济的基础，法律、政治都建筑在这基础上面。一切制度、文物、时代精神的构造都是跟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的，经济的构造是跟着生活资料之生产方法变化而变化的。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生活，倒是人的社会生活决定人的意识。

其二，说明社会制度之变动。大意是说：社会的生产力和社会制度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有变动，社会制度也要跟着变动，因为经济的基础（即生产力）有了变动，在这基础上面的建筑物自然也要或徐或速的革起命来，所以手臼造出了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造出了资本家的社会。一种生产力所造出的社会制度，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发展，后来生产力发展到

这社会制度（即法律、经济等制度）不能够容他更发展的程度，那时助长生产力的社会制度反变为生产力之障碍物，这障碍物内部所包含的生产力仍是发展不已，两下冲突起来，结果，旧社会制度崩坏，新的继起，这就是社会革命。新起的社会制度将来到了不能与生产力适合的时候，他的崩坏亦复如是。但是一个社会制度，非到了生产力在其制度内更无发展之余地时，决不会崩坏。新制度之物质的生存条件，在旧制度的母胎内未完全成立以前，决不能产生，至少也须在成立过程中才能产生。

马克思社会主义所以称为科学的不是空想的，正因为他能以唯物史观的见解，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所以成立、所以发达、所以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自然结果，是能够在客观上说明必然的因果，不是在主观上主张当然的理想。这是马克思社会主义和别家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之要点。

有人以为马克思唯物史观是一种自然进化说，和他的阶级争斗之革命说未免矛盾。其实马克思的革命说乃指经济自然进化的结果，和空想家的革命说不同。马克思的阶级争斗说乃指人类历史进化之自然现象，并非一种超自然的玄想。所以唯物史观说和阶级争斗说不但不矛盾，并且可以互相证明。

马克思底好友恩格斯曾述说马克思的意见道："在历史各时代，必然有他的生产分配之特殊方法，又必然由这种特殊方法造出一种社会制度。那时代的政治和文明之历史，都建设在那个基础上面，依据那个基础说明。所以人类全历史是阶级争斗的历史，即是掠夺阶级和被掠夺阶级，压制阶级和被压制阶级对抗的历史。这些阶级争斗的历史相连相续，构成社会进化之阶级，到了现在又达到一种新阶级，被掠夺被压制的阶级

（即无产劳动者）要脱离掠夺压制阶级（即绅士、军阀、资本家）的权力，将自己解放出来；同时还要将一切掠夺压制和阶级差别、阶级争斗完全铲除，永远把社会全体解放出来。”这一段话可以说是把唯物史观说和阶级争斗说打成一片了。

（三）阶级争斗

一八四八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著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书。这书底精髓，正是根据唯物史观来说明阶级争斗的。其中要义有二：

（一）一切过去社会底历史都是阶级争斗底历史。例如在古代有贵族与平民、自由民与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与农奴、行东与佣工。这些压制阶级与被压制阶级，自来都是站在反对的地位，不断的明争暗斗。封建废了，又发生了近代有产者与无产者这两个阶级新的对抗，新的争斗。

（二）阶级之成立和争斗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必然结果。例如欧洲在封建时代的工业组织之下，生产事业是由同行组合一手把持的。到了发见了印度、中国等市场和美洲、非洲等殖民地的时候，便不能应付新市场需要底增加了。于是手工工场组织应运而生，各业行东遂被工场制造家所挤倒，接着市场日渐扩大，需要日渐增加，交通机关和交换方法都日渐发展。这时手工工场组织也不能应付了，于是又有蒸汽及大机器出来演成产业革命，从此手工工业又被大规模的近代产业所挤倒。近代的有产阶级便是这样成立的。近代产业建设了世界的市场，有了这些市场，商业、航业、陆路交通都跟着发达，这些发达又转而促进产业发达，产业、商业、航业、铁路既这样发达，有产阶级也跟着照样发达，资本越加多，产业越扩大，将中世

纪留下的一切阶级都尽情推倒了。由此可知，近代有产阶级乃是长期发达和生产及交换方法迭次革命底结果。由此可知，做有产阶级基础的生产和交换方法是萌芽在封建社会里面。这种生产和交换方法发展到一定地步，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制度（即农业手工封建的制度）便不能和那已经发展的生产力适合，这种制度便成了生产力底障碍物，便必然要崩坏。结局果然崩坏了，封建的制度倒了、自由竞争的制度代之而兴，适合这自由竞争的社会及政治制度也就跟着出现，有产阶级底经济及政治权力也就跟着得到了。有产阶级得势以后，造成了极雄大惊人的生产力（像工业、农业、轮船、铁道、电报、运河等），惹起这般大规模生产及交换的社会，将人口、财产及生产机关都集中了，建设了许多都市，将乡村人口移到都市，使乡村屈服在都市支配之下，使多数人民脱离了朴素的乡村生活，使野蛮和未开化国屈服于文明国，农业国屈服于工业国，东洋屈服于西洋。但是到了有产阶级底生产力发展到了与有产阶级社会底制度不适合的时候，社会制度就成了社会生产障碍物，有产阶级及有产阶级社会底制度也是必然要崩坏的。崩坏底征兆就是商业上的恐慌，这种恐慌隔了一定期间便反复发生，一回凶过一回，常常震动有产阶级社会底全部。这恐慌发生底缘故，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所造成的生产过剩，是由于有产阶级社会底制度过于狭小，不能包容那过于发展的大生产力。有产阶级救济这种恐慌的方法，不外一面开辟新市场，一面尽量剥削旧市场，这只能救济一时，终是朝着更广大更凶猛的恐慌方面走去，如此，有产阶级颠覆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向着有产阶级自身了。

有产阶级不但造成了致自己死亡的武器，还培养了一些使用武器的人，这些人就是近代的劳动阶级，也就是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是跟着有产阶级照同一的比例发达起来的。近代产业发展的结果，一般小资产的小商人小工业家，一方面因为他们的专门技能为新生产方法所压倒，一方面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为大规模的产业所压倒，都不断地降到无产阶级。可是一方面产业愈加发展，一方面无产阶级不但人数愈加增多，而且渐次集中结成大团体，因为生活不安，对于有产阶级渐次增长阶级抵抗底觉悟，发生争斗，始于罢工，终于革命。有产阶级存在根本底条件，是在资本成立及蓄积；资本底重要条件，是在工钱制度；工钱制度，全靠劳动相互竞争。但有产阶级既已促进了产业进步，便已经使劳动者从竞争的孤立变成协力的团结了。近代产业发达，使有产阶级的生产及占有之基础从根破坏。有产阶级所造成的首先就是自身的坟墓，有产阶级之倾覆及无产阶级之胜利，都是不能免的事。

马克思说明阶级争斗大略如此，我们实在找不出和唯物史观有矛盾的地方。

（四）劳 工 专 政

从前有产阶级和封建制度争斗时，是掌了政权才真实打倒了封建，才完成了争斗之目的。现在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争斗，也必然要掌握政权利用政权来达到他们争斗之完全目的，这是很明白易解的事。所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

“从前一切阶级一旦得了政权，没有不拼命使社会屈从他们的分配方法，巩固他们已得的地位。

“有产阶级发达一步，他们政治上的权力也跟着发达一步。……自他们成为有产阶级后，近代代议制度国家底政权都被他们一手把持。

“劳动阶级第一步事业就是必须握得政权。

“劳动阶级革命，第一步就是使他们跑上权力阶级的地位，也就是民主主义底战胜。既达到第一步，劳动阶级就利用政权渐次夺取资本阶级的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就是集中在组织为支配阶级的劳动者手里；……其初少不得要用强迫手段对付私有财产和资本家的生产方法，才得达到这种目的。

“原来政权这样东西，不过是一个阶级压制一个阶级、一种有组织的权力。劳动者和资本家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织一个阶级，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支配阶级的地位，不得不用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

他又在所著《法兰西内战》里说：

“劳动阶级要想达到自己阶级之目的，单靠掌握现存的国家是不成功的。”

他又在所著《哥达纲领批评》里说：

“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移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之中间，必然有一个政治的过渡时期。这政治的过渡时期，就是劳工专政。”

根据一九二二年七月一日出版的
《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刊印。

PDG

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

（一九二二年七月一日）

李　大　钊

现代有一最伟大、最普遍的潮流，普被人类生活的各方面，自政治、社会、产业、教育、文学、美术，乃至风俗、服饰等等，没有不著他的颜色的，这就是今日风靡全世界的“平民主义”。

“平民主义”是一种气质，是一种精神的风习，是一种生活的大观；不仅是一个具体的政治制度，实在是一个抽象的人生哲学；不仅是一个纯粹的理解的产物，实在是濡染了很深的感情、冲动、欲求的光泽。若把他的光芒万丈飞翔上腾的羽翮，拘限于狭隘的唯知论者的公式的樊笼中，决不能得到他那真正的概念。那有诗的趣味的平民主义者，直想向着太阳飞，直想与谢勒（Shelley）、惠特曼（Whitmen）辈抟扶摇而上九霄。

我们怕把他的精神的广大弄狭小了，怕把他的精神的生机弄死僵了，姑称他为平民主义，称这种精神表现于政治上的为平民政治。

平民主义原语为 Democracy，在古希腊雅典政治家波里克鲁（Pericles）（纪元前四百九十五年生，四百二十九年死）时代，亦是一个新造语，当时亦曾遭嫌新者的反对，后来有些人

觉得为表示一种新理想有立这个新名词的必要，故终能行用。至亚里士多德时代，学者使用此语，取义还各不同，例如亚氏用之则当其民主政治（Polity）的变体，含有暴民政治的意味；而鲍莱标士（Polybios）用之，则当亚氏的民主政治（Polity）。

平民主义（Democracy）的语源，系由 Democ 与 Kratia 二语联缀而成，音转而为 Democracy。Democ 意为“人民”(People)，Gracy 意为“统治”（Rule），故 Democracy 一语，可直译为“民治”（People’s rule or popular Government），但演进至于今日，此语的意义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动，最初“统治”的意义久已不复存了。

马萨莱客（J. G. Mosaryk）有几句话诠释现代的平民主义，可谓精当之至。他说：“平民主义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目的，乃在废除属隶与统治的关系。平民主义本来的意义是‘人民的统治’。但现代平民主义的目的已全不在统治，而在属于人民，为人民，由于人民的执行。这国家组织的新概念、新计划，怎样能被致之实行，这不仅是权力的问题，乃是一个执行的技术的难问题。”含有统治意味的平民主义，仍有治者与被治者的关系。现代的平民主义全无对人的统治，只有对于事物的执行与管理。故欲实现现代的平民主义，不须研究怎样可以得到权力，但须研究怎样可以得到管理事物的技术。

普通诠释平民政治的人，都是说“平民政治是为人民，属于人民，由于人民的政治”（Democracy is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by the people.）但是看破此语是虚伪的，不止马洛克（Mallock）一人。马洛克在他的《*The Limits of Pure Democracy*》里开宗明义即揭破此言的虚伪。

因为他们所用的“人民”这一语，很是暧昧，很是含混。他们正利用这暧昧与含混，把半数的妇女排出于人民以外，并

把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男子排出于人民以外，而却僭用“人民”的名义以欺人。普通所说的平民政治，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乃是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所以列宁（Lenin）氏于一九一九年四月在莫斯苦瓦第三国际大会里演说，曾竭力为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与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的区分。后来在他所著的《国家与革命》里，并别的著作里，亦尝屡屡赞扬这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但列宁氏虽称道平民政治，却极反对议会政治。他以为议会制度纯是欺人的方法。此方法的妙处，在以人民代表美名之下，使此机关仅为绕舌的机关，为中产阶级装潢门面，而特权政治则在内幕中施行。列宁氏以为欲救此弊，要在使代表机关不但为言论机关，并须为实行机关。无代表制度固无平民政治，而无议会制度则依然可行平民政治，而且真实的平民政治非打破这虚伪的议会制度必不能实现。这样看来，现在的平民政治，正在由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向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发展的途中。在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下，自然亦没有两性的差别了。有人说，只有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才是纯化的平民政治，真实的平民政治，纯正的平民政治，就是根据这个道理。

从实质上说，这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虽亦是平民政治的一种，但共产主义者的政治学者，因为此语在资本主义时代已为中产阶级用烂了，乃别立一新名词以代平民政治而开一新纪元。这新名词就是“工人政治”（Ergatocracy）。此语出世不久，在字典上还没有他的位置。此语的创立，亦和“Democracy”是一样，借重于希腊语丰富的语源。希腊语“Ergates”是“工人”（Workers）的意思，故“Ergatocracy”意为“工人的统治”（Worker’s rule），故可译为“工人政治”。在革命的时期，为镇压反动者的死灰复燃，为使新制度、新理想的

基础巩固，不能不经过一个无产者专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的时期。在此时期，以无产阶级的权力代替中产阶级的权力，以劳工阶级的统治代替中产阶级的少数政治（Bourgeois Oligarchy）。这一期的工人政治，实有“统治”（rule）的意味，并且很严，大权全集于中央政府，以严重的态度实行统治别的阶级。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实行社会主义的精神，使之普及于一般，直到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的特色私有制完全废止，失了复活的可能的时候，随着无产者专政状态的经过，随着阶级制度的消灭，Ergatocracy 的内容将发生一大变化。他的统治的意义，将渐就消泯，以事物的管理代替了人身的统治。此时的工人政治就是为工人、属于工人、由于工人的事务管理（Ergatoracy is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workerŝ，for the workers，by the workers）。因为那时除去老幼废疾者，都是做事的工人，没有阶级的统治了。这才是真正的工人政治。

鲍洪（Bohun）氏劝告他的同志们说：“不要再谈平民政治了。你们想你们是平民政治者么？但是你们不是。你们想你们要平民政治么？但是你们不要。你们是工人政治者，你们要工人政治。平民政治是资本主义破烂时期的方法，是一个被卑鄙的使用玷污了的名词。留下平民政治一语给那自由的中产阶级和那社会主义者中的无信仰者用罢。你们的目的是工人政治。”这一段话，可以表示他们弃平民政治而用工人政治的理由。

现在再讲一讲社会主义（Socialism）与共产主义（Communism）的区别。照现在的情形讲来，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很有分别。当一八四八年一月时候，昂格思（Engels）与马克思同作的《共产党宣言》发布了。其后一八八八年用英文发

刊，昂格思作了一篇序文，郑重声明这是共产党宣言，不是社会党宣言。昂格思说，在一八四七年顷，所谓社会党人乃是那些在劳工阶级运动以外求援于智识阶级的人们。不论多少，只要有一部分自觉的工人，渐知只是政治的改革还是不够，从而主张有全社会改革的必要。这一部分工人可自称为共产党人。社会党人的运动是中流阶级的运动，共产党人的运动是劳工阶级的运动。

由《共产党宣言》发表到昂格思序文刊布时候，其间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种名词，用得非常混淆。到了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国起了经济革命，这种革命家是无产阶级，他们自称为共产党人。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又有半有产阶级在德国起了政治革命，他们却自称为社会党人。其区别愈益明了。一九一九年共产党在莫斯苦瓦开第三国际大会，代表共产党，以示别于代表中产阶级的第二国际大会社会党。旗帜更见鲜明了。

我们用颜色表明共产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的不同，则社会主义者应为浅红色，而共产主义者为纯赤色。可是共产主义者却称社会主义者为黄色的社会党、黄色的国际，而不以浅红色称之。

简明的说，社会党人的运动是半有产阶级的运动，共产党人的运动是无产阶级的运动。社会主义的运动是创造的进化，共产主义的运动是创造的革命。社会党人是中央派与右派，共产党人是极左派。社会党人的国际的结合是第二国际，是黄色的国际；共产党人的国际的结合是第三国际，是赤色的国际。这是现代社会革命运动的两大潮流。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都尚在孕育时期，故在今日尚不能明了的指出他是一种什么制度。但在吾人心理的三方面，可以觅出他的根蒂：（一）知的方面，社会主义是对于现存秩序的批

评主义。（二）情的方面，社会主义是一种使我们能以较良的新秩序代替现存的秩序的情感。这新秩序便是以对于资本制度的知的批评主义的结果，自显于意象中者。（三）意的方面，社会主义是在客观的事实界创造吾人在知的和情的意象中所已经认识的东西的努力，就是以工人的行政代替所有权统治的最后形体的资本主义的秩序的努力。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学说的内容上没有区别，不过在范围与方法上有些区别罢了。德谟克拉西与社会主义，在精神上亦复相同。真正的德谟克拉西，其目的在废除统治与屈服的关系，在打破擅用他人一如器物的制度。而社会主义的目的，亦是这样。无论富者统治贫者，贫者统治富者；男子统治女子，女子统治男子；强者统治弱者，弱者统治强者；老者统治幼者，幼者统治老者。凡此种种擅用与治服的体制，均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所不许。不过德谟克拉西演进的程级甚多，而社会主义在目前则特别置重于反抗经济上的擅用罢了。

这样看来，德谟克拉西（Democracy）、伊尔革图克拉西（Ergatocracy）、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精神上有同一的渊源，在应用上有分析的必要。

根据一九二二年七月一日出版的
《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刊印。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答黄凌霜

（一九二二年七月一日）

陈　独　秀

凌霜兄：

精研笃信安那其，在中国当推兄为第一人。今竟翻然有所觉悟，真算是社会改造之大幸。捧读来信，很喜，且极钦佩吾兄有自白思想变迁之决心与之勇气。本来国家这个制度，克鲁巴特金并没有主张即时就可以废去，马克思也没有主张永远不能废去，这道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说得极明白透彻，所以法国无政府党读此书后加入共产党的很多很多。至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两句格言，不但共产党不反对，我想除了昏狂的人，没有人愿意反对。现在共产党所争持的所努力的乃是怎样使我们由强制而习惯的作工，使人人真能各尽所能；乃是怎样通力合作，怎样使生产事业集中成为社会化，怎样使生产力大增、生产品充裕，使人人真能各取所需。想努力实行这些理想，都非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这道理吾兄一定是明白了，尚请向旧日真的安那其诸同志详细解释，以免误会才好。我们要知道“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说很容易，做起来着实是一件艰难的大事业，千头万绪，不是容易可以实现的，尤其在中国更不容易实现，因为我们的天性生来不喜欢什么首领、什么指导者。然而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

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所以要想无产阶级底革命与专政实现，非去掉我们厌恶首领、厌恶指导者的心理不可。尊兄以为如何？

独 秀

根据一九二二年七月一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刊印。

PDG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宣言

（一九二二年七月九日）

王 尽 美

资本主义在中国各大商埠发展的状态，和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是一样的。新式的生产制度一天一天地将旧的生产方法毁灭，一天一天地将劳动者集中到工场里去，叫他们做机器的附属物，像牛马般地作工，将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与剥夺者，换到极少工银。还有千万男女小孩不分日夜地到纱厂、发网工厂和火柴工厂等等，去作十二点钟起码的工。一般成年工与童工，他们血汗换来的工钱，多半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不但牺牲了健康，在剥夺制度下，失却了受教育的机会，还要受冻受饿，并且小孩子们从年幼的时候，就变成本国或外国资本家富源开发者，和资本家的新式奴隶。但是我们相信这种痛苦的工作，一定会迫着一般男女工人和童工团结起来，向他们的东家剥夺者作有力奋斗。

但是劳动者没有组织，就有也不过是无意识的结合，自然这种团体不能够自卫，也自然没有反抗的能力。而且劳动者将他们分成天津、济南、南方等帮是不行的，这是将自己分裂的办法，怎能拿这种团体和资本家斗争呢？我们将一个产业底下的劳动者，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幼组织起来，成一个产业组

合，因为这样一种团体才能算一个有力的团体。要这样的组织法，劳动者才能用他们的组织力，做奋斗的事业，谋改良他们的地位呢。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是由山东的一些劳动团体所发起的，是要将各个劳动团体联合起来的总机关。他的事业是要发达劳动组合，向劳动者宣传组合的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山东工人们与各地工人们的密切的关系。但是这些事业是必要大家起来同心合力做的，所以我们请那些已经成立的真正劳动团体加入这个书记部，与我们共同进行。

劳动兄弟们呀！我们拿各国经历过的事实来做比方，知道我们的事业在起初是很困难的，但是资本制度在中国一天比一天的发达，我们相信劳动团体也会日见发达，日见有力，并且相信将来的世界一定是工人们的世界。山东工人们！上海、广东等处的工人都联合成很大的革命的团体了，我们还不联合起来吗？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啊！

根据一九二二年七月九日出版的
《山东劳动周刊》第一号刊印。

PDG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一九二二年七月）

一　国际帝国主义宰制下之中国

（一）

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多半是靠掠取非洲和亚洲做大市场和大掠夺场。在最近一世纪内，资本主义侵略的积累，造成二十世纪血染遍了的世界资本主义巨大骨干。那些资本帝国主义者由竞争掠夺而出于战争，把他们自己造成的骨干从根本上加以损毁。损毁之后，又想用原法巩固而且扩大资本主义的建筑物，同时他们新的损毁事业又正在准备进行中——这种循环式的趋势，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在现今这段资本主义进程中，全世界有十二万五千万的殖民地和被压迫国的人民（还有资本主义国家里万万数的无产阶级）辗转就毙于伦敦、巴黎、纽约、东京等处极少数银行家、工业家和他们政府重压之下。除非把世界资本主义的组织完全铲除，这种惨酷的现状是决不会消灭的。这个现象最值得弄个明白，因为个个中国人（不但是劳动阶级）都应当知道他自己受痛苦的原因。

世界上的个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必须获得最大的市场，来销售他过剩的商品、吸收他需要的原料，而世界上可供掠夺的市

场，只有印度、中国、土耳其、摩洛哥、埃及、波斯、高丽、墨西哥、安南、南洋群岛、南部和中部的阿非利加洲等地方，因此夺取那些市场的竞争是免不掉的。竞争的结果，便须诉诸战争。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屠杀，便是发源于英德两系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争夺近东市场的冲突。

上次世界大战的成绩，即是屠杀了数千万的劳动群众，瓜分德国的殖民地，毁灭德奥等国的经济基础使他们变为英法的殖民地，并把全世界的经济秩序破坏无遗。战后，那些帝国主义的国家又企图恢复战前经济原状，来挽救资本主义根本覆灭的厄运，便想将战争的巨大损失取偿于全世界的劳动群众。因此，他们先后在巴黎、华盛顿、柔鲁等处开分赃会议，假借“和平”、“正义”等名词以掩饰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耳目，但那争夺宰割世界而引起剧烈冲突的真相，已暴露无余。他们那些不可消除的利益冲突，便是第二次更猛烈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导火线。

帝国主义者开多少次的会议，都不能免去日美在最近将来的战争趋势和英法非相见于疆场不能解决的冲突。不过他们常常被逼着去救济资本主义无法挽回而日见扩大的世界经济恐慌，冀图免避社会革命的锐利锋芒，故不得不借此种会议的分赃妥协行为，牺牲弱小民族的利益来掩盖他们中间的裂缝，以苟延此不可免的大战时期。同时并可在此苟延期间之内，加劲劫夺殖民地和弱小国家的富源和劳力，一方可以勉强按住他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使之不能即时脱离羁轭，俾得从容补偿前次大战的损失，他方便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经济的和军事的准备。

许多年来，东亚各民族被踏在英美日法等国铁踵压迫之下，上次大战之后，帝国主义侵略东亚各民族又更加厉害。美国勒住菲律宾群岛，一面用假装慈悲的态度，一面继续他的经

济侵略，不稍放松。英国扼着印度的喉颈，刚柔并用的压倒印度独立运动，以维持每年一百万印度劳动群众死于英国资本家的长爪之下的现状。安南农民更是奴伏在法兰西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牛马一般的种出米谷来供法商的榨取，安南尽可每年饿死多少万种米的农民，但何时都缺不了法国米商成千万石的米粮输出。日本榨取高丽人民的血汗，更是横暴无比，日货尽量的输入，米粮强迫的输出，使二千万高丽农民处在饥饿而死的境遇。

帝国主义的列强历来侵略中国的进程，最足表现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本相。中国因为有广大的肥美土地，无限量的物产和数万万贱价劳力的劳动群众，使各个资本主义的列强垂涎不止：你争我夺，都想夺得最优越的权利，因而形成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特殊地位。

（二）

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开始于一八三九年英国舰队的攻击。这次攻击实是资本主义最著名的卑污强盗行为，因为他的起因是由于英国政府和商人要强迫把鸦片毒害中国民众。从一八五八年英法联军攻打大沽直到一九〇一年义和团反抗“洋人”的暴动促成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这四十三年间，乃是资本主义国家宰割中国的流血时期，也是中国人在历史上受最大痛苦和侮辱的时期。二十世纪的开始，已是到了列强因掠夺而互相冲突的形势。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战争，为的是争夺满洲，战争的损失，又挖取中国人的血肉去填补。

帝国主义的列强在这八十年侵略中国时期之内，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共同的殖民地了，中国人民是倒悬于他们欲壑无底的巨吻中间。帝国主义者掠取了中国辽广的边疆领土、岛

屿和附属国，做他们新式的殖民地，还夺去许多重要口岸，做他们的租界，并自行把中国画成几个各自的势力范围圈，实行其专利的掠夺事业。在中国自己的领土之内，三分之一的铁路为外国资本家的所有物，其他的铁路也是直接或间接由外国债权主人管理；外国的商轮是在中国的海口和内河里面自由行驶；邮电是受严密监督；关税也不是自主的，是由外国帝国主义者协定和管理的。这样，不但便利于他们的资本输入和原料的吸收，而且是中国经济生命的神经系已落在帝国主义的巨掌之中了。那些外国资本家还在中国占据了许多矿山，并在上海天津等商埠开设了一些工厂，鞭策百万的中国劳工在那些矿山工厂里，做他们生利的奴隶。同时又加上外国商品如潮的输入，漫说布匹纸张之类，旧有的针和钉都几乎绝了种，因此生活程度日渐增高，三万万的农民日趋于穷困，数千万手工业者的生活轻轻被华美的机器制造品夺去，而渐成为失业的无产阶级。中国因为每次战争都要被索去一批现金赔偿，加上鸦片和商品的吸收，现金日见减少，又加上二十万万外债连本带利不断的盘剥，更加上上海、北京、天津、汉口、广州几个外国银行的操纵，国家和民众的经济生活都陷在极恐慌的状态之中。帝国主义者还贿赂中国的官僚政客，派遣许多的顾问牧师，出版报纸，设立学校——这是企图更顺利的达到他们贪婪掠夺的目的。同时为防止中国民众的反抗起见，帝国主义者的列强又掠得实际统治中国人的领事裁判权，并派遣军队、警察、军舰驻守于中国领土之内。

（三）

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起后，欧美各国无暇东顾，日本帝国主义者便利用此千载一时之机会，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占

领胶州湾，并用恐吓贿赂等外交手段以最著名的二十一条压迫中国，意在使中国变为他独占的殖民地。从此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就侵入了中国各种行政、财政、军事、外交及其他一切政治机关的血管里面，控制中国经济生命，自由指挥北京政府，以完全实现他的侵略政策。这样虽然填满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欲壑，但是却引起了美国帝国主义者的嫉妒，日美两帝国主义在中国争夺的冲突于是起了一种很深的一道鸿沟。

到了大战告终，所谓巴黎和会，便是分配德国的殖民地和从新划定资本主义国家在近东和远东的势力范围的分赃会议。在那次会议席上，日本既是先行获得中国的利益太多，美国帝国主义者又难于迁就，冲突无从调和，关于中国问题遂搁置而不能为平均分配的解决。

然日美互争掠夺中国的强盗行为，已是表现得极其明白了。

美国既不能在巴黎和会上与日本调和关于中国的冲突，相互获得平均利益，便企图组织新银行团——国际帝国主义的托辣斯，想用经济优胜势力，尽量把资本输入中国，以达到掠夺中国的优越地位，做完全管理中国经济的主人翁。但日本却已占得中国领土的最大部分做他专利的势力范围，又岂肯轻于让步，所以新银行团的计划未能即时实现。

在这样日美冲突状态之下，形成中国的特殊政治状况。日本帝国主义者先后扶助安福部、张作霖、新旧交通系等当权的北京政府，为的是要利用北京政府为实现日本侵略计划的工具。英国便站在吴佩孚派的督军后面，为的是要借此巩固他在长江一带的权利和势力范围的推广。美国却勾结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知识阶级分子，想用掩眼法来实现他国际托辣斯的经济侵略政策。但是这种步骤不一致的侵略方法，究不能即时发

展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处于利益冲突日甚的地位。

（四）

英国在战后的欧洲市场日被排斥，生产过剩，经济恐慌，故以发展远东市场为救济的唯一道路，而又陷于与日本冲突日见紧张的地位，同时又发生一个重大的问题：英国还是继续与日本同盟来垄断远东的权利呢？还是和美国联合来实现共同侵略远东呢？在这种纷纠之下就产生了华盛顿会议。华盛顿会议为的是要从新分配他们在远东的市场，希图调和那不可免的日美和英美的两种冲突。远东问题在英国帝国主义者看来，是他许多掠夺殖民地问题中间之一个，所以英美战争或许可以久延时日，但是在日本乃只有这个唯一的大市场，在美国也只有这个唯一可供发展的大市场，所以日美冲突万难减轻，而战争必在最近期间内爆发无疑，华盛顿会议哪能为力呢？不过他们在爆发之前，拿远东——特别是中国——的丰富物产和劳苦群众，搁在各国集于华盛顿的外交家、银行家的晚餐席上，平均各个的贪欲，从新宰割一次罢了。

华盛顿会议所以标榜减轻军备，完全是要欺骗在军备负担底下呻吟而将起来革命的劳动阶级。军备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柱石，资本主义国家不但需要他来侵略弱小民族，且需要他来镇压本国劳动阶级的反抗，因此资本主义国家裁减军备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他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些主力舰吨数比例和陆空军备保持的竞争，愈现出帝国主义者怎样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计划压迫劳动者的阴谋。

华盛顿会议中之主要问题——中国问题，是在美国胁制之下解决的。结果，他们承认日本在满蒙和东部西伯利亚独占的掠夺，将中国置在他们共同侵略的“开放门户”政策之下。美

国之所以采用海约翰以来的旧调，完全是要借着这个“开放”来打破日英在中国的优势，让他自己插足进来，操纵中国的经济生命。“开放门户”政策的采取，显然是美国侵略中国的第一步成功。多少年来驾驭中国的英日同盟虽是废了，但这次成立英美日法的四国吸血同盟——虽然他的根基极不稳固——却要做比他加倍有力的侵略。美国所领袖的新银行团，从华盛顿会议算是加了一层保障，将要使农人的中国变成国际托辣斯进贡的藩属，从此中国的贫苦农民要纳租税给那些外国的银行，中国所有的实业要归为外国银行的私产了。

华盛顿会议给中国造成一种新局面，就是历来各帝国主义者的互竞侵略，变为协同的侵略。这种协同的侵略将要完全剥夺中国人民的经济独立，使四万万被压迫的中国人都变成新式主人国际托辣斯的奴隶。因此最近的期内，是中国人民的生死关头，是不得不起来奋斗的时期。

（五）

所有上述那些事实，都是帝国主义的列强怎样必须侵略中国、怎样宰割中国和剥夺中国工人和农民们的贪婪的写真。

帝国主义者们还口口声声唱什么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和人类平等等好听的名词，想把资产阶级掠夺无产阶级的资本帝国主义的强国压迫弱小民族的行为，轻轻隐瞒过去。但是中国人民受了这几十年被压迫的经验，却最易了解帝国主义者所宣称的平等和自决是什么意义，而且也容易了解只有打倒资本帝国主义以后，才能实现平等和自决。

但是被压迫的中国劳苦群众最要明了现今世界大势，才能从受压迫的痛苦中加快的救出自己来。最近世界政治发生两个正相反的趋势：一是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

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一是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即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国际共产党和苏维埃俄罗斯——领导的世界革命运动和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大战以后，英国生产力停滞，法国经济破产，美国生产力过剩，而帝国主义者简直没法恢复战前经济原状。他们所组织的“国际联盟”用意是互相尊重其所得权利、互相维护其掠夺物的相互保险政策，结果又被他们自己拆散了。

华盛顿会议把日美冲突弄得更明显，柔鲁会议英法背道而驰，已是回复到比大战以前的形势还更危险。大战的“破坏”既然已将资本主义的墙脚挖掉了一大半，他旦夕有发生塌倒之可能，还能说及恢复和再造吗？这便可证明世界资本主义的命运已离他的末日不远了。在另一方面，工人和农人的苏维埃俄罗斯——全世界劳苦群众革命势力的柱石——不断的从根本上打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经了五年的奋斗，势力日见巩固；德国和中欧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焰，已达到极烈的顶点，英美意法等国常常发生极可怕的罢工运动，已摇动了资本主义的老巢穴；就是日本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也是声势浩大的兴盛起来；至于印度埃及爱尔兰高丽等被压迫民族，受了前次大战和俄罗斯革命的影响，独立革命运动日见有组织、日见紧张，业已惊得帝国主义者心神不宁了。这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迅速伸长的确证。

而且这两种反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的联合日趋密切，这个联合的革命势力必定会把世界资本主义的枯骨架推到资本主义自己掘成的坟墓里去。最近数十年之内，中国人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势力，已是大有进步，而且还会增长起来。但是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

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的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唯一的道路。

二　中国政治经济现状与受压迫的劳苦群众

（一）

帝国主义的列强既然在中国政治经济上具有支配的实力，因此中国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没有不是受他们操纵的；又因现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期还是很远，所以在政治方面还是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军阀们一方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者的利用唆使，一方为自己的利益把中国割据得破碎不全，张作霖之占据东三省，便是一个最显明的例。这样的情形，即是中国政治上一切纠纷内哄的复杂基础。

中国目前政治状况又另开了一个新局面。这个新局面一方便利于帝国主义的列强实行华盛顿会议所决定的共同侵略政策，一方延长中国的纠纷情势。最近的奉直战争，在吴佩孚方面，英美帝国主义者站在他的后面，为的要协助吴佩孚打倒日本在北京的优势，达到他们自己把持中国政治中心的欲望；在张作霖方面，自然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其后盾，希图维护著名亲日派张作霖所栽培的交通系内阁，以保持他对于北京政府的优越地位。这次战争的结果，吴佩孚扫除了张作霖在北京的势力，但是张作霖在满洲的势力并未失坠，仍足为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做专心掠夺满蒙的刽子手。吴佩孚战胜以后，北京政府渐渐落在亲美派的官僚手里，这是美国实现对华政策一个绝好的

机会。但是美国并不愿意吴佩孚——是一个较进步的军阀——制造一个统一的政府，因为吴佩孚所主张废督裁兵如果实现的统一，是与中国资产阶级以极大的利益而易于发展，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是极不利的。美国帝国主义者便转过头来，与日本强颜携手，企图共同利用张作霖、曹锟和其他顽固的军阀官僚（如安福系、交通系等），以免日美互相掣肘而造成一个可以共同利用的中国傀儡政府。英国更又赞助暴露了反动行为的陈炯明，铲除孙文派在广东的民主势力。这样，他们利用军阀，阻挠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造成军阀势力下之有名无实的统一政府做英美日的共同工具的计划，已是显明极了。即使中国现在能出现一个所谓统一政府，但列强的压迫不去，军阀的势力不除，中国是万难实际统一的，而且内乱还会不止呢！民国成立十一年，几于年年都有战争，不是军阀压迫民主主义革命的战争，便是军阀内哄，如直皖战争和奉直战争等。现在那些督军间的冲突，无处不现出严重的形势，加以帝国主义者之无穷操纵，因此内乱是有加无已的。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的和平，非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永远建设不成功。因为中国还是军阀把持和割据的时代，故在现今“统一”呼声之下，发生两种矛盾的现象：一派军阀假联省自治的名义实行割据，同时他派军阀假统一的名义压迫南方的民主革命和蒙古的自治，以增长自己的威权。两派所假借的名义虽然不同，而其各想延长武人政治的命运，是一样的。但是本部各省（东三省在内）经济上绝无根本的不同，而民国的历史，若以十年来武人政治所演出的割据现象便主张划省为邦，以遂其各霸一方的野心而美其名曰地方分权或联省自治，这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因为十年来，一切政权业已完全分于各省武人之手，若再主张分权，只有省称为国，督军称为王了。所以

联邦的原则在中国本部各省是不能采用的。至于蒙古、西藏、新疆等处则不然。这些地方不独在历史上为异种民族久远聚居的区域，而且在经济上与中国本部各省根本不同：因为中国本部的经济生活，已由小农业手工业渐进于资本主义生产制的幼稚时代，而蒙古、西藏、回疆等处则还处在游牧的原始状态之中，以这些不同的经济生活的异种民族，而强其统一于中国本部还不能统一的武人政治之下，结果只有扩大军阀的地盘，阻碍蒙古等民族自决自治的进步，并且于本部人民没有丝毫利益。所以中国人民应当反对割据式的联省自治和大一统的武力统一，首先推翻一切军阀，由人民统一中国本部，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共和国；同时依经济不同的原则，一方面免除军阀势力的膨胀，一方面又因尊重边疆人民的自主，促成蒙古、西藏、回疆三自治邦，再联合成为中华联邦共和国，才是真正民主主义的统一。

（二）

那些帝国主义者，本来想完全毁灭中国旧有的经济构造，代以完全由他们掌管的新式资本主义的经济建筑，但是他们毕竟没有完全毁灭的本领。他们曾经百端阻挠中国经济自动的改进，如他们不让中国人民自己建筑粤汉铁路、沪杭甬铁路及川汉铁路，强迫清政府借他们的款子来兴工，以及他们夺取汉冶萍公司之类。但是这样阻挠的结果，曾激成剧烈的反抗，对他们经济的垄断政策加以攻击。而且外国资本家初到中国的时候，究不能独立经营，只好借助中国商人和雇用中国账房、买办、经纪人之类，做掠夺勾当的中间物。这么一来，中国资产阶级就渐渐完成他们的初步积累阶段。大战期内，欧美商品不能顾及中国，日本商品又遭抵制，遂造成中国资本家发展的最好机会，如是中国资本主义也渐渐在扬子江流域一带兴旺起

来了。

但是压迫在世界侵略的资本主义极大组织之下的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哪能自由发展和自由竞争而达到独立的地位，只不过做世界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中间物罢了。而且外国资本主义为自己的发展和利益，反扶助中国军阀，故意阻碍中国幼稚资本主义的兴旺。中国幼稚资产阶级为免除经济上的压迫起见，一定要起来与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奋斗。

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已能结合全国的力量，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北京卖国政府，如一九一九年的排日运动。国民党所组织的广东政府，更是中国开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运动。广东政府现在虽然倒了，但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在中国是不会消灭的。还有一层，中国的智识阶级，商业的和工业的资产阶级，要自己能够避免美国的愚弄，他们的民主运动才能依正轨进行。

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农民因为土地缺乏，人口稠密，天灾流行，战争和土匪的扰乱，军阀的额外征税和剥削，外国商品的压迫，生活程度的增高等原因，以致日趋穷困和痛苦。近来农民更可分为三种界限：（一）富足的农民地主；（二）独立耕种的小农；（三）佃户和农业雇工。第一种占最少数，第二、第三两种的贫苦农民至少也占百分之九十五。如果贫苦农民要除去穷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而且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

自从外国商品充斥中国市场以来，手工业者、小店主、小雇主也是日趋困苦，甚至破产失业，加以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增加了手工业者无产阶级化的速度。这个大量的群众也势必痛恨那拿痛苦给他们受的世界资本主义，加入到革命的队

伍里面来。

中国劳动运动已是在第一个阶段中发展起来，香港海员和其他工人为经济要求的罢工运动，足够证明工人们的伟大势力，工人们的组织近来亦见迅速的扩大。而且工人们处在中外资本家的极端压迫之下，革命运动是会发展无已的。发展无已的结果，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

（三）

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民）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即因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独立和比较的自由。因此我们无产阶级审察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我们无产阶级和贫苦的农民都应该援助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而且我们无产阶级相信在现今的奋斗进行中间，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才能使真正民主主义革命格外迅速成功。

三　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及其目前的奋斗

（一）

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

我们无产阶级有我们自己阶级的利益，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

而且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

（二）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利益在这个联合战线里奋斗的目标是：

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

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

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四、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

五、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六、工人和农民，无论男女，在各级议会、市议会有无限制的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绝对自由；

七、制定关于工人和农人以及妇女的法律：

A. 改良工人待遇：（甲）废除包工制，（乙）八小时工作制，（丙）工厂设立工人医院及其他卫生设备，（丁）工厂保险，（戊）保护女工和童工，（己）保护失业工人……等；

B. 废除丁漕等重税，规定全国——城市及乡村——土地

税则；

C. 废除厘金及一切额外税则，规定累进率所得税；

D. 规定限制田租率的法律；

E. 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

F. 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

上面的七条，是对于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都有利益的，是解放他们脱出现下压迫的必要条件。我们一定要为解放我们自己共同来奋斗！工人和贫农必定要环绕中国共产党旗帜之下再和小资产阶级联合着来奋斗呀！

但是工人们要在这个民主主义联合战线里，不致为小资产阶级的附属物，同时又能为自己阶级的利益奋斗，那么工人们要组织在共产党和工会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工人们时常要记得他们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训练自己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预备与贫农联合组织苏维埃，达到完全解放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党的一个支部——现在他向中国工人和贫农高声喊叫道：快聚集在共产党旗帜之下奋斗呀！同时，向中国全体被压迫的民众高声喊叫道：一齐来和集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之下的工人贫农共同奋斗呀！并又高声喊叫道：一齐来和全世界的革命伙伴们并肩前进呀！只有“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是解放全世界的途径呀！前进呀！共同前进——

打倒军阀！

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为和平而战！

为自由而战！

为独立而战！

和平、自由、独立万岁！

受压迫群众之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国际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

一九二二年七月

根据一九二六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五年来之政治主张》刊印。

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

（一九二二年七月）

一九一四年大战以后，世界资本主义的势力已是衰萎，社会革命的势力日见澎湃。只因无产阶级自己营盘里有许多奸贼，很下流的替资产阶级服务，变作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最厉害的敌人，把这股革命狂潮暂时按抑下去了。因此造成世界帝国主义者为恢复他们经济起见，向全世界无产阶级进攻的情势，如各国资本家减少工人工资和增加工人工作时间等。在资本家向无产阶级进攻之情势中，第三国际召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建立一个联合的战线，共同抵御资本家目前的进攻。

苏维埃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和农人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祖国，是劳苦群众的祖国，也是全世界工人和农人与世界帝国主义的国家对抗的壁垒。现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势力还是强盛的时候，是不断的向她进攻，因此全世界的劳动阶级和劳苦群众应该尽力保护苏维埃俄罗斯。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大会议决：中国共产党要召集中国工人们加入世界工人的联合战线，保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维埃

---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收入一九二二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

俄罗斯，抵御资本主义的进攻；并要邀集中国的被压迫群众，也来保护苏维埃俄罗斯，因为苏维埃俄罗斯也是解放被压迫民族的先锋。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

（一九二二年七月）

人类经济的及政治的进化，自然造成阶级的战争，封建时代与民主时代间，因为经济的及政治的大变动，资产阶级对于封建的战争，是不能免的；民主时代与共产时代间，因为经济的及政治的大变法，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战争也是不能免的。

人类现在的历史，正在阶级战争的奋进途中，不但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战争大部分还未得着胜利，即民主对于封建的战争也并未终了，尤其是东方产业幼稚的国家，不但在社会习俗上，即在国家统治权上，封建的势力仍然大部分存在或完全存在。在这种封建势力统治的国家，人民的生命财产都握在武人手里，法律和舆论都没有什么效力，所以为人民幸福计，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够单独革命，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因为封建武人是无产者和民主派公共的仇敌，两派联合起来打倒公敌，才能得着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任何阶级都必须得着这几种自由方有充分发展的机会。民主派打倒封建以后，他们为自己阶级的利害计，必然要用他们从封建夺得政权来压迫无产阶级，这时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收入一九二二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

他们压迫的程度和无产阶级能够抵抗的程度，乃看无产阶级在民主的战争期间所发挥的组织能力和战斗能力至何程度而定。

中国名为共和，实际上仍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在这种政治经济状况之下的无产阶级，在这种内外两层压迫之下无法得着自由而又急须得着自由的无产阶级，更有加入民主革命运动之必要。我们要知道：无产阶级加入民主革命的运动，并不是投降于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来做他们的附属品，也不是妄想民主派胜利可以完全解放无产阶级，乃因为在事实上必须暂时联合民主派才能够打倒公共的敌人——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不如此无产阶级便无法得着为自己阶级开始团结所必需的初步自由，所以在民主的战争期间，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

我们共产党不是空谈主义者，不是候补的革命者，乃是时时刻刻要站起来努力工作的党，乃是时时刻刻要站起来为无产阶级利益努力工作的党。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在中国的无产阶级现状之下，我们认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我们应该号召全国工人农人在本党旗帜之下去加入此种战争。我们须告诉他们：此种战争虽不能完全解除工人农民的痛苦，却是解除工人农民的痛苦使工人农民到权力之路的第一步。同时又须告诉他们：无产阶级加入此种战争，不是为了民主派的利

益，做他们的牺牲，乃是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眼前所必须的自由而加入此种战争，所以无产阶级在战争中不可忘了自己阶级的独立组织。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认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发表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是能够应付时势之急迫的要求的，今后更应扩大此主张，并规定进行计划如左：

（A）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

（B）运动倾向共产主义的议员在国会联络真正民主派的议员结合民主主义左派联盟。

（C）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工会农民团体、商人团体、职教员联合会学生会妇女参政同盟团体、律师公会新闻记者团体等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

（一九二二年七月）

无产阶级是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世界的，况且远东产业幼稚的国家，更是要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现在代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大本营的，只有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后新兴的第三国际共产党。第三国际共产党，是和一方面利用无产阶级，一方面供资本帝国主义利用的第二国际，正立在对抗的地位。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二次全国大会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附：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1]

（一）每日的宣传和运动须具真实的共产主义的性质，并遵守第三国际的纲领和决议。党的一切机关报，均须由已经证实为忠于无产阶级利益的忠实共产党编辑，不要空空洞洞说成“无产阶级专政”为一种流行的烂熟的公式，应当用实际的宣传方法，把每日的生活事实系统的清解于我们报纸上面，使一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收入一九二二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

切劳动者，一切工人，一切农人，都觉得有无产阶级专政出现之必要。

一切定期的或其他的报纸与出版物，须完全服从党的中央委员会，无论他是合法的或违法的，决不许出版机关任意自主，以致引出违反本党的政策。

凡属第三国际的党众，无论在报纸里面，公众集会里面，工团里面，合作社里面，不仅要系统的，严刻的攻击资产阶级，并且要攻击与他通气的各色改良派。

（二）凡要加入国际共产党的组织，必须一律的系统的从一切工人运动的重要地位中（如党的机关编辑部，工团，议院团体，合作社，市议会）排除一切改良派和中央派而代以证实的共产党——在起初的时候，不要顾惜以初出行伍的劳动者代替经验富足的战士。

（三）阶级争斗，差不多在欧美各国家中，已入了内乱时代，在这样情形之下，共产党就不要以适合于资产阶级的法律为能事了，他应该到处创造与合法机关平行的违法机关，以便在决定的时候，完成他对于革命的职务。在施行戒严令或非常法律的国家，共产党一切行动不能合法发展时，合法行动与违法行动同时并进为绝对必要。

（四）在军队中传播共产主义的理想，必须引起一种坚忍的系统的宣传与运动，若因非常法律，公开的宣传困难时，就应当在里面做违法的工作；假使不肯这样进行，便是违背革命的责任而不能加入第三国际。

（五）系统的合理的宣传，在乡村是必要的，工人阶级，若是至少得不到乡村劳动者（农业的雇工和极贫的农人）一部分赞助或至少不能使一部分落后乡村在政治上守中立，他是不能胜利的。故共产党在乡村的工作在今日占非常重要的位置，

他应当使共产主义的工人常常与乡村相交接；假若拒绝这种工作，或委托这种工作于可疑的半改良派之手，那就等于抛弃无产阶级革命。

（六）凡愿意属于第三国际的党，应该告发一切爱国社会主义，和平社会主义的虚伪与错误；应该普遍的指教劳动者使其知道除了由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外，国际联盟所标揭的甚么国际仲裁，缩减军备，民主主义的改造，一点也做不到，并且绝不能救出人类于帝国主义无穷的战杀之中。

（七）凡愿意属于国际共产党的党，必须承认与改良主义和中央派的政策有完全的确定的分裂之必要，而且必须在党员与组织之间宣传这种分裂。共产党一致的行动，惟有付了这个代价才为可能。

国际共产党命令的，不许讨论的要求这种分裂应在一个极短期间即行成就。国际共产党不能容许著名的改良派屠拉第、考茨基、伊尔辉登、朗格特、马克它兰马、老列尼辈有权自命为第三国际党员，及到这个里面来演把戏。假使这样一来，他们又要飞速的把第三国际弄成为第二国际一样的。

（八）关于殖民地与被压迫民族的问题，凡在资产阶级私有这些殖民地或压迫其他民族的国内的党，应该具一种特别显明的方针。凡愿意属第三国际的党必须严厉告发“他的凶恶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的威压”；对于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不但口头赞助，而且要在实际上赞助他，要求驱逐帝国主义者于殖民地之外，使本国劳动者对于殖民地的劳动人民与被压迫民族发生真实的友爱感情，而且在宗主国军队之中，维持一种继续的运动，反抗其对于殖民地人民的一切压迫。

（九）凡愿意属于国际共产党的党，在工团、合作社及其他一切工人群众的组织里面，必须从事一种坚忍的系统的宣传

运动，应以坚忍的工作在其中组织一些共产党的核心，使一切工团都共产主义化。他的责任又应时时刻刻揭破爱国社会党的叛逆和中央派的犹疑。一切共产党核心，应当完全受党的节制。

（十）凡属于国际共产党的党，都应努力坚忍的攻击亚姆斯德登的黄色国际工团，他们都应坚忍的在工团内部宣传与亚姆斯德登黄色国际必须分裂的思想，并应以一切势力拥护加入于国际共产党的红色国际工团。

（十一）凡愿意属于国际共产党的党，应审他的议院团体的构造，排除一切可疑的分子，使议院团体，不在口头上而在实际上，服从党的中央委员会，务令一切共产党议员将其一切活动，隶属于革命的宣传和运动之真正的利益之下。

（十二）凡属于国际共产党的党，必须建筑于德莫克乃西的中央集权的原则之上。在现在内乱激烈的时候，共产党唯靠极集中的组织，铁的纪律（即采用军队的纪律）和全体战士一致给中央机关以广大的权力，过余的信任，使得执行一种不可抗辩的威权，才能成就他的职务。

（十三）凡在共产主义可以合法争斗的国内，共产党必须定期的洗刷自己的组织，淘汰一些模棱的和小资产阶级分子。

（十四）凡愿意加入国际共产党的党，必须以全力拥护苏维埃共和国与反革命作战。他们必须不懈的鼓吹劳动者拒绝为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运送军火军需，并须在派去攻击苏维埃共和国的军队中，努力从事合法的或违法的宣传。

（十五）一切至今还保守在社会民主党旧政纲上面的党，必须立刻根据国际共产党的精神，参酌他们国内的特别情形，建立一个共产党的新政纲。照例，凡属于第三国际各党的政纲，必须经过国际共产党大会或他的执行委员会批准，如某党政纲不及执行委员会批准时，该党有请愿于国际共产党大会

之权。

（十六）国际共产党大会一切决议及他的执行委员会一切决议，有强迫加入国际共产党之各党一律遵行的权力。当兹内乱激烈的时代，国际共产党与他的执行委员会，自应计算各国争斗的不同情形才通过各种普遍的决议并且审定其可能才至强迫执行。

（十七）按照以上一切设定，凡加入国际共产党的党，应一律改变他们的名称。凡愿意加入国际共产党的党必须命名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共产党支部。名称问题不仅是形式问题而且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国际共产党业已不客气的向资产阶级旧世界和一切黄色的旧社会民主党宣战，所以最要紧的，是要把共产党与旧社会民主党及冒了工人阶级旗帜的官僚社会党之不同，在全体劳动者眼前，弄得极明白。

（十八）各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必须刊布国际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一切重要的正式文件。

（十九）凡已经加入及表示愿意加入国际共产党的党必须于尽快的短期间内——至迟不得过国际共产党第二次大会后的四个月——召集非常大会说明这些条件。各党的中央委员会应把国际共产党第二次大会的一切决议宣传一切地方组织完全了解。

（二十）凡现在愿意加入第三国际而还未根本变更其旧方略的党，必须由在第二次大会前已公然宣言加入第三国际的同志，预先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及一切重要中心机关中，获得党员三分之二的多数。例外的事须经国际共产党执行委员会核准，才得行使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于第七条所载的中央派的代表，保留行使例外之权。

（二十一）凡排斥国际共产党一切条件和原则的党员，必须开除出党，非常大会的代表同样处理之。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本文系译文，原附印于《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中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之后，译文有许多混乱费解甚至错误之处。请参阅一九八六年十月出版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三十九卷第一九九——二〇四页及注释第一一四条。

PDG

关于议会行动的决议案*

（一九二二年七月）

（一）在经济先进国，资本主义的大生产既安然发展过好几十年，于是与他表里为用的议会政治，也随着渐趋于巩固。在这样背景之下，无产阶级政党议会行动，就渐渐变成为投机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议会行动，换过说，就是第二国际的议会行动，德、奥、法、比的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简直以全副精力集注于这种合法的绕舌的改良行动之内，而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宣传运动及其他一切必要的违法工作抛在九霄云外。

（二）第三国际产生于投机主义、改良主义流血的破产之中，换过说，即产生于第二国际投降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之中——重行估定无产阶级参与资产阶级专政之下的“民意机关”的价值：他把马克斯主义上面改良主义的油烟完全抹去，阐明无产阶级议会行动的革命性质；设定无产阶级参加、抛弃、退出资产阶级议会，及完全打破资产阶级国家机关的步骤；并且把这类合法的行动完全隶属于违法的革命行动之下，至此的革命的议会行动，成为激起或辅助无产阶级一类革命风潮的重要方法之一。

（三）经济落后如中国，一面成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掠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收入一九二二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

夺场和半殖民地，一面成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所扶植的武人势力的宰割物和糜烂区域，因此民主革命未成功，议会政治还未确立。虽然形式上，设立了各级议会，但因为武人势力的干涉和蹂躏，常常处在破坏胁迫的恐怖之中。

（四）中国共产党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贫苦农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先锋军，所以应当跑入这类时常被封建的武人势力所胁迫破坏的议会中去，高声告发代谢不穷的由国际帝国主义所收买所扶植的武人政治的罪恶，酝成民主革命到最高的潮流，以期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同时又在各级议会中，辩护无产阶级和贫苦农人经济生活的利益，以反抗本国幼稚的资产阶级对于劳动者一切的压迫。

（五）中国共产党为实施革命的议会行动起见，按照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所通过的原则规定如下：

A. 国会候选人名单，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省会、市会、县会候选人名单，由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协同提出，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所提全体或一二人不能胜任时，令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改提。

B. 候选人资格决不限于甚么“学识”和“经验”，应尽情提出本党中最勇敢最有革命精神的劳动者。

C. 本党国会议员，绝对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和指挥，省会、市会、县会议员绝对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派员和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和指挥，一切重大政治问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授以方略。本党议员之个人及团体（共产党议会团体）绝对不得自主。国会议员各项的演说稿，须预先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审定，省会、市会、县会议员各项的演稿须预先交中央特派员和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审正。

D. 本党一切议员须利用议员不可侵犯的身份权，参与议

会外一切群众运动和违法的组织。每次示威运动发生，本党议员必为示威行列的领袖，跑在群众的前面。

E. 本党议员必须常常保持与群众的直接接触，每年必须到选举他的区域往返几次，召集选民开种种会议，演说政治、经济、国际等情形及访察群众的新要求。他们在议会中的演说稿，必须用一切工人、农人、妇孺都能懂解、能动听的文字常常汇印成小册子，散布于城市与乡村。

F. 本党议员不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监督或违犯中央执行委员会方针时立即撤销其议员资格，并开除出党。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

（一九二二年七月）

中国的劳动运动，是在第一个阶段中发展，还脱不了旧行会和手艺组合的束缚。同时劳动阶级的奋斗还不过是为某种手艺或某个工厂的特别状况的单独运动，并没有普遍性质的运动。工人的组织也不强固，组合的人数也不多。切实研究这种现状，集中、扩大和正当指挥这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

按照中国劳动运动的现状和我们过去活动的经验，以及证以近代欧洲运动的教训，我们在工会运动中，应以下列各项原则为根本方针。

（一）劳动阶级和劳苦群众从资产阶级掠夺中解放自己的奋斗，必须伴着劳苦群众中的最进步和最能战斗的部分——无产阶级——的利益奋斗进行。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工会运动范围内，必须集中他的力量为产业工人的组合运动，如铁路、海员、五金、纺织工人等。

（二）工会是为什么成立的？工会就是保护工人切身的利

---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收入一九二二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

益和为工人的利益奋斗的机关，因为劳动者是创造各种物品者，所以劳动者应该享受劳动者所创的东西。这个事实，便是真正工会的出发点。

（三）工会应该明白并且认识资本家与工人中间没有相同的点，他们中间的利益的冲突，是不能调和的，所以工会不但不要去调和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利益，还要使这种争斗更加紧张。一个争斗接着一个争斗，在两个争斗之间工会的组织愈增强固，预备第二次争斗。如将工人的会费多数存作罢工基金是必要的，但同时工人必须避免自己立在不利地位的情况中争斗。

（四）工会应该努力做改良工人状况的运动，凡在资本主义之下能够改良的，都要努力去做。同时须使工会很快的向着劳动运动的最终目的进行，就是完全打倒工银奴隶制的资本制度，并照共产主义原则改造社会。

（五）工会进行劳动者的经济改良运动，必须进于为劳动立法运动。同时使工会明白：获得劳动立法和争得劳动改良条件，均必须工会组织得强固；在资本制度之下，要能够使劳动立法或劳动改良条件真正实现，都必须劳动者的力量能够压迫政府和东家才行的。

（六）我们的同志也时常有主张工会不做政治运动的，这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趋势，也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此会使工会运动软弱永远处在非法的地位。工会必须做民族独立政治的和市民的权利与自由（包括普通选举权和废除罢工刑律的运动）的奋斗，并在民主主义联合战线中占独立的重要的地位，这样才能促进工人们得到最后的胜利。但同时这个奋斗的用意是真正无产阶级争斗的革命宣传，不是投机主义者政治运用的用意，所以要防备非无产阶级工人们领导他们，须要无产阶级

领导他们自己。

（七）固然工会可以为反对一个工头或一个雇主而奋斗，但是工会务必把雇主们看作一个阶级来对抗，或对抗工头任意压迫工人的制度和包工制，各种运动都要变成有普遍的意义才能使工会扩大，真正变为阶级的行动。

（八）工会有两个最重要而须努力做到的职务：一种是团体契约，一种是同样的劳动要得同等的工钱，单独契约是很利于雇主掠夺的工具，他利用了这种工具便可随他的意思来进退工人和操纵劳力的卖价。工会须要努力争到：工人进退和一切待遇的条件不得由雇主的向工人单独缔结，要工会代表工人和雇主的协定。将工人分成了若干——种族性的，年龄和体力——种别，据着这些分别来定工钱的高低，这是资本家欺弄劳动阶级最巧妙而残刻的一种手段。资本家不但可用这种手段去更贪婪的掠那些弱的和幼的劳动者，且可将劳动阶级裂成了若干利益有差的组派，要他们自相忌恨，自相较争，工会在这种场合便须努力争到"同样劳动须给同等工钱"。不论他是洋人或华人，不论他是男子或妇女，不论他是壮年或幼孩和老头，只要他们做得是同样的劳动，便须给他们同等的工钱，不得据生理及社会的分别给他们不同等的工钱。但同时不要弄错，所谓"同等工钱"，不是将高的工钱减抑了去就低的工钱，是要将低的提到和高的同等地位。这两种职务是工会的基础职务，前一者的成功，是可使工人对工会增加了信赖，吸收他们大群的加入运动；后一者的成功，是可免除工人们中间的相冲突，做到了阶级团结的一致。

（九）工会的性质，不能与行会一样，不能有雇主在里面，同时只要是赚工钱的工人，不论男、女、老、少，信仰，地域，种族，国籍，政见，熟练、不熟练等区别，都须加入工

会。因此工会不得有收费过重或经过严重审查等办法，以限制工人的加入，这样才能使工会变成一个阶级的群众的工会。

（十）工会最主要的活动是与资本家和政府奋斗，互相帮助、联络感情不过是次要的目的，因为工会是一战斗的团体，不专是共济的机关。

（十一）工会自身一定要是一个很好的学校，他应当花许多时候努力去教育工会会员，用工会运动的实际经验做课程，为的是要发展工人们的阶级自觉。

（十二）工会的构造须要很快的使他成为团结很紧的、中央集权的和有纪律的产业组合。产业组合工会内部不能依职业分为一些“自治”组，因为这是会使工会成为不能战斗的破碎团体。

（十三）工会最好的基本组织是工厂委员会，每种产业下的一个工厂里的工人组织一个工厂委员会为基本单位，再组织一个产业组合。但工厂委员会须属纯粹工人的组织，绝不可用雇主和工人的代表混合组成之，同时工厂委员会又不可离工会而独立。

（十四）但是工会只是产业组合的构造，还不算最好的工会，真正的工会除了是产业组合的构造和以革命为目的以外间还须要有阶级一致和纪律的训练。就是要使全劳动阶级都联合起来，决不可有一个工厂或一部分工人的特别利益与一个产业组合的利益冲突之事发生，也须调和一个产业组合和全国劳动阶级间的利益。

（十五）各国革命的工会必须有统一的联合，去同全世界资本主义奋斗，这个全世界革命的工会的统一联合，就是赤色工会国际协会。中国共产党必须根据上面的原则组成工会带到赤色工会国际旗帜之下，同时中国劳动阶级的利益须免去与向

全世界劳动阶级的利益冲突的事，如提高中国工人的工资，免得中国贱价劳力被外国资本家雇用了去排挤外国高价劳力等。

（十六）共产党与工会的分别是，共产党是所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的组合，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有一定的党纲，是一个以打倒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为目的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工会是所有工人的组合（不管政治见解怎样），工人们在工会里，去接受“怎样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去奋斗”的教育，与共产党向同一目的进行，但是较缓的全阶级的组合。如战争一样，军队中有一个先锋，所有这大量的军队都跟着这个先锋前进。共产党也可说是一个人的头脑，全体工人便是人的身体。所以共产党无论在哪种劳动运动中，他都要是“先锋”和“头脑”，决不可不注意任何工会活动，并要能适当的诚实的和勇敢的率领工会运动。

（十七）共产党为实际率领工会和实际为无产阶级的先锋，必须在工会中和各个工厂委员会以及一切的劳动团体中组织强有力的团体，很少有例外。

（十八）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无政府党或基督教所组织的工会里面活动，不得任意引导工人脱离已成的工会。我们的战术是要在他们势力下的工会里面，渐渐积成势力，推翻国民党、无政府党或基督教的领袖地位，自己夺得领袖地位。

（十九）为工人们目前利益的奋斗，我们共产党人要随时与国民党、无政府党甚至与基督教合作。但是我们要随时证明和解释给工人知道：只有共产党是工人的先锋，是工人的政党。

附加议决案

前面的议决案是关于重要产业工人的工会运动，是最重要

的，现在还有几点次要的议决案，照录如下。

1. 工人消费合作社是工人利益自卫的组织，共产党须注意和活动此种组织。

2. 较进步的行会里，共产党也必须进内去活动，为的是要把行会里的雇主驱逐出来，结合性质相近或同一原料作工的各种的行会，组成一个工会。

3. 很守旧的行会和资产阶级为愚弄工人起见所组织的团体、俱乐部、学校等，共产党也要进去活动，在里面组织小团体。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

（一九二二年七月）

（一）机器生产力的进步，幼弱的劳力也成了可供引申的生产要素，结果在好些企业里边便加入了少年劳动的队伍，他们同样的与成年工人成了必要的机器附件。但资本家还与少年工人的经济待遇却是普遍的都较对成年工人为尤苛酷。因之少年劳动者成了受掠夺阶级较更受掠夺的部分。

无产阶级少年不只成了资产阶级可榨出更大量剩余价值的目的物，且为他们驱使了去做保护他们掠夺旧的和做新掠夺的武器。每个发达到了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须组织坚强的军备做他的柱石，这组织中是要有多少万鲜花一般可爱而强壮的劳动者做他的主力。帝国主义国家不但需要军备去劫掠弱小民族，且需要他来镇压本国劳动阶级的反抗和革命。在每次战争和内乱里，组成了军队的劳动者逼于资产阶级的驱使，疯狂一般的去屠杀他们本国和外国的弟兄们，为了资产阶级利益的保持和争夺，劳动阶级中不知有多少兆鲜花一般可爱而强壮的青年生命染血在资本主义进行的历史上了。

在资本阶级这样残酷的掠夺和不害羞的利用之下，欧洲劳动少年的先驱们举起了他们反对的旗帜，他们要勇毅的为了他

---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收入一九二二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

们经济利益和反对军备而奋斗。不幸，这种运动有多少年为黄色的“社会主义者”陶冶的青年所玩弄，他不曾得将他革命的光焰放高。一九一九年十一月的柏林会议，是国际无产阶级少年痛恨帝国主义战争的屠杀而聚千百的青年的，这次会议才组成与无产阶级少年赤色的国际团体——共产主义少年国际。共产主义少年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所采的标语是“向劳动的群众中去!”他决定了各国少年劳动者奋斗的新责任；他决定了在国际共产党政治的领袖之下，独立的做无产阶级少年运动的引导。

凡是受掠夺的少年们所在的地方，都是共产主义少年要去活动的地方，要在这些地方组织他们，引导他们做种种经济的奋斗。这是吸引他们归依共产主义革命队伍旗帜最有效的道路。

将资本主义世界整身推入他已打就的坟墓，实有待于劳动者阶级认识的增加，革命的教育在无产阶级少年运动当中成了很紧急需要，这种教育的重要教材就在他们日常的奋斗当中。组织的本身就要是个训练的指导师，每种运动都要是训练少年劳动者成为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的课程。

帮助世界劳动者祖国——苏维埃俄国——的赤卫军，反对资产阶级的军备!

世界的经济秩序已为帝国主义破坏了，世界的资产阶级现要求加劲掠夺他们本国劳动者和弱小民族企图恢复大战前经济原状，在这个进攻之中劳动阶级最先做炮灰的自然是最受掠夺的少年劳动者了。目前是十分需要：劳动的少年与成年联合成一个国际的联合战线，来反抗这个进攻。

（二）天产殷富和有四万万贱价劳力人民的中国，八十年来早已成英、法、日、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劫掠和争夺的目的物

了。现在中国的重要经济生命是已全操在外国资本家掌握之中，同时国内政治是为极反动的封建军阀们所统治，他们各据一方为了外国帝国主义利用和各自利益的争夺，互相战争不已。

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达虽已到了使新兴的资产阶级起来反抗外国侵略势力和打倒封建制度，建设一个独立民族的民主国家的运动，但这种势力常压服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交相利用的压迫之下，从一九一一年至今未能成功。

这种情形决定了共产主义少年在中国最近奋斗的重要责任。中国少年运动的先锋，他不但要在共产主义与少年国际领导之下为了少年劳动者经济和文化利益而奋斗，将他们组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少年军旅，他同时要联络中国一切被压迫的少年们的革命势力在一条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上，引导他们做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奋斗。

共产主义少年在中国的运动是要成个大群众的性质。

他且要记着他是以劳动少年的利益为第一的，他要认目前民主革命的奋斗是训练无产阶级革命的绝好机会，他要收革命的少年劳动者大群众的坚强的团结成了他的唯一主力。

（三）所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认为，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所采取的纲领和一切决议案都是根据了实际革命需要而下的重要结论。他认这种运动是中国共产运动中重要的一部。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在青年劳动者一切经济和教育利益奋斗的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是个独立的团体；关于普通政治运动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则应当约束他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之下。

为了促进两团体关系的密切和协谋各种运动的顺利起见，

大会认为两团体在各级组织中有互派代表的必要。至于此项职务如何实现，应由两团体中央执行委员会按实际情形协商决行。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

（一九二二年七月）

一、几世纪以来，平等自由的原则成为资本主义“文明”国装饰门面的口头禅，可是在他的制度之下经济既不平等妇女是得不到一切平等和自由的。他们不但成为资本家用以操纵劳动市价更廉贱的生产奴隶并且负担资本主义社会组织中家庭的和母性的负担。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之下妇女是得不到解放的。

现在妇女在世界上开始得着解放地位的，就只有苏维埃俄罗斯。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获得了完全平等的权利。他们业已在实际上参与改造社会的工作，与男子毫无区别。如共产团，公共食堂，公共洗濯场，儿童养育院等都渐在建设之中，以图根本解除妇女家庭的奴隶地位，可见妇女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五年工夫所得的自由和平等，远过于妇女们在欧洲资产阶级专政之下经过一世纪奋斗的结果。这便可证明妇女解放要在社会主义的社会才得完全实现。

二、自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无产阶级的妇女渐渐降到工钱奴隶地位。他们在不堪忍受的工作状况中作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不过取得比男子更低的工钱，对于女工、童工的

---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收入一九二二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

待遇，简直惨无人道。

在中国现状之下不独女劳动者已陷在极残酷的地位，还有许多半无产阶级的妇女，也渐渐要被经济的压迫驱到工厂劳动队里面去，就是全国所有的妇女，都还拘囚在封建的礼教束缚之中，过娼妓似的生活，至于得不着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的权利，乃是全国各阶级妇女的普遍境遇。所以中国共产党除努力保护女劳动者的利益而奋斗——如争得平等工价，制定妇孺劳动法等之外并应为所有被压迫的妇女们的利益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认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他目前为妇女奋斗的是：（一）帮助妇女们获得普通选举权及一切政治上的权利与自由；（二）保护女工及童工的利益；（三）打破旧社会一切礼教习俗的束缚。同时，中国共产党又要高声指教全国的妇女们：这些运动，不过为达到完全解放目的必须经过的站驿，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妇女真正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前进，才能跑进妇女解放的正路。

三、第三国际，为一切无产阶级，一切被压迫的民族，一切被压迫的妇女及一切被压迫的少年的世界革命的总机关，所以他的里面包括共产党妇女国际为其一部。第三国际第三次大会议决定各国共产党于他们的组织之旁设立特别委员会，以宣传广大的妇女群众，并令在各国创立一妇女部，各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中，亦须为妇女特辟一栏。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尽快的时期内实现第三国际这种决议。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

（一九二二年七月）

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我们既然不是讲学的知识者，也不是空想的革命家，我们便不必到大学校到研究会到图书馆去，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既然要组成一个做革命运动的并且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就不能忘了两个重大的律：

（一）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

（二）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

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

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须依据左列诸原则：

（一）自中央机关以至小团体的基本组织要有严密系统才免得乌合的状态；要有集权精神与铁似的纪律，才免得安那其的状态。

---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收入一九二二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

（二）个个党员都要在行动上受党中军队式的训练。

（三）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

（四）个个党员须牺牲个人的感情意见及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

（五）个个党员须记牢一日不为共产党活动，在这一日便是破坏共产主义者。

（六）无论何时何地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不可有离党的个人的或地方的意味。离开党的支配而做共产主义的活动这完全是个人的活动，不是党的活动，这完全是安那其的共产主义。

（七）个个党员须了解共产党施行集权与训练时不应以资产阶级的法律秩序等观念施行之，乃应以共产革命在事实上所需要的观念施行之。

所以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要说我们中国共产党成功一个党，不是学会，成功一个能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大的群众党，不是少数人空想的革命团体，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必须是很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我们的活动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中国共产党章程*

（一九二二年七月）

第一章 党　　员

第一条　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第二条　党员入党时，须有党员一人介绍于地方执行委员会，经地方执行委员会之许可，由地方执行委员会报告区执行委员会，由区执行委员会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次第审查通过，始得为正式党员。但工人只须地方执行委员会承认报告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即为党员。

第三条　凡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承认者，或已经加入第三国际所承认之各国共产党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第二章 组　　织

第四条　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附近，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如各组所在地尚无地方支部

---

*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章程，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收入一九二二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

PDG

时，则由区执行委员会指定隶属邻近之支部或直隶区执行委员会，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地方，则直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挥监督）。每一个机关或两个机关联合有二组织以上，即由地方执行委员会指定若干人为该机关各组之干部。各组组织，为本党组织系统，训练党员及党员活动之基本单位，凡党员皆必须加入。

第五条　一地方有两个支部以上，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许可，区执行委员会得派员至该地方召集全体党员大会或代表会，由该会推举三人组织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并推举候补委员三人——如委员因事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地方，则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派员召集组织该地方执行委员会，直接隶属中央。区执行委员会所在地方得以区执行委员会代行该地方执行委员会之职权。

第六条　各区有两个地方执行委员会以上，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有组织区执行委员会必要时，即派员到该区召集区代表会，由该代表会推举五人组织该区执行委员会，并推举候补委员三人。如委员因事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委托一个地方执行委员会暂时代行区执行委员会之职权。区之范围，中央执行委员会规定并得随时变更之。

第七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五人组织之，并选举候补委员三人，如委员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

第八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期一年，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任期均半年，组长任期不定，但均得连选连任，干部人员由地方执行委员会随时任免之。

第九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大会的各种决议，审议及决

定本党政策及一切进行方法。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并在其范围及权限以内审议及决定一切进行方法。各委员会均互推委员长一人总理党务及会计，其余委员协同委员长分掌政治、劳动、青年、妇女等运动。

第十条　大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之各种议案及各地临时发生之特别问题，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均得指定若干党员组织各种特别委员会处理之，此项特别委员会开会时，须以各该执行委员会一人为主席。

第三章　会　　议

第十一条　各组，每星期由组长召集会议一次，各支部每月召集全体党员或组长会议一次，各地方由执行委员会每月召集各干部会议一次，每半年召集本地方全体党员或组长会议一次，各区，每半年由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本区代表大会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

第十二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召集全国代表临时会议。有过半数区之请求，中央执行委员会亦必须召集临时会议。

第十三条　全国代表大会或临时会议之人数，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定之。

第十四条　凡一问题发生，上级执行委员会得临时命令下级执行委员会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

第十五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得随时派员到各处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此项会议应以中央特派员为主席。

第十六条　中央及区与地方执行委员会，均由委员长随时召集会议。

第四章 纪 律

第十七条 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机关。在全国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

第十八条 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

第十九条 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

第二十条 各地方党员半数以上对于执行委员会之命令有抗议时，得提出上级执行委员会判决；地方执行委员会对于区执行委员会之命令有抗议时，得提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判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抗议时，得提出全国大会或临时大会判决，但在未判决期间均仍须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

第二十一条 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各组均须执行及宣传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凡有关系全国之重大政治问题发生，中央执行委员会未发表意见时，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均不得单独发表意见。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所发表之一切言论倘与本党宣言章程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及所定政策有抵触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得令其改组之。

第二十二条 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加入一切政治的党派。其前已隶属一切政治的党派者，加入本党时，若不经特许，应正式宣告脱离。

第二十三条 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为任何资本阶级的国家之政务官。

第二十四条 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

第二十五条　凡党员有犯左列各项之一者，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

（一）言论行动有违背本党宣言、章程及大会各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

（二）无故连续二次不到会；

（三）欠缴党费三个月；

（四）无故连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

（五）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其停止出席、留党察看期满而不改悟；

（六）泄漏本党秘密。

地方执行委员会开除党员后，必须报告其理由于中央及区执行委员会。

第五章　经　　费

第二十六条　本党经费的收入如左各项：

（一）党费　党员月薪在五十元以内者，月缴党费一元；在五十元以外者，月缴党费按月薪十分之一计算；无月薪者及月薪不满二十元之工人，每月缴费二角；失业工人及在狱党员均免缴党费。

（二）党内派捐。

（三）党外协助。

第二十七条　本党一切经费收支，均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支配之。

PDG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章程修改之权属全国代表大会，解释之权属中央执行委员会。

第二十九条　本章程由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二十三日）议决，自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之日起发生效力。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

（一九二二年八月）

周　恩　来

新近旅法学界中有些人集资编印了一种非宗教的册子，名《无所谓宗教》。这本是一件好事，而且是当做的事。在那本册子中，《如何掘去宗教之根》一文，要算是杰出之作，只可惜文中最后一段竟以共产主义与宗教同列，殊令人大惑不解，且适足为全篇根据科学精神反对宗教的污点。著者曾谓“吾人不能于物质世间之外，复有非物质世间”，“……吾们的人生，是实际的人生”。“生活颠困为物质世间之缺憾……这是社会组织及经济组织的问题，应让社会改革者去解决。”总此数语已知著者是接近唯物史观的了。著者信社会改革当重科学精神，然则科学精神又如何？著者说：“……种种社会上问题，我们发现了他的不安，我们便立当研究一个改革的办法。有了办法，我们立当去实验过了，如果有错，我们也可拿以再去更改，这是唯一的科学方法。”“我们只有去研究，去试验，终可以试验出一个最良最适的制度，除了我们不去试验，不肯改革，则终身困苦……”

我们试问问著者，马克思所提倡的共产主义有一点不合于

---

* 本文原载一九二二年八月法国印行的《新刊评论·无所谓宗教》小册子，后又在一九二二年九月一日出版的《少年》第二号刊载。

上边列举的话么？在马克思以前，社会主义成为有产阶级中人的清谈，共产思想还存留在乌托邦中，自马克思出，一本科学的精神，寻出“物质世间”的最大缺憾在现代经济组织，而生产力的变迁，更足以使此经济组织有必须崩溃之势。另一方更从人类史中，找出阶级争斗的痕迹，知道现今的“下层阶级”（凡加“”符号的字句，都是用著者语）乃是依附现代经济组织之下的最后最困苦的无产阶级。欲“铲除痛苦的根源”，消灭此阶级界限，顺着经济变迁可能的趋向，自不得不想出“最公平的分配方法，最有效的生产制度，使生产者公有其生产品，而公同分享之”。这便是共产主义所由来，也正是马克思全部经济学说给以明确证明的。至于革命，更是“铲除痛苦的不可避免的方法。除非我们抱无抵抗主义，求上帝无形之安慰”，“不去试验，不肯改革”便罢；否则欲用一个研究出的办法去实验，没有不妨碍旧办法的，没有不与他冲突的。

马克思正因为立论准乎“实际”，研究出来的改革办法必须“实验”，所以才主张实行革命的共产主义；信此主义的人，所以才能勇于实行。别的社会主义派别，或者还可容留宗教思想，唯独共产主义者对此种“牺牲弱者庇护强者”，长人倚赖性，诱人容忍，“锢蔽思想”的宗教却深恶痛绝。国际共产党因此认宗教是人类中的一种毒药。

至著者谓共产主义具有宗教精神，我真不知其何所见而云，然岂也受了罗素谓马克思主义已成了宗教的暗示么？其实罗素所指多在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本来革命精神多出之热烈的情感，理愈明，信愈真，感愈切，革命的精神遂能愈久而愈坚。这种培植情感使趋重“实际”的精神，不但改革社会须要他，便实验室中也不可离他须臾。牛顿没有他，引力原理未必发明，安斯坦没有他，相对论不会出世。在我们现在看来，牛

顿有些地方的精神未免白用，但是安斯坦以前二百年的科学世界，果是谁的领域？且当其时，即至现在，又谁能说他是迷信？

迷信与信仰何别？别在其所信的理论与方法，能否用在“实际”上来“试验”，换过来说，便是能否合乎科学精神。所以同一参加情感而成为意志的“信”，乃有“迷信”与“信仰”之别（其实只说一“信”字便足）。再申说一句，凡有所“信”，都不应趋越于理智范围之外，出此便为“迷信”。准此，我们能说纯本科学精神探求出来的共产主义具有宗教精神么？

共产党人对于他种为有产阶级作辩护，或是无形中阻人前进，引人空想未来天国的种种学说，“不能接受，不能容忍”，而更加上合乎“实际”的批评，这正因他有信仰主义的热烈精神和改革社会的决心。他决不能学自由论者之徒尚空想，还以为是乃本诸科学精神。为要解决物理学上的问题，所以牛顿、安斯坦各信他们的发见为“不易之良方”；为要“铲除社会痛苦的根源”，所以我们才信“共产主义为不易之良方”。假若我们对于马克思本着科学精神研究出来，急待试验的共产主义，信而又疑，不去实行，我们又何必谈“信仰”，又何必谈“试验”、谈“改革”。相信安斯坦学说的人，才肯替他证明日蚀的移动是合于他的理论，替他奏此凯旋。那么，相信马克思学说的人，视马克思的著作为可贵可重，又何足怪？凡是相信某种人的学说，对于其著作，无有不珍视之理，何况急待试验的学说，便甚言之为“经”为“典”，也无可议。

教徒对于神父牧师只有迷信，即心知其非，口亦不敢言。至于共产党人一方服从领袖的指挥，一方实时时监督其行动，著者止知俄党爱护好的首领，也知各国共产党人时时驱逐其不良的首领么？即在俄国当日，此类事亦极多。

共产党当然不要“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自由论者，但共产党也决未曾想造出蠢如鹿豕只知服从的党员。旧式的军队除掉被愚弄和服从外无他事，今日的红卫军却有了劳兵会议。军队犹如此，他种组织，更不待言。

著者对于《资本论》亦曾读过未？不知其从何而证明“《资本论》所搜集之事实，即以最有力的暗示，利用人类好杀的兽性，以激动其报复及争权的野心。”因为《资本论》搜集的“事实”（注意此两字），甚有伤“上层阶级”的体面，多是些残暴掠夺的罪状，遂谓马克思借此与人以暗示。马克思本此以主张共产主义，主张“下层阶级”当将握特权的“上层阶级”赶走，好消灭阶级界限，此不仅暗示，马克思且曾彰明较著地嚷出来了。但著者如此说法，不惧犯有拥护有产阶级的嫌疑么？然则又何解于“铲除痛苦的病根”与“生活颠困为物质世间之缺憾”之言？若以宣布一种阶级一派人的罪恶便以为“利用人类好杀的兽性，以激动其报复及争权的野心”，则《无所谓宗教》一书也具有宗教精神作用了。

至其谓“驱下层阶级以杀上层阶级，率共产教徒以制服异己……”我们第一须认清在共产主义中所认定的“上层阶级”与“异己”果属何人。共产党人指导劳动阶级驱逐有产阶级和附属他的军阀官僚，更使之由有产化为无产来尽人人劳动的义务。这种解脱人类全体，引人向善，并使之有路可走的精神，岂轻轻可以“报复争权”等字样抹杀掉的么？至于杀与不杀，那纯视反革命的举动如何为定。革命是不能不流血的，除非著者与读者是抱无抵抗主义的人，尚可以“杀”字动人，然而又何解于“消灭此不平的政治组织”与“铲除痛苦的根源”之说，且更何解于“科学的精神”？

强他人迷信其教条，故基督教说爱之结果为杀。共产党人

不仅不说那“爱仇如友”的空话，且也未尝“强他人同其信仰”。反过来，恐怕那有产阶级却正在利用宗教精神使人人麻醉于“自由思想”好听的名辞之中，无形中却为旧制度作了保证而不自觉呢！然则“十字军之东征”、“左手执《克兰经》，右手执刀”的譬喻，也止有放在“上层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异己”身上为当了。

至于说到“得势”的赤俄，则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更使指导无产阶级，以无产阶级利益为利益的共产党人充当先驱，乃政治经济过程中的必然趋势，有何足怪！若谓“以首领之意旨强迫人民服从”，著者亦曾知赤俄政治上的首领须服从劳动会议（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人民委员会的决议么？著者亦曾知劳动会议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常变更人民委员会的决议么？而劳动会议代表更有为无产阶级中人撤换的事么？再“人民”果何所指？若谓赤俄首领为拥护无产阶级利益起见强迫反革命派的人服从，有类于罗马教皇，立意未免滑稽。著者试沉心想，今日世界除赤俄外，果是何种阶级的天下？我们果受了何人的强迫而须得服从？且所已得的自由又是什么？不要说实行反抗旧制度、反抗“上层阶级”了，便是为拥护被压迫阶级利益而有所结合，有所主张，也要常常受那维持特权阶级的法律干涉。而社会上受了宗教精神之毒的人，不一定是教徒，更要轻蔑排斥你到了万分，并且有生以来便无形中受了各方教育的限制与暗示。试问自由在哪里？自由思想更从何说起？旧制度旧思想既然把人心锢蔽得这样，一旦无产阶级为解放人类全体而夺得政权，在过渡期中为要肃清旧毒，扶植自由的新芽，对他如何能不加以限制？不然，还得请出沙皇，请出克伦斯基政府来好了。但又何必“改革”，又何必“实验”？又何必“实现出一最公平的分配方法，最有效的生产

制度，使生产者公有其生产品，而公同分享之”以图“铲除痛苦的根源”，而得到未来真正自由发展的协同社会呢?

著者自信为拥护科学精神爱好自由思想的了，但他文中这最后一段话，实太不科学的了，太不肯跳出旧思想的圈套中来自由思想了。

著者立论着眼在“掘去宗教之根”，但此“根”隐伏之所，决非在科学的共产主义中。凡是那描写出一个理想的天国，而无法实现的一切学说主义，都还有宗教迷信的毒根在内，即著者“成功即在目前”之言，也都含有几分心理上不科学的宗教毒质在内，想又为著者所忽略了。凡真拥护科学精神，爱好自由思想的人，也都有责任去纠正他。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出版的《周恩来早期文集》刊印。

PDG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拟定的劳动法案大纲*

（一九二二年八月）

（一）承认劳动者之集会结社权。

（二）承认劳动者之同盟罢工权。

（三）承认劳动者之团体的契约缔结权。

（四）承认劳动者之国际的联合。

（五）日工不得过八小时，夜工不得过六小时，每星期连续四十二小时。

（六）十八岁以下青年男女工人及吃力的工作，不得过六小时。

（七）禁止超过法定的工作时间。如在特别情形须得工会同意才得增加工作时间。

（八）农工的工作时间虽可超过八小时，但所超过之工作时间的工值，须按照八小时制的基础计算。

（九）须以法律担保一般不掠夺别人劳动之农人的农产品价格，此项价格由农人代表提出，以法律规定之。

（十）吃力的工作及有碍卫生的工作，对于十八岁以下的

* 这个文件最早刊载在北京出版的《工人周刊》上，后在一九二二年九月三日出版的《先驱》第十一期上转载。

PDG

男女工人，绝对禁止超过法定时间。绝对禁止女工及十八岁以下男工作夜工。

（十一）体力的女工产前、产后各八星期休工，其他工作之女工产前、产后各六星期休工，均照常领取工资。

（十二）禁止雇用十六岁以下之男女童工。

（十三）为保障工人适当以至低限度的工钱，国家须制定这种保障法律。当立此项法律时，须准全国总工会代表出席。无论公私企业或机关的工资，均不得低于此项法律保障的至低限度。

（十四）各种工人，由他们产业组合或职业组合保障，可选举代表参加政府经济机关，及选举代表参加政府企业机关，及政府所管理的私人企业或机关之权。

（十五）国家对于全国公私各企业均须设立劳动检查局。

（十六）国家保障工人有完全参加国家所设劳动检查局之权。

（十七）一切保险事业，须由工人参加规定之，以保障所有在政府的、公共的、私人的企业和机关内的工人之损失或危险。保险费完全由雇主或国家出之，受保险者决不分担。

（十八）各种工人和雇用人，一年工作中有一月之休息，半年中有两星期之休息，并领薪之权。

（十九）国家须以法律保证男女工人有受补习教育的机会。

（附白）工友们！这是本部斟酌各国劳动法拟定的，我们认为是最低的限度，并不过高，我们是非要国会都要通过不可的。但不知各位对于这十九条认为满足不满足？完备不完备？

如有认为要增加或更改的请快快来函示知，以便修改。这是关于我们劳动阶级切身的利害，我们不可忽视呀！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本报宣言

——《向导》发刊词

（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

现在最大多数中国人民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敢说是要统一与和平。为什么要和平？因为和平的反面就是战乱，全国因连年战乱的缘故，学生不能求学，工业家渐渐减少了制造品的销路，商人不能安心做买卖，工人农民感受物价昂贵及失业的痛苦，兵士无故丧失了无数的性命，所以大家都要和平。为什么要统一？因为在军阀割据互争地盘、互争雄长、互相猜忌的现状之下，战乱是必不能免的，只有将军权统一、政权统一，构成一个力量能够统一全国的中央政府，然后国内和平才能够实现，所以大家都要统一。我们敢说：为了要和平要统一而推倒为和平统一障碍的军阀，乃是中国最大多数人的真正民意。近代民主政治，若不建设在最大多数人的真正民意之上，是没有不崩坏的。

所谓近代政治，即民主政治立宪政治，是怎样发生的呢？他的精髓是什么呢？老老实实地简单说来，只是市民对于国家所要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宗教信仰，这几项自由权利。所以有人说，宪法就是国家给予人民权利的证书，所谓权利，最重要的就是这几项自由。所以世界各种民族，一到了产

业发达人口集中都市，立刻便需要这几项自由，也就立刻发生民主立宪的运动。这是政治进化的自然律，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可以说没有一个例外。十余年来的中国，产业也开始发达了，人口也渐渐集中到都市了，因此，至少在沿江、沿海、沿铁路交通便利的市民，若工人，若学生，若新闻记者，若著作家，若工商业家，若政党，对于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宗教信仰这几项自由，已经是生活必需品，不是奢侈品了。在共和名义之下，国家若不给人民以这几项自由，依政治进化的自然律，人民必须以革命的手段取得之，因为这几项自由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可是现在的状况，我们的自由不但在事实上为军阀剥夺净尽，而且在法律上为袁世凯私造的治安警察条例所束缚。所以我们一般国民，尤其是全国市民，对于这几项生活必需的自由，断然要有誓死必争的决心。“不自由毋宁死”这句话，只有感觉到这几项自由的确是生活必需品才有意义。

现在的中国，军阀的内乱固然是和平统一与自由之最大的障碍，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钳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北京东交民巷公使团简直是中国之太上政府；中央政府之大部分财政权不操诸财政总长之手，而操诸客卿总税务司之手；领事裁判权及驻屯军横行于首都及各大通商口岸；外币流通于全国；海关邮政及大部分铁路管理权，都操诸外人之手；银行团及各种企业家，一齐勾串国内的卖国党，尽量吸收中国的经济生命如铁路矿山和最廉价的工业原料等；利用欺骗中国人的协定关税制度，钳制中国的制造业不能与廉价的外货竞争，使外货独占中国市场，使中国手工业日渐毁灭，使中国永为消费国家，使他们的企业家尽量吸收中国的现金和原料，以满足他们无穷的掠夺欲。在这样国

际帝国主义政治的、经济的侵略之下的中国，在名义上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实质上几乎是列强的公共殖民地。因此我中华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自卫计，势不得不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

现在，本报同人依据以上全国真正的民意及政治经济的事实所要求，谨以统一、和平、自由、独立四个标语呼号于国民之前！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祝安源路矿工人罢工胜利函

（一九二二年九月十八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全体工友：

诸工友这次的罢工，敝部已经看见了诸工友是很有战斗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对于诸工友这次的大胜利，敝部是佩服的欣喜的，敢向诸工友前庆祝胜利，大呼：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万岁！

全世界劳动阶级万岁！

敝部又敢用十二分的诚意敬告各工友：诸君这次的胜利，不是诸君终极的胜利；诸君终极的胜利是在于把资本阶级打倒，将全世界的产业由劳动者自己管理，建设共产主义的新社会之后。诸工友为得要达到终极的目的、终极的胜利起见，在现在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实力举行社会革命的时期中，一方面要发展诸君已经学会了的战斗能力和组织能力好打倒资本阶级；一方面要设法练习诸工友的管理能力，好待社会革命后，管理一切的产业，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这才是诸工友的真正胜利。诸工友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呵！努力呀！奋斗呀！

全世界劳动阶级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敬祝

附：萍乡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宣言

（一九二二年九月十四日）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呵！请你们看：我们的工作何等的苦呵！我们的工钱何等的少呵！我们时时受人家的打骂，是何等的丧失人格呵！我们所受的压迫已经到了极点，所以我们要“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团体——俱乐部”。

现在我们的团体被人造谣破坏，我们的工钱被当局积欠不发，我们已再三向当局要求，迄今没有圆满答复，社会上简直没有我们说话的地方呵！

我们要命！我们要饭吃！现在我们饿着了！我们的命要不成了！我们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的手段。我们要求的条件下面另附。

我们要求的条件是极正当的，我们死也要达到目的。我们不作工，不过是死！我们照从前一样作工，做人家的牛马，比死还要痛苦些。我们誓以死力对待，大家严守秩序！坚持到底！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呵！我们罢工是受压迫太重，完全出于自动，与政治军事问题不发生关系的呵！请你们一致援助！我们两万多人饿着肚子在这里等着呵！下面就是我们要求的条件：

（一）俱乐部改为工会，路矿两局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向路矿两局交涉之权。

（二）以后路矿两局开除工人，须得工会之同意。

（三）从本月起路矿两局每月例假废止大礼拜，采用小

礼拜。

（四）以后工人例假、病假、婚丧假，路矿两局须照发工资。

（五）每年十二月须发给夹薪。

（六）工人因公殒命者，路矿两局须给以天字号棺木并工资三年，一次发给。

（七）工人因公受伤不能工作者，路矿两局须营养终身，照工人工资多少，按月发给。

（八）路矿两局从前积欠工人存饷，一律发给。

（九）罢工期间工钱，须由路矿两局照发。

（十）路矿两局须指拨火车房后之木围及南区警察所前之大坪为建筑工会之基地，并共拨一万元为建筑费，每月两局各津贴二百元为工会常月费，从本月起实行。

（十一）以后路矿两局职员工头不得殴打工人。

（十二）窿工全体工人须加工资五成。

（十三）添补窿工工头，须向窿内管班大工照资格深浅提升，不得由监工私行录用。

（十四）窿工食宿处须切实改良，每房至多不得过三十八人。

（十五）洗煤台须照从前办法。每日改作三班，每班八小时，工资须照现在长班发给，不得减少。

（十六）制造处、机器厂将包工改为点工。

（十七）路矿工人每日工资在四角以下者，须增加一角。

萍乡安源路矿两局全体工人同启

根据工人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出版的
《中国工会历史文献》（一）刊印。

PDG

造　国　论

——以真正国民军，创造真正民国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日）

陈　独　秀

我们中国此时在名义上虽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实质上比南洋马来群岛酋长割据的英荷殖民地高明不多，哪里算得是一个独立的国！在经济方面：国家重要的权利大部分抵押给外国了，外国货充满了全国，全中国人都是外国生产国家的消费者，全国金融大权都直接或间接操诸外人之手。在政治方面：大小酋长分据了中央及地方，这班大小酋长之发号施令又惟公使团之意旨是从。南洋英属荷属殖民地的政治经济状况完全是这样，如何能算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这样殖民地状况之下，有何国会可言！有何法统可言！有何宪法可言！有何政治可言！所以我们以为中国还在“造国”时代，还在政治战争时代。什么恢复法统，什么速制宪法，什么地方分权，什么整理财政，什么澄清选举，对于时局真正的要求，不是文不对题，便是隔靴搔痒。时局真正的要求，是在用政治战争的手段创造一个真正独立的中华民国。

这个问题倘然决定了，接着第二个问题就是用什么方法来造国？

我们的答案是：组织真正的国民军，创造真正的中华

民国。

这个国民军，是应该由全国被压迫的各阶级爱国者而不为私利私图的有力分子集合起来号召全国各阶级觉悟的大群众组织而成。在这创造国家的大事业中，自然少不得许多有力的领袖，但英雄时代贤人政治时代都快过去了，这种新势力若不建立在大群众的需要与同情的力量上面，不是难以持久，便是造成新的军阀。在中国的产业状况看来，这种大群众决不是哪一个阶级的群众在短期内能够壮大到单独创造国家的程度。商人说，在商言商不与闻政治，教育家主张不谈政治，至今没有一个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发生，这都是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壮大的表征。在私产制度之下，资产阶级未壮大，无产阶级也自然不能壮大。因此，我们敢说，中国产业之发达还没有到使阶级壮大而显然分裂的程度，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这个时期的成熟是可以拿十余年来的政治史及眼前要求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呼声可以证明的。

各阶级大群众联合的国民军如果成立了，国民的革命如果成功了，压迫我们的内外恶势力如果解除了，民主的全国（指中国本部而言）统一政府如果实现了，这时候才有宪法才有政治之可言，这时候中华民国政治上的创造才算成功。而真正的中华民国还只创造了一半，其他一半，乃是中华民国经济上的创造。因为民国必须建设在最大多数人民的幸福上面，人民的幸福又以经济的生活为最切要，经济的生活不进步，所谓人民的幸福，仍只是一句空话。

用什么方法来创造经济？我们的答案是：采用国家社会主义，由中央或地方（省及市）政府创造大的工业商业农业，一直到私产自然消灭而后已。

照中国社会的现状，要开发实业，只有私人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这两条道路。用私人资本主义开发实业，在理论上我们不能赞成，因为他在欧美日本所造成的罪恶已是不能掩饰的了；在事实上，以中国资产阶级幼稚的现状，断然不能在短期间发展到能够应付中国急于开发实业的需要，而且在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国内军阀的扰乱未解除以前，中国的资产阶级很难得着发展的机会，到了国民革命能够解除国外的侵略和国内的扰乱以后，无产阶级所尽的力量、所造成的地位，未必不大过资产阶级，以现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倾向大过资产阶级便可以推知，那时资产阶级决难坚持独厚于自己阶级的经济制度。所以我们敢说，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来开发实业，是国民革命成功后不能免的境界。

政治的创造及经济的创造都能成功，那时国民军创造真正中华民国的工作才算完结。

总括起来说，我们造国的程序是：

第一步组织国民军；

第二步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国外的一切压迫；

第三步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

第四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开发实业。

根据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日出版的
《向导》第二期刊印。

PDG

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

——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日）

蔡　和　森

一、乱源的分析

一个时代的政治变化，有一个时代的经济变化为基础，所以近世政治史上的民主革命，不过是经济史上产业革命的伴侣。中世纪末，封建制度既成为新兴资本主义大企业的桎梏，所以被桎梏的资产阶级便起来推翻封建而建筑近世的民主政治。

因为资本主义的东侵，民主革命的潮流自然也要随着波及东方被侵略民族的弱国和经济落后国。故中国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数十年严重压迫之下，便发生了“改革内政以图自强”的革命运动。

然国内农业手工业的经济基础虽日被压迫，日见崩坏，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却不容许其起一种强大普遍的变化，因而经济地位上强有力的革命阶级没有形成，不过少数觉悟的革命党，凭借饱受外国刺激的外埠华侨势力，奋斗不息，勉强完成辛亥革命罢了。

故中华民国，乃是革命阶级羽毛未丰，将就封建的旧支配阶级势力，与之调和妥协而后苟且成立的。这样一来，更加以

国际帝国主义扶植旧势力以图自便的捧袁[1]空气之压迫（当时捧袁外论，英美主之，压力极大，对于民党吹毛求疵的疑惧或诋毁，极力制造中国非袁则亡，则惹干涉，则不被承认等空气），及全国还无革命意识的小资产阶级和平、统一、妥协等倾向之鼓荡，自然新政权不得不完全落于封建的军阀与官僚之手。由此就形成十年以来军阀专政和军阀割据的封建残局。自帝制，复辟，以至今后假名统一与联治之争，哪一役不是根源于未曾解除武装而且反为新统治之主人的封建余孽呢？

所以今日不但直、奉、皖各系军阀为前清遗下的北洋派之嫡系，就是川、湘、滇、粤等经过民主革命领域的新军阀，也是在这封建政治的残留局面之下孳乳出来的。

由此，我们可正确的肯定中国乱源：在封建的旧势力之继续，而不在胡适之先生那种新发明的“统一”史观（看《努力》十九号）！我们要高声说：他那种牵强皮相的分析是很谬误的。

二、封建残局下的政治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十年以来的内乱与战争，既不是“南”“北”地域之争，又不是“护法”与“非法”之争，更不是“统一”与“分离”之争，乃是封建的旧支配阶级与新兴的革命阶级之争。这样的阶级战争，发生于一定的经济情形和国际情形之下，谁也不能否认。假使经济地位上的革命阶级早已成长，假使国际帝国主义不忌革命党统治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那末，十年之中民主革命总可完成，把旧支配阶级解除武装而退处于无权。这样，则中国现状早已上了民主政治轨道，由新支配阶级来制定宪法，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都是容易解决的事体，何至酿成内乱与战争？只缘新旧支配阶级

同时并立，旧势力反占优势而握得政权，所以元二年间总统制，内阁制，中央集权，地方分权，以及同意权之争，才成为北洋派与国民党爆裂的导火线。所以这些政制上的争执，不过为内乱的导火线而已，新旧势力之不能两立，才是内乱的真实根源。

所以要国体政体确定，非先确定新旧两阶级的胜负不可，要靠妥协、调和来立国定政，乃是绝对不可能的。只有旧势力完全推翻革命，解除革命阶级的武装，封建政治才能完全恢复；也只有新势力完全制胜反革命，解除封建阶级的武装，民主政治才能真正成立，不然宪法制定也是无效的，政制修明也是徒然的。换过说：新旧阶级的地位没确定，死文字的规定，不能发生作用。

国家政权，系建筑在阶级抵抗上面，为这阶级用以统治别阶级的机关，只能属于一个支配阶级而不能有两。若一国有新旧两个胜负未分的支配阶级同时存在，各据政权或武力以相抗，则其现象必为内乱与战争，或妥协苟安之局，而其政治必为半新半旧非驴非马的东西。所以中国现在这种半封建半民主的局面，就是新旧两阶级的争斗，还没有达到决定时候的反映。

由此可以断定：在这样情形之下，一切政治问题，不是创法改制可以解决的，换过说，就是非继续革命，完全打倒军阀，解除封建阶级的武装不能解决。

三、军阀所要的统一与联治

假使民主革命成功，民主政治有确立之可能时，政治上的单一制与联邦制，不过为宪法上一个容易解决或修订的问题。可是这个问题现在横在我们之前，则完全为另外一回事。力能进取的军阀，便倡武力统一，或主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如

曹、吴[2]）；仅能自保或希图自保的军阀，便倡联省自治或筹备制省宪，举省长（如川、滇）；同一军阀，进攻时宣布武力统一，退守时宣布联省自治（如奉张[3]），位置动摇时改称省自治（如浙）或打算取消省自治（如湘赵[4]），又如湘赵最初之因首鼠两端而宣布省自治，粤陈[5]之想王广东，反对北伐而主张联省自治……凡此种种，无非是封建的残局之下，军阀专政，军阀割据的必然现象和趋势。所以统一派的军阀最忌联治，联治派的军阀最忌统一，换过说，就是为帝者不愿众建为王，为王者不愿奉人为帝，或则为帝不成而思王，为王不愿而思帝，完全为军阀间一种斗剧。

可是在这样武人主倡的联省自治说之下，却激起一部分政论家和智识者"将就现状"、"因势利导"的赞同，认为是解决时局的唯一方针。最近胡适之先生在《努力》十九号发表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他诂定联邦运动的作用为"增加地方的实权，使地方能充分发展他的潜势力，来和军阀作战，来推翻军阀"，他更找得与军阀作战和推翻军阀的工具为省议会。这不可不说是联省自治论中的大进步。

但我要明白告诉适之先生：你这种英国式的议会政策用在政治问题解决后——即封建的军阀被推翻后——是有点作用的，若用来解决政治问题乃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在军阀没有铲除的时代，省议会无法免掉他们的制造、强奸、蹂躏和压迫，如此而可望充分发展地方的潜势力，来和军阀作战，来推翻军阀吗？故适之先生当承认：你这种和平改良的议会政策，原先想借议会来推翻军阀，结果只有军阀推翻议会，这是武人政治下的必然律，证以过去现在的事实，没有人可以否认的。

适之先生一若承认过去为法治而不为武人政治，故将督军总司令权力扩张之原因归于地方之无"权"；又若承认今后也

为法治而非武人政治，故主张赋地方潜势力以合法的“权”，使之到省议会里面去与军阀作战，并“大胆”肯定打倒军阀割据的第一步在联省自治。但我们也可以大胆告诉适之先生：打倒军阀割据的第一步在民主的革命。

四、中国唯一的出路

中国政治的乱源既然在军阀，所以现在根本的问题不在政制而在怎样推翻军阀，换过说就是怎样革命。若忘记现状——封建残局——以为改变一种政制就可以止乱定国，那末，不将乱源嫁于政制，便将政制认为是止乱的方法，胡适之先生便完全犯了这种错误。在今日而讨论未来的政制可以说是无病呻吟，毫无意义。若讨论现实的政制，则决不能置现状于不顾。所以现今的政治问题既非势必成为割据的联省自治所能解决，又非北洋正统的武力统一所能奠定，唯一的出路，只有贯彻民主革命。在现状未完全打破之前，地方政权不能脱离军阀之手，中央政权也不能脱离军阀之手，所以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不是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但是强有力的革命党，不是武力的统一，但是革命的统一。我们既不梦想一个将就现状或超越现状的宪法来统一，更不梦想大批军阀来统一，我们惟望结合伟大的革命群众的势力，尤其是最能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势力来统一。统一的目的要建筑在最大多数贫苦群众的幸福和全国被压迫民族的对外独立之上，才能够真正的统一。

自来一班与群众隔离的政治家或政论家他们简直不知道或者不承认有群众的势力，所以他们不谋勾结或利用旧势力便想求助于外国帝国主义者，不是发表些蔑视群众、谩骂工人兵士的怪议论，便是想出些上不靠军阀下不靠民众的智识者的纸老

虎或乌托邦。所以革命数十年，议论三十载：上不能破坏旧军事组织解除军阀的武装而反使封建残局孳乳延长，下不能将革命潮流普及于全国最深最广大的群众唤起浩大不可抵御的革命势力，而坐失了许多可以扩大兴奋的宣传运动之机会。每每失败一次又踏一次的故辙，萦情于现成的势力及不可得到的外力帮助而不能自已，致使可以膨胀的革命潮常常因而收缩，乃反蔑视群众无力，或诬群众麻木，不知真正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而革命，群众未有不感发兴起的。这些都是真有改革精神之政治家、政论家所应急于觉悟而改变的。可是现象不然，或则仍然梦想借外力以废督裁兵，或则仍然梦想联合几派现存的势力来统一，或则梦想改变一些纸上的制度来和平改良。够了！这些过去都已试验了，现在须得觉悟起来罢！大家试想想：不要以为除革命外还有别的出路；不要以为革命没有办法，假使能将求助于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精神去求助于群众，假使能把一部分工夫去做违法的工作，破坏旧军事组织和纪律，激起兵士们的自觉心，假使能够鼓起人民武装的自卫和抵抗，使各大城市的市民全副武装或工人全副武装，那末，民主革命没有不成功，封建的武人政治，没有不崩倒的。

根据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日出版的
《向导》第二期刊印。

注 释

〔1〕指袁世凯。
〔2〕指曹锟、吴佩孚。
〔3〕指张作霖。
〔4〕指赵恒惕。
〔5〕指陈炯明。

PDG

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

世界经济状况已指示世界无产阶级在对于世界资产阶级共同作战之中，分出三种策略：（一）欧美资产阶级已于一世纪半以前完成了他们推倒封建阶级的使命，实现了他们阶级的政治，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之经济条件也发达到急切推倒资产阶级而自己取得政权之可能与需要；（二）日本资产阶级只发达到脱离了外国帝国主义者之羁绊而与本国之贵族军阀平分政权的程度，因此日本政治成了一种半封建主义半资本主义之现象，目前日本的无产阶级仍有推进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作战之需要，而且他们的势力已集中，已有与封建阶级作战之可能；（三）东方诸经济落后国如印度、中国等，都在外国帝国主义的势力及本国封建阶级的势力勾结支配之下，不但无产阶级没有壮大，即资产阶级亦尚未发达到势力集中，对于封建阶级及帝国主义者有自己阶级的争斗之觉悟与可能，因此他们每每有依赖贵族军阀或帝国主义者而生存的倾向。此等国家的无产阶级，在为自己阶级的利益奋斗以外，仍应采用各种政策，促进那涣散而懦弱的资产阶级在他们能够与封建阶级及帝国主义者

* 本文的俄文稿和英文稿均在篇末标明“陈独秀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于莫斯科”。

PDG

争斗范围以内的经济势力集中及发展，使他们的经济地位自然唤醒他们了解有与无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打倒两阶级的公敌——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客观的需要与可能。这种联合战线之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而幼稚的无产阶级只有在此联合战线才能实行争斗，不仅仅是一个主张，亦只有在此联合战线之复杂的争斗过程中，才能够使自己阶级独立争斗的力量之发展增加速度。

共产国际第三次、第四次大会，依据世界经济状况发达的程度，为东方的无产阶级指示出目前争斗所需要的两个策略，即民主的联合战线及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

中国无产阶级的目前争斗，应该以这两个策略为不可离的根本原则，应用在各种实际问题，以消除为中国民族发展的两大障碍物——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

“政治问题”

A. 统一与分治问题：武人倚靠外力割据纷争的现状，为资产阶级势力及劳动运动得集中之大障碍，吾人应该反对军阀的分治主张，而赞成资产阶级的国民统一运动，并促进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互相结合，而极力反对其互相分裂或反与军阀合作。然在国民统一运动未能集中时，若有由一地方人民奋起反对一地方军阀统治的自治运动，及不压迫劳动运动、不依赖帝国主义者之民主的省政府，则吾人亦宜赞助之，以消灭一部分军阀势力及减少一部分帝国主义者之侵略。

B. 对于国民党问题：国民党虽然有许多缺点与错误，然终为中国唯一革命的民主派，自然算是民主的联合战线中重要分子。在国民党为民主政治及统一政策争斗时期，无产阶级不

但要和他们合作参加此争斗，而且要在国民党中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及为工人阶级利益与自由的口号，以扩大其争斗，更要向国民党中工人分子宣传促进他们阶级的觉悟，使他们了解国民党终非为无产阶级利益争斗的政党。若国民党与最反动的黑暗势力（如张作霖、段祺瑞、曹锟等）携手或与帝国主义者妥协时，吾人即宣反对之绝不容顾忌。总之，我们共产党在任何问题的争斗中及与任何党派联合运动中，总要时刻显示我们的真面目于群众之前，更不可混乱了我们的独立组织于联合战线之中。

C. 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以工人、农人及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党派或分子为主力军，向一切帝国主义者加以攻击，同时亦可联合半民族运动的党派，向一派帝国主义者作战（例如资产阶级反对日本时）。

D. 国会问题：现有国会已经过十年，无论民八民六均未能代表民意。吾人主张用普通选举法选举而不为军阀势力所支配的新国会，同时亦必须改组一新政府，而对于现有的国会及政府，亦仍要作劳工立法及承认苏维埃俄罗斯之运动。

E. 对俄外交：俄国为现时世界上唯一抛弃帝国主义的国家，所以中国对俄交涉如通商、中东铁路、松花江航权、庚子赔款、蒙古等问题，吾人应主张即速与俄罗斯直接开始谈判，绝对不容第三国之干涉或参加。

F. 蒙古问题：在国家组织之原则上，凡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言语不同的人民，至多也只能采用自由联邦制，很难适用单一国之政制。在中国政象之事实上，我们更应该尊重民族自决的精神，不应该强制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言语不同之人民和我们同受帝国主义侵略及军阀统治的痛苦。因此我们不但应该消极的承认蒙古独立，并且应该积极

的帮助他们推倒王公及上级喇嘛之特权，创造他们经济的及文化的基础，达到蒙古人民真正独立自治之客观的可能。

"劳动运动"

共产党是工人的政党，他的基础应该完全建筑在工人阶级上面，他的力量应该集中在工人宣传及组织上面。中国的工人运动，已有由地方的组织进到全国的组织之倾向，由经济的争斗进到政治的争斗之倾向，中国共产党的劳动运动，除普通运动（如减时加薪、劳动立法等）外，应利导此倾向依次进行下列具体的计划，以增加其实际的战斗力：

A. 有系统的巡回政治宣传，此项宣传务使工人阶级由被动的、改良的、单纯经济的运动，进到自动的、革命的、经济与政治不分离的运动。

B. 工厂委员会之运动：单是工会运动，工人的势力终于站在生产机关的外面，其运动之基础恒不巩固。惟有实现工厂委员会之制度，廓清工头、包工及一切居间人之障碍，才能使工人的势力达到生产机关以内。

C. 组织全国铁路总工会及矿工总工会：中国工人阶级只有铁路工人、海员、矿工为三个有力的分子，海员已有全国的组织，铁路工人及矿工经数次大罢工，亦有全国的组织之可能。

D. 组织铁路工、矿工、海员三角同盟：在一个大规模的全国劳动总联合中，尤其在工人组织幼稚的国里，若是没有几个大的有力工会为中坚，是不容易团结及持久的，所以在未组织全国工会总联合以前，必须努力先成此三个产业联合的三角同盟。

E. 为巩固及强大劳动阶级之战斗力计，应该提出“全国劳动运动统一”的口号，应该极力指斥无政府工团派以“独立”、“自治”等名词使劳动阶级之组织及运动分裂的阴谋。因此，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日），首先要提出“全国劳动运动统一”的议案及议定关系全国劳动阶级利害的各种共同工作，并组织全国工会总联合会之中央机关，筹划及指挥实施劳动阶级联合战线上各项统一的策略，以防欧美资本进攻之余波或及于中国。

“农民问题”

无产阶级在东方诸经济落后国的运动，若不得贫农群众的协助，很难成就革命的工作。

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之基础，农民至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中最困苦者为居农民中半数之无地的佃农。此种人数超过一万二千万被数层压迫的劳苦大群众（专指佃农），自然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友军，为中国共产党所不应忽视的。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功一个大的群众党。

中国一般农民之痛苦如下诸端：

（一）外货输入之结果。一般物价增高率远过于农产物价格增高率，因此自耕农民多卖却其耕地降为佃农，佃农则降为雇工，或流为兵匪。此事实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贫农仇恨外国势力之侵入，一是兵匪充斥供给军阀不断的源泉。

（二）水旱灾荒使各种农民一律受苦。

（三）兵乱及灾荒使农民大为迁徙。其迁徙所至之地方遂至佃农、雇工均供过于求，因同业间竞争，地主及雇主所要求的条件日加苛酷。

（四）因以上三种之结果，农民食用不足，遂不得不受高利盘剥之痛苦，此项痛苦以无地之佃农为最甚。

欲解除此等痛苦，应采用下列政策：

（A）限田运动。限制私人地权在若干亩以内，以此等大地主、中等地主限外之地改归耕种该地之佃农所有。

（B）组织农民消费协社。中国农民间有合资向城市购物之习惯，应就此习惯扩大为消费协社。

（C）组织农民借贷机关。中国农村向有宗祠、神社、备荒等公款，应利用此等公款及富农合资组织利息极低的借贷机关。

（D）限制租额运动。应在各农村组织佃农协会，每年应缴纳地主之额租，由协会按收成丰歉议定之。

（E）开垦荒地。应要求政府在地税中支用款项，供给过剩之贫农开垦官荒。

（F）改良水利。应支用国币或地方经费修理或开挖河道，最急要者如黄河、淮河等。此等河道之开浚，不但与农民有迫切的利害关系，而且在工商业之运输上亦有绝大的影响。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革命与反革命*

（一九二三年一月八日）

陈　独　秀

吾人对于指导人类行为一切名词之解释若无一定的概念，则行为者及批评此行为者均易于堕入迷途而不自觉。中国革命者反革命者及批评家往往堕入迷途，正以对于革命与反革命这两个名词无明了的概念故。

综计人类社会兵争之祸有四：（一）外患，这是种族间的侵略战争；（二）内乱，这是野心家抢夺政权的战争；（三）革命，这是社会组织进化的战争；（四）反革命，这是社会组织退化的战争。

遍一切现象界均日在进化的过程中变动不息，人类社会也是现象界之一，在如流不息的渐变中，积诸多复杂的因果关系，往往现出组织上的顿变，革命便是这种顿变之代名词。

革命既是社会组织进化过程中之顿变的现象，则革命必以不违反进化社会组织为条件，反革命必以违反进化为条件，内乱乃以社会组织之进化或退化两无主义为条件。革命者反革命者及批评家必须明白了解这些观念，然后才不致堕入迷途。

人类社会之历史，乃经过无数进化阶段及多次革命战争，乃至有今日之组织及现象；其组织进化之最大而最显著者，乃

---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三年一月八日出版的《向导》第十六期。

是由部落酋长进化到封建诸侯王，由封建诸侯王进化到资产阶级，由资产阶级进化到无产阶级。在这些最大而最显著的社会组织进化之中，又各有几多比较小的比较不甚显著的进化阶段；在每个进化阶段新旧顿变时，都免不了革命战争。革命之所以称为神圣事业，所以和内乱及反革命不同，乃因为他是表示人类社会组织进化之最显著的现象，他是推进人类社会组织进化之最有力的方法。

因此，革命者反革命者及批评家都应该明白了解革命与进化之关系，对于一个革命运动都应该以他的内容及起因或结果是否有进化的意义定功罪，不应该以他的行为者属何阶级何党派定是非。因为一个阶级一个党派的理想比较是静的，社会现象比较是动的，以静的阶级党派理想应付动的社会变化，便往往因前后对象不同，一个阶级一个党派在前是革命的，在后是反革命的。动的社会进化日在新陈代谢之中，一个静的阶级党派，对于障碍他进化的旧阶级党派，他是新的革命的，同时对于比他更进化的阶级党派，他便变成旧的反革命的及新的阶级党派进化的障碍物了。

封建诸侯王在打破部落酋长制、建设比较的统一政治时代，他是革命的，到了民主革命时代，他便是反革命的了。民主派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他是革命的，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他便是反革命的了。在这些阶级争斗亦即社会组织进化最显著的时代，固然明白显出他们革命的及反革命的性质；在这些时代之每个时代中，又复有几多小的进化阶段现出革命与反革命的争斗。在一些进化阶段短促变化复杂的社会里，一个党派的理想，一个人的行为，同时能建革命的功劳，也能造反革命的罪恶。

秦始皇以武力兼并六国，建设统一的政制，建设统一文

字，这是革命的，至于焚书坑儒压迫言论，便是反革命的了。段祺瑞在赞成辛亥革命反对洪宪帝制讨伐张勋复辟时，本是革命的人物，后来组织卖国机关（安福俱乐部）讨伐西南护法军，便是反革命的行为了。康、梁[1]一派人在戊戌变政时代是属于革命性质的，辛亥革命以后完全取反革命的行动。赵恒惕在参与辛亥革命及讨伐洪宪时，也算是革命分子，到了割据湖南惨杀黄庞[2]时，便是反革命的军阀了。陈炯明在辛亥革命时代，在漳州时代，在讨伐陆荣廷、莫荣新时代，都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党，后来阻挠北伐军，驱逐孙中山，便是反革命的行为了。胡适之先生说陈对孙是革命行动，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陈炯明举兵逐孙，不但未曾宣告孙中山反叛民主主义之罪恶及他自己有较孙更合乎民主主义之主张，而且逐孙后，做出许多残民媚外的行为，完全证明他是一个反革命的军阀。吴佩孚在奉袁世凯命讨伐护国军时，在奉段祺瑞命讨伐护法军时，本是一个反革命者，但是他讨伐段祺瑞、安福部、张作霖、交通系，都是革命的行动；因为段祺瑞、张作霖、安福部、交通系这班卖国的反动派失去政权，是给资产阶级的民主派能够得着政治上发展的机会。

不但封建式的党派人物在这进化阶段短促变化复杂的社会里同时现出革命的及反革命的两种行动，即民主派社会主义派也往往前后取革命反革命两种不同的态度。例如：法兰西的共和派，在十八世纪打倒帝政时是何等急进的革命先觉，在二十世纪因为要压迫无产阶级的共产运动，不惜与帝制派宗教徒妥协；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党，在帝政时代是何等革命的英雄，现在因为反对劳农政府不惜和一切反动派合作。

因此，我们对于革命与反革命可以决定两个概念：（一）革命应以社会组织进化为条件，不应以武力暴动为特征，因为

革命反革命及内乱都要取武力暴动的手段；所以不但用武力改进社会组织是革命事业，凡是在社会组织进化上阶级争斗的日常工作，都是革命事业。凡是一个革命家万不可误认革命之手段（武力暴动）为革命之目的（社会组织）。（二）我们称许一个革命派攻击一个反革命派或自命为一个革命派，都不应该以一个阶级一个党派或个人之静的名称为标准，应该以那阶级党派个人之动的行为为标准。

我们若是明白了解了革命与反革命的概念，对于任何党派甚至于任何军人每个革命的行动，都可以与之联合；这种联合纯然是革命的联合，为推进革命的过程而联合，为克服反革命而联合，决不是妥协的联合。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国民党在革命与反革命的进化阶段上未认清目前最反动的敌人是谁；我们又可以看出益友社反对一个较开明的军阀取媚一个最反动的军阀之政策的错误。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六大以前》刊印。

注释

〔1〕指康有为、梁启超。

〔2〕指黄爱、庞人铨。

PDG

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六日）

李　大　钊

社会主义的派别很多，大别为理想派与科学派。无论为理想派为科学派，均相信有一个新时代存于将来。这个新时代，就是社会主义实现的时代。欧文说："过去的历史，都只以示人间的非合理性，我们今才向理性的曙光进展。"是欧文理想中的新时代，乃为合于理性的时代。马克斯说："人类的前史，都是阶级争斗的历史。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演成最后的阶级战争。人类的前史，就随着阶级告终。"是马克斯理想中的新时代，乃为阶级消泯的时代。马克斯一派的经济的历史观，尤能与人以社会主义必然的实现的确信。

欧洲大战酿成荒乱的现象。这种荒乱的教训，及荒乱复兴的预防，使人发不可不急谋改造的深省。改造的新局面，必为带着社会主义的倾向的局面，是确切无疑的。改造的机运，虽然日形迫切，而改造的方案，则于一般人的意想中尚欠明了。一般人对于社会主义的组织既不明了，而社会主义者亦因制度的复杂，又把实现此主义的障碍看得过大，致使社会主义的运动遭过困难。免除这些困难，是社会主义者的责任。

---

* 本文是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经济学会的讲演，原载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六日出版的《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

PDG

社会主义的实现，必须经过三阶段：一、政权的夺取；二、生产及交换机关的社会化；三、生产分配及一般执行事务的组织。

政权的夺取，有两种手段：一是平和的，一是革命的。采取平和的手段的，大抵由宪法上、议会上着手。但是因为战争的影响，农民渐富，他们都不愿牺牲他们偶得的富裕，其他商人反动派及政府，均能与此运动以莫大的障碍，任你社会主义者如何宣传，终不能使选民及代议士都变成社会主义者，故此种运动常归于失败。有许多社会主义者鉴于平和的手段的失败，乃悟改造的事业非取革命的手段不可。革命的方法，就是无产阶级独揽政权。这种革命的运动，有失败的，有成功的。失败的如德奥是，成功的如苏俄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布尔扎维派的新发明。一八七五年马克斯论《*Gotha Programme*》的信里说过："在资本主义者的社会与共产主义者的社会间，有一个由此入彼的革命的过渡时代。适应乎此，亦有一个政治的过渡时期。当此时期的国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经济组织是怎样呢？

（一）生产交换机关的社会化

除去一部分的有土农夫，凡大资本的企业：铁路、矿山、轮船公司、承办运输事业、大规模的制造工业、大商店，收归国有，在人民会议代表人支配之下，照常办理。

自国家银行以下所有的银行，均收归公有，而停止其从前的业务，有限的归于消灭。因为信用机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久已不必要了。

中间的中介人、代理人一类的职业均被抑止。

小工商业及运输机关，亦渐次收归国有。

生产行于大工厂。分配集中于大中心。市场运输归于国营。在被抑止的企业里的雇工，转业于国营的生产事业及分配事业。

除去有土农夫所有的土地以外，土地亦收归国有。但在新组织之下，他种职业未觅得以前，此项农民仍准续理前业。

住房由地方会议遵照中央会议的条例执行，将来设专机关管理之。

（二）生产的组织

私营的生产机关既经废止，一切生产事业都归国营，则小工厂都合并于大规模的工厂，俾收事半功倍的效果。从前私营的经济组织之下，有许多很重要的生产事业，或因利益不多，或因效果难期，而置之不理者，今则国家都一律举办，依极经济的组织与方法，把资本、劳力与天然均成经济化，利用自然力开发富源，俾利国用。有需国际的共营的事业，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间亦可共同举办，但此实有利无害，断非现在什么中日合办、中英合办的种种事业可比。在这种经济组织之下，无论工农生产事业均渐扩大，生产自然增加。此时最经济的运输法日渐扩张，既便于材料的供给，又便于成品的分配，于生产事业、分配事业均有利益。

社会主义的精神，固极主张民族自决。倘使经济情形已能自立，如印度、朝鲜等，自应任其自主。而若经济进化过于低浅，苟非于经济上助其开发则永不能达于自决的境界，社会主义的国家当然有提携掖进的义务。近来有人大惊小怪的说有社会主义的侵略，这话大错，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能有侵略

的意味。社会主义的国家间，苟有旷土，不许闭户自封，依社会主义的民族平和的解决。

社会主义之所成，就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下尽资本主义的强度，亦断不可能。其原因有四：（一）小企业报酬少；（二）经过多次中介人、代理人的消糜；（三）资本主义的本质是无政府的，不能齐一努力；（四）资本主义的目的在得利润，有许多公用的大事业，利润相离太远，不确定而不充分。

此时除去用于必要的生产的工作以外的剩余工作，可用以美化人们的生活。过劳的工时可以缩减，使得复苏娱养的机会。此时科学上有所发明普及的工人，才能得到他的惠利，以代少数人享福、使多数人失业或受伤的结果。

（三）劳动的组织

工人执政后，工联没有存在的必要，可以合作替代之。工人虽执掌政权，但实际上不能指挥工师、技匠、实业家。此时阶级既废，好意的前资产阶级自当许与合作。

社会主义的制度，是以事物的管理代人的统治的制度。此时所欲解决的，不是政治问题，乃是经济问题。所以农部委员必集合农业专门家，组织高等会议，分部实行指导农民，以图农业生产的改进。工部委员及其他委员亦然。

（四）分配的组织

生产品不就是为消费的，有直接分配于消费者，有分配于他业者。后者不过记一记账，前者则须代价。金银纸币流行，可以换取所需的物品。

国家将生产品经过一回中心市场，使有货币者得以换取所需的物件，售价适应于此期流行的货币。

生产为消费者的需要所轨制，计算应绰裕一点。国家用科学的方法，制定工作日的期间，使生产恰合于公众的需要。

每月支用货币的项目：一、薪俸，二、恤金（鳏、寡、孤、独、废疾者），三、前资产阶级的年金赔金，四、农产物的代价。

假定甲，付直接生产消费品者，及乙，付生产农作品者，共计三十亿。a 付生产交给他业的物品者，b 社会恤助金，c 付前所有者，共计二十亿。（一个月）那么，那些生产品的总售价应定五十亿。国家银行每月应筹五十亿货币，国家物品所每月应备价值五十亿的物品。定物价的标准，应以生产费并加生产费的三分之二，譬如一百二十元的生产费，应加入八十元为二百元；五十四元的，应加入三十六元为九十元。

以上所述，是社会主义下经济组织的要点。其余关于经济的问题尚在多有，如外国贸易及租税信用等问题，俟后有机会时再与诸君共同研讨之。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的《李大钊文集》刊印。

PDG

中国共产党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

（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工人们，农人们，全国被军阀和外力压迫的同胞们！二月七日长辛店和汉口的大惨杀，你们已经耳闻目见或身历其境了，这场野蛮残酷的大惨杀，就是前此倡言“保护劳工”的军阀吴佩孚发纵指使的！这个虚伪险诈的武力魔王，“保护劳工”的假面具戴不到几个月，现在已在全国工人之前，毕露其鲜血淋漓逞凶惨杀的真面目了！

中国共产党早已告知全国劳工阶级：惟有共产党是真正保护劳工为劳工阶级利益而奋斗的党，此外一切标榜保护劳工的党派和势力，都不过是为他们自身的利益或他们阶级的利益而施行的一种政策；但在劳工阶级的势力还未组织成熟及未建设劳工阶级的国家以前，共产党为保护劳工目前利益及完成其组织力战斗力起见，在一定限度内，并不反对那些开明一点进步一点的党派和势力采用这种假仁假义的“保护劳工”政策。虽然明知他们采用这种政策的用意，虽然明知他们采用这种政策的虚伪，但代表劳工阶级利益的共产党是要毅然决然领导劳工阶级乘此努力成就本阶级的组织，准备并训练本阶级的战斗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七日出版的《向导》第二十期。

力，有时并须帮助这样一支较开明较进步的势力——以劳工阶级利益为前提，打倒其他较黑暗较反动的势力，渐进而推翻一切旧势力，与新兴的敌对阶级争斗而达到劳工阶级革命专政的目的。在这个原则之下，所以中国共产党前此无须公然戳穿吴佩孚“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只望京汉各铁路工人极力进行工会的组织，一步一步成就劳工阶级的势力与使命。

可是京汉路总工会要告成立了，这个戴着“保护劳工”假面具的军阀——吴佩孚便害怕起来了！怕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中国现在除了他们军阀的军队势力外，还没有比他们更集中更强大的组织力存在；京汉路总工会的出现，就是保障中国人民利益真正势力的出现，这当然要触犯了军阀的畏忌心。所以这个冒称“保护劳工”的军阀便不惜自揭假面具，破坏约法赋予的集会结社自由权，便不惜血肉横飞惨杀赤手空拳以争自由的劳动者。

全国争自由的人民呀！这次汉口的大惨杀，不仅是军阀惨杀工人的意义，乃是军阀惨杀争自由人民的先锋军的意义；这个惨杀凶手吴佩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乃是全国争自由的人民的敌人。“不自由毋宁死”，现在我们三十九个烈士已经惨死了，军阀们从此更将肆无忌惮的向我们不自由的人民进攻了！全国不自由的人民呀，你们应一律准备和争自由的先锋军——工人阶级一起来打倒惨杀工人的军阀吴佩孚、曹锟呀！打倒一切压迫工人的军阀呀！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敬告国民书*

（一九二三年二月）

中国大小军阀们，为了互争地盘，年年兵连祸结，因此冤枉打死的兵士平民，简直计算不清。全国的金钱都吸收在军阀们荷包里去了，他们还命令一班不觉悟的兵士天天拿枪替他们向国民要钱，他们又还天天跑向外国借款卖国，以供给他们挥霍，买军械，养土匪兵，打战，杀老百姓，非弄到国家财政破产以至亡国而后已。

国家的财政被军阀们搜刮了，国家的自主与尊严被军阀们损坏极了，商界因他们的战乱，生意买卖不能做了，学界因为他们不发给教育费，教职员都纷纷辞职，学生不能求学了，现在他们又来残杀工人了。

京汉铁路工人大惨杀案，想国民都已知道。工人们天天替社会做劳苦的工，他们为改良生活起见，要求组织工人的团体，无论在国法在人情，都不能不认为是正当的要求。工人所要求的，学界商界都有先例，学界能有教育会、学生会，商界能有商会，何以工人不能有工会呢？京汉铁路各站工人代表于二月一日，在郑州开全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洛阳军阀用兵力禁止他们开会，并派兵包围工人代表的寓所，监视行动。吴佩孚口说赞成民主共和，口口声声说他的兵只做保卫国家保卫人民

---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三年三月出版的《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

之用，并且曾发表了保护劳工的主张。就这回的事实看来，是保护劳工保卫人民吗？是民主共和的气象吗？军阀们骗人的话本来是不可信的，现在吴佩孚的食言，又加上一层确实的证明了。吴佩孚天天在那里“做北洋正统武力统一”的迷梦，他对于民众的醒觉与联合非常惧怕。他知道民众果然醒觉而且联合起来，便不容中国再有第二袁世凯、第二段祺瑞出现了。

吴大军阀既然派兵制止开会，没有武装的工人，为力争宪法上集会结社之自由权利计，只有出于罢工之一途。吴大军阀在郑州的蛮行还未了结，曹[1]大军阀又在长辛店施行更大的惨杀。

不但工会被封，工会职员十一人被捕，而被杀伤的工人、老百姓多至数十名，中国的军阀只会残杀同胞呵！

长辛店工人之流血，把工人阶级争自由争民权的神圣决心更明白表示出来了。各界同胞如不愿再受军阀的压迫，都应当即时起来援助以热血争自由民权的工人。工人们能以热血争自己的自由，他们一定也能以热血争全国人民之自由，从事反抗军阀政治，反抗外国侵略之战争，他们是我们的先锋呵！

商界工界学界同胞都应当起来向政府提出抗议，都应该组织援助罢工工人和被杀者的机关。我们知道各业工人一定要起来罢工援助，不到工人争得完全自由的保障，是不肯罢休的。我们希望全国学生青年，鼓起在“五四”以上的热诚援助工人。

京汉罢工乃是工人为自由、为工人人格的争斗，也就是向军阀、专制魔王残杀者一切黑暗势力的争斗，这才是为全国人民夺自由、争民权的急先锋。各界同胞应以援助此急先锋为自己的责任。

打倒军阀！

工会万岁！

自由的中华民国万岁！

根据工人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出版的《中国工会历史文献》（一）刊印。

注　释

〔1〕指曹锟。

PDG

外力、军阀与革命*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日）

毛　泽　东

中国的统一到底能实现吗？除开张绍曾等一班妄人，谁都晓得在最近期间内是不能的。因为国内各派势力在现在是无法使他们统一。统一当然不是混和，所以现在什么“各省会议”，“国事协议会”，下至什么派遣代表和各派首领磋商，无非是些空话空事。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进步党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胡适、黄炎培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和聂云台、穆藕初等新兴的商人派也属于这派。反动派的范围最广，包括直、奉、皖三派（目前奉、皖虽和国民党合作，但这是不能久的，他们终久是最反动的东西）。三派之中，前二派在稍后的一个期内是会要合作的，因为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研究系、知识派和商人派都会暂放弃他们非革命的主张去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所以以后中国政治的形势将成为下式：一方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功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三年四月十日出版的《新时代》创刊号。

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中国政治的结局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但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一个期内，中国必仍然是军阀的天下：政治更发黑暗，财政更发紊乱，军队更发增多，实业教育更发停滞，压迫人民的办法更发厉害。质言之：民主的脸面更发抓破，完全实施封建的反动政治，这样的期会要有十年八年都说不定。

何以知道必然是这样呢？你看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形势是何等的反动！他们现在是协调着步骤来侵略中国。他们的步骤以先是不协调的，经华盛顿会议一番商量便协调了。虽然他们的协调终久是要破坏的，但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他们为补偿前次大战的亏失及蓄养下次大战的精力，是断然要取协调主义的。美国的门户开放主义居然能通过在中国拥有势力范围的英、法、日，就是明显的证据。中国的分裂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是不利的；但由民主派统一中国，较之民主、军阀两派混乱中国，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更不利；只有由反动政治完全霸占中国于他们就最利。这是目前及最近将来中国必仍然是反动军阀的天下的第一理由。从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看，中国现在是最便利于军阀统治的。白狼、老洋人可以在河南一带啸聚数万人扰乱数省；人民百分之九十几未受教育；除开沿江沿海沿铁路稍有点可怜的工商业外，全部都属于农业经济生活；人民的组织，除开沿江沿海沿铁路应乎他们经济的情形有一点微弱的组织，像工商、教职员、学生等团体外，几乎全是家族的农村的手工业的自足组织；蒙古、新疆、青海、西藏、陕西、甘肃、四川、贵州、广西各地至今无一寸铁路；全国无一个有三十万确实党员的政党；全国无一家销到二三十万份的报纸；全国无一种销到两三万份的杂志；而中国全体有人口四万万，有土地三千余万方里：试问在这种社会经济情形下军阀

不来统治，还有谁可以来统治？这是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中国必仍然是军阀的天下的第二理由。

我们从内外政治经济的情势上，可以断定中国目前及最近之将来，必然是反动军阀支配的天下。这个期内是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是必然成功一种极反动极混乱的政治的。但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要一天进步一天。一面西南各省终不能为北方统一，虽然也不免是些小军阀，但终究还是革命分子存匿之地。这个期内，民主派分子是一天一天增加，组织一天一天强固。结果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中国的民主独立政治在这个时期才算完成。

我们只知道现在是混乱时代，断不是和平统一时代，政治是只有更反动更混乱的；但这是和平统一的来源，是革命的生母，是民主独立的圣药，大家不可不知道。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PDG

怎样打倒军阀*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八日）

陈独秀

中国的统治阶级还是帝政余孽北洋军阀，他们是外国帝国主义者下面的臣仆，是中国政府上面的太上政府；他们利用政权来卖国，来紊乱全国的财政军纪，做出在法律以外压迫人民的一切黑暗罪恶；他们断然置外交紧急国库破产而不顾，一意索款增兵，借口统一，屠戮异己；这些都是昭然的事实，人人知道，不用我们再说了。近来以外交内政上种种事实的教训，国民各方面救国的思想及方法都已渐渐集中到“打倒军阀”这一点，这也不用我们再来解释了。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打倒军阀，但是在决定这个问题之前，必须了解军阀存在的基础和将来的运命。

第一我们要了解军阀们所以存在，决非偶然，他们有两个强大的基础：（一）是国外帝国主义者的后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达的最高形式，他是依靠掠夺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而生存而荣华，所以自来各帝国主义者都不愿被他们压迫的民族能够自强，他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所采用的政策，总是扶助比较黑暗的旧势力扑灭国民运动的新势力。在中国极力帮助袁世凯段祺瑞压迫民党，这是以往的明证；现在对于地方的军阀还是明扶暗助，日本在奉天供给军械，英国在广东帮助陈炯明，上

---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八日出版的《向导》第二十一期。

海的领事团极力结纳何丰林，连市民对于孙中山的欢迎会都禁止了，连国民党出版的国民周刊都不许发行，这都是眼前的明证。所以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势力，若不因中国国民之反抗或国际形势之变迁而失坠，终是军阀最有力的后援。（二）是国内无业游民的后援。军阀的势力在兵多，兵从哪里来，不用说不是依法征调而来，乃是一班无业游民，由军阀出钱招雇来的。这种兵匪不分的兵，原来本无职业，或是失了职业，现在以兵为终身职业，终身要靠大帅吃饭，自然不得不昧着良心服从大帅命令去杀人、放火、抢钱，无所不为。大帅拿出吃饭不饱饮酒不醉的小钱，雇用一些土匪兵，去抢政府、人民成百万成千万的大钱，真是一本万利。可怜这班职业兵，打死一队，马上可以再招一队，解散一师，马上可以再招一师，这种非阶级化的游离无产者（即无业游民），不是他们心理之恶特异于人，乃是他们的境遇、他们的职业，使他们不得不供军阀牺牲，不得不为军阀作恶。中国此时无业游民群众日见增多，他们简直是供给军阀势力之无限的活动资金。

第二我们要了解军阀的命运固然已去末日不远，然而自古道困兽犹斗，最近曹、吴、冯、齐[1]有在“北洋正统武力统一”口号之下大结合的趋势，他们这最后的决死战，却也未可轻视；况且他们的知识力量固然不过是些土匪头，算不得什么真的军阀，但是政权与武器都在他们手里，比起我们组织很弱的人民来，还是矮人国里的长子，若是没有组织力很强的很广大的国民运动，还怕是敌他们不过。

在这种状况之下，要打倒军阀，必须注意左列各点：

（一）必须做民族独立运动，排除外国势力，造成自主的国家，以根绝军阀之后援。有一班人以为只须做拥护民权打倒军阀的运动，不必牵扯到反对帝国主义，多树敌人。他们不知

道中国在国际地位上还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军阀自身究竟没什么真实力量，他们的屡次战争背后都伏有列强间势力竞争的意义。所以我们固然要根本反抗列强在中国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侵略，而目前最急的是要抵死反抗他们以各种名义的外债直接或间接供给军阀。

（二）必须做武装平民的裁兵运动。在产业幼稚兵匪不分的中国，召来便是兵，散去便是匪，根本的救济固然只有开拓工业农业来吸收这些非阶级化的无业游民；然而目前救急，裁兵也算是缩小军阀势力救济财政破产之一法。但我们要知道：(1)只裁一部分兵，其结果反使军阀荷包增加一笔裁兵费，而他们压迫平民和兵争战乱的力量依然存在；(2)希望军阀自己裁兵，真是与虎谋皮；(3)希望军阀行兵工政策，更是附虎以翼。这些方法都是不行的。我们主张：一、以平民的宣传力量使兵士倒戈而自散；二、资本家合力兴办浚河、筑路等公司，以兵工政策吸收一部分解散的兵；三、农村平民出资组织大规模的乡团，城市平民出资组织大规模的工团、商团，如此，不但可以吸收一部分解散的兵，并且有了武装的平民才可以打倒武装的军阀。

（三）必须做民主的统一运动，使同一国民在一个统一的国家统治之下，才能根本改变军阀割据纷争的局面；然而这种统一的国家，必须是民主的统一才能够实现，决不是军阀们“北洋正统武力统一”所可冒牌；民主的联邦固然不害于统一，然而军阀们所提倡的“联省自治”，却是破坏统一之变相的封建割据。赵恒惕、卢永祥都主张联省自治，到了人民真要实行省宪法都害怕起来；吴佩孚口口声声主张统一，实际上处处破坏中央政府财政军事的统一，而且见了工人联合统一的运动便害怕起来。这班军阀们，力量小的便想借口“联省自治”以图割据，力量大的便想借口“统一”以扩张自己的地盘，这种军

阀割据的省自治，这种军阀兼并的统一，不但去自治与统一都有天渊之隔，而且同是纷争战乱的源泉。我们主张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和民主的省自治并行不悖。

（四）必须做统一的国民运动，使全国各阶级各党派各部分争自由争民权的各种势力，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之下结合起来，成功一个有组织的广大的国民运动，才有充分反抗军阀的力量。现在的事实却不是这样：工人屡次罢工，别人都袖手旁观；学生请愿被打，大家说是学潮；商界虽号召裁兵运动，而眼见学界工界与军阀血斗，仍然置之不理；江西人民反抗蔡成勋，安徽人民反抗马联甲，别省人都是隔岸观火。这样散漫不集中的各个运动，决不能打倒困兽犹斗的军阀，能够打倒军阀的，只有统一的国民运动。统一的国民运动之具体办法，最好是各省各团体集合在国民革命军中心地方，开一国民代表大会，以议定解决政治之统一的战略。

（五）必须做民主革命势力集中的运动，在国民运动中，要成就一个革命的局面，断然不可没有一个势力集中的革命党做中坚，担负破坏及建设的责任。中国民主革命至今未能完成，军阀政治得以存在，唯一的原因，就是民主革命的势力未曾集中。此时全国各党派倾向军阀官僚的分子，当然不必说了，凡属民主革命的分子，若当真要革命，便应该集中在民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使他成功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党，才有打倒军阀的希望。若是大家都想别树一帜，这便是游戏，出风头，不是真要革命；如此做法，只有使革命势力分散不能集中，只有使北洋军阀延长生命。

（六）必须认定劳动阶级是国民运动中的重要部分，全世界的各种革命史，大部分是劳动阶级的热血所造成，眼前的中国事实更可证明。知识阶级诸君呵！最近政象已明白告诉我们：

我们若不愿投降于军阀，只有民主革命这一条路可走，别无中立徘徊之余地。你们切不可迷信宪法可以革军阀的命，白纸黑字的自由是骗人的废话，自古只有革命造成宪法，没有宪法造成革命；你们切勿想单靠你们决战的舆论和学生运动来打倒军阀，你们的舆论与运动倘不中途退却，固然也可以造成革命的空气，并且你们当中富于革命精神和革命理论的分子，自然在革命运动中恒站在指导地位，但是你们离了工人贫农的劳动群众便没有当真革命的可能；这是因为被压迫的劳动群众之现实生活的要求及阶级的战斗力，都具有客观的革命条件，并非是些浪漫的革命分子可比。你们勿怕，我们现在并不是鼓吹劳农革命，即在国民运动中若忘记了劳动阶级是重要部分，这种国民运动也必然是软弱没有力量。所以知识阶级、工商阶级不但不应当怕劳动阶级的组织及运动，而且应当竭全力以赞助此等组织及运动：(1) 保障工会之权利；(2) 扩大工会之组织；(3) 与之为平等的结合。如此方能运用此最有实力之社会阶级来反抗军阀。劳动阶级不但要求真民主主义最切，而且能为真民主主义奋斗的力量也最大。并且此时中国的国民运动，劳动阶级不但是重要部分，已经是最勇敢急进的先锋了，试看铁路工人已经首先起来以血肉和军阀相搏，便可明白。他们此次的血战，不只是为工人的自由与人格而战；乃是向军阀们黑暗势力为全国人民之人格与自由而战；凶手们北洋军阀的罪恶，不只是因为杀伤了几百个工人，并且是对全国人民之民权自由与人格而宣战。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
《六大以前》刊印。

注　释

〔1〕指曹锟、吴佩孚、冯玉祥、齐燮元。

资产阶级的革命
与革命的资产阶级*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陈 独 秀

人类社会组织之历史的进化，观过去现在以察将来，其最大的变更，是由游牧酋长时代而封建时代，而资产阶级时代，而无产阶级时代，而无阶级时代，这些时代之必然的推进，即所谓时代潮流，他若到来，是不可以人力抵抗的；在空间上各民族以环境所演的机会不同，虽至进化之迟速大相悬绝（例如非洲南洋之游牧酋长社会，东方之封建军阀社会，西欧南北美之资产阶级社会，俄国之无产阶级社会，同存于今世），而在时间上，进化的历程恒次第不爽，这是因为人类治生方法，次第变更发展，由单简而复杂，造成次第不同的经济组织而为社会一切组织进化基础的缘故。

中华民族以地大物博易于停顿在家庭农业手工业自足的经济制度之下，及与治生方法进化较速的西欧民族隔绝这两个原因，封建军阀时代遂至久延生命，由秦汉以至今日，社会的政治的现象，都是一方面封建势力已濒于覆灭，一方面又回向封建，这种封建势力垂灭不灭的现象，乃是因为封建宗法社会旧

---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的《向导》第二十二期。

有的家庭农业手工业已充分发展而有更进一步的倾向，但新生的经济势力（即资本主义的大工业）过于微弱，还不能取而代之的缘故。

明代西力东渐，这是中国民族思想制度发生空前大变化的最初种子；清代鸦片战争，这是西欧资本帝国主义向长城内封建的老大帝国开始发展，也就是沉睡在长城内老大帝国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开始大崩溃；甲午庚子两次战争，这几乎是中国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最后的崩溃，也就是资本民主革命运动最初的开始。近代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在西欧征服了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进化到世界的资本帝国主义，世界各国的铜墙铁壁都被他们打开，封锁不住了，老大帝国之万里长城哪里还封锁得住？所以中国自甲午庚子两次战争以来，已由内部产业之发展遇着外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驱入封建宗法主义与资本民主主义之转变时代，“富强”、“维新”、“自强”、“变法”的呼声遍满全国，便是这个时代的精神；自此以后，无论几多老少昏蛋天天讲什么人心道德，什么礼教纲常，什么东方文化，什么精神生活，凭他们喉咙叫得多少响亮，可怜终于被机器算盘的声音掩住了；这种历史进化的必然现象，就是封建宗法主义进化到资本民主主义的现象，或者也很可愤恨，很可鄙厌，然而我们主观的愤恨鄙厌心理，终于敌不过客观的历史进化历程之必然性，因此这班老少昏蛋的咨嗟太息终于无用，因此清西后及刚毅辈无论有如何威权终于失败。

辛亥革命，已由和平的资本民主运动进步到革命的资本民主运动，更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帝制变化到资本民主之剧烈的开始表现。所以单以满汉民族冲突解释辛亥革命之原因，那便只是皮相的观察，忘了经济的历史的基本条件；因为辛亥以前，已经有了十七年以上的富强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正是封建派

压迫资本民主派富强维新运动之反动，所以“非革新不能自强，非推倒满清不能革新”，是当时革命派反对立宪派之重要的理论。当时革命与立宪两派的方法虽然不同，而两派之目的同是革新自强，换句话说，就同是“革旧制”、“兴实业”、“抗强邻”这三个口号，明明白白是半殖民地之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口号，哪能说是满汉民族之争。

辛亥革命所以失败的原因（此次革命表面上虽说成功，实质上可说是完全失败），也正以当时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未曾发达到与封建官僚阶级截然分化的程度，未曾发达到自己阶级势力集中而有阶级的觉悟与革命的需要，他们大部分只看见目前的损失，不懂得民主革命是他们将来利益，更不懂得民主的革命党之胜利就是他们资产阶级之胜利，所以革命事业犹在中途，他们便现出小资产阶级和平苟安的根性，反对继续战争，而且反对革命党，遂使全国的武装及政权完全归诸帝政余孽北洋军阀之手；帝国主义的英美日本等国知道中国资本民主革命成功是他们的不利，极力援助北洋派压迫革命党；于是革命党失败逃亡，以致帝制两次复活，革命党屡战屡败，一直到现在还是孤苦奋斗，唯一的原因就是：全国资产阶级之多数缺乏阶级间利害不同的觉悟，所以始终依赖他们的敌人——封建的北洋派，而漠视或更至嫉视他们的友人——民主的革命党之故。

辛亥革命本身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非民族革命，更非其他阶级的革命，这是如上文所述在经济的历史的观察上及革命的前因后果上可以充分说明的。但以革命运动中主要分子而论，却大部分不出于纯粹的资产阶级，而属于世家官宦坠落下来非阶级化之士的社会，这种非阶级化的“士”之浪漫的革命，不能得资产阶级亲密的同情，只可以说明辛亥以

来革命困难不易完成的原因，不能以此说明他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将来革命事业完全成功时，社会阶级分化究竟至何程度，那时对于革命的性质究竟如何解释，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现在也没求其知道的必要；可是观察过去及现在的革命运动，确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且我们也应该希望他能成功一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因为依世界的政治状况及中国的经济文化状况和在国际的地位，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正负着历史的使命，这是毫无疑义的。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革命运动中，革命党便须取得资产阶级充分的援助；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没有阶级意义和社会基础的革命，在革命运动中虽有一二伟大的人物主持，其结果只能造成这一二伟大人物的奇迹，必不能使社会组织变更，必没有一个阶级代替他一个阶级的力量，即或能够打倒现在统治阶级（北洋军阀），而没有真实力量牢固的占住他的地位，被打倒的阶级时时都有恢复故物之可能。因此，我们以为中国国民党应该明白觉悟负了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使命，在这革命运动中，不可有拒绝资产阶级之左倾的观念，我们对于这种左倾的观念，自然十分感佩，但是在目前革命事业上，这种浪漫的左倾，实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每个阶级的革命，都要建设在每个阶级的力量上面，决不是浪漫的左倾观念可以济事的。

同时我们对于右倾的观念，也不得不加以警告。原来在各阶级的革命当中，实际参与的只是该阶级中一部分最觉悟的革命分子，挺身出来为全阶级的利益奋斗，决不是全阶级的动作与意识，并且全阶级中一定还有许多失了阶级性的分子同时出来依附敌对的阶级，来做不利于自己阶级之反革命的行动！这

是历史上现社会上常见不足为奇的事。因此，我们虽然主张中国国民党不可有拒绝资产阶级之左倾的观念，同时也不主张国民党有极力与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妥协之右倾的观念。在产业幼稚资产阶级势力不集中的社会，尤其是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社会，资产阶级每每有分为三部的现象：（一）是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妨碍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而赞成革命，如中国海外侨商及长江新兴的工商业家之一部分；（二）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素来是依靠外人的恩惠及利用国家财政机关与军阀官僚势力，造成了畸形的商业资本，专以卖国行为增加他们货币的富，他们自然而然要依附军阀官僚及帝国主义的列强而反对革命，他们也可以叫做官僚的资产阶级，如中国新旧交通系之类。自盛宣怀以至张弧王克敏，乃是他们代表的人物；（三）是非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所营的工商业规模极小，没有扩大的企图，没有在政治上直接的需要，所以对于民主革命恒取消极的中立态度，这种小工商业家，在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社会居最大多数。中国国民党应该一方面容纳革命的资产阶级，为他们打倒妨碍工商业发展的一切军阀，并且为他们排除援助军阀而又压迫中国工商业的国际帝国主义者，因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深受外资竞争和协定关税及种种不平等的条约之痛苦，非排除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脱离半殖民地的地位，成为完全自主的国家，实行保护政策，决不能完成资本民主革命，所以中国资本民主运动自始便以维新自强抵御强邻外患为唯一的动因；一方面也应该提携中立的小资产阶级，引导他们上革命的路，增加革命的势力；至于那班反革命的官僚资产阶级，实是中国真正资产阶级发展之障碍，绝对不可和他们妥协。他们为做官扒钱计，有时也鬼混到革命政府做事，一到了困难艰险的时候，他们是

丝毫不负责任的，就是在没有困难艰险时，他们也有使勇敢纯洁的革命党变成官僚化的能力；他们始终是靠帝国主义的列强及国内的军阀而生存，他们始终是阻挠革命运动，他们当中最优秀分子，也不过一足立在军阀阶级，一足立在资产阶级，调和两方面革命冲突，结果必然造成封建的资产阶级，封建的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的工具，可以永远阻住本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发展及国家独立自主；所以国民党要想完成资本民主革命的使命，万不可和反革命的官僚资产阶级妥协，因为中国此时的危机，“军资妥协”更险恶于“劳资妥协”，官僚的资产阶级正是军阀与资产阶级妥协之媒介物，也就是资产阶级中卖阶级之蟊贼，和欧美劳动运动中鼓吹“劳资妥协”来卖无产阶级之改良派（如社会民主党）等是同样的奸恶。

我们也知道中国资产阶级势力微弱，尚不足克服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所以使革命党易于采用右倾的妥协政策；但是要知道现有一条活路横在我们的眼前，就是与革命的无产阶级携手，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中国的经济现状，军阀阶级已与资产阶级显然分开，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分化，尚未到截然分离的程度，所以革命的资产阶级应该和革命的无产阶级妥协，打倒共同敌对的军阀阶级，不应该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妥协；因为劳动群众本来具有革命的实力，应在革命运动中占重要部分，而且此时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共同敌对的目标相同，可以联合一个革命的战线；官僚资产阶级所处的环境，使他不得不站在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者那一方面，决不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联成一个战线，这是中国国民党应该明白觉悟的。无产阶级也明明知道此种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所以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也

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之路。

总括起来说：在每个革命运动中，浪漫的左倾观念和妥协的右倾观念都能妨碍革命进行；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可是要想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完全实现，在革命运动中，革命的资产阶级断然不可忘记了两件大事：（一）是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而脱其羁绊；（二）是承认无产阶级的势力而与之携手进行；因为本国的资产阶级决没有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政治或经济的侵略之下能够发展的希望，幼稚的资产阶级也很难以单独的力量完成革命事业；所以“反抗帝国主义”及“联络无产阶级”这两个原则，是全世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特有的共通原则。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

（一九二三年五月二日）

蔡　和　森

一、世界资本主义与民主主义之崩坏

自十八世纪以来，人类经济生活演进到资本主义时代，政治组织也就随着演进到民主主义时代；产业革命与民主革命的潮流，在欧美各先进国，次第扫荡农业手工业与封建制度，而建立了近代资本民主的政治经济组织。

资本主义发达到十九世纪下半纪，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混合，托拉斯与卡特尔垄断国际市场，于是遂入于争夺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家，由阶级争斗与国际竞争的结果，一面成为一些托拉斯争夺殖民地之武力的集团，尽量扩张其军国主义与军备，一面渐渐揭破其“德谟克拉西”的假面具，显出资产阶级专政的真相。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资本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结果，一面酿成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一面破坏了全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这就是世界资本主义与民主主义崩坏之发端。

现在我们可以简单列举资本主义崩坏之科学的例证：

---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三年五月二日出版的《向导》第二十三期。

（一）地域上的推广阻止了并且缩小了。以前资本主义之昌盛由于不停的推广殖民地及常常获得新市场，但地球面积有限，资本主义发达到今日已是无孔不入，亚洲非洲的穷乡僻壤，都有了大工业国的商品，加以劳农俄国成立，占全地球六分之一的地方，已不是资本主义的范围了。

（二）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回复到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状态去了。这种状态在中国与东欧特别显著。因为纸币的跌落，农人渐渐回复到自给的经济状况，既不愿将其农产品卖于市场，又不愿买市场的商品，而以家庭生产自给；从前以现银纳税，现在以货品纳税，从前用货币交易，现在用谷物交易；资本不投于生产事业而投于不生产的交易事业。

（三）国际的分工限制了，世界经济生活的单位摇动了。比如美国从前是农业国，英国是工业国，因有这种国际的分工，所以资本主义发达非常畅利。现在不然，美国由大战一跃而兼为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同时英国也高唱发展自己的农业；各大工业国皆极力恢复几百年前的保护政策，增加进口税（如美国新税则），以防外来商品之输入，巩固国内的市场；因为国际贸易额大减，国际经济的协作衰颓。

（四）世界经济生活的统一破坏了。战后，资本主义的中心由欧洲移至美国与日本，但以前欧洲的旧中心能借水陆交通，将高量的生产匀送于低量生产之各地，故世界经济生活常呈统一平衡之观；现在不然，因为国际经济的平衡破坏，中欧东欧纸币的跌落，生产高的国家不能将其生产品匀送于生产低之各地，高量生产与低量生产遂失其调剂而分两种半身不遂的经济状况。

（五）生产减低，财富的积聚也减低了。战后，中欧东欧完全破产，丧失其购买力，故工业恐慌，在英美特别显明，失

业者常自二三百万至六七百万，所以生产异常减低，财富之积聚自然也要异常减低，这种状况在战败国更甚。

（六）信用制度崩坏了。战前欧洲各国皆采用金本位制，纸币与金币价格相等；战后几乎完全变为纸本位，纸币与金币价格相差悬殊；国际间汇兑率尤为奇变，国际经济之平衡异常倾畸，国际交易也就异常衰歇。

资本主义这样的崩坏，有方法可挽回吗？这个问题，资本主义的本身是不能解答的（参看本报十六期至十八期的《赔偿问题与帝国主义》）。至此我们更可审查现在还勉强可以维持其存在的政治形势。

现在各大强国的资产阶级，以最少数的人口统治了十二万万以上被压迫民族（占全人类四分之三以上）及其本国几百几千万无产阶级。战前殖民事业发达，经济状况优裕，资本民主国家的统治权威，自然要算是“万能”；可是现在就不同了，经济恐慌，财政恐慌，失业问题，贫困问题，不仅一个不能解决，一纸凡尔赛和约，更弄得破产的欧洲一塌糊涂。不仅国际资产阶级不能协调一致，就是一国的资产阶级，因为利害关系亦常常四分五裂，互相冲突（如美国禁酒案、商船津贴案之争等）。他们再也没有能力解决社会问题了，对于革命的无产阶级，便只有揭破“德谟克拉西”的假面具，野蛮的反动起来。他方面，我们试看各国共产党运动之强大，英国工党左翼在上届选举之胜利，劳农俄国（世界革命的大本营）之巩固，土耳其及东方被压迫民族之崛起，就可知道世界资本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末日快到了。

二、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中国

资本主义与民主主义在历史上虽确已入了凋谢日期，但在殖民地及弱小民族，因为国际侵略的关系，还未充分发达并且不能充分发达，如中国就是一个例。国际资本主义最后生息调剂的源泉，现在可说只有中国，他们若容中国政治经济独立发展，便无异是宣布自己的死刑。中国民主革命至今不能成功，关税至今不能自立，就是因为他们不任中国政治经济独立发展的缘故。他们维持袁世凯与吴佩孚的封建势力，目的就在永远握住中国的经济生命，掠夺中国自然的富源与劳力，以图救济或和缓其国内政治经济的危机，延长其资本主义民主主义的命运。

中国三十年来的革命运动，虽然是幼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实际上与十八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有国际地位及经济地位之不同。在英法各资本主义先进国，资本主义不仅自动的萌芽于封建社会的内部，而且自动的成熟于封建社会的内部，以致打破封建制度狭隘的束缚；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则不然，这些地方的资本主义，乃因国际资本主义之侵入而发生，但在国际资本主义压迫与操纵之下，决不容独立的发展至于成熟；这些地方的资本主义，在外貌上虽比十八九世纪英法的经济状况更发达（如上海），但这系外铄而非自动，系外国资本之幻影，而非本国资本发展之实质。

各资本主义先进国的民主革命，可说完全是对内的革命，他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封建阶级；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革命则不然，不仅是对内的革命而且是对外的革命，他的敌人有两个，一是封建阶级，一是外国帝国主义。当各资本主义先进国

革命时，国际资产阶级每每能互相援助（如法美）以对抗国际的封建势力；殖民地及半殖民地革命时则不然，国际资产阶级不仅不帮助此等地方幼稚的资本阶级去打倒封建势力，反而援助封建势力压迫民主革命，中国十二年来的往事，就是明证。

资本主义先进国的民主革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主革命即有如许区别，所以中国革命运动之性质与历程必与从前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当此世界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业已开始崩坏之时，当此被压迫民族与无产阶级同夷为最少数帝国主义者的奴隶之时，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已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事实上业已变成为国民革命（亦可称民族革命）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要待列入世界革命的议事日程中才得解决。

殖民地国民革命运动的特性就是：一面打倒国内的封建势力，一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在这种立场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所以可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结成联合战线。革命党的领袖们如不认清中国的革命运动为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如不认清中国的革命须同时打倒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则其方略与趋向必致大错而特错，不但不能达到成功目的，而且将使革命运动中道夭殇。

三、革命党之谬误观念

上述中国革命运动的性质，是由中国国际地位决定的；中国革命运动之动因（因外力侵凌，清廷丧权辱国）与挫折（因各国援助袁世凯以下的旧势力），自始即具有复杂之国际关系；中国革命运动之成功，亦必成为国际的问题而不是纯粹可由中国自己解决的“内政”问题。资本世界崩坏的现象：在西方业

已形成普遍的无产阶级之革命运动，在东方业已形成普遍的被压迫民族之革命运动；两种革命运动的焦点就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两种革命运动的成功就是世界革命；必须使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汇合，中国革命才能成功，中国革命问题才能真正解决。所以“联合苏维埃俄罗斯”实成为中国革命运动更向前进之唯一重要的先决问题。

然而，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常有许多谬误观念：第一，他们认不清中国的革命运动是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所以他们把中国的革命专门做成为一种解决“内政”的运动，他们以为对于外国帝国主义无须倡言反抗，只要内政肃清，强邻自然改颜相向。第二，他们误认革命为纯粹的中国事业，与国际没甚关系，他们以为只须用一种政策阻止外国的干涉，中国革命便可成功，只须声明“承认（或不侵犯）一切条约”，外国妨害革命运动的举动即可避免。第三，他们常常梦想所谓“友邦”的帮助，换过说，即一派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帮助，虽然事实上常常证明这种梦想得不到什么益处，但是他们心中总还保留这种想头。

其实，外国势力早已在中国内政上支配着：东交民巷的太上政府可以决定北京政府的一切动作；外国公使、领事、商人、牧师的态度可以影响一切官吏甚至于国民领袖；不仅北京政府一举一动要仰公使团的鼻息，就是广州前前后后的革命政府对于“如在其上”的香港英国帝国主义者也常常免不掉畏首畏尾呢！

况且外力不停的援助军阀们，革命形势常在失败之中，中国“内政”何日可以肃清呢？国民党因为种了以上的谬误观念，所以对于全国如火如荼的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如现在收回旅大的运动）常常缩头缩脑不敢出面领导群众，有时且故意躲避。又如年来工人阶级罢工运动之发展与失败，

这在国民革命的意义上何等重要，但是国民党因为避“赤化”的嫌疑——恐怕外国报纸指他为“过激化”，对于被军阀与洋资本家压迫工人的事情一声不响；最近吴佩孚——国民党现在主要的敌人——对于京汉路工的大惨杀，国民党还是一声不响，还是恐怕惹起英国帝国主义的嫌疑，却不顾及因此要减低劳动群众对于他的同情！

因为梦想“友邦”的援助，或者也是使国民党不敢与爱国运动和劳动群众接近的原因之一个。虽然，丢开过去的事实不谈，我们且看现在自称对于孙中山改变态度的英国帝国主义：英国帝国主义者，除了敲敲广九与粤汉路接轨的竹杠外，帮助了孙中山些什么？不但没有丝毫帮助，而且香港又成为陈炯明的阴谋窟，英国帝国主义者不日又要资助陈贼回粤发难驱逐孙中山呵！我们试回忆中山先生在香港的演说，有何意义呢？

因为要避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嫌疑，因为要保持“外交”的面孔，国民党不但不敢与民众接近，更是不敢与苏维埃俄罗斯接近；苏俄革命成功已六年了，土耳其国民党得其帮助（这才是被压迫民族真正的帮助）业已战胜外国帝国主义，使土耳其民族朝向解放的路上走了，然而中国国民党至今还未派一个正式代表赴莫斯科呢！

以上种种谬误与失策，实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损失！这种损失比较军事的失败、地盘的丧失要重大得多！我们诚恳的希望中山先生们迅速估定革命新方针，朝着国民革命的正轨走去，而且朝着世界革命走去，中国革命才得成功，中华民族才得解放！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
《六大以前》刊印。

《新青年》之新宣言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五日）

“我将创造成整个儿的世界，
又广大，又簇新，请几万万人
终身同居住，免得横受危害，
只希望我自己的自由劳动……
我终看得见奇伟的光辉内
那自由的平民，自由的世界。
那时我才说：唉，‘一瞬’，
你真佳妙！且广延，且相继！
我所留的痕迹，必定
几千百年，永久也不磨灭。”

葛德之《浮士德》(Goathe，《*Faust*》)

《新青年》杂志是中国革命的产儿。中国旧社会崩坏的时候，正是新青年的诞辰。于此崩坏的过程中，《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革新思想的代表，向着千万重层层压迫中国劳动平民的旧文化，开始第一次的总攻击。中国的旧社会旧文化是什么？是宗法社会的文化，装满着一大堆的礼教伦常，固守着无量数的文章词赋；礼教伦常其实是束缚人性的利器，文章词赋也其实是贵族淫昏的粉饰。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中国革命，

不过是宗法式的统一国家及奴才制的满清宫廷败落瓦解之表象而已。至于一切教会式的儒士阶级的思想，经院派的诵咒画符的教育，几乎丝毫没有受伤。如何能见什么自由平等！可是中国的大门上，却已挂着“民国”招牌呢。当时社会思想处于如此畸形的状态之中，独有《新青年》首先大声疾呼：反对孔教，反对伦常，反对男女尊卑的谬论，反对矫揉做作的文言，反对一切宗法社会的思想，才为“革命的中国”露出真面目，为中国的社会思想放出有史以来绝未曾有的奇彩。五四运动以来，更足见中国社会之现实生活确在经历剧烈的变迁过程，确有行向真正革命的趋势，所以《新青年》的精神能波及于全中国，能弥漫于全社会。《新青年》乃不期然而然成为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中国现时的旧社会，不但是宗法社会而已，他已没落于世界资本主义的虎口，与世界无产阶级同其命运。因此，中国黑暗反动的旧势力，凭借世界帝国主义要永久作威作福，中国资产阶级自然依赖世界资本主义而时时力谋妥协。于是，中国的真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能负担此等伟大使命。中国社会中近年来已有无数事实，足以证明此种现象，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何况资产阶级其势必半途而辍，失节自卖。真正的解放中国，终究是劳动阶级的事业。所以《新青年》的职志，要与中国社会以正确的指导，要与中国劳动平民以智识的武器。《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

《新青年》自诞生以来，先向宗法社会、军阀制度作战，革命性的表示非常明显。继因社会现实生活的教训，于“革命”的观念，得有更切实的了解——知道非劳动阶级不能革命——所以《新青年》早已成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不但将与宗法社会的思想行剧激的争斗，并且对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同时

攻击。本来要解放中国社会，必须力除种种障碍——那宗法社会的专制主义，笼统的头脑，反对科学，迷信，固然是革命的障碍；而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琐屑的对付，谬解科学，“浪漫”，亦是革命的大障碍。因此种种，《新青年》孤军独战，势不均，力不敌。军阀的统治，世界帝国主义的统治，如此之残酷，学术思想都在其垄断贿买威迫利诱之下，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既不得充分积聚人才能力之可能，又内受军阀的摧残，外受“文明西洋人”的压迫，所以困顿竭蹶，每月不能如期出世，出世的又不能每期材料丰富。然而凡是中国社会思想的先进代表必定对于《新青年》表无限的同情，必定尽力赞助；《新青年》亦决不畏难而退，决不遇威而屈。现在既能稍稍集合能力，务期不负他的重任，所以在可能的范围内，重行整顿一番，再作一次郑重的宣言。

《新青年》当为社会科学的杂志。《新青年》之有革命性，并不是因为他格外喜欢革命，“爱说激烈话”，而是因为现代社会已有解决社会问题之物质基础，所以发生社会科学，根据于此科学的客观性，研究考察而知革命之不可免；况且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之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所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不期然而然突现极鲜明的革命色彩。中国古旧的宗法社会之中，一切思想学术非常幼稚，同时社会演化却已至极复杂的形式——世界帝国主义，突然渗入中国的社会生活，弄得现时一切社会现象繁杂淆乱，初看起来，似乎绝无规律，中国人的简单头脑遇见此种难题尤其莫名其妙，于是只好假清高唱几句“否认科学”的“高调”。独有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勇猛精进，不怕“打开天窗说亮话”，应当竭全力以指导中国社会思想之正常轨道——研究社会科学；当严格的以科学方法研究一切，自哲学以至于文学，作根本上考察，综观社会现象之

公律，而求结论。况且无产阶级不能像垂死的旧社会苟安任运，应当积极斗争，所以特别需要社会科学的根本智识，方能明察现实的社会现象，求得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凡是中国社会之新活力，真为劳动平民自由正义而奋斗的青年，不宜猥猥琐琐泥滞于目前零碎的乱象，或者因此而灰心丧志，或者因此而敷衍涂砌，自以为高洁，或自夸为解决问题；更不宜好高骛远，盲目的爱新奇，只知求所谓高深遽远的学问，以至于厌恶实际运动。《新青年》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必定要由浅入深，有系统、有规划的应此中国社会思想的急需。——“社会现象复杂得很呢，单是几个‘新术语’尚且要细加紬绎，然后能令真正虚心诚意的革命青年及劳动平民知道‘社会’是个什么东西！”

《新青年》当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研究社会科学，本是为解释现实的社会现状，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分析现实的社会运动；真正的科学，决不是玄虚的理想。中国新思想的幼稚时期已过。现在再也可以不用搬出种种现成的模型，勉强要中国照着他捏——其实“中国式的新乌托邦家”不但不详悉他自己所荐举的模型，而且也不明了中国社会，正因为不了解社会科学的方法，不能综观实际现象而取客观的公律，所以不是泥于太具体的事实——说到中国政治，头脑里只有张曹吴孙几个大姓大名，就是力避现实，逃于玄想——说到经济改造，满嘴的消费、生产、分配等类的外国新名词，不会应用于实际。《新青年》现在也要力求避免此等弊病，当尽其所有区区的力量，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试解剖中国的政治经济，讨论实际运动。

《新青年》当表现社会思想之渊源，兴起革命情绪的观感。社会科学本是要确定社会意识，兴奋社会情感，以助受压迫、

被剥削的平民实际运动之进行。所以对于一般的思想及情绪之流动，都不得不加以正确的分析及映照。一切文学艺术思想之流派，本没有抽象的“好”与“坏”，在此中国社会忙于迎新送旧之时，《新青年》应当分析此等流派之渊源，指出社会情绪变动的根由，方能令一般的意识渐渐明晰，不至于终陷于那混沌颟顸等于飞蛾投火的景象。再则，现时中国文学思想——资产阶级的“诗思”，往往有颓废派的倾向，此旧社会的反映与劳动阶级的心声同时并呈，很可以排比并观，考察其中的动向，亦可以借外国文学相当的各时期之社会的侧影，旁衬出此中的因果。却尤其要收集革命的文学作品，与中国麻木不仁的社会以悲壮庄严的兴感。

《新青年》当开广中国社会之世界观，综合分析世界的社会现象。社会科学本无国界，仅因历史的关系，造成相隔离的文化单位，所以觉得各国有各国的“国粹”，其实不过是社会的幻觉，泥滞于形式上的差别。中国受文化上封锁三千多年，如今正是滚入国际舞台的时候，非亟亟开豁世界观不可。况且无产阶级的斗争本来就是国际的，尤其不可以不知道各国劳工革命运动的经验。因此《新青年》当注意于社会科学之世界范围中的材料，研究各国无产阶级运动之过去与现在，使中国得有所借鉴。从最反动的日本至赤色的苏维埃俄国，都应当研究。

《新青年》当为改造社会的真理而与各种社会思想的流派辩论。社会科学，因研究之者处于所研究的对象之中间，其客观的真理比自然科学更容易混淆。因此，人既生于社会之中，人的思想就不能没有反映社会中阶级利益的痕迹；于是社会科学中之各流派，往往各具阶级性，比自然科学中更加显著。《新青年》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无产阶级于现代社会中，对于现存制度自取最对抗的态度，所以他的观察始终是比较上

最客观的。何况《新青年》在世界无产阶级的文字机关中，算是最幼稚的，未必有充分健全的精力，足以为绝对正确的观察。有此两因，都足以令《新青年》不能辞却与各方面的辩论：一则以指出守旧各派纯主观的谬误，一则以求真诚讨论后之更正确的结论。于辩论之中，方能明白何者为无产阶级的科学结论，何者为更正确、更切合于事实的理论。总之，为改造社会而求真理。

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仅仅有最小限度的力量，能用到《新青年》上来，令他继续旧时《新青年》之中国“思想革命”的事业，行彻底的坚决斗争，以颠覆一切旧思想，引导实际行动，帮助实际行动，以解放中国，解放全人类，消灭一切精神上、物质上的奴隶制度，达最终的目的：共产大同。《新青年》虽然力弱，必定尽力担负此重大责任，谨再郑重宣告于中国社会：

《新青年》曾为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

《新青年》今更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

* * *

《新青年》既为中国社会思想的先驱，如今更切实于社会的研究，以求智识上的武器，助平民劳动界实际运动之进行。而现代最先进的社会科学派别，最与实际的世界革命运动有密切关系的，就是共产国际。所以《新青年》新整顿之时，特以此“共产国际号”为其第一期。

根据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五日出版的
《新青年》第一号刊印。

PDG

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二三年六月）

陈　独　秀

现在我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上届代表会议以来的工作报告。中央委员会的人员太少，搜集不了很多材料。由于遭受迫害，许多材料也遗失了，所以概述得不可能全面。

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只有五人，因此，代表会议以后，杭州委员会建议扩大中央委员会，再增加两名委员，可是上海和北京反对这个建议。当上海的迫害更加厉害时，北京的政治局势还可以使我们在那里进行工作，因而中央委员会迁到北京。我们开始改善机构。但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着手执行我们的计划，在京汉大罢工以后，猖獗的反动派就迫使我们离开北京返回上海。改善机构的计划未能实现，因为上海的迫害非常厉害，又加上我们要准备召开党代表会议，所以我们把中央委员会迁到广州，那里的局势也不稳定，因此，改善中央机构还是不可能的。

上海和广州小组由这两个市的一些地方小组组成。北京、汉口和长沙（湖南）的许多地方小组已联合成地区小组。郑州

---

* 这个报告译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的俄文稿。

PDG

小组在京汉铁路罢工时被破坏了。

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我们只能提出最近几个月的详细报告，因为其余的材料落到了上海法国巡捕的手里，由于一个同志被捕，这些材料全部遗失了。

现在共有党员四百二十人，其中在国外的有四十四人，工人一百六十四人，妇女三十七人，另外还有十个同志被关在狱中。

去年我们只有二百名党员，今年入党的大约有二百人，其中有一百三十个工人。

杭州会议以后，我们间断地出版了日报[1]，这种间断的情况是罢工造成的。报纸只出了二十八期，每期平均印五千至六千份。然而在初期我们的日报遭到了批评，现在它才得到同情。北京、湖北、广州和上海等地也出版了周刊。

关于京汉铁路罢工事件，我们出版了小册子，在很多场合，我们发表了宣言。《新青年》杂志以前每月出版一次，现在改为三个月出版一次。出版《前锋》月刊，刊登有关中国政治经济情况的一般性的文章和国际政治形势问题的文章。

在上届代表会议上，我们同意东方民族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派合作问题的决议。情况的发展表明，只有联合战线还不够，我们又接到了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指示。在上届党代表会议以后，我们不能很快地再召开代表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中央就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

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者，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后来我们开始更多地注意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参加现实的运动。

关于第二次代表会议上决定的“民权”运动，北京、广州、上海、山东和江西等地都成立了“争取民权同盟”。在北京，参加这些新团体的大部分是学生；在山东和广州，大部分是工人。

我们始终是反对军阀的。有个时期，我们忙于组织京汉铁路员工，要与“交通系”作斗争，而吴佩孚也反对“交通系”，那时我们没有反对吴佩孚。但是从罢工时起，我们就猛烈地反对了吴佩孚。然而，中央委员会与吴佩孚有过来往，这是不恰当的。

我们是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口号下工作的。打倒军阀的口号已得到中国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响应，而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还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党员应该更加注意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

现在我谈谈工会的宣传工作。先从上海谈起，上海的工业最发达和最先进。可是那里的工人组织却很落后，开展运动很费力。有很多工人组织，可它们只是空有其名。我们与一个不大的五金工人小组有联系。国民党与海员和制烟工人有联系。我们对于上海应该更加注意。

在北方的铁路员工中，我们在京汉线上有较好的组织，可是在罢工期间被破坏了。津浦路的组织只是一个空架子，实际上并不存在。京奉路的组织是秘密的。津浦路上的工人还严重地分成各个同乡会。京奉路上至今还很难把不同部门的工人联

合起来。

湖南、湖北和广东的联合会与我们有联系。湖北的炼铁、制烟和纺织等产业部门的工会，以及人力车夫组织，也与我们有联系。汉阳工会很有希望，是中国最大的工会，可以作为榜样。萍乡矿工工会在二月罢工中受到了损失，但组织仍然保存下来了。

湖南几乎所有拥有三万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的影响之下。加入这个联合会的还有萍乡的矿工。粤汉路的组织也参加了这个联合会。其余的组织是由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广东的大部分工人工会是手工业工人工会。建筑工人的组织也在我们的影响之下。

我们党的女党员只有十三人。中国的妇女运动还很不发展。我们对广州和湖北的“女权联合会”有一些影响。北京和上海也有这种联合会。

现在我想就我们最近一年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首先我们忽略了党员的教育工作。我们遇到的许多困难，都可以归咎于这一点。许多知识分子抱着革命感情加入了我们党，但是对我们的原则没有认识。工人表现出脱离知识分子的倾向，常常缺乏求知的愿望。

宣传工作进行得不够紧张，我们很少注意农民运动和青年运动，也没有在士兵中做工作。要在妇女中进行工作，女党员的人数也还太少。在工会的宣传工作中，我们没有提出任何口号。现在我们在工人中只能提出成立中国总工会的口号，而不能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还应当在工人中进行拥护国民革命的宣传。

我们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党员往往不完全信赖党。即使党有些地方不对，也不应当退党。我们应该纠正我

们的错误。此外，党内的同志关系很不密切，彼此很爱怀疑。

现在谈谈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实际上中央委员会里并没有组织，五个中央委员经常不能呆在一起，这就使工作受到了损失。

中央委员会也缺乏知识，这是罢工失败的原因。我们的政治主张不明确。大家都确信中国有实行国民革命运动的必要，但是在究竟应当怎样为国民革命运动工作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各不相同。有的同志还反对加入国民党，其原因就是政治认识不够明确。

我们不得不经常改换中央所在地，这使我们的工作受到了严重损失。

现在我想对个别中央委员提出批评意见。陈独秀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很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

张国焘同志无疑对党是忠诚的，但是他的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

邓同志在唐山和科乌[2]矿工罢工时犯了严重错误，并且在广州造成了很多困难。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建党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能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广州的同志在对待陈炯明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最近他们正在纠正错误。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此处俄文稿为“ежедневник”（日报），德文稿为“Die Woe－chentliche Ecitung der Partei”（党的周报）。

〔2〕此处俄文稿为“Koy”。

PDG

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

（一九二三年六月）

一、帝国主义与中国旧经济

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然的结果，乃产生帝国主义；把殖民地变做他经济机体的附庸，就是帝国主义的最终目的。中国旧时的宗法社会，因为受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如割地赔款，强辟商埠，接受外债等——就开始崩坏。帝国主义的列强在中国既已取得了治外法权、协定关税等等优越的权利，他们便支配了中国重要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

二、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及其性质

外货之输入，虽然使中国的手工业生产适应了他而渐渐趋向着集中，但是外国大资本生产品之占领中国市场，几乎同时断绝了中国的大工业发展之可能；原料之输出，虽然使特种农产物的收集和流通渐渐进到了新式的组织，但这样便紊乱了中国旧时经济基础之宗法社会的农业。因为这个原故，中国国内国外的商业便独作偏畸的发展，基本农业的生产力一天一天退步，工业被外力阻住不得正当发展，手工业工人和农民等小生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收入一九二三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

产者渐渐失掉了他们的生产资料，失业的手工业工人和失地的农民，他们人数之众多和失业失地之迅速，比起国内工厂等新式生产机关的发展来，不知要超过若干倍，这些新式生产机关自然容不了他们。

这种经济的大变动，只有极少数的官僚和极少数的大商人（财阀）趁火打劫得了些便宜；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和大多数的劳动平民便一天一天失掉了他们生活的保证，他们遭受贱价劳力的剧烈竞争，他们遭受一切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使他们无法生活。商业经济的市场越开展，外货之输入原料之输出越增多，而同时生产方法之改进甚少，宗法社会崩坏之过程因而甚缓。而且国家在对内对外的新环境内，令政府不得不滥征各种苛税，故生产事业更因之而毁坏日甚。

三、现代中国的政治现象

失业的人越多，极幼稚极少数的工业生产越不能收容，兵和匪就越多，中国最初因为要抵抗列强而采用近代的军事技术，添设“新军”这本不是积弱的中国所能担负，尤其不是宗法式的皇帝所能驾驭；而且中国旧时的经济生活极其散漫，并没有成为一个集中的经济区域，这些散漫的半独立的区域，到处都能够将财阀的经济力去供给军事长官或土匪，使他们都有所凭借：因此就造成了军阀统治的政治形势。中国军阀之存在及发展，又大有赖帝国主义的列强，他们便不惜向列强低首，甘心做列强统治中国的代理人。各军阀有此种种凭借，便互争雄长，引起不断的内乱；帝国主义的列强各谋利用中国一派军阀，相互争夺其势力范围，又酿成了无穷的冲突。军阀之间，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争斗日趋剧烈，中国国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争斗也日趋紧迫，不但如此，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已经

稍为有一点发展，劳资的争斗也就稍为有了一点萌芽。

这种种争斗的表现，到欧战以后就更发显著了。

四、欧战后中国社会中各种争斗的形势

帝国主义的列强各自尽量的发展，而又相互攘夺，因此酿成欧战，结果暴露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大危机；但在各殖民地却恰好趁此机会勉强地发展了他们的工业；一面世界的社会革命时期从此开始，打断帝国主义战争的横流，许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做许多殖民地革命之自然联盟者。中国系处于“国际殖民地”的地位，欧战以前列强在华虽然互相恶斗，但尚能勉强维持其均势，中国的政权也就因为这个均势尚能勉强保存于本国军阀之手；固然亦因此而中国在欧战中之经济发展仍是横受各方牵制，并未能有长足的进步，然在这一期中国工业极小的发展中，毕竟露出了少数的无产阶级，渐渐可以加入世界革命的反对帝国主义战线。但在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因防御社会革命而力求恢复资本主义的威权，更竭全力来侵略中国这一个唯一的“自由”市场，其侵略方法，愈进于攫取财政权及移植资本之倾向，愈要勾结军阀煽动内乱；于是辗转相因，使“游民化”、“兵匪化”更成为中国之普遍的经常的现象——在这种情形之下无产阶级的势力自然不免涣散。况且中国经济生活中骤起骤落的危机，无一不受正在崩坏的世界资本主义之影响——列强大资本生产品之倾轧，原料之垄断，机器购买之限制以及关税金融之操纵都使幼稚的中国工业发展受莫大的障碍。再则欧战后列强间的均势时有破裂之虞，已屡屡引起其代理人（军阀）中间的战争；其经济上政治上的冲突更将引起太平洋上的世界大战。因此种种，可以证明中国之经济力，在帝国主义及

军阀统治之下，永无独立及充分发展之可能，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自然亦极难发展集中其争斗力。因此而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民族民主的总争斗就日趋激厉，日益迫切。

五、中国之国民革命及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此革命中所占的地位

中国处于现时这种状况之下，资产阶级不能充分发展，因之无产阶级也自然不能充分发展，阶级分化不充分的全国人民，皆受制在资本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之下，不能不要求经济发展而行向国民革命，第一步且仅能行向国民革命，这种革命自属于资产阶级的性质。但是在这个革命中间，无产阶级却是一种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因为其余的阶级，多为列强的经济力所束缚，一时不易免除妥协的倾向，有些还囚在宗法社会的陷阱里。至于农民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

六、中国无产阶级的责任

此时中国重要的工业机关，大部分都在列强或军阀官僚手里，很少在中国资产阶级手里；农民正面的敌人，更是列强与军阀官僚，故中国的无产阶级应当最先竭全力参加促进此国民革命，并唤醒农民，与之联合而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以引导革命到底；以革命的方法建立真正平民的民权，取得一切政治上的自由及完全的真正的民族独立。还应当努力扫除宗法社会的余毒，以增加国民革命运动进行之速度。

七、中国无产阶级之争斗及其最终目的

中国民族要求政治经济独立的革命，在世界社会革命的进程中，不期而与世界无产阶级的战线相联合，故中国无产阶级参加此种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宗法社会的国民革命，其意义实在就是中国无产阶级反对世界资产阶级的阶级争斗。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与国际帝国主义及军阀根本上不能不冲突；而劳动平民及无产阶级的解放，尤其与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根本上不相容：国民革命之进行，是必不可免的。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大部分依赖帝国主义的列强或军阀，极易妥协而卖平民；所以中国无产阶级更当参加此种国民革命，以先锻炼集中其能力而取得政治争斗中的位置，方能于世界社会革命的进程中，联合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各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务力缩短自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的过程，而达到共同的最高目的——建立无产阶级独裁制，创造世界的苏维埃共和国，以进于无阶级的共产社会。

八、中国无产阶级争斗之方式

凡属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之争斗必是政治的，中国工人阶级现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争斗，当然也是一样。工人阶级要反对资本主义而无政治上的自由权，必不能实行其经济争斗发展其经济组织，中国劳动平民反对军阀制度的意义也就在这里。但是，工人阶级必须取得政权方能将生产资料归之于社会公有，达到他最高的目的，所以中国无产阶级又必不当以“国民革命”自限。

九、共产党之任务

中国无产阶级，同时须从事国民运动及阶级运动这种复杂的争斗，其职任非常困难，而其发展程度又非常之稚弱，所以他的争斗必与世界无产阶级的争斗有最密切的关系。此种自中国国民革命进而至世界社会革命之争斗，必须是有觉悟的，统一的，并且了解其必然的目标；而锻炼此种觉悟力统一力及指示此种必然的目标，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之任务。

中国共产党根据上述的理由，特定出最小限度的党纲，以为目前的要求如下：

1. 取消帝国主义的列强与中国所订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实行保护税则，限制外国国家或个人在中国设立教会、学校、工厂及银行。

2. 肃清军阀，没收其财产，以办公益的生产事业。

3. 铁路、银行、矿山及大生产事业国有。

4. 实行无限制的普通选举，选举期当在休假日。

5. 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权，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压迫罢工的刑律。

6. 公私法上男女一律平权。

7. 平民须有建议权，罢官权，撤回代表权及废止法律权；中央地方重要的国家职员须民选。

8. 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等地和中国本部生关系由各该地民族自决。

9. 实行都市和乡村自治。

10. 划一币制，禁止辅币之滥发及外币之流通；财政公开。

11. 废止厘金，征收所得税及遗产税；每年审定租税一次。

12. 实行义务教育，教育与宗教绝对分离。全国教育经费应严重保证。教员应享受年功加俸；到相当年龄应享受养老年金。

13. 改良司法，废止肉刑和死刑，免除一切诉讼手续费。

14. 废止雇佣军队制度，改行民兵制。军饷公开。

15. 供给并改良都市贫民之住宅；规定限制房租的法律。

16. 限制一切日常消费品的最高价额。

17. 农民利益的特别要求：

A. 划一并减轻田赋，革除陋规。

B. 规定限制田租的法律；承认佃农协会有议租权。

C. 改良水利。

D. 改良种籽地质；贫农由国家给发种籽及农具。

E. 规定重要农产品价格的最小限度。

18. 工人利益的特别要求：

A. 废除包工制，承认工会的团体契约制（工会议定雇用条件）。

B. 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禁止做日工者续做夜工。

C. 每星期应有三十六小时以上的继续休息。

D. 女工与男工之工资待遇一律平等；生产期前后六星期之休息，不扣工资。

E. 禁止雇用十四岁以下的童工；十四岁至十八岁者每日工作不得过六小时。

F. 工厂卫生及劳动条件以法律规定，由国家设立监察机关监督执行，但工人有权参与之。

G. 制定强迫的劳工保险法（灾病死伤的抚恤等），工人

有参与办理保险事项之权。

H. 救济失业之工人。

此草案通过于第三次中国共产党大会，作为底稿；并议决令各地方郑重讨论后，尽一九二四年一月前将批评、修改及增补之条文意见等，汇交中央局，以便交由出席国际大会代表带往第五次世界共产国际大会作最终之决定。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关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案*

（一九二三年六月）

听了赴第四次国际大会代表报告之后，大会决议：

（一）对于第四次大会所议决各案愿切实履行。

（二）现时的世界大势是：世界革命潮流日益低落，反动的势力弥漫全欧，苏维埃俄罗斯的生存及发达日受国际帝国主义者的威胁。全世界无产阶级此时的重要任务是在要求资本家政府承认俄国与俄国恢复和平的通商关系，以拥护他们的唯一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摧残。

（三）世界的资产阶级的进攻，使劳动阶级的地位沦落，劳动阶级十小时以上的工作所得工资尚不能维持其生存，同时劳动阶级内部有改良派分裂无产阶级，力助资产阶级破坏罢工及示威运动。所以全世界无产阶级奋斗的口号是为劳动运动的统一。

（四）对于东方问题的决议案：大会特注重其在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二种工作：即一面为国民革命，为达到殖民地的政治的独立奋斗；一面须组织工人及农民，利用资产阶级间之冲突，执行为他们特别的阶级利益的争斗。

（五）大会承认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此次由联合的基础之

---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收入一九二三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

组织，改组到集中的基础之组织，并以为这是进到组成一个集中的国际大共产党的第一步表现。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

（一九二三年六月）

（一）在被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之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只有实现国民革命加帝国主义者以有力的打击，是他在世界的革命之工作中所应尽的职务。

（二）此时统治中国的是封建的军阀，不是资产阶级。军阀政府名为独立政府，其实事事听命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列强，不啻是他们的经理人，财政交通工业几完全操于国际帝国主义者之手，中国资产阶级所占者仅仅日用品之极小部分，帝国主义者利用其在华政治势力，妨碍中国工业之自由发展，所以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

（三）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

---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收入一九二三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

（四）以产业落后的原故，中国劳动阶级还在极幼稚时代，多数劳动群众之意识，还停顿在宗法社会，非政治的倾向非常之重，只有少数产业工人已感觉国民运动之必要，真能了解共产主义及共产党组织的更是少数，因此工人运动，尚未能强大起来成功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以应中国目前革命之需要。

（五）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

（六）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七）我们在国民党中，须注意下列各事：（1）在政治的宣传上，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2）阻止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并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3）共产党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在国民党中言语行动都须团结一致。（4）须努力使国民党与苏俄接近时时警醒国民党，勿为贪而狡的列强所愚。

（八）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同时我们特别的工作，须努力促成全国总工会之独立的组织，从事经济的及政治的争斗。我们须努力引导劳动群众由日常生活的争斗到政治的争斗。目前政治的争斗，自然只是国民运动——排除外力及军阀的运动，因此，在劳动群众中须有大规模的国

民运动的宣传，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同时凡已了解国民革命之必要更进而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当尽量加入我们自己的组织；并当于群众中普遍宣传“国民运动中拥护劳动阶级利益的必要”。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劳动运动议决案*

（一九二三年六月）

（一）中国目下劳动运动方取守势，党的活动须多于工会活动，恢复工会口号须在被封工会各工友中宣传，引起压迫下之工人作政治的斗争。

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应从速召集全国各路代表会议讨论各路统一之工作，改造筹备委员会及讨论救济“二七”被难工友之方法。

（二）哈尔滨及山东两地在产业上及地位上皆甚重要，该两地方之劳动运动不可忽视。哈尔滨方面之劳动运动更宜作与苏俄工人联合之宣传，现时反对苏俄之趋向亟宜纠正。

（三）广东方面劳动运动，须注意新式产业之工人。至进步的手工业工人组织同时亦须整顿，促进其阶级觉悟。

省港澳三方面产业的及手工业的工人组织，须适用国民运动口号作统一运动。

香港地方在产业上甚为重要，在该地方之劳动运动须设法改职业组织为产业组织，以增加工人势力反抗英国帝国主义及资本主义之压迫。

南洋华工为数极大，须设法使其与国内工人发生密切关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收入一九二三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

PDG

系，但须纠正其省界国界分别之趋向。

（四）中国妇女劳动运动以上海天津等处为最盛。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须附设妇女部，由女同志负责担任此种工作。

（五）工厂劳动运动须通用下列口号：（1）男女工资平等；（2）废止未满十四岁之童工；（3）推翻包工制；（4）星期日休息；以引起男女工人争取自身利益之觉悟。

（六）为养成劳动运动人才起见，在适当地点设立劳动教育机关，以启发工人宣传及组织之智识。

（七）劳动组合书记部今后之责任为组织天津、哈尔滨、山东、上海等处已组成之路矿等工会以外之各种工会。

（八）在半殖民地之中国手工业工人占多数，在手工业中之劳动运动中除加薪减时口号外，消费合作运动或要求红利运动亦宜注意，但须纠正劳资妥协之趋向。

（九）大的产业工会，尤其是海员工会，须设法引起其与赤色职工国际联合。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农民问题决议案*

（一九二三年六月）

自从各帝国主义者以武力强制输入外货以来，一般日用品的价格增高率远超过于农产价格增高率，从前的农民副业（如手工纺织等）也全被摧残。又自辛亥以后，军阀争地盘的战争连年不息，土匪遍于各地，再加以贪官污吏之横征暴敛（如预征钱粮额外需索等），地痞劣绅之鱼肉把持，以致农民生活愈加困难。因此种种压迫农民自然发生一种反抗的精神，各地农民之抗租抗税的暴动，即其明证，故我党第三次大会决议认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宰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收入一九二三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

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

（一九二三年六月）

凡党员之行动带有政治意义者，中央执行委员会有严重监督指导之权。党员遇有不得已须在政界谋生活时，必须请求中央审查决定。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收入一九二三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

PDG

青年运动决议案*

（一九二三年六月）

第三次大会认青年运动为本党重要工作之一，所以对于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极力加以组织上指导上之援助。

社会主义青年团应以组织及教育青年工人为其重要工作，在出版物上应注意于一般青年实际生活状况及其要求。

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于青年学生应从普通的文化宣传进而为主义的宣传，应从一般的学生运动引导青年学生到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国民运动。

社会主义青年团应开始从事于农民运动的宣传及调查。

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根据本党第三次大会关于国民运动与国民党之议决案极力参加国民运动。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收入一九二三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

PDG

妇女运动决议案*

（一九二三年六月）

（一）劳动妇女运动　在去年的蓬勃罢工运动之中，已表现劳动妇女在阶级斗争中之重要与意义。但同时男工女工间之冲突亦随而发见。此种冲突之来源大致由宗法社会轻蔑妇女之习惯与成见，还保留于男工之中，以致女工在工会中常感男工压迫侮弄之痛苦，因而另思组织女工会，此实为工人阶级分裂之危机，本党关于此点应尽力宣传，不仅要号召男女工亲密团结，而且要扫荡男工轻侮女工之习惯与成见。至接触女工初步方法，或办工儿院，或办女工夜学，亦方法之一，并可斟酌情形因时制宜。

（二）一般的妇女运动　一般的妇女运动如女权运动、参政运动、废娼运动等，亦甚重要。此等运动年来在各处皆已发生，但是既不统一，又不活动。本党女党员应随时随地指导并联合这种种运动，口号应是“全国妇女运动的大联合”、“打破奴隶女子的旧礼教”、“男女教育平等”、“男女职业平等”、“女子应有遗产承继权”、“男女社交自由”、“结婚离婚自由”、“男女工资平等”、“母性保护”、“赞助劳动女同胞”。这些口号之外，还应加入“打倒军阀”、“打倒外国帝国主义”两个国民革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收入一九二三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

PDG

命运动的口号，以引导占国民半数的女子参加国民革命运动。至我们指导此等运动的态度，亦宜注意：第一，不要轻视此等为小姐太太，或女政客们的运动；第二，阶级的主义的色彩不要太骤太浓，致使她们望而生畏。

（三）妇女运动委员会及出版物　为集中本党女党员之活动及系统的指导全国妇女运动起见，应设立妇女委员会以外，要在全国妇女运动中树立一精神的中心，应创办一种出版物，以指导并批评日常的妇女生活及妇女运动。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

（一九二三年六月）

（一）中央执行委员会由本党常年大会选出。其一切行动对大会负责，在两大会之间为本党最高指导机关，管理各区各地方之行动，发行用本党名义之出版物；并管理派遣做青年、妇女、劳工、农民等工作之职员。

（二）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九人组织之。中央委员缺职时应以候补委员补缺。大会后之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即应分配工作，并选举五人组织中央局。其余四人分派各地，赞助该地方委员会一同工作，每星期将所在地情形报告中央局一次。

（三）中央局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行使职权，由执行委员会选出委员长、秘书及会计三人，其职务如下：

委员长主席一切中央局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会议，遇委员长缺席时，由中央局互推一人代理委员长之职权。

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收入一九二三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

PDG

会计在中央督察之下，管理本党财政行政，并对于各区各地方及本党一切机关之财政行政负责。

（四）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每四个月开一次，中央局每星期开会一次。中央局自己或经中央执行委员四人之请求，可召集特别会议。在请求书上须说明开会讨论之问题及其理由。

（五）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附加会议之日程。

（六）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局之一切决定，以多数取决，但召集临时全党大会之议决，须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取决。

（七）中央执行委员会，须在全党大会开会日期前至少两月通知召集，附寄议事日程草案，并请地方于通知后一月内交齐议案。各地方议案须互换。

（八）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报告，在开会一月之前寄与地方。

（九）中央执行委员会财政报告，由大会指定审查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不得当选）审查后报告大会。

（十）如有本党三分一之区代表全党三分一之党员之请求时，执行委员会必须在接到请求书之一月内召集本党临时大会。请求书上必须说明请求召集临时大会之理由。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

（一九二三年六月）

第一章　党　　员

第一条　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党纲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第二条　党员入党时，须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经小组会议之通过，地方委员会之审查，区委员会之批准，始得为本党候补党员。候补期劳动者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但地方委员会得酌量情形伸缩之。候补党员只能参加小组会议，只有发言权与选举权，但其义务与正式党员同。

第三条　凡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承认之党员，当通告该党员所在地之地方委员会，亦须经过候补期；凡已加入第三国际所承认之各国共产党者，经中央审查后，得为本党正式党员。

第四条　党员自请出党，须经过区之决定，收回其党证及其他重要文件，并须由介绍人担保其严守本党一切秘密，如违时，由区执行委员会采用适当手段对待之。

---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收入一九二三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

第二章　组　　织

第五条　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附近，凡有党员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一小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不满五人之处，亦当有组织，公推书记一人，属于附近之区或直接属于中央。如各组所在地尚无地方支部时，则由区执行委员会直辖之，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处，则由中央直辖之。

第六条　一地方有十人以上，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许可，区执行委员会得派员至该地方召集全体党员大会或代表会，由该会推举三人组织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并推举候补委员三人——如委员因事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地方，则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派员召集组织该地方执行委员会，直接隶属中央。区执行委员会所在地，得以区执行委员会代行该地方执行委员会之职权。

第七条　各区有两个地方执行委员会以上，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有组织区执行委员会必要时，即派员到该区召集区代表会，由该代表会推举五人组织该区执行委员会；并推举候补委员三人，如委员因事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委托一个地方执行委员会暂时代行区执行委员会之职权。区之范围，中央执行委员会规定并得随时变更之。

第八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九人组织之；并选举候补委员五人，如委员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

第九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期一年，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

任期均半年，组长任期不定，但均得连选连任。

第十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大会的各种决议，审议及决定本党政策及一切进行方法；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并在其范围及权限以内审议及决定一切进行方法。各委员会均互推委员长一人总理党务，其余委员协同委员长分掌职务。

第十一条 大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之各种议案及各地临时发生之特别问题，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均得指定若干党员组织各种特别委员会处理之；此项特别委员会开会时，须以各该执行委员会一人为主席。

第三章 会 议

第十二条 各小组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一次，由组长召集之。各地方每月至少召集全体党员会议一次（其有特别情形之地方，得改全体会议为组长会议，但全体会议至少须两月一次）。各区每三月由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该区全体党员代表会议一次，每五人有一票表决权。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每四月开全体委员会一次。

第十三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召集全国代表临时会议。有三分之一区代表全党三分之一党员之请求，中央执行委员会亦必须召集临时会议。

第十四条 全国代表大会或临时会议之代表人数，每地方必须派代表一人，但人数在四十人以上者得派二人，六十人以上者得派三人，以上每加四十人得加派代表一人。每地方十人有一票表决权。未成地方之处，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

得令其派出代表一人，但有无表决权由大会决定。

第十五条　凡一问题发生，上级执行委员会得临时命令下级执行委员会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

第十六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得随时派员到各处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此项会议应以中央特派员为主席。

第十七条　中央及区与地方执行委员会，均由委员长随时召集会议。

第四章　纪　　律

第十八条　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机关；在全国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

第十九条　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

第二十条　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相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

第二十一条　各地方党员半数以上对于执行委员会之命令有抗议时，得提出上级执行委员会判决；地方执行委员会对于区执行委员会之命令有抗议时，得提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判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抗议时，得提出全国大会或临时大会判决；但在未判决期间均仍须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

第二十二条　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各组均须执行及宣传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凡有关系全国之重大政治问题发生，中央执行委员会未发表意见时，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均不得单独发表意见，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所发表之一切言论倘与本党党纲宣言章程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及所定政策有抵触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得令其改组之。

第二十三条　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加入一切政治的党派。其前已隶属一切政治的党派者，加入本党时，若不经特许，应正式宣告脱离。

第二十四条　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为任何资本阶级的国家之政务官。

第二十五条　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

第二十六条　凡党员有犯左列各项之一者，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

（一）言论行动有违背本党党纲章程及大会各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

（二）无故连续二次不到会；

（三）无故欠缴党费三个月；

（四）无故连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

（五）不守纪律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其停止出席留党察看期满而不改悟；

（六）泄漏本党秘密。

地方执行委员会开除党员后，必须报告其理由于中央及区执行委员会。

第五章　经　　费

第二十七条　本党经费的收入如左各项：

（一）党费：党员月薪在三十元以内者，月缴党费两角；在三十元以上至六十元者缴一元；六十元以上至百元者缴二十分之一；在一百元以外者缴十分之一。失业及在狱党员均免缴党费。

（二）党内义务捐。由地方执行委员会酌量地方经费及党员经济力定之。

（三）党外协助。

第二十八条　本党一切经费收支，均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支配之。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章程修改之权，属全国代表大会，解释之权属中央执行委员会。

第三十条　本章程由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三年七月十日[1]——二十日）议决，自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之日起发生效力。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此处“七月十日”有误。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召开的。

PDG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一九二三年六月）

中国人民受外国及军阀两层暴力的压迫，国家生命和人民自由都危险到了极点，不但工人农民学生感觉着，即和平稳健的商人，也渐渐感觉着了。

目前北京政局之纷乱儿戏；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工会学生会日在压迫摧残中；山东河南兵匪之猖獗，外人借端要挟，并要拿回华盛顿会议所赏的利益；沙市长沙日本水兵之暴行；外人强令棉花出口；吴佩孚齐燮元争相制造广东之战祸；吴佩孚萧耀南合力助成川乱；又若未来的奉直战争及直系军阀之内哄；——在在可以证明内忧外患交加于国民之身，除集合国民自己之势力，做强大的国民自决运动，别无他途可以自救；也在在可以证明本党一年以来号召的“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之国民革命运动，不是一条错误的道路。

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不幸中国国民党常有两个错误的观念：（一）希望帝国主义的列强援助中国国民革命，这种求救于敌的办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收入一九二三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

法，不但失了国民革命领袖的面目，而且引导国民依赖外力，减杀国民独立自信之精神；（二）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忽视了对于民众的政治宣传。因此，中国国民党不但会失去政治上领袖的地位，而且一个国民革命党不得全国民众的同情，是永远不能单靠军事行动可以成功的。

我们希望社会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国国民党，使国民革命运动得以加速实现；同时希望中国国民党断然抛弃依赖列强及专力军事两个旧观念，十分注意对于民众的政治宣传，勿失去一个宣传的机会，以造成国民革命之真正中心势力，以树立国民革命之真正领袖地位。

中国共产党鉴于国际及中国之经济政治的状况，鉴于中国社会各阶级（工人农民工商业家）之苦痛及要求，都急需一个国民革命；同时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疏忽的；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加入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

中国国民革命万岁！

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解放万岁！！

全世界被压迫的阶级解放万岁！！！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中国农民问题

（一九二三年七月一日）

陈 独 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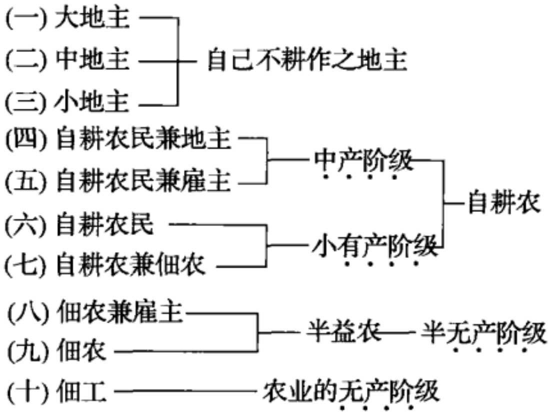
一

在经济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不但农民占全人口之大半数，其国民经济之真正基础，还是农业；在这些地方之各种革命都不可忽视了农民的力量。有些自耕农居多数而且是小农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如中国），农民所受地主的压迫，不像地主强大的国家（如旧俄罗斯、印度）或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如欧美各国）那样利害，不容易发生社会革命的运动；然所受外货侵入生活困难及贪官劣绅军阀灾荒之痛苦，往往也能激起他们的群众运动；这种农民的大群众，在目前已是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潜势力，所以在中国目前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国民运动（即排斥外力打倒军阀官僚）中，不可漠视农民问题。

二

中国人口约六千余万户，而农民有四千万户以上，是农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俄国农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日本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即此人数上看起来，我们应感其重要。

此农民大群众，其经济生活程度虽非杆差甚远，而经济地位则有几多复杂之区别，兹将地主与农民略分为十等如左表：



有地过万亩之大地主，在全中国每省不过十人左右，此等大地主少数是前清贵族，大多数是旧官僚或新军阀，他们对于佃农有很大的威权；股份公司居极少数，因为旧法耕地之利润远不及工商业，故城市的资本家多不肯投资经营农业。

有地过千亩之中等地主，全国至少在二三万以上，他们半居乡村，半居城市，有的是在城市兼营小工商业者，有的是官僚后裔之无职者，专恃收取地租维持生活。其居乡村者，或为绅董把持乡村之政权，或为高利营业盘剥贫农。

有地过百亩之小地主，其数至少十倍于中等地主，他们大多数居住乡村，其职业或在乡镇经营小商业，或在乡村为绅董。

最大多数之农民，非自耕农即佃农，据民国七年农商部统计如左[1]：

农户总数	43，935，478
自耕户数	23，381，200
佃农户数	11，307，432
自耕兼佃	9，246，843

依此统计，自耕农民之数多过佃农一倍，其中相差最甚者，为江苏、安徽、湖北等省。江西、福建、浙江等省，则相差极微。

自耕农民中有兼为地主者，是一家族人少而地多，除自耕外尚有余地租给别人耕种，一方面是自耕的农民，一方面又是收租的地主，此种农民为数不多。自耕农民中有兼为雇主者，是一家族自耕自地而劳动力不足，雇用别人帮忙，此种农民为数甚多。此二种农民，不独占有地土权，无向地主缴纳地租之义务，而且得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掠夺他人之剩余劳动，其生产物不仅供给一家生活及农作上的需要，并且，至少在丰年时可以获得盈余，变成初步积累的资本，是以此种农民应属之中产阶级。

纯粹自耕自地之农民，为数亦不少，其所种之地则甚少。其自耕兼佃农，则因一家族人多而地少，除自地自耕外，又不得不向地主租地耕种，此种农民为数不多。此二种农民，虽非半益农，得全收其劳动所得之利益，而无掠夺他人劳动力之机会，虽丰年亦难有多量之盈余以为积累；只以完全占有地土所有权，生产工具及生产物所有权，应属之小有产阶级。

佃农兼雇主，是向地主租地耕种而劳动力不足，雇用别人帮忙者；纯粹佃农，乃由一家族任工作不雇用他人者。此二种农民人数略相等，其中又分二等：（一）纯粹无地权者，地主随时可向佃农收回其租出之耕地，（二）半有地权者，佃农曾出等于当时地价半值之金额向地主租得耕地，其后能以同等金额或较少之金额辗转租给别人耕种，原地主只能向现时耕地之佃农收取地租，除出资购回此半佃权外，不能自由收回耕地另给别人耕种。佃农们租地时，须向地主缴纳押租金（或名羁

庄，退租时可以收回）每亩约一元左右；耕种时须自备生产工具（牛、农具、食粮等）；所得生产物须缴纳一部分与地主，缴纳之方法，或预约一定之额租（或名铁租），无论收成丰歉不得短少，或每年按收成丰歉临时议租；缴纳之数量，至少须在收获物三分之一以上。佃农住屋多随地租得，退租时须退还地主。地主对于佃农甚尊严，大地主尤甚，有“东佃如父子”之谚。此等农民既不能掠夺他人，又为地主所掠夺，不能全收其劳动所得之利益，丰年尚可勉强供给一家生活及农作上的需要，荒歉时则衣食且不足，又加以地主追缴租课，不胜其困苦，因此每年秋收时，各地佃农罢租讼案往往占各种讼案平均百分之三十以上。但此种半益农，虽不占有地权或只占有半地权，然仍占有生产工具及收得并管理其劳动所得之一部分生产物，故应属之半无产阶级。

雇工是各种农民出一定工资雇用他们做工者，此种雇工分成人及童工两类，和长工及短工两种办法；长工以年计，每年工资由二十元至四十元不等，短工以下种或收获时短期间计算，工资略高；童工专事牧牛及零碎轻工作，每年工资不过数元；惟各种雇工的伙食均由雇主供给，且间有供给衣服者，长工多给以住所，短工则不然。此种雇工，倘不失业，其生活费反较佃农稳固；惟其不但无地权，而且没有生产工具及收得并管理其劳动所得生产物之权，纯粹是被雇者，各种农民中，只有他们是无产阶级。

以上七种农民中，后三种（佃农兼雇主、佃农、雇工）都是无地的农民，在全国农民总数中约占百分之四十，人数当在九千万以上；因为自耕农民虽多过佃农一倍，而加上雇工，无地者人数纵不能与有地者相等，当亦不致相差甚远。

各种农民所占地均甚少，此时不但无集中的倾向，而且有

分小的倾向，据农商部之统计，农民耕地多寡别，民国六年七年比较如左表：

	民六	民七
十亩未满者	17，805，125	17，914，231
十亩以上者	13，248，474	11，303，570
三十亩以上者	10，122，214	6，712，366
五十亩以上者	5，348，314	4，137，136
百亩以上者	2，835，464	2，278，355

三

中国农民之痛苦计如下诸端：

（一）一般农民之痛苦

a. 外货输入之结果，一般物价增高率远过于农产物价格增高率，因此自耕农民多卖却其耕地降为佃农，佃农则降为雇工，或改业往城市为苦力，沿海者则移住海外，多数则流为兵匪，此为中国目前兵祸匪祸之一大原因。

b. 政治不良之结果，军阀战争及水旱灾荒，也都是使农民困苦失业流为兵匪之一大原因。

合上列二个原因，农民失业者之日渐增多，可以农商部各项统计证明之：

1. 耕地减少亩数

民三	民七
1，578，347，925	1，314，472，190

2. 被灾亩数

民三	民七
653，475，445	61，717，113

以直隶、山东、江苏三省最甚。

3. 荒地增加亩数

民三	民七
358，235，867	848，935，748

其中增加最巨者，第一是黑龙江省，由民国三年一万六千六百余万亩，民国七年增至六万八千七百余万亩，多属私有地；第二是广西省，由民三四百余万亩，民七增至一千四百余万亩，多属私有地；第三是奉天省，由八百九十余万亩，增至一千七百余万亩，多属官有地；第四是湖北省，由四十八万余亩，增至三百八十余万亩，多属私有地；第五是山西省，由二百二十余万增至四百五十余万亩，多属私有地。

4. 农户减少数

民三	民七
59，402，315	43，935，478

据此表，民国三年至民国七年，四年之间，全国农民减少了一千五百万户以上，其中失业之农民必有可惊之数！其中减少最巨者为湖南、陕西二省，此为战乱之影响；其次则为浙江、山西、江苏等省，苏、浙为都市工业发达之结果，独山西省工业既未发达，又无战乱灾荒之影响，农户何以减少，岂是

模范省缘故？

c. 农民文化过低，又无组织之结果，地主绅董们，把持乡村政权，鱼肉贫农，两者时生冲突。

（二）自耕农之痛苦

官吏舞弊额外需索及预征钱粮使地税无形增加，荒歉时自耕农无力缴纳地税，极感痛苦，往往有聚众“抗粮”、“哄堂”之举，农民暴动几全属此数。

（三）佃农及雇工之痛苦

a. 兵匪扰乱及水旱灾荒使农民大为移动，所移住地外来农民之增加超过需要时，同业间发生竞争，遂使地主、雇主们对于佃农、雇工所要求之条件日益苛刻。

b. 因城市物价及生活费日益增高，地主们对于佃农之需索随之日益加紧。

c. 以上述种种压迫之结果，农民因衣食不足及农作上的需要，尤其是春夏间青黄不接时，不得不出去借贷，于是高利盘剥者或地主，乃乘机以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百的利息，吸取贫农之血汗，此项痛苦以无地之佃农为最普遍而且特甚。

四

欲解除此等痛苦，且引导其加入国民运动，应依各地情状采用下列方法：

（一）教育及宣传　教育以农暇时授以文字（应注意注音字母的传布）及世界大势。宣传以“排斥外力”、“打倒军阀”、“限田”、“限租”、“推翻贪官劣绅”口号（最好是携带影灯的巡回讲演）。

（二）组织及实际运动　组织有四种：

a. 农会　小农中国之农民，他们各阶级间无显明的分化，此时全乡村各种农民（自耕农、佃农、雇工）可就其共同利害之点，联合为一个组织。各地旧有农会虽有法律的地位，而组织之分子多非农民，今应鼓吹真正农民改造之，以反对横征暴敛之官吏，压迫佃农之大地主及鱼肉贫农包办选举之劣绅为对象；以“组织消费协社”、“组织农民借贷机关”、“组织谷价公议机关”等为实际运动。

b. 乡自治公所　此亦系旧有的地方政治组织，南方各省尤正在进行，在此组织中应以组织乡团抵御兵匪，改良水利，要求“县长民选”为主要运动。

c. 佃农协会　以向政府要求“限田”（限制私有地权在若干亩以内，即以此等大地主、中地主等限外之地权分给耕种该地之佃农）、“限租”（每年应纳地主之租额，由各农村佃农协会按收成丰歉自定之）为佃农特有之运动。

d. 雇农协会　以协议工资及介绍工作为主要任务。

根据一九二三年七月一日出版的
《前锋》第一期刊印。

注　释

〔1〕此表数字有误。

PDG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

（一九二三年八月一日）

时局之危机，现在大家都觉悟了，大家都想起来挽救了，只可惜稍迟了一点！

时局之危机来源甚长，此次曹党驱逐黎元洪，不过是长久酝酿之危机中屡次发现之一个最近发现的结果。大家对于这一个最近的结果都大惊小怪起来，而对于酝酿此结果之根本原因却不甚措意。像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如何能救危机四伏之中国！

中国号称民主国家已经十二年了，而与民主政治绝对不能相容的北洋军阀势力依然存在，是以有洪宪之变、复辟之变、安福之乱以及此次曹党之乱。这些连续不断的变乱，都是北洋军阀势力存在与列强势力相勾结之自然的结果。他们多存在一日，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利用他们侵略中国的程度便增高一日，这就是中国危机四伏之根本原因。去年奉直战争之结果，我们知道一面是奉直势力的消长，一面也是日美在中国的势力消长。所以当时吾党对于时局主张，曾说过：恢复国会，联省自治，黎元洪复位，吴佩孚得势，都不能解决时局；曾说过：只有以民主的联合战线，继续革命，打倒军阀及军阀背后的外国势力，才是救济中国的唯一道路。

---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三年八月一日出版的《先驱》第二十四号。

即以此次曹党之乱而论，也非旦夕的骤变。去年奉军战败，美国在北京的势力，几乎取日本代之，那时曹党本欲拥曹代徐[1]，其所以未即实行者只以曹党中分缓急两派（现在还是如此）：缓进的洛阳派吴佩孚主张暂时利用黎元洪为傀儡，直系取得实际的政权，一面以武力削平南方统一中国，一面以金钱包办宪法，然后利诱威迫国会议员拥戴他们的大帅做很体面的合法总统，所谓“武力统一北洋正统”，就是当时吴佩孚号召的政纲；急进的天津派曹锐边守靖等，迫不及待，即欲拥曹登台；当时吴佩孚势盛，曹边等只得屈从了他的主张，可怜的黎元洪遂因此做了一年替直系军阀监印的傀儡总统。曹党阴谋酝酿至今，一方面因为削平南方为期愈远，制宪之说徒为黎元洪延长监印时期；一方面又得到美国及亲美派基督徒冯玉祥之助，遂不顾一切而悍然驱逐黎元洪。曹党所恃者，不但冯玉祥之兵力，尤其是以外交系顾维钧等为中间人获得美国之金力，欲以重金贿买国会议员及军队，攘窃政权。短视的国民，视黎曹争政为时局危机之焦点，其实问题不是如此简单，曹党敢于逐黎，因其背后有大力者（美国）之援助，所以逐黎不过是历来外力军阀勾结为患，造成中国危局之一个必然的结果，而非时局危机之因。北洋军阀旧势力统治中国，抑制民权，勾结列强，断送利权，此乃中国危机四伏之根本恶因，此恶因一日不除，其危机连续起伏之恶果将一日不止。

因为大家不甚措意时局危机之根本原因，所以此时各方面解决时局之舆论，仍不免趋向几个错误的观念：

（一）拥护黎元洪。黎元洪依附军阀窃取高位，在法律上本无根据，在政治上勾结军阀御用之国会与张[2]内阁而为三角同盟，杀工人，伤学生，妄发命令造祸闽粤，以恋位故不惜逢恶长乱，其罪不在曹吴之下；此时政学会拥之抗曹，纯系利用

时机，以报私怨而窃政权；其他直系政敌欲以猪黎为傀儡，拥之于奉或浙者，均应为国民所不齿。

（二）拥护段祺瑞。段派与直系素不两立，安福罪恶，世界所知，彼等亦欲利用国民恶曹心理，起而恢复其势力，张作霖、卢永祥之于段，亦犹吴佩孚、冯玉祥、齐燮元之于曹，将来即有变化，其结果亦不外北洋军阀直皖两派首领夺政之争，这两派首领背后都各有一派帝国主义的列强在那里做后台老板，无论谁胜，都非国家人民之福。此等反动的北洋军阀，无论何派利用时机，出而组织政府，窃取政权，曹与非曹均应为国民所否拒。

（三）国会南迁及制宪。贪横无耻的国会议员，久为曹琨所驯养，或云其中亦有贤良，何以始终同流合污无所表示？代表全国商人工人学生各团体，都已先后宣告否认此国会，不知其尚能代表何种民意？我们认定国会南迁及国会制宪之说，都是违反民意的主张；此种鲜廉寡耻违反民意的国会议员，无论其将来投靠何方，其所定宪法所选总统，国民都一概认为无效。

（四）团结西南联省自治。西南诸将之拥兵聚敛压抑民权，无异于北洋军阀。以此而谋联省自治，仍是联督自保之老文章；若云团结西南以抗北方，观往察来，只是地域上南北割据之争，绝无政治上封建民主之别。主张此说者，不是失意政客欲挟西南为奇货，以达其总裁头衔及分赃会议的欲望；便是贪鄙腐儒欲据此以为拥黎地步而已。

（五）借助列强。创造独立的国家，建设革命的政府，端赖吾民自力，真能艰苦奋斗而成，断不能效有些朝鲜民党，不自努力革命，而呼号于巴黎华盛顿会议，希望外国承认之助力，得以成功。勾结列强的军阀固为人民所痛恨，而痛恨军阀者亦往往有借助列强以制军阀的谬误观念，像这样懒惰取巧依赖外力的国民，不懂得军阀列强勾结的关系，如何能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的

国家！反之，我们是要求一个以国民自力，由革命而建设的政府，由任何外国帝国主义者所支配所援助的政府，国民都誓不承认。

同胞们！用以上五个方法中任何方法反对曹锟，都不是国民应取的正当态度；我们的主张是：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国民会议；若是国民党看不见国民的势力在此重大时机不能遂行他的历史工作，仍旧号召四个实力派的裁兵会议与和平统一，其结果只军阀互战或产生各派军阀大结合的政局，如此我们主人翁的国民断不能更袖手旁观，例如上海总商会所发起的民治委员会即应起来肩此巨任，号召国民会议以图开展此救国救民的新局面。在北京之国会已成为封建军阀的傀儡，国民已否认其代表资格，只有国民会议才真能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够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也只有他能够否认各方面有假托民意组织政府统治中国之权。由此国民会议所产生之新政府，须以真正国民革命的势力，扫荡全国军阀及援助军阀的外国势力，然后才不愧为统一全国的人民政府，不是一个偏安一隅的政府，更不是一个各派军阀合作受列强势力所卵翼的政府。同胞们只有这一条路，是真能救济我们中国人逃出外力军阀二重压迫的道路。

打倒利用军阀侵略中国的列强！

打倒勾结列强压迫人民的军阀！

全中国国民革命者联合起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注　释

〔1〕指徐世昌。

〔2〕指张绍曾。

PDG

对俱乐部工作的回顾*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日）

刘　少　奇

我们抱定社会主义的思想，从最黑暗的家庭奋斗出来，到中国这样沉寂的社会里面，干这种改造社会的事业。去年奉到我们的总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命令到安源来帮助路矿工友办事，至今已是一年了。这一年过去的事实，实使我们得了许多很大的教训，关于将来进行的方针，也因此得以稍事计议。此时我将个人所感觉的，用极真实的态度披露出来，使大家对俱乐部得一种系统的观念，以便批评指正。

社会改造的步骤，我们所主张的是：（一）使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养成无产阶级支配社会的潜伏势力；（二）实行夺取政权，用政治的力量消除社会一切阶级的压迫——人的压迫；（三）在产业公有制度底下以极大的速力发展实业，减少人类所受自然的压迫。

（二）、（三）两项是我们无产阶级终极的目的。以中国现在的情势看来，这样幼稚的无产阶级当然说不上马上就拿来实行。既是很远的事实，也用不着说很多的话来讨论他。在（一）项里面又应该分为下列几个步骤：（1）由争得工人直接

---

* 这是刘少奇为纪念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一周年写的《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一文的节选，原载一九二三年十月十日出版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

的利益——加工资——使各个工场的工人团结起来；（2）由争得工人第二步本身利益——减少工作时间——使各地同产业的工人形成产业的大联合；（3）以过去奋斗的经验切实教育工人，使工人明了自己阶级在现在及将来社会上的地位，工团终极的目的与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养成极健全的奋斗者，成功无产阶级有方法的支配社会的潜伏势力的大组合。

由上面社会改造的步骤看来，工人以罢工手段要求普遍增加工资和减少工头职员无理的压迫与剥削，并不是我们工人的目的，乃是一种手段，即是利用群众的“利害”心理，划清资本家与工人之界限，使工人阶级自觉的团结起来。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这种经济的奋斗，在工人将来全部的利益上看来是很小的；但是我们必得要做这种利益很小的运动，才能使工人目见利害的关系团结起来，才能训练工人的奋斗能力及方法。这是工人解放运动最初步的工作。

我们安源自去年九月罢工胜利以后，继续至今，所得的胜利——增加工资，打破包工制度——要算已经成功第一步的工作——工人解放运动最初步的工作。在这一点点的成功里面，我们已经用了许多的力量，经过了许多的危险，做出了许多的错误，这总算使我们这些缺少奋斗经验的人，在这里面得到了很多的教训；在另一方面，我们应该不使前日的成功失败，赶紧引导全体工友向劳工解放运动的正确道路前进。在以上两个意义里面，所以我不惜把俱乐部过去的一切，切实批评一番；把俱乐部将来的计划，具体的向大家宣布。

代表：代表可说就是工人的领袖，上年代表在组织上算有系统，能尽责任，并且还是很努力的。不过有一部分因自己居在领袖的地位，对于俱乐部的宗旨和目的，或者还有些不大十分明了，以为俱乐部是行政机关，以为自己有很大的权力和威

风。因此自己渐习于一种官僚绅士的态度，对工人的态度和说话，多骄傲不和悦；且久而见只有牺牲没有权利，就不快活了。还有些不知道我们帮大家工人做了事，虽然有点功劳于俱乐部和大家，自己是不应该居功，不应该求报酬的，所以有功不得大家的恭维，不得俱乐部的报酬就灰起心来，生起气来，在旁边说坏话。还有以为自己要帮助工人，对于工人无理的要求，也一概赞助的。这些都是去年代表中确有的错处。这都是不诚实的努力，有用意的努力，工人领袖如果都是这样，那我们的事业便非常危险。因为我们将来的事业还很大，还要管理世界一切的，假若各人都要得相当的报酬，那不又把社会弄到很不平等，有很多阶级吗？那我们就用不着改造现在不平等的社会了！我们既为改造社会而尽力，我们只知道牺牲，不知道权利，把自己心理洗刷得清清洁洁，然后不致做出违背主义的事情。他方也须把改造社会的步骤和现在外面的大势看清楚，然后在我们处置事情的时候，不致有手段上的错误。

还有些以为工人是无产阶级，办事情不应该有秩序，不应该有时间的限制，这种观念是很错误的。因为我们的组织不是只这样大就止了，将来组织还是极大的，将来的事业还极多极复杂的，假若现在不养成办事的秩序和守时刻，将来不会弄成一桶乱糟样吗？

还有，我们大家既是为改造社会努力，我们的心理就早应洗刷清洁，我们既同是很清洁又抱同一的主义，我们做起事来，当然会相同。其余对于私人的态度不好，意气不对，都是不成问题的小事，我们哪应该闹个人的小意见而妨害我们工作的进行和前途？上年有些工人领袖对于这种地方不十分明了，闹出很多个人意见的乱子，这是不应该的，是我们的过错。因为感情的意气不消除，于是彼此间就有些意外的猜疑，这种猜

疑是错误的，是危险的。望各工人领袖再不要做出这种错误来！

上面说的是各级代表——工人领袖——普遍的错点，现在分述如下：

（1）总代表：总代表在俱乐部及工友中所负责任很大，作事更多，在上年各处总代表大部分是努力尽责的。但有一共同的弊病，就是每次在俱乐部开会后，回去不将结果报告大家，以致弄成工友与俱乐部中间有很深的隔阂，这是总代表的错。工人代表——工人领袖——一面固替工友解决各种临时发生的事，但一面必须引导工人，训练工人，使工友有相当的明了，事事归于正轨。上年各总代表对于工人训练没有尽多大的力，这也是一个缺点。

（2）百代表：在上年俱乐部组织的系统上说来，百代表在会议上只有复决最高代表会提交案件及接受最高代表会议决案的报告。在办事系统上，负十代表责任与总代表接头。但上期百代表常因责任分析不清，不知自己所负的是那些十代表的责任，十代表也找不着自己的百代表，以致弄成百代表无事可做，若有若无，这是百代表不明了自己责任的错。

（3）十代表：十代表在俱乐部基本小组织——十人团——上面，负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十人团组织得好，十代表能尽责任，俱乐部的团体基础就稳固了。对于办事上极为灵敏，就是有人有不正当的行为或谋害俱乐部者，也很容易找出。上年俱乐部的十人团的组织，不十分坚固，职权和界限都分不大清楚，十代表除缴常月费外，其余都不负责，所以十人团根本的职能也不能做到，这是各十代表对于十人团的团结没有尽到力量。

部员：安源的工友——俱乐部员——在极残酷的压迫和剥

削之下作了二十余年的工作，大家的心里只知道作工伏受雇主们的欺侮，绝不想本身有团结反抗这种压迫的可能，绝不觉到能有这样的俱乐部来做拥护自己权利的武器。去年罢工胜利以后，事实已明明白白的在大家的面前表现，各工友都是出乎意外的打破从前一切的糊涂观念，很猛勇的趋向俱乐部这一线之光明。所以大家团结的能力，奋斗的精神，以及在罢工时能服从统一的指挥，都是极令人佩服的。就是从俱乐部经过各种危险，大家能够消除内部一切的纷争，专心对外，这点有阶级认识的事实，也是表现得清清楚楚。但是我们大家在这一年里面，也做出不少错误的事实和表现出许多错误的观念。

我们工人的组合，是一个极大的组合，全世界都要联成一气，并要组织得和军队一样，才能与那有坚固组织的资本阶级奋斗。我们哪里能够分出什么省别县界来呢？但我们在安源去年的事实上看来，还有些工友不能免掉这个观念，如认某桩事情是“排外”哪！“我们是这一帮的”，“他们是那一帮的”等话，都是同乡观念的表示。又如关于两省或两县工友的纷争及两段或两处工友的纷争，总是较难解决，彼此都要争个高低，不服这一口气。在平时这种有界限的纠葛，俱乐部也来得不少。以后我们大家都要努力消除这个观念，关于有界限的纷争，两方都应该特别谅解些，不要坚执，这样——俱乐部的大团体，才不致破裂！

大家组织俱乐部，固然是拥护我们的权利，减少对我们的压迫。工友受雇主或外界人无理的欺凌，俱乐部在可能范围以内，都是应该保护的，但我们俱乐部总不应该庇护工人不正当的过犯，或助长工人欺凌外人的威风。我们工友在去年以来有些以为“现在我们有了俱乐部保护，闯出祸来有俱乐部承肩”，于是就只凭自己的气愤，一意横行。这是何等的错误？如打张

万发铺店，与军警盘查所发生殴打的冲突，以及各个人在外面闹出各种不正当的乱子等，都是绝不应该的事实。当工人还没有能力支配社会的时候，我们大家应该极端明了，不要闹出这种问题，弄到外面的人，个个痛恨俱乐部，使自己生命一样的团体受危险。

我们安源俱乐部的力量虽大，但是还要靠着外面各地的工友联络，互相援助，才能立脚。所以我们有些事情，应看外面的形势如何，全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怎样才着手来办，我们不能只看安源工友的力量可以办到，就不顾一切的做起来。这种幼稚的毛病，盲目的奋斗，有些工友犯得很深。如遇事就要罢工，在此时就要减少工作时间等，都是这种幼稚病的表现。当中国这样幼稚的无产阶级，我们不能事事冒险直冲，使全部劳工运动受打击。

工人组织团体的目的极为远大！将来还是要管理世界一切的。增加工资，不过为争得目前很小的利益，使大家认识阶级的利害而结合团体的一种手段，绝对不是我们工人的目的。我们俱乐部第一步替大家做的事，固说是加工资，但是俱乐部绝对不是只加点工资就完了的，而且工资是绝对不能时常增加的。安源的工友有好些认为，增加工人工资就是俱乐部的目的，以为工资既已加了，就是目的达到了，俱乐部就抛到侧面去了；或者总望俱乐部怎样第二次普遍加我们的工钱；或者又要求普遍加工钱。这都是认俱乐部以加工资为职志的错误。还有些只知道加几个钱，其余一切什么“联合”、“训练”、“阶级争斗”等，都不关他的事，概不过问。这种错误的观念，实大足以妨碍团体前途远大的发展。望大家都认清自己阶级的地位和真实的目的，努力前进！

俱乐部在现在社会之下，为自己立脚起见，不得不与环境

稍加妥协，故他——俱乐部——在现社会的地位只是一个正式“公团”，他的职权只能行使在他的范围以内。他绝对不是一个“衙门”，不能受理或干涉社会上一切事情。有些工友误认俱乐部是“青天衙门”，什么事情都拉扯到俱乐部来办，范围以外的事情，都去干涉，呈文禀牒纷纷往俱乐部呈递。这种错误的认识，望各工友明了改掉。

罢工是工人的武器，不是好玩的，是对待敌人的，不是对待自己团体的。我们工友有些因要求不遂，即行部分的罢工，以为罢工随便可以举行；或者以罢工来对待俱乐部，这是怎样的错误？望各工友切不可轻于动武！不要拿武器杀自己家里的人！

我们大家都是工友，世界一家，是兄弟一样，应该怎样的互相亲爱、互相帮助？就是别人对我有点不好，也可原谅下去，总不要记仇记恨，不要闹起来打起来。但是我们工友有好些因一点小事便打得皮破血流，互争长短，到俱乐部来又要受罚、送警、开除。这是何等痛心的一回事呵！并还有工友不关自己的事，看见别人家闹乱子，无故暗地打伤别人。又有些因为闹乱子恐怕理由失败，便邀一些人来帮助，横直要争了这口气。如是就邀茶哪！结盟哪！为自己将来吵架有一伙人说话。此一帮，彼一派，到俱乐部来几天还扯不清楚。唉！我们大家都是兄弟一样，何必这样不能谅解！何必这样记仇记恨分成一些界限，使大家的团体不能结紧！上年俱乐部所办的事，工友争斗案件占一大半，请大家一看裁判委员会的报告，则我们工友之好争斗可想见了。俱乐部办事人因大部分的力量办了这些无益的纷争，反使很多重要的事不能办了。工友争斗的害处，真是说不尽！并还有许多危险。望各工友切要自己明了，不要争意气！不要记仇恨！不要打架！更不要无故打伤别人！大家

和和气气，亲亲爱爱，才是正理。

我们都是相信社会主义——工人的主义——才到安源来帮大家做事的，并且都是劳动组合书记部命令我们来做事的，我们绝对不是为名为利个人跑得来的，所以大家工友既相信我们做事是帮助大家，不致害大家，就应相信其他相信社会主义的人来做事也是帮助大家，不致害大家。大家不要相信某一个人，应该相信是社会主义者的人，应该相信劳动组合书记部派来的人都是一样的；倘使各工友只相信一个人，不找这个人的来历及为什么使大家相信，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一个人不能守着大家做几十年几百年的事。并且各工友还要相信自己团体是可信的可靠的，不能永远靠一个人的。望各工友相信社会主义者，相信自己的团体。

有了事情，俱乐部万余工友不能人人各干各的，必须有统一的指挥，有规则的动作，因为万余工友必须服从指挥才有办法。又俱乐部的议决案，总是顾及大局，顾全万余工友的，或者有少数工友有不得利益的地方，也应为大局的关系而服从。这样俱乐部才有办法。这点以前工友的精神甚好，但后来也有少数对于指挥上或议决案表示很难服从的样子，以为“谁也不要服从谁”，这是很大的很危险的错误。俱乐部是奋斗的营盘，大家要组织得和军队一样，应该要保存以前那种服从的精神。

我们既要组织团体——俱乐部，就要有人和地方来办事，既要人和地方办事，就要用费，这种用费要大家凑拢来，每人凑多少，就看用多少来决定。俱乐部要收常月费，也是这样一回事。若是大家不缴常月费，俱乐部就无从维持了。所以俱乐部规定对于三月不缴常月费的即行开除。但还有些工友把常月费拖欠的，或者私地瞒没不缴的，这都是无心保护团体，只要明白点的人都会知道是不对的。

我们痛苦，我们要增加工资，要减少压迫，但我们不能吃了饭不作工。“吃饭不作工”是我们社会主义最反对的。我们很多人作工，又不能不有一种系统和秩序，所以工厂也要一种正当的厂规。有些工友以为厂规是资本家订的，不管他正当与否，故意不守，工头职员在工作上正当的指挥，也故意不听，如是工头职员也落得不去干涉，大家不负责指挥。工友见工头职员不负责，以为没有人管他了，也效尤对工作不负责，偷懒起来，如是使出产及工人秩序均受很大的影响。这种错误我们也是有的。我们应该守正当的厂规，我们应该自治，保持自己的秩序，不要人家说我们的坏话。

我们每天作十多点钟的工，得了一点子工钱，身体是很疲倦的，生活是很困苦的，哪里有时间去赌去嫖！又哪里有钱去嫖去赌！嫖、赌，我们工友都不应该去做，而且种种作恶的缘因，都是赌、嫖，我们应该归正轨做各种发展的事业。有好些工友对于嫖赌仍是深好不改，这是极不对的！这种不良的习惯，堕落的嗜好，我们工友应切戒切戒！

俱乐部的敌人很多，他们都想方法来破坏俱乐部。他们时时刻刻到工友里面来放散谣言，以图扰乱俱乐部的秩序。工友常常有受这种谣言的引诱而蜂动，而怀疑俱乐部，或向俱乐部吵闹的。这种误会很危险。我们不要听信谣言，有事尽可正式来俱乐部很诚恳的质问。

无论什么人做事，不能够没有过错，做事越多，过错越多；但我们做事绝对不要怕错，绝对不要隐瞒自己的过错。因为过错越多，经验越多，下次就可以不再错了。俗话说的好：“错一事，长一智”，我们应该把这句话牢记着。俱乐部已经有了一年的历史了，这一年里面各人所经过的错误，我已用极诚实的态度将其大而易见的批评在上面，各位以为正确么？“往

者已矣，来犹可追”。我们应该虚张胸怀，把我们一年来所做出这些历史上错误的经验，一点点都灌了进去，努力革除，才不致辜负这一年的苦劳，才得以发展将来的事业。同志们！工友们！勉哉勉哉！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刘少奇论工人运动》刊印。

PDG

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

（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瞿　秋　白

落后的国家其无产阶级参加民权革命之职任愈大

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却须无产阶级领导方能胜利

平民之革命民权独裁制是中国到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

中国宗法社会的皇帝制度破败之后十二年，方才露出一些民权主义的可能性，然而已经处于世界社会革命的时代；中国"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的国家观念受枪炮、飞机、潜艇、新银行团的恐吓，方才烟消云散，想建立"民族国家"，然而欧美各大民族国家却已显然表露他们是"阶级国家"。中国民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开始，恰好在世界的民权主义和民族主义崩坏的时期。于是中国的社会思想和社会运动的倾向便有些"徘徊不定"不能自信的状况。实际生活要求民权主义，而思想的先驱却揭橥着社会主义、民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究竟哪一个要实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究竟哪一个能取得革命运动的领袖？

中国的"第三阶级"诚然不错，要求革命了；然而他的目

---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二期，原题为《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作者自编论文集时将标题改为《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对内容作了个别修改，并加了小标题。

标只限于民权主义，他的力量只能做“无血革命”。天下的革命有无血的么？中国的无产阶级，确是幼稚；然而他的目的必然在于社会主义，他的力量却能彻底的扫尽旧统治阶级。然而现在的统治阶级去了，社会主义便能实现么？天下的革命没有无血的，现在的统治阶级去了，社会主义也还不能实现。那么，无产阶级是否应当参加推翻现存统治阶级的运动，使无血的革命变成有血的呢？社会主义的实现是否有赖于这民权主义的革命运动呢？世界的社会革命对于中国的民权革命有何等影响，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究竟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

我们请细细的论一论这中国现时很迫切的问题。

一、无产阶级参加民权革命之天责

先从无产阶级之革命策略的总原则说起。

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职任应当依社会进化中之客观的可能和必要而确定。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制度，由于所谓“国民经济”之自然的发展而成，不管你心上喜欢不喜欢。况且只有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能生出社会主义来，只有他能造成社会主义公有生产资料之技术上的基础，只有他能造出数量多而觉悟深的革命无产阶级。没有受大工业大都市锻炼集合的普通劳动者，或简直是游民，只能“穷人造反”，而不能革命。没有集中的资本和生产，只能均分（抢掠）而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历史上穷人造反的实例很多，而丝毫社会主义亦没有看见，便是明证。要知道：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民权主义）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的种子才能开始萌动，那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才显然暴露。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同出发反对君主封建制度的时候，阶级矛盾不期然而然隐匿掩藏

不甚显露。在民权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之中，无产阶级方才有活动之自由及广泛的政治运动之可能，这是无产阶级的成熟及经验之必要的前提。因此，凡资产阶级社会还没成就的地方，“资产阶级还能做革命的进取”的地方，无产阶级应当和资产阶级联合而反对“君主诸侯及军阀”，同时亦就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建立资产阶级的社会；无产阶级最高的目的固然是社会主义，而达到社会主义的途径上，随时有切近的目标和利益，就是政治自由及经济改善。然而这种斗争之时，“务必时时刻刻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矛盾，确实深入于群众的意识”，又以备工人能利用资产阶级政治之下所发现的新式的社会政治关系，立刻就反对资产阶级。

马克思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初期曾经希望革命转向社会主义方面，然而他仍旧认政治斗争、结社自由、普通选举是必要的。他论德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时代（一八四八年）的责任说：

“实际上，既然工人独立的出发还没有基础，还没有直接普选的制度，大大小小三十六个国家还在分裂德国，这时候除出紧随巴黎运动之后（巴黎运动的胜败对于德国运动有生死的关系），在这个时候，除出与小资产阶级共同争政治权利（有这些权利再能行自己的斗争），此外无产阶级的政党还有什么可以做呢?”（《德国之革命与反革命》）

马克思自己在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之间断然实行上述的见解于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之中。他和恩格斯在德国革命初期，不到“资产阶级勉强发生只有口硬手软的市侩和绝对还没开通的工人”之柏林去，而到莱因省城科隆——那时是最开通的地方，已受法国革命的冲刷，旧国家的形式破坏，工业亦最发达，而资产阶级受新式社会生活的波动亦最甚。他们不像波尔恩等人（亦是共产主义联合会的会员）在这革命时期去专做所

谓“纯粹的工人运动”，却以全力来办一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极左派性质的机关报《新莱茵报》（罗兰霍尔斯德《论资产阶级革命中之马克思及无产阶级》）。马克思既然以无产阶级的观点考察得社会进化的公律，断定革命的进程是如此，所以先提出民权派各阶级的总利益以反对封建君主制度，而暂时不及于无产阶级的特别利益。马克思之所谓无产阶级赞助资产阶级革命，乃是利用时机推动资产阶级前进，即此突现革命运动中之最彻底最热烈的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的分子。资产阶级本来亦必定要提出普通平民的要求，而无产阶级的政党便当逼迫他实行到底，勿使中途让步。

所以无产阶级赞助资产阶级革命是为无产阶级自身的利益。可是这种赞助必定不能永久的。马克思以为“在某种程度之内各阶级的联合常常是革命所必要的先决条件”；然而等到革命开始进行，却亦就是阶级矛盾暴露的起点，革命进程愈速，阶级矛盾的爆发亦愈激厉。“共同的仇敌刚刚打倒，胜利的军营里，立刻就要分裂成几派，而重起相互的斗争”。（《德国之革命与反革命》）

所以等到革命的进行既已变动了局面，如一八四九年春天德国资产阶级的民权派已经不往前进而向后退，那时《新莱茵报》也便变更其策略，马克思等也就退出莱茵区民治委员会。于是开始预备革命行动的组织。结果反革命占胜利，《新莱茵报》被封，而德国革命也就失败了。

再则像一八四八年的法国革命。二月革命固然还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然而比起一七八九年及一八三〇年来已经大不相同。那两次无产阶级的出发必定在革命已到高度发展的时候，而这一次却在革命的最初期，无产阶级的特殊利益不期然而然即占了畸重的形势。六月之役无产阶级失败，那时“国内的阶

级战争”已经非常明显。然而一八五〇年春反革命地位渐稳而国内民权派各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及一切中等阶级又重新兴起要想与治者阶级反抗，而围拱“革命中心”的无产阶级。这一民权派的联盟反对那所谓“秩序党”，居然在三月选举时取得胜利。革命有重复前进的形势。可是，这时的封建阶级已经很弱，耐不起战斗，他们宁可让步，于是高等阶级得到让步的利益而退却，革命大受打击。高等阶级不但退却，而且用种种卑劣的手段反对“赤党”。

这种革命失败的原因乃在于经济的变动。一八四九年欧洲经济渐渐的兴盛起来，革命的潮流不期而缓和许多；其次，民众的政治知识虽经屡次的革命教育而还不能算成熟，所以那时国王背誓破坏普选而竟没有大反响。现时就大不同了！一九一七及一九一八年的俄德革命尤其给了不少教训。现时德国、法国无产阶级的政治程度，就是从那时参加普通的民权革命，经过长期的锻炼而得来的。可见虽失败而对于无产阶级还是有益的。

无产阶级方面固然受此训练，而资产阶级方面却亦有很大的影响。从一八四八年以来大致欧陆无产阶级的力量一天增加一天。即使君主政体还没推翻的地方，资产阶级亦已恐惧不宁，他们要革命，却又怕革命时政权被无产阶级夺去了。因此连资产阶级的革命都不能成功。然而无产阶级却利于这一革命早些爆发。社会结构进化的原则确要有资产阶级制度（民权主义）的发展，那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完全正当发展之必要的前提。因此往往无产阶级在此等国家内反成资产阶级革命之组织者指导者。大资产阶级愈弄愈胆小，而同时就是大资产阶级变成君主封建制度之政治的附庸，这种情形愈过愈明显，那时一切反对旧统治的毒恨都转移到大资产阶级身上，而可以不用大

资产阶级的掌握政权已经显然的暴露阶级矛盾。所以不论先进或落后的国家里，在封建军阀政治之下无产阶级必定参加或进行民权革命。可是愈落后的国家，他的无产阶级在民权革命中愈有势力，他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变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机会也愈多。

马克思说：

> "数量多而且集中强大的有知识的无产阶级之存在条件常常和那多而且又集中有力的资产阶级之存在条件同时并进的。资产阶级的各部分，尤其是他那进步的一部分，假使还没有取得政权而改组国家制度以应其需要，那时的工人阶级运动无论如何还不能成为独立的，而且不能有纯粹无产阶级的性质。只有资产阶级式的政治制度成立之后，工人与企业家之间的冲突才大大的发现，那时已经不能再推动资产阶级前进；那时资产阶级亦不能再拿好话来骗工人，满口答应而不实行；那时无产阶级的解放问题才完全明晰的暴露于全世界。"
>
> "无产阶级曾经参与这一反抗运动（一八四八年），他本来对于这一类的革命运动没有不参加的，他的希望不外两种：（一）或是这种运动能扫除行向社会革命及无产政权的道路中之几种障碍；（二）或是这种运动至少使势力较大而勇气较少的阶级行向更果决更革命的道路。工人拿着武器参加反抗运动的时候，明明白白的知道：这一次的斗争还不是为他自己的阶级利益；可是他在这时候唯一正当的策略，却是：假使高出于无产者的任何阶级（如一八四八年的资产阶级）不能给工人阶级以'为他自己利益而斗

争'的自由战场，那就无论如何不让这种阶级的统治得以稳固；并且无论如何都要引起政治危机，使全国非决然行向革命不可，否则索性回复旧统治的'不变状态'，使新革命不能免。两种假设之中，工人阶级都是真正的全国利益的代表，因为欧洲一切旧社会（各国）都应当及早革命，谁也不能想安安稳稳有条有理的发展自己的力量（假设真正如此，欧洲便是梦中事了！——译者注），而工人阶级却是真正诚意的在可能范围内促进革命的阶级。"（《德国之革命与反革命》）

二、民权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问题

无产阶级对待民权主义运动的态度和参与民权革命的方法，大概在原则上是如此。

现在我们再取现实社会进化中的实例作更详尽的说明。欧洲落后的国家，第一就算俄国。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时，离法德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已经百年五十年。俄国那时已经有二百三十五万七千八百人的无产阶级（五十人以下的小工厂不算在内——见托洛茨基之一九〇五年），而且有社会民主党，似乎可以直接行无产阶级革命了。何况实际上革命是社会民主党指导的，大多数罢工工人所参与的。然而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者无条件的断定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性质。"（列宁之《两个策略》）这是什么意思？原来那时的俄国，已经有民权主义的政治上经济上的改造之必要。这种改造运动不但还不足以表明是资本主义的崩败，资产阶级统治的崩败；而恰恰相反，正要有这类民权主义的政治经济的改革，才能扫清障碍，让俄国的

资本主义好好的发展，进于纯粹欧洲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永滞于亚洲式的半自给经济；有这种种改革才能使俄国有完全资产阶级式的统治。俄国社会革命党，俄国的农民党，自称为最激急的社会党，其实不懂社会主义，当时就不明白这层道理。因为他们不懂得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是什么。他们决不知道：就算农民暴动得了完全的胜利，田地完全均分过，或者干什么“农村立国”的鬼把戏，始终对于资本主义并无丝毫损伤，反而促动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发展，而农民之间自己便要受“阶级的分化”。民权主义的改革必然引导资本主义的发展。既然如此，或者有人可以说，无产阶级很可不必帮助民权革命了。那却不然！

民权革命之社会及经济的内容，本来就是资产阶级的，然而并不因此而对于无产阶级没有很大的利益。民权革命在形式上可以有好几种：也许在这种形式的民权革命中，大资本家及财阀可以得到很多的利益；也许在那种形式的民权革命中，却是农工平民可以得到很多的利益。

民权革命表示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虽然眼看得是革命，是暴动，反对上等人，反对资本家或帝国主义。然而这一革命不但不消灭资本主义的基础，而且扩充推广他的发展。民权革命不但代表劳工平民的利益，而且代表全资产阶级社会的利益。因此，既有资本主义，则资本主义之下，资产阶级之统治工人阶级是不可免的；所以可以说：民权革命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多，而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少。然而说民权革命绝对不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那却是蠢话。俄国社会思想发展的最早一期曾经有过这种论调，所谓“民粹主义”，他们以为无产阶级用不着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这种思想，往往可以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否认一切政治斗争，否认资产阶级的代议制，否认资

产阶级的革命。这种思想根本与科学的经济学相冲突：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免的，无论怎样不能禁止资产阶级的生长，要想跨过资产阶级立刻实现乌托邦是必不可能的事。马克思主义说：凡是一个社会，根据于商品经济而与文明的资本主义各国发生交易关系，到一定的程度他自己亦必定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俄国当初是如此，中国现在亦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绝对与非科学的民粹派或无政府派不同，决不想用什么手段跳过资本主义直接行社会主义；路只有一条，就在这一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就在这一资本主义的范围内，行阶级斗争。

马克思主义的这几层意思已经有一大部人类历史，如俄国、如印度、如埃及、如土耳其，足以证明是科学的公律。所以假使有种学说，要除出"更加发展资本主义"之手段而另求别法来救济工人，这种思想，自不免是反动的。列宁说得好："像俄国这种国家里的工人阶级，受资本主义本身的苦，实在比受'资本主义发展不透'的苦少。"（《两个策略》）工人阶级确利于资本主义有很广泛很自由很快的发展。工人阶级确利于很彻底的破坏一切旧制度旧习惯（如行会制度、艺徒制度、同乡观念、门阀观念等），因为旧制度是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障碍。民权革命就是这种彻底的改革，应当扫除一切旧迹和那便于军阀官僚营私舞弊的制度。

所以资产阶级的革命对于无产阶级也是很有利的。资产阶级革命愈彻底愈普遍，那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而与资产阶级的奋斗也愈有保证愈易开展。只有那班根本不懂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才听着这一结论诧异呢。因此，有的时候由某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革命也许对于无产阶级比对于资产阶级的利益更大些。资产阶级有时候很可以靠旧制度旧习惯来抵制无产阶级

（如西欧俄国当时的帝制政府，中国的军阀警察等）。资产阶级所以往往利于革命的不彻底，所谓："不为已甚，过犹不及。"向来欧美革命史里社会党和共产党往往论述到这类的事，习惯上总说：资产阶级自卖，他竟背弃"自由的原则"，或是：资产阶级不能行彻底的民权主义。事实上是一样的。资产阶级宁可使必须的资产民权主义的改革，也慢慢的进行，小心谨慎的用改良的手段，而不用革命的手段。资产阶级很愿意这些改革不促进平民农工等阶级之革命的独立性及建议力；因为假使如此，正像法国人的俗语，平民"掉过枪来"也来得容易，于资产阶级自身先就不利。所谓"掉过枪来"便是：民权革命的成功，使那些自由民主的机关及舆论集会的权利等等，都可以用来反对资产阶级自身。

至于工人阶级呢，却正利于民权主义的改革不以改良的手段实现，而以革命的手段。因为改良手段是使社会的腐败部分慢慢的烂掉。无产阶级及农民阶级正是受这"腐败社会"的苦最厉害的人，非得一刀把他割掉不可。革命的手段就是用果决的行动和群众的势力有组织有系统的努力扫除一切封建君主时代的遗迹。所以资产阶级革命的实现，若愈无组织系统、愈不集中、愈不彻底，则对于资产阶级的利益愈大；他若愈有组织系统、愈集中、愈彻底，则对于无产阶级及农民阶级，愈能多保证他们在民权革命中的利益。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无产阶级远避资产阶级革命或不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不是教无产阶级："因为革命是资产阶级的，就放任资产阶级，让他单独去干。"而是教无产阶级竭力引导革命到底并且全副精神的去参与，是教无产阶级："不要专守着经济斗争而要参加总的政治斗争，努力去争民权主义，争那最彻底的无产阶级的民权主义。"

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时，列宁说："我们不能跳出俄国革命之'资本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可是我们能够竭力去扩大这个范围；我们能够并且应当在这范围之内争无产阶级的利益，争他们生活里迫切的需要，争他们预备将来再战而能彻底胜利的条件。"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固然结果为反动所摧残，然而俄国无产阶级在此中得了不少政治上的教训——创立苏维埃制度。

无产阶级的政党因此必须参加民权革命的运动，当然要和资产阶级的政党发生关系，甚至于在革命潮流汹涌的时机，可以加入革命政府，在代议制范围扩大的时候，可以从事于选举运动。于是有些"洁身自好的社会改造家"，好一似黄花闺女、《柏舟》孀妇，要大叫起来："这不是要玷污我们无产阶级的'家声'吗，抛头露面的像个什么样子!"其实大谬不然。现今时代开通，男女社交已经司空见惯，难道社会改造家还做高节的隐士吗？无产阶级的参加民权革命，诚然有改良派化的危险，然而却并非不参加便能免祸的。

无产阶级政党参加民权革命运动能否不受资产阶级的恶化，并不在于某人某领袖要想投降资产阶级，亦并不在于党中某一派保存了形式上对于民权运动的"独立"。这种独立派，其实往往只是形式上的；不管他组织上怎么独立，而实际上因为政治标语落于实际生活之外：若不问政治便与群众脱离，若问政治往往又只是跟着群众已有的情绪移转，不能尽领导之责。因为若是当时社会只有民权革命的需要，那初入政治战场的群众，往往反而容易跟着"自由派"的模糊标语走；保持所谓"独立"的社会党尽着放空炮，实际上反使革命运动的领袖地位落于资产阶级之手。最后一着，这种独立派反而为资产阶级所恶化。所以这一问题的解决，完全在于各阶级之客观的现

实的社会力之消长：当时社会中的各阶级，各以实力参加总的革命运动，暂时亦许力量大的得到最近的胜利，力量小的却仍旧继续着往自己的目标走。无产阶级政党的责任便在于指示劳动群众以一定的合于实际生活的标语，实质上就已经决不会和资产阶级同化了。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标语可以同是一“民权主义”的形式，而他的经济内容却决不会同的。这种“标语的阶级实质”，只要会运用，自然能引导民权革命到底，造成社会革命的一切可能的条件。很用不着拼命的直叫：“我们要革命，不要改良，要社会主义，不要民权主义。”

譬如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那时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当只听好听的‘革命’字眼。我们应当考察切实，究竟反抗俄皇政府的有哪几个社会实力。……只有‘平民’，便是劳工和农民，乡村的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至于革命，却并不因此而失其资产阶级性，民权主义的改革决跳不出资产阶级式的社会经济关系之范围，然而这一革命对于俄国及世界之将来的发展实有非常之重大的意义。”（《两个策略》）

无产阶级运动处于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期间。往往可以有两派似是而非的倾向：一、乱叫社会革命；二、只管经济斗争。我们再举俄国的实例：

“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二年的运动离现在还不十分远呢，并不是什么古代神话（列宁写这段文章正在一九〇五年）。那时示威运动刚刚开始。‘庸俗的革命主义派’就大叫起‘猛烈攻击’来，发布血色传单（《劳工事业报》，当时少数派的机关），骂那提议创办全俄宣传日报的人（列宁等），说他们是文学迷、学究派。而那所谓‘尾巴主义派’——专门只跟着群众或别的政党后面叫，不是迁就庸众，就是迁就自由派——却又竭力主张：‘经济斗争是政治宣传的最好的手段。’那时真正革

命的社会民主党（多数派）怎样对待他们呢？他两方面都反对，他反对庸俗的革命主义派，因为这一派的确是轻躁妄动——所谓‘猛烈攻击’和群众的公开的出发明明还是将来的事。他亦反对‘尾巴主义’，因为这一派确是假清高怕多事，喜欢在小范围内当领袖而实际上没有政治能力。他那时所决然提出的，就是全体平民暴动反抗的标语；可还不是直接号召行动的意思，而仅是宣传的意思，说明客观上必然的结论是要平民反抗。那时宣传和鼓动的确是第一等重要的责任，那时全俄的《政治评论周报》还算是很难能的事……”“庸俗的革命主义派不懂得‘文字’（宣传），也是‘实事’。总观历史的全部都是如此，尤其是在公开的群众政治运动不可能的时代，本来群众的政治运动不是人力可以任意制造的。‘尾巴主义派’却又不懂得当革命时机临头，便不能再死守着旧‘文字’，而应当有直接行向‘实事’的标语。”（《两个策略》）

这两派都是真革命运动的障碍。

再则，还有小资产阶级误解民权主义为放任主义的一派，亦很足以危及革命。凡是革命的成功，必不可少的革命的独裁制；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是社会主义的独裁制，在无产阶级参加资产阶级革命时便是民权主义的独裁制。孙中山的“军政时期”确与此意有些暗合。然而革命的独裁必定要求社会某一方面的巨大牺牲，所以非有民众的实力后盾不可，不然就变成个人专制。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正须得此政治机会，以促进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的途程。

“平民之革命民主的独裁制”，是民权革命中最近的目标。或者，如香港《南华晨报》（英文）对于中国各公团（商会、工会、学生会）召集国民会议的提议之批评，说这是水与油混合的药方。固然，真可以说：所谓“独裁制”必须有“统一的

意志”，而无产阶级和其他的平民不能有“统一的意志”。这一驳议其实并无价值，因为他抽象的形而上的来引用“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有种种不同的“统一的意志”。可以有各方面完全相合的统一意志，亦可以有一方面统一而别方面不统一的。对于社会主义不能有同一的意向，而对于民主政权及共和主义却可以有统一的意志的。假使不记得这一层，那便是不明白民权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逻辑上历史上的差别；那便是忘记了民权革命是有全民的意义的：革命既是“全民的”，就有统一的意志在。民权主义的要求以外，当然无产阶级与农民资产阶级更不能有什么统一意志。所以无产阶级在革命期间，尽可以执此统一意志要求严厉的克服反革命——就是平民的革命独裁制。

无产阶级应当引导最大多数的农民小商，行民权革命到底，而以严厉手段镇服君主派或军阀派的反动，并且遏制资产阶级的畏怯妥协。无产阶级应当引导大多数半无产阶级的分子，成就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而以严厉手段镇服资产阶级的反动，并且遏制农民及小资产阶级的畏怯不前。

无产阶级的斗争是为着全体平民的。封建军阀之下首先要的是平民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资产阶级滥用“平民”一词，空泛的说平民而掩藏着平民里面的阶级对抗性。马克思主义断然的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之阶级的独立。然而他分“平民”为“阶级”，并非为着使这先进阶级闭关自守只于工会运动，而让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单独发展；而是为着要使无产阶级以最大的毅力为全体平民的事业而奋斗，领导全体平民。当然不是在某某委员会里占着几把交椅，就算得了领导权；而要组织群众以实力表示无产阶级在政治中的影响。

民权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俄国民粹派的“平民均分土

地主义”，中国国民党的所谓“民生主义”亦是资产阶级的。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知道：没有别的途径可以使无产阶级得到真正的自由，只有经过资产阶级的自由和资产阶级的进步。我们应当知道：在封建军阀之下没有别的方法行向社会主义，只有完全的政治自由，民权主义的共和国，平民的革命独裁制。所以无产阶级在这种时代，当有正确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关系，这件事非常之重要；经济斗争的工会运动固然要紧，而尤其要注意民权主义的总的政治斗争，“我们应当做‘平民使者’而不应当仅仅做‘工会书记’。必定要如此，方才能尽无产阶级的天责。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产儿，亦就是颠覆资产阶级社会的健将；他的力量，正在他阶级意识明显，并且有组织有系统的奋起而为政治斗争之时。

“阶级的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输入工人阶级，就是在经济斗争之外，在工人对工厂主的关系之外。此种知识所由来的地方，乃是各阶级对于国家政府的关系，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所以对于‘怎样为工人求得政治知识’的问题，决不能像普通的实际运动家（更不用说偏向于‘经济斗争主义’的实际运动家）永久只有一个答复：‘往工人间去’、要予工人以政治知识，社会民主派（共产派）应当往各阶级间去，应当派遣自己军队到各方面去。……试举一个最近几年的社会民主派（共产派）的机关，看一看他的工作。他‘和工人有联络’，就此自以为满足了，只知道发发传单，专说工厂中的虐待，政府帮资本家，警察的凶横；和工人开会谈话，大致也不过谈这些事，几乎绝对不出此等范围；至于讨论研究革命运动史，俄国内政外交问题，俄国西欧各阶级在现代社会中之状况及现代社会的经济进化等，则可以算绝无仅有；更不用说有系统的实行扩充对于各阶级的联络关系，那更梦想也想不到。实际上大多数此

等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里的党员，只想着应当做一个工会书记，而并非一个社会党员——政治的领袖。其实英国的工会书记，亦在时时帮着工人行经济斗争，揭发工厂里的恶弊，解释一切法律规则的不公道，说明此等法律妨碍罢工自由及工人纠察队的职权，说穿罢工调和人的偏心等等。总之，凡是工会书记亦在帮助工人做‘反对东家及政府的’经济斗争。可是这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民主派不应当仅是‘工会书记’而要是‘平民使者’，应当：对于一切压迫和专制，不论他是关于哪一阶级的，都加以攻击；汇合一切现象而予人以警察、政府、富豪、地主之残暴的总概念；利用每一件‘小事’，证明自己的社会主义见解和民权主义要求之正确于人人之前；对于一切人和每个人解释明白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有世界的历史的意义……

“‘往各阶级间去’，我们是以理论家的资格，是以宣传鼓动家的资格，是以组织者的资格。自然，最重要的是平民的各阶级间的宣传和鼓动。……谁实际上忘了‘共产主义派赞助一切革命运动’，谁忘了我们应当在全体平民之前，既不隐藏我们社会主义的见解，又要明白指出民权主义的总责任，那人便不是社会民主党（共产党）。谁实际上忘了自己应当在人人之先提出激动并解决一切民权主义的总问题，那人亦不是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列宁之《怎么办》，一九〇二年）

三、中国国民革命与世界社会革命合流直达社会主义

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的革命策略应当如此的去实际应用。中国现时的状况究竟在社会进化史上占何等阶段，社会运

动的趋势和民权革命的方向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又怎样呢？

“中国十二年前的暴乱，近因起于国内两个新兴阶级争取统治者的地位：一、军阀阶级（财阀政客附），二、商业资产阶级。中国商人阶级不能如英法当年，由商业资本直进于工业资本以组织生产，他们为数不多，经济力为列强资本主义所掩，所以辛亥革命时他刚一抬起头，就受北洋军阀的当头棒击。治者阶级实际上已是军阀；然而军阀一则始终见此隐隐中的资产阶级力量，二则内部之间无力统一，三则现代中国处于文明的外国人监视之下，四则‘官僚资本家式’的军师（政客）要有新的运用方法，所以必需国会，以便涂饰耳目巧于操纵”。因而有此畸形的“民国”，其实还在封建宗法社会时代。

虽然，“中国经济生活的现状，却已经渐出于商业资本的阶段（欧战的影响很大）。所以近年来最大的现象：海员罢工、铁路罢工、矿山罢工、纺纱业罢工以及其他罢工，工人已渐团结，积极组织；亦自然趋于运用自力争取立法权、政治权，要求最普遍的代议制”。资产阶级更大有进展，起而要求裁兵、理财、制宪，试组织“民治委员会”。可见“中国……政治运动之中已有资产阶级民权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劳动运动混流并进的现象，这是中国国际经济地位使然。中国工业发达的途径与欧美大异，政治运动也必不同（民权与社会两革命间的进程紧凑得多）。中国资产阶级要自力发展，非去军阀不可，非去帝国主义不可。然欲去此二者，则必须借重中国的劳动平民及世界的无产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亦就非对社会主义让步不可”。（参看瞿秋白之《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前锋》第一期）

虽然，我们考察中国经济政治现状所能下的断语，仅仅是：“中国已渐进于资本主义而需要民权主义的改革。”至于本国资本主义的程度，是否已经发达到成就社会革命的物质基础

的阶段，那却还待考虑。并不因为中国革命运动或所谓新思想带着一些社会主义色彩，便足以证明现时所需要的革命是社会主义的。

中国实业虽受外国压迫，而五十年来确不能说没有进步。帝国主义当然要变中国成资本主义的而完全破灭中国原来的“半自然经济”。即使帝国主义能行妥协手段而缓和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排外性，然而因此而实业又进一步；或者外资直接经营实业于中国境内，以至于和中国人合办，实际上夺去中国资产阶级的地位，然而实业因此亦有一更大的进步；在中国境内（在此一经济区域内）而有实业发展，则必要求更宽泛的市场，因此中国内地之资本主义化的速度愈增，外资愈侵入，中国资产阶级在此经济机体内愈膨胀愈深入；外国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缓和了这一部分，又“培植”了那一部分，再缓和了那一部分，又激起了第三部分。帝国主义的经济上的让步是有限度的，若无限度他便不是帝国主义了。因此，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无论如何，确在一天紧迫一天。

譬如中国绸缎之输出，光绪二年（一八七六）为四百万余海关两，至民国九年（一九二〇）便已涨到二千八百万。中国矿产物之需要，在五十年前为二千五百余万两，至最近便已达二万二千八百万，差不多增加十倍。中国境内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这一发展前面有非常之巨大的障碍物。军阀制度沿袭皇帝对商人的政策而变本加厉：重征暴敛，就地筹饷；更加以争城夺地，内乱不息。不但如此，更有类似于英法当年的“贵族与市侩”之争：“今之政客、军人失势则办工厂，曰吾将以实业救国也；既办厂矣，朝开会，暮投机，明日又为官，工厂遂为传舍。”（杨铨[1]：《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这确是扰乱市

场的大害，然而也是不可免的经济斗争，不可免的军阀官僚之资产阶级化。中国的市侩又怎么办呢？他们但“愿吾国之工业家专心本业，尤愿吾国军政界之伟人，勤修己职，勿污工业界之干净土。……振兴工业之道亦至简：（一）政府与工业当合作，凡妨碍工业之法令制度当皆革除；（二）工业组织当大，则资本与人才皆可经济，而得多所制造之益；（三）当多设制造机械之厂；机器为工业最要之资本，故孙中山有机器借款之议。然中国本有煤铁，与其仰人供给，不如退而自造，仅购基本之机械，即可源源供给各业之需要”。（同上）这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梦想。理财、制宪、裁兵及民治委员会的尝试又是个什么味儿？哼！美国公使休门尚且教训你们说商人当自组政府。颠覆军阀的民权革命始终是不可免的。

复次，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还有一个更大的障碍。我们看：（一）“一九一六年以后吾国之棉织业遂呈空前之活跃……至一九二一年底，全国共有纱锭三，二六六，六六六枚，计华商一百三十四万枚，日商八十六万七千枚，英商二十五万九千枚，其余未开车者一百三十万枚……”（穆湘玥之《中国棉织业发达史》）外国人在中国棉织业中占二分之一的势力。（二）最近几年（一九一八）中国铁的产额约共三五五，〇〇〇吨；而日本之山东金岭镇铁矿，二十一条所要求的奉天海城等地铁矿，奉天庙儿沟中日“合办”的铁矿，总共的产额就是三三六，五六一吨；简直是全数，至于汉冶萍等的“官办”、“借款”式以及其他形式的铁矿（亦大半是外国资本家的），所产有限。（三）最近几年煤的产额约共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吨；而日本之奉天抚顺及山东淄川、中英“合办”之开滦等煤矿，所产却有九，九一八，八六三吨；几乎占二分之一。中国自己还打算制造机器，岂不是笑话！中国的资产阶级对这有什么办

法？他只知道“今者，关税已有修改之机会，各国对于中国通商之待遇亦将渐趋平等；此正吾人发展国外贸易之日，工业革新不容更缓，自动发展时期之后若继之以通国合作，吾知中国工业史上之黄金时代，不难立致也”。（杨铨）唉！临城案时留华美侨已经主张撤销华会优待条件；临城案后铁路共管问题已经紧迫万分；等到“中国各要地都驻外兵”（美侨主张），等到“美国派委员会来替中国组织政府”、整理财政（《密勒氏评论》），那时关税虽增加，于中国还有什么利益？那时难道还有中国？人家筷子头上落下来的骨头，不是好吃的；吃了就要套上嘴套系上链条的。独立、自由、平等，都要自己化气力去争。那颠覆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实实在在是必须的。

中国的现状约略如此。解决这中国问题的主张，最近几年随欧战而兴的“新文化运动”里约略可以分为三派：一、绅士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二、小资产阶级的浪漫革命主义；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共产派）。

虽然主张的人亦许事过遗忘，而我们研究的是社会现象，不管个人。现时明明还是可以看见社会之中隐隐有此三种心理。

第一派的心理，可以看两年前张东荪、梁任公[2]等人驳社会主义的论调。当时虽是东荪发难，而实是任公综合这派的见解（一九二一年梁任公《复东荪书论社会主义》）。他的意思：一、“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能使多数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盖我虽将国内资产均之又均，若五雀六燕铢黍罔失其平，而我社会向上之效终茫如捕风。……故吾以为在今日之中国而言社会主义运动，有一公例当严守焉，曰：‘在奖励生产的范围内为分配平均之运动’”。二、“欲行社会主义必须先以国内有许多现行之生产机关为前提”。三、“中国生产事业若有

一线之转机，则主其事者，什九仍属于将本求利者流，吾辈若祝祷彼辈之失败耶？则无异自诅咒本国之生产事业以助外国资本家张目”。四、“惟当设法使彼辈（资本家）有深切著名之觉悟，知剩余利益断不容全部掠夺，掠夺太过必生反动，非彼辈之福。对于劳动者生计之培养，体力之爱惜，知识之给与，皆须十分注意”。五、所以“第一灌输工人以相当之知识，第二助长其组织力。先向彼辈切身利害之事入手试办一两件（如疾病保险等），办有成效，彼辈自感觉相扶相助之有实益，感觉有团体的好处，则真正之工会可以成立”。任公末后居然说：“谋劳动团体之产生发育强立，以为对全世界资本阶级最后决胜之准备。”然而他主张对于资本家之“取偿较优亦可姑容”；他主张的社会政策，原是因为“生反动非彼辈（资本家）之福”；他主张不要逼迫中国资本家“助外国资本家张目”。可见他完全站在士绅资产阶级观点上来论社会主义。他的社会政策以至于工会运动无非是喂猪的食料，人要吃猪，当然愿意喂肥再吃。他的意思是说：“我只要你们工人容许这‘在奖励生产范围内’一条件；我们资本家当然来行些社会政策，使国内有生产事业，将来可以交给你们（?），现在且慢；至于要国家来办亦可以，只要你们不助外国资本家张目，暂时让我们多剥削些罢。”而他偏要“冀普天下同主义之人有以教之”，他实以分配平均为社会主义。不知道谁和他同主义！他的平均分配及社会政策只可以算得“喂猪的社会主义”。梁任公以唤醒资产阶级觉悟自任，与我们劳动者或游民何与！无业的平民只知道自己组织起来，以革命的力量要求应得的权利；劳动没有生产机关，我们就要求他有，没收军阀来办工厂。无所谓奖励生产。我们穷无所之，奖励什么生产。关心奖励生产，自有人在，如梁任公——士绅资产阶级的代表。劳动者和无产阶级只知道积

极为群众的政治经济运动。既然要我们做工，当然你们便该给我们优越的劳动条件，优越了再优越一直到政权交给我们。什么叫妨害中国生产？要赚钱的资本家为什么不看见军阀和帝国主义妨害中国生产？我们只知道以革命的手段逼得资本家推覆军阀等等，劳动运动所取于资本家的，资本家当取偿于列强及军阀，不应当反来请我们姑容！我们无产者怎样有姑容你们大人的资格？罪过罪过了！

总之，中国的民权民族的革命运动（国民革命），万不是和平的“试办一二件”的方法所能了事。必须以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见解及手段来行。中国资产阶级的觉悟亦要在这实际运动里才能发生。何况他非受无产阶级的促进不能举步。中国军阀及列强存在一日，便一日不容你“试办”；资本主义都不能十分容你试办，何况社会主义。革命貌似破坏，而实是彻底廓清旧社会，开新社会建设之门。英、法资产阶级的革命如此，到一八四八年的德、奥、匈，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亦是如此：革命之后即开一生产力发展之长时期。现代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更是如此。任公派的猥琐怯懦正足以证实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他的社会政策正是瞿秋白所谓对社会主义之让步——对无产阶级的让步，目的仅在于保证资本主义的安全发展。因为中国资产阶级之“社会的下意识”早已觉得：只有唐山矿工、太平洋中国海员、京汉路工、上海纺织工敢于直接行动，以及最近长沙之五六万劳动平民的国民外交委员会，能外慑日本且内夺赵恒惕之胆；只有真正的劳动平民能行国民革命。

虽然，中国的国民革命，却并不因此而失其资产阶级的性质，这一层应当非常之注意的。

现在要说那第二派的心理了。第二派的解决法，大致说中国要社会主义，从完全否认政治运动起到相对非难民权运动

止，其中阶段非常之多。然而最主要的就是：（一）以为现在社会主义时髦，是“理论上之极致”。（二）或者是宗教式的信仰抽象而不着边际的“无产阶级”。假使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从精密的社会科学来运用他的策略，竭力参加民权革命并组织一切劳动者及平民，他们就说：“那就要这些国民党都变成社会主义者才行”，或者简直说：“那么，这一党是失节了。”其他种种无政府派的论调，大致相仿佛。那前一种的代表便是《努力》（六十六期时）的高一涵，后一种的代表可以随手推举《今日》杂志（二卷四号）的初民[3]（虽然今日之初民已非那一《今日》之初民了，他最近在《努力》六十六期已是另一主张。可是他个人不成问题，中国社会思想中现时确还存在这种心理）。这第二派的两种心理可以并合批评。如高一涵的意见是：国民运动是好的，可是必须是单纯的社会主义的国民运动。他说“要国民党自身完全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殊不知道，中国现时需要国民运动的真正国民党，正因为没有发生可以公开的社会党；而且必须有民族民权主义的广大联合战线。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还很浅，当然没有大生产中之纯粹无产阶级（参看《前锋》杂志第一期瞿秋白及我的文章）。俄国发生小小的一个社会主义团体——五六个人的劳动解放社，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女士等的组织，时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那时俄国集中的工业资本已经有五万四千一百万卢布；他们那时的社会主义运动，尚且还只是参加民权运动，宣传学理和指导工会组织，绝不能称政党。社会主义的政党，必定要能明显的拿着主义的旗帜走入劳动群众，而不为群众所诧怪；必定要能对于日常政治生活次次提出社会主义的解决法，而不为群众所不了解。而那时俄国并不单因为政府压迫，而因为资本主义改组社会生活的火候还没到：虽有许多工人，而都是刚

从农村来的，或尚未完全失私产，或方失私产而求恢复之心甚殷；他们不诧怪而能了解社会主义的运动之心理的物质基础还没有筑就；所以那时俄国社会运动发展之限度还只到民权主义之最左翼的地位（汪尔洛夫斯基之《俄国马克思主义史略》）。中国现时工业资本仅仅一〇八，九〇二，八一一元（一九一八年），约比俄国当年少四万万元，仅有其五分之一。不但如此，俄国一八九七至一九〇五年间，资本主义发展已大进步，纯粹工人有二百余万，工业资本已达十八万万一千六百万卢布，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已经成立而稳固，那时列宁尚且说："往各阶级间去……做总民权主义的革命运动。"中国现时真正的社会党（共产党）并非仅仅代表国内六十一万的工业无产阶级而存在的（这普通工人数是一九一五年的统计，现在至多不过一百二三十万）。假使仅仅有此，他早已不存在了。他的能存在，乃是因为中国无产阶级所处的时代是世界革命的时代，全世界无产阶级已经开始征取政权，他不得不赞助各殖民地的国民运动，尤其是辅翼其幼稚的无产阶级，以行世界的扑灭帝国主义的总斗争。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在世界的斗争范围之中，与国际无产阶级同具最终的共产主义目的，所不同的是斗争方法。先进国是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以至于劳工独裁制，中国是国民运动联合战线以至于革命独裁制，然后再进。中国一千万人的手工业劳动者，四千二百万户的农民劳动者之中的一百二三十万无产阶级，在中国的斗争范围中，与普通所谓"平民"同有民权革命的需要，所不同的是目标。资产阶级是要法律上的平等，无产阶级是要事实上的平等——最彻底的民权主义，所以中国有无产阶级政党自有其独立的政治主张。并非采取了白纸黑字的理论就算社会主义的政党，没有物质基础及实际运动是不能凭空造的。至于国民党尤其不能变成社会党；真

社会党在中国尚且只能以世界共产党支部的资格勉力栽培无产阶级之组织及训练的根本，而同时在总的民权运动中勉力做主干。何况国民党历史上就是纯粹的民族主义的政党，那时的所谓民生、民权主义都只是“富强”——资本主义发展——的手段，看孙文《建国方略》便可了然。他说民主共和是他教小孩子似的教中国国民的功课，原来并非中国平民真要民权，而他代表这种心理来抗争的，乃是因为要“富强”非共和不可。直到五四运动之后，国民党才渐渐接近民众，接近那真正要自由的学生会，真正要平等的海员工会等等。国民党到现今方才开始走上民权主义的路，渐渐想代表平民群众而抗争，行真革命；以前是浪漫的革命的政党，首领制个人主义的义侠策略，哥老、同盟会的祖传，如此而已。现今国民党所以能有如此的大概的倾向，也只是因为社会中实际上有了学生、工人、商民等的运动，“社会的物质”已经稍有端倪。然而至今他的根本观念还是在政治清明、国家富强而已；同时一方面，宣誓“维世界之和平”，这不是对帝国主义的畏怯，便是对社会主义的让步。可见仍不离一种“民族的资产阶级”的意识，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价值，也不过如此。

既然这样，国民革命的真国民党是现时实际生活所需要的，却还不是社会主义。然在此总运动中，只有以世界无产阶级的观点为根据立刻实行的政党，才能用社会主义的见解及运动方法来促进这一国民运动，或者简直改造国民党，同时这亦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正确的策略。

于是可以说第三派了，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

中国客观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其国际地位，实在要求资产阶级式的革命；同时此种绝对资产阶级性的所谓“民族民权革命”却非借重国际的及国内的无产阶级不可。独有无产阶级能

为直接行动，能彻底革命，扫除中国资本主义的两大障碍；就是以劳工阶级的方法行国民革命。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劳工阶级的最后目标在社会主义，那么，到国民革命的最高度，很可以与世界革命合流而直达社会主义。然而现时真正共产派的运动在中国亦不过是“雅各宾”最彻底的最左的民权主义运动。大概而论，要劳工阶级真正彻底觉悟资产阶级假民权主义的不可信，决不是几本书可以办到，而必须实际普遍的政治经验——小孩子不烫手总是要弄火，而且应当弄一弄火，至少也要远远的试一试火的热性——那时群众意识再能实实在在进而求无产阶级的独裁制。劳工群众应当参加国民革命，第一，就是要拿“雅各宾”的方法加速革命的过程；第二，就是实际上去感受资产阶级革命之不彻底（不完全反对列强及军阀到底）；第三，就是在这运动之中无产阶级能得必须的政治知识及经验，增高一般的程度。

所以参加并促进国民革命，是现在中国无产阶级的职任，在原则上、在实际应用上、在国内政治经济上都是绝无疑义的。既然应当促进国民革命，便当有国民革命的中心。列宁说：“我们应当组织反对政府的一切势力成一全民的运动。……这样去实行各方面的政治鼓动。应当有一个政党，能结合一切攻击政府的‘军队’成一统一的集中的中心，以全体平民的名义去斗争。再则，实行那无产阶级之革命的训练工夫，一方面严格的保存政治独立，并领导劳工阶级的经济斗争；别方面利用一切剥削者与受剥削者之自然冲突（剥削者本来日益替我们“拉拢”新的各种无产阶级分子）。凡是这些工作都要集中于不可分的统一行动。”（《怎么办》）中国国民运动的主干，亦应当如此，并应当由此主干扩大国民运动的中心，

那时势力才能凝聚。

然而要造成运动的中心，必定要用社会已经有的实力。我们理想一个乌托邦是幻想，理想一个“理想的国民党”亦是幻想。中国现存的国民党，因其宗法社会的出身，旧历史的关系，军事崇拜的习惯，中国旧式下等阶级的会党遗传等等，他所有不良的地方也是自然的现象。他当时亦的确只能如此，而且正唯因为如此而能行一部分历史使命。与他同时的其余一切维新派，却因完全是上等社会式的，而绝无革命性。只有国民党能秉此革命性而适应进化。可见中国现有的革命材料，旧的只有国民党，新的尚未集中。所以只能，并且十分应当适合现时社会的动向，就现有的材料努力改造，集中实际生活所涌出的一切新的革命派分子于此党。况且时过境迁，国民党以前的不纯分子，当然要在淘汰之列，不过应当就在集合新分子的过程中。因为我们“年纪也大了”，既要组织政党也可以不像以前那样“儿戏”了，什么罚咒打手印等；我们现在必定要有明切的政治主张来号召，不纯分子的行动如不能与之适合，就立刻请去。于是劳农派在国民运动之中的基础，亦就因此而凝聚起来。换句话说，便是根据于现时实际经济动向而改造国民党，使从模糊的革命主义进于真正的民权革命及民族革命主义。那时的国民党方才能做国民运动的中心。

如此的去造成国民运动的中心。正因我们参与其事，我们阶级的政治独立性便亦建立，而得日趋巩固。在这运动的急速的过程里和社会经济的动向中，“阶级利益”必定渐渐突显。到那个时候，即使仅仅是国民党左翼的分子，亦就很可以勇往直前，走上他们所应当走的路。何况无产阶级呢！

中国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此的去参加民权主义的群众政治总运动，并指导劳工阶级的经济运动，绝不使政治经济相

离，他那时必定能成群众的政党。那时简直实现对等的联合战线。可是这种群众党的基础，正要筑在国民运动中。

于这一过程中，世界的社会革命同时必努力提携中国的国民运动；中国国民运动里的最大多数的社会力量因之可以急速的长成，而与世界社会革命结合。

不论这中间要经多少波折，革命与反革命互相激荡，而结果那最终的胜利必定在世界及国内的无产阶级。

所以现时必定要：

"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同时我们特别的工作，须努力促成全国总工会之独立的组织，从事于经济的及政治的斗争。我们须努力引导劳动群众由日常生活的斗争到政治的斗争。目前政治的斗争，自然是国民运动——排除外力及军阀的运动；因此，在劳动群众中须有大规模的国民运动宣传，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同时凡已了解国民革命之必要更进而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当尽量加入我们自己的组织；并当于群众中普遍的宣传'国民运动里拥护劳动阶级利益的目的'。"（陈独秀之《论国民运动及国民党》）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
《瞿秋白选集》刊印。

注　释

〔1〕即杨杏佛。
〔2〕即梁启超。
〔3〕即邓初民。

PDG

《中国青年》发刊词

（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日）

政治太黑暗了，教育太腐败了，衰老沉寂的中国像是不可救药了。

但是我们常听见青年界的呼喊，常看见青年界的活动。

许多人都相信中国的唯一希望，便要靠这些还勃勃有生气的青年。

只是可惜风习的熏染太厉害了，魔鬼的诱探太有力量了。志行薄弱的父兄，脑筋昏乱的师友，一天对他要说许多似是而非的话，亦要劝他做出许多败坏操守的行为，所以许多青年每每仍是不能保持他自己的纯洁，而为万恶社会所同化。

亦有一些青年，幸而能不为那种父兄师友所愚惑，但是他们又因自己品性才学的有些缺欠，而在社会上得不着指导他们纠正他们的人，所以他们常常苦于不知应当怎样做事，以及他们做的事不知应当怎样改良。

我们必须为青年的这种需要，供给他们一种忠实的友谊的刊物。这便是我们刊行《中国青年》的意思。

《中国青年》要引导一般青年到活动的路上，要介绍一些活动的方法，亦要陈述一些由活动所得的教训。中国的事，总是要做的。做事的方法，总是要学的。青年要学得做事，要用做事以学做事。青年是需要读书的，要读指导怎样做事的那些

书，但是同时要做事。只愿读书而不做事的人，纵然把指导做事的知识学到手中了，他会失了他做事的习惯。

《中国青年》要引导一般青年到强健的路上。要介绍一些强健伟人的事绩与言论，亦要用种种可以警惕青年的材料，以洗刷青年苟且偷懒的恶弊。中国希望她的国民都能尽他的责任。中国需要强健的国民，只有强健能救拔我们于习俗之中。只有强健能使我们避去魔鬼的诱探。只有强健能打倒一切魔鬼，为中国前途开一个新纪元。

《中国青年》要引导一般青年到切实的路上。要介绍一些切实可供研究的参考材料。要帮助青年去得一些切近合用，然而在学校中不容易得着的知识。中国的青年，已经显然可见其必须担负指导群众的责任。所以他们必须自己对于要走的路很有些把握。虚骄的浮夸，不是中国所需要的。中国的青年，必须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才好。

这个对于《中国青年》的期望或者太大了，不是本社同人力量所能做得到的。但是本社同人总当勉力的向这一方面做，而且亦诚意的要求阅者诸君，大家要给我们一些仁爱的帮助，以补我们的不周到地方。

根据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一期刊印。

PDG

社会主义释疑*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李　大　钊

今天是苏维埃俄罗斯革命成功的六周纪念日，又是本校的“社会问题研究会”的成立日，所以我在此要与诸位作几句谈话。

现在社会上有许多人，对于社会主义不明白，有许多怀疑地方。这种怀疑，实在是社会主义进行上之极大障碍。现在所要说的，就是要解释这几种怀疑。

一、社会上有些人，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是穷苦的，不是享福的，因此他起来反对社会主义。不知道在资本制度之下，我们永远不会享福，不会安逸；能够安逸享福的，惟独那少数的资本家。资本主义制度能使社会破产，使经济恐慌和贫乏，能使大多数的人民变为劳动无产阶级，而供奉那少数的资本家。社会上到了大多数是穷的，而那少数的富人也就不能永久保有他的富了。

社会主义就是应运而生的起来改造这样社会，而实现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社会主义是使生产品为有计划的增值，为极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产的方法。这样一来，能够使我们人人

* 本文是李大钊在上海大学社会问题研究会上的演讲，原载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

照这样看来，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

二、有些人以为社会主义制度成立之后，人民就要发生怠工的现象，因此他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施行。他不知道在社会主义制度底下做工，是很愉快的，很舒服的，并不像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作，非常劳苦，同那牛马一样，得不到一点人生的乐趣。从前乌托邦派托莫斯·莫阿，他描写了一种理想的社会，他认劳动是最苦而可怕的，所以主张强迫工作。因他目睹资本主义制度底下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是那样黑暗，所以发生这种观念。一般人以为工作是苦事，亦是拿现在生活下的眼光，去观察那将来的社会。其实社会主义实行后的社会的劳动，已和现在的社会的劳动不同了。

如莫理斯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美感的社会主义。他常说：工作能使精神感觉愉快，这就是"工作的喜悦"。即我们日常生活上的喜悦，也多从工作中来。比如烹调，自己弄的东西，总觉比别的好吃，倍觉津津有味。这都是因为自己经过一番工作，含有一分愉快之故。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是永享不到工作的愉快的。

莫理斯最赞美的，是欧洲十四世纪的艺术品，而最鄙视的是现代的艺术品。因为十四世纪的艺术品，都是那时代能感觉着"工作的喜悦"的工匠作出来的。艺术家最希望发表的是特殊的个性的艺术美，而最忌的是平凡。所以现在有一班艺术家很怀疑社会主义实行后，社会必然愈趋平凡化，在平凡化的社会里必不能望艺术的发达，其实在资本主义下，那种恶俗的气氛，商贾的倾向，亦何能容艺术的发展呢？又何能表现纯正的美呢？那末我们想发表艺术的美，更不能不去推翻现代的资本

制度，去建设那社会主义制度的了。不过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要注意保存艺术的个性发展的机会就是了。

由以上所说的看来，我们的工作是要免除工作的苦痛，发扬工作的喜悦的，哪里有像现在劳动的劳苦，有怠工的现象发生！

三、又有一般人，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底下是不自由的。他不晓得经济上的自由，才是真的自由。现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底下，哪里有劳动者的自由，只有少数的资本家的自由，高楼、大厦、汽车、马车全为他们所占据，我们如牛马的劳苦终身，而衣食住反得不着适当的供养。所以我们想得到真的自由，极平等的自由，更该实现那“社会主义的制度”，而打倒现在的“资本主义的制度”。

我们要改造这样的社会，是寻快乐的，不是向那穷苦不自由的地方去，前边已经说明白了。

但是社会上人有一种惰性，这也是我们讲社会主义的人，不可不先注意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的
《李大钊文集》刊印。

PDG

中共三届一次
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纪要*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

第一次执行委员会本定于十月二十日召集，嗣因与劳动大会时间冲突，改在十一月十五日，又以候驻粤委员，延期到二十四日始开会。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时开会，二十五日下午四时闭会。到会者中局委员四人，驻京驻鄂委员各一人，S. Y. 代表一人，特别招待同志一人，共八人，驻湘驻粤委员未到，中局委员一人因事赴湘亦未到。议事日程如左：

（一）中局报告大会后进行事项；

（二）各委员报告地方工作情形；

（三）国民运动进行计划；

（四）劳动运动进行方针；

（五）教育宣传问题；

（六）第五次国际大会准备事件；

（七）郭平伯、郭寄生、周无为、张子余、张绍康、陈天党籍问题；

（八）胡鄂公等党籍问题；

（九）党证问题；

---

* 这个纪要原载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第一号。

（十）中局会计报告。

讨论的结果：第（六）催取各地方对于党纲草案之意见，原选出席代表张同志失踪，届时由中局另派。第（七）郭平伯、郭寄生、周无为、张子余四人，执行大会决议，开除党籍；张绍康、陈天均已登报脱离，亦应开除。第（八）胡鄂公，在未能证明其确未帮忙贿选以前，仍旧停止出席小组会议；熊得山、汪剑侬因与胡有连带关系，亦应同样办理。第（九）暂行从缓。其余报告及决议案另录。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中共中央局向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的报告*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

（一）政治　大会后即发生北京政变，中局随即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印汉文六千，英文三百），主张召集国民会议解决时局，只香港各英文报发生反感，在国内舆论上无什么影响。同时并函请孙中山赴沪召集国民会议，亦无结果。

（二）宣传方面　因中局及出版机关迁移之故，《新青年》应出二期，只出一期；《前锋》应出五期只出一期，《向导》应出到四十九期，只出到四十六期，小册子无。在三种定期刊物中，《向导》在社会上稍有影响，因此社会上反帝国主义的空气大会后比大会前渐渐浓厚起来。

（三）与国民党关系　大会决议案，尚未能充分执行者，一，因同志中对于决议案有多少疑虑；二，因国民党本部办事不敏决；三，因同志们和国民党党员间的猜疑及政治观念不同；四，因本党经济困难。有此四因，原拟在最短期间成立北部中部各重要支部之计划遂未能实现。此时惟北京已有组织；天津，哈尔滨、湖南也在进行，湖北、南京方与国民党交涉中；山东、四川国民党本有组织，对于我们的同志加入工作者

* 这个报告原载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第一号。

颇信任。安徽国民党分两派，均不得社会的信仰，现需有能力者前往另行组织。此时国民党中有一派人拟实行改造，并决于明年正月十五日在广州召集大会，又一派人反对之，将来或酿成重大的变化。

（四）劳动运动　中局直辖之劳动运动，惟路工，兹据铁委报告如左：

一，正太路　正太情形最好，因为彼方有九个 C. P. 同志，二十余 S. Y. 同志，人都很好，并且都勇敢努力，他们对于工会的组织潜在外进行，执行委员会不断地开会。二，京奉路　京奉情形也很好，唐山、山海关、天津、丰台等工会都还秘密存在，这四处尤以唐山和山海关更好。三，京汉路　京汉以江岸郑州比较好一点，该两处都有秘密小组。信阳亦由江岸派有专人负责。长辛店比较差一点，但现在亦找了几个工友常来京谈话，屡次教他们把小组组织起来，但他们都很怕，前两三星期他们虽已组织十余人，但现在又无形消灭了，不过大多数对于工会还信仰，只不敢出头；今日长辛店又来了一位工友，教他回去活动小组织，他已应允了，或者从此后，长辛店可有中心了。四，津浦路　津浦南段浦镇已有了三十余人的小组织，不断地开会；北段亦有人接洽了，但一时都不敢出来，有几个活动分子都很好，但被工贼崔某监视，不敢动作。五，胶济路　此路现在已组织一个一千六七百人的工会，此间已与他发生了关系，工刊每期寄去二百份。六，京绥路　京绥车务工会还好，对于我们还时常有信来。七，道清路　道清情形比较差一点，因为那方面的工人，刚把工会组织起来，便遇了二七事件，所以工友格外的胆小，但有一同志在彼处，亦有相当活动和宣传。八，陇海路　此路至今还由林之英、魏某等把持工会，王同志久无信来，彼间情形不大清楚。

（五）农民运动　新起的农民运动，一在广东省之惠州，一在湖南省之衡山，惠州各属有一万户以上的组织，衡山也有万余人的群众运动，两处都是S. Y. 同志在那里指挥，现在都已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一，我们的同志在农村中尚无深的根基，一时经济的煽动，遂召中农多数的反抗，勾结军阀官僚，加以武力的压迫。二，惠州在陈〔1〕军反动的势力之下，衡山在赵〔2〕军反动的势力之下，政治也是一个原因。

（六）党务　大会后党员增加不过百人；新发展的地方，一是济南成立了地方会，一是哈尔滨成立了一组，也只有一两个地方工作最力，湖北的工作最松懈，官厅的压迫和同志们的萎顿两个原因都有。南京、杭州、四川、江西、福建均可望有新的发展。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指陈炯明。
〔2〕指赵恒惕。

PDG

中共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各委员报告*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

（一）京　区

（A）国民运动　初因同志中政策怀疑，继因与民治主义同志会有龃龉，民党本部又有人利用同志会从中阻挠，故无速效。现拟派得力同志加入该同志会，其障碍当可去。同志会疑忌我们，与我们同志受民党委托在京沪办杂志也有关系，现已解释清楚。前此王安[1]二同志在京时，内部稍有精神，现范高[2]亦甚努力，惟因内部意见不协，进行上颇多障碍。现亟须加派新同志担负工作。天津方面已有数同志在组织讲演会及国民党。

（B）劳动运动　亦缺乏人力财力，此时最困难的是应付失业工人及在狱同志及其家属。

（C）学生运动　自韦青云为王正廷收买，造谣损坏范高二同志在学生会的信用，并借以使学联分裂，此项工作吾人应急加入得力分子去整顿。

---

* 这个文件原载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第一号。

PDG

（二）湖　北　区

（A）国民运动　武汉近来突起的爱国运动，忽然沉寂下去，外交协会已为官厅封禁，官厅对于外交委员会虽尚未封禁，而明示以勿许工人团体参加，该会虽未遵行，而态度转为消极了。国民党有成立支部的可能，但多为工学界的新分子，旧党员可靠者极少。

（B）劳动运动　武汉工联虽解散，近来暗中尚极团结，惟缺乏负责之人出头组织，党中现设一劳动运动委员会，即为从事此项工作。武汉失业工人多无大希望，今后须向工厂去寻勇敢分子以教育训练之。

（C）青年运动　学联毫无群众，近令各同志借各种机会向各学校活动。

（D）党务　负责者少，事多照顾不到，前时工作都是向外发展，对于内部教育训练工夫，太没有注意，故同志精神颇不振。学生好批评而不努力工作，工人思想过于幼稚，不能独立担任工作，区委拟今后向此方努力。

（三）沪　　区

大会后，本区专力整顿上海地方之内部，因前此内部涣散，等于没有组织，现在内部的组织稍有头绪，党费已能收到应收数一半以上。上海为中国第一大都市，可是我们的工作仍然毫无起色。关于国民运动，因为我们的同志多是无职业的外省人，和本地的社会隔绝得厉害，所以不容易进行；关于劳动运动，上海为全国工人最多的地方，而工人运动并不发达，其

原因是：（一）交通便利，劳动者供过于求，同业间竞争甚烈，遂不敢与雇主竞争；（二）丝厂、纱厂、香烟厂之女工占全埠工人半数以上，这也是上海劳动运动不易振起之原因；（三）工人籍贯复杂，地方观念也是阻碍团结的原因；（四）原有的青红帮，不但无形中阻碍工人团结，并还自引捕房恶探，侦察工人的行动，无微不至。我们办的机器工人俱乐部，因为他们生活利害关系太不相同，他们居住距离也相隔太远，似此散漫不相粘结的分子，如何能够团结起来，所以上海的机器工人组织，前此已数次失败，现在这个俱乐部也无形消灭了。邮差运动前此尚好，现因受压迫而停顿。现在着手吴淞及高昌庙的部分运动，吴淞设一工人学校，已开过一次工会预备会；高昌庙亦拟组织一个工人夜学。店伙组织已着手联络，一二月后即可成立。南京党务比前此略有起色，现拟合浦镇成立一地方会。杭州同志太少，尚不能成立一地方会。沪宁、沪杭铁路工人都立有进德会，会员为熟练工人及员司头目等，颇为工会运动之障碍。

（四）湖　南　区

（A）政治　自七月初，湖南局面即成“讨贼”、“护宪”之争，北军未入湘以前，谭[3]已拥有湘南湘西全部，赵[4]则仅据长沙、湘阴、岳阳、平江、浏阳五县以相抗；攸醴则在或得或失之间，自中立军鲁[5]挥戈附谭，湘潭随之以去。上自湘潭，下迄湘阴临资口，谭赵之兵皆夹河而阵，战争之重心，则在攸醴之间。九一之变以后，赵氏虽得回复长沙，然各军溃散及倒戈而去者过半，原驻防地尽失，形势过弱，赵乃升十四团长为旅长，叶贺唐[6]刘（铏）尽编成师，招兵买马，勒捐强

借，竭泽而渔，长沙市民独当其冲，或捐或借，搜索在十次以上（房捐抽收三四个月，田赋征收到十四年）。上自富商，下及车夫走卒，无一幸免者。加以内河交通断绝，生意凋零，商家陆续倒闭，工厂尽数歇业，人民之苦于兵，为民国以来未曾有，赵氏知民不附己，索性撕去护宪假面，延引北军，南北夹攻，谭军遂不支而撤退赴粤，赵乃重握政权。

(B) 党务　四个月中，同志增加者，长沙十四人，安源二十余人，水口山十余人。教育进行，长沙较好，同志颇喜于政治及问题之讨论，安源次之，水口山又次之，常德数人太幼稚，目前无办法，衡阳数人亦幼稚。

(C) 劳动运动　长沙因各厂歇业，工人竭蹶求生，且多星散、纺纱、造币、黑铅诸业俱乐部，顿形冷寂，惟整理其中S. Y. 的组织而已。其他各手工业工会，则只能保持原状。安源四个月来，现状颇好。工人颇能在工会指挥之下，练习自治生活，地方军警均失其作用。工会对于社会亦不似从前之隔阂。合作社亦渐有起色。工人补习学校虽未得适当之人主持，然工人居领袖地位者，现有特别班，专事主义与政治上之训练。工人子弟学校有七：惟株醴二校，受战事上之影响，维护颇不易。在安源可虑之点，则三公司（汉冶萍）资本素仰给于日本，自震灾发生，来源断绝，安源工资，积欠已二月；或竟停工亦未可知。然安源煤矿可以独立，汉冶歇业，萍煤有不歇业之可能。但有何方法，做到此着，此间尚无把握。水口山工会尚能保持现状。合作社已成立，因交通断绝，尚未正式开办。衡阳之白果，组织了一个农会，会员约二三万，但因水陆交通断绝，无法加派得力人去主持。距长沙四十五里之靳家江之煤矿亦有数千工人，曾派人去调查接洽过，一俟战争停止，便可进行。

（五）山　　东

（A）党务　十一月十一日下午二时开第二次地方全体大会，同志十三人，又新介绍同志三人，共十六人。第一组因吴同志辞组长，故未开一次会，殊属失当，此后仍请吴同志负责进行。第二组虽开过几次会，亦未见精彩，以后希努力进行。党费务于本次大会后一星期内由组长收齐汇交。

（B）劳动运动　理发工会已就绪。自王[7]同志去青岛，彼方面劳动界中已着手活动，现正努力进行。张店方面，已由同志联络路工十余人，不久即可成会。津浦路亦有车务工人与我们联络，将来一定也有头绪，不过最近胶济路全路工人因待遇不良，要起大风潮，这是我们应特别注意的。

（C）将来进行计划　1. 关于党务方面，要通告青岛方面同志，迅速发展一地方，张店方面亦然。努力发展使山东成立一区。2. 关于劳动方面，先以全力注重胶济路，因有机可乘也。胶济路组织好了，则青岛工人与沿路矿工即不成问题。3. 关于国民革命方面，要督促国民党正式成立山东支部，大加扩充起来，借以改造腐败的学生会。4. 关于宣传方面，努力扩充《向导》报及各种宣传品，并相机组织研究主义的团体。

又对于最近发生的事件，由学生会发起的国民大会——于十四号开，决计一致加入，并主张不承认北庭，打倒国贼梁如浩，严惩猪仔议员，追悼留日被害同胞。

（六）哈　尔　滨

1. 民校[8]　民校事，张同志的部长委任状已接到，我们

现开始活动。事务所将租妥，以后预备以三十人为基本，从事有意义的组织。

2.《晨光报》 此报的销数在哈埠现已占第一位，一个月以后，可归我们主持。

3. 青年学院 官厅已批准。现正在特警处粮捐下活动经费。青年学院半月刊——《青年》——下星期内正式出版。

4. 劳动运动

A. 有京汉高碑店分会得力工友来此，他是天津人，又在东路做工多年，会俄语，现已由俄友供给生活费，办东路华工部事。

B. 此间友人每月出八十元，办《劳动周刊》，此报由我们办，下星期出版。

5. 通信社现已有了两个办公处，电话等都全备，与无线电收发处合办。仍加力进行津贴，俟根基在握，在此希望再调一同志来专办，以保持这块招牌。

6. S.Y. 基本人已有六人（C友出外）努力于商人学生两方面，从事组织。

7. 已发起一群众对外的组织，下星期日开大会。拟乘机鼓吹反帝国主义的联合，促进中俄会议等……内幕由我们主持。此间同志皆以“参加团体、组织团体”为唯一方法。

（七）广　东　区

（A）国民运动 自某方面代表[9]于十月到广东，国民党改组之事遂实际进行。某代表到广东即召集C.P. 及S.Y. 执行委员及两中局驻粤委员开会讨论国民党改组进行方法，力劝孙中山召集改组会议。孙中山毅然召集此会议，同志出席此会

议者五人。会议的结果，大多数并不反对改组，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会遂于十月二十八日正式成立，由孙中山特派九人为委员（内有同志一人[10]），特派五人为候补委员（内有同志一人[11]），是日开第一次会议，提出讨论者：（一）广州市分区组织问题（现已分为十二区，同志有势力者有四区）；（二）召集全国代表会议问题（定于明年正月举行——每省六人，海外华侨有支部者代表一人）；（三）筹办国民党周报问题（已出版）；（四）党纲起草问题（已由廖仲恺起草草案，载在周报）；（五）经费问题。又另组临时委员会上海执行部，推定汪精卫、张继、戴季陶、胡汉民、叶楚伧五人为委员，并已派廖仲恺到上海克日召集成立云。广东未来的国民运动，是收回海关主权问题，此时国民党及广州政府都有此倾向，倘真能有点运动，便是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冲突之第一步。

（B）劳动运动　广东劳动运动到今日渐将回复其原始状态，三年来带经济性质之运动已普遍做过，加薪减时之口号，在现在很难适用。目下唯一的工作，只有内部组织，而各工会因成立时组织形式太涣散或太旧，又因会员已失工会之需要，多数不能号召会员，其散漫状态与其原始未有成立工会时之状态相同。范围小的人数少的职业不甚重要的，已经无形中自行解体，或仍留其躯壳而已。其比较稍有组织者，只建筑工会、油业工会、机器工会、粤汉路机料工团而已。

（C）学生运动　自第三次大会之后，四个月以来，在广州方面虽有新学生社为公开的学生运动。但非 S. Y. 的社员不甚多，而活动分子则更少，故新学生社的组织，只得到对外发表主张，发起或加入各社团之群众运动等作用；尚未做到能左右广州学生的地步。凡曾参□群众的同志，无论是谁，都觉得我们在学生群众中势力之薄弱，每次都要假借别的团体的力量

或政治势力，才能得到较好的结果。故此次 S. Y. 区代表会有“扩充新学生社”之决议案。现已由各地方会先整顿各 S. Y. 支部，进而整顿新学生社各支部，再进而扩充之。新学生社出版之《新学生》半月刊虽未能得到多数学生的同情，但于广州的麻木群众当中总有些少影响。虽销行不多——在广州学生方面连社员三百余份，但稍有研究精神，有读书兴趣的学生，都已知道这个刊物。致其不能多销的原因：（一）因政治批评太多，关于文化运动及学生切身问题的批评太少，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二）因没有确定的编辑负责者。故此次区代表会曾讨论及此，通过了应多发表关于文化运动批评的文章，并举定罗绮园同志担任编辑。可惜他又就了兵工厂的事，故至今仍无负责人。今年九月间全国学生大会，虽然通过了许多关于国民革命的议决案，广州学生会代表且提出拥护中山组织政府案，可是闭会之后，他们又回到原校去读死书，把所有议决案都忘记了。最重要的是实行赞助三民主义者的三种办法，如召集该地方的学生大会进而召集该地方的国民大会宣布学生大会的主张，他们都完全没有做一点工夫。其他关于威海卫问题、天津汉口租界问题、铁路共管问题、长江警备舰队问题，任由英美帝国主义者猛烈进攻，都完全没有表示。即反对曹锟贿选、请愿北伐的示威运动，虽由我们拉他们加入发起，亦只得一个名义加入，毫无实力。至于根据全国大会议决的章程，改组广州学生会一事，更丝毫没有提到。此次区代表会认定现在的广州学生会实不能领导学生群众做国民革命的工夫，非改组不可，故有“改组广州学生会”的议决案。但我们势力所能支配现已加入广州学生会的代表，实缺乏活动力量，故拟先组织法大学生会，俟他加入之后，然后提出改组。现法大的同志已极力活动，且已有头绪，组织学生会事大约不久可成功。

（八）S. Y.

开过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一次，最重要的是对于各地方团问题，均有相当的决议，各地答复大致尚能实行。宣传方面，《团刊》十月已出两期，《中国青年》已出六期，《青年工人》已出一期。各地工作，以广东最佳，各项运动，S. Y. 均参加。山东近因派专人前往已改组，青岛已快成地方。农民运动，湖南岳北农民自遭地主联合官厅高压后，被捕者数人，死一人，现农会尚存在，有决议案数起，以排斥洋货反对军阀为口号。太原、哈尔滨、济南等地十一月七日的运动甚好。现S. Y. 分子缺乏真正青年，尤缺乏青年工人，故实际上无什么独立工作，此应设法改正。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指王仲一、安体诚。
〔2〕指范鸿、高君宇。
〔3〕指谭延闿。
〔4〕指赵恒惕。
〔5〕指鲁涤平。
〔6〕指叶开鑫、贺耀祖、唐生智。
〔7〕指王尽美。
〔8〕指中国国民党。
〔9〕指鲍罗廷。
〔10〕指谭平山。
〔11〕指李大钊。

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

国民运动是我党目前全部工作。因为目前的中国劳动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在政治上的意义都只是国民运动。兹根据大会议决案，议定国民运动之进行计划如左：

（一）国民运动，当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因为大规模的国民运动不可无一个有力的公开的党为之号召指挥。

（A）扩大其组织：（1）国民党有组织之地方，如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处，同志们一并加入；（2）国民党无组织之地方，最重要的如哈尔滨、奉天、北京、天津、南京、安徽、湖北、湖南、浙江、福建等处，同志们为之创设；（3）新创设之组织，须遵用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发之党纲章程及党证，其名称则暂随当地情形自定之。（B）矫正其政治观念，根据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促其做反帝国主义的宣传及行动。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在中国国民运动中，比反军阀运动更为切要，在军阀与帝国主义者有冲突时，吾人得助军阀以抗外人，断不可借外力以倒军阀。（C）我们与国民党之关系：（1）我

---

* 这个文件是中共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制定的，原载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第一号。

们的同志在国民党中为一秘密组，一切政治的言论行动，须受本党之指挥；（2）我们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但事实上不可能时，断不宜强行之；（3）我们的同志倘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其经费受诸国民党者，应公开的支配，其账目只报告国民党；受诸本党者则对本党负责。

（二）国民运动之主要动力固然是国民党，而国民党之力量必须建设在各种人民的组织上面，必须以国民党的名义去创造或参加各种人民的组织：

（A）农民　农民在中国国民运动中是最大的动力，中国国民党的基础便应该建设在农民上面，各省支部应竭力推广其分部于乡村。运动之策略，以教育及自治入手，以“全农民利益”为号召，如水利、防匪、排洋货、抗苛税等，不宜开始即鼓吹佃农的经济争斗致招中农之反抗。

（B）工人　工会的组织应与党的组织并重，对于近代产业工人，更应发展其阶级的意识。

（C）商人　注意地方商会及大都市商会中，对于官僚分子之反对派。

（D）店伙　上海、汉口、天津等大都市急应进行此项组织。

（E）各机关职员　即衙署局所雇用之下级人员，此项组织与店伙组织在都市中均极有威力。

（F）学生　应以之为各种人民的组织及宣传之媒介，初级师范生对于农民运动尤为重要。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劳动运动进行方针议决案*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

自“二七”工潮以后，中国北部中部之工人组织大部分破坏了，工人阶级内部的精神，亦因此而涣散、胆怯，有的还堕落了。全国工业中心——上海——以种种特殊原因，劳动运动仍旧毫无起色。南部——广东——大部分是手工业，海员因缺乏宣传与组织，总会职员素不为会员所信任，又以经手财政不清，互相冲突甚烈，内部危机日迫一日。依此状况，大会所议决的全国总工会及其他类似之组织一时均不易着手，兹拟先行选择最重要的产业工人，如铁路、海员、矿工，集中我们的力量，加以切实的各个组织或整顿。候这三个产业工人都真有了全国的组织，然后再谋这三个产业工人的联盟；即使彼时有组织全国总工会之必要与可能，亦须十分注意于这三个产业工人的联盟以为之中心，方免涣散。

组织整顿这三个产业工人之目前计划：

（一）铁路　由现在之铁路委员会派人分往各路接洽，俟各路能够派出有力代表（以在职工友为限）担负组织责任，即应择相当地点召集各路会议，以议决各路公开的或秘密的组织方法及各路公同的关系。在此会议前，上海、杭州、山东及广

---

* 这个文件是中共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制定的，原载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第一号。

州同志对于该地铁路工人之组织，须特别努力。

（二）海员 （1）由上海及留法同志努力于宁波海员之联络及宣传；（2）上海汉口天津同志，努力于北洋及长江航路之船员组织；（3）由广州同志用国民党的力量设法改造中华海员总工会，并在香港特设国民党海员部，以便开始宣传及改良其组织。上海、香港、新加坡间之文件输送，亦海员运动中重要工作。

（三）矿工 以奉天、直隶、山东、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包含在内）为主要区域。湖南已有组织；直隶之唐山应由京区及唐山地方设法进行，并各指定同志主持此事；山东之坊子、淄川博山、峄县等处矿工运动，山东同志应把他和津浦胶济路工运动同时并重；奉天以设法成立本党组织，河南以恢复本党在彰德组织，为入手办法。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

A. 宣 传 方 针

一、政治　最近期间可略偏重于下列几种政治上的及外交的宣传：

1. 反对英美帝国主义之各方面的宣传。

2. 中俄亲善及承认苏俄（以爱国主义为立足点之分数当加多：中国可以利用俄国抵制英美日；俄国实际上决不能侵略，而必须经济的政治的合作）。

3. 国民党之改组（反对非政党说，提倡健全的国民运动的政党，当就现有的国民党着手）。

4. 反对曹吴[1]及外交系（当注全国目光于直系，对其他军阀不必与以同等之攻击；不可落于普遍否认的稚气，当以竭力求变更现状为宣传的最近目标）。

5. 反对研究系——宪法派（证明宪法非民众实力不能保证；研究系借“法律条文”投机与外交系借“西餐礼节”卖国有同等的罪）。

6. 各省的现实政治之批评（如省区及地方组织尤当注意

* 这个文件是中共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制定的，原载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第一号。

如山东、哈尔滨等有 C. P. 所能支配之新闻机关者）。

7. 地方自治之实际建设（如职业选举之类，当以能实行为前提：如哈尔滨市议会——中国、日本、俄国平民——之选举权等，都可借此相机引起中国商人、工人等的政治运动）。

8. 五权宪法的研究——（应当借革命的一权说，民党所谓五权宪法，不过组织上的问题而并非“权”）。

9. 其他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之宣传及介绍。

10. 近时德国革命形势之论述。

此中尤以反对英美及直系为最重要。

二、劳动　劳动群众中，除上述的政治外交问题当以极浅近的口号宣传外，并须特别注意下列几项：

1. 经济斗争（须有组织有步骤之坚决斗争，勿作孤注一掷）。

2. 经济斗争与政治及外交之关系（当取中国实际经验作例，如海员唐山京汉等）。

3. 自然及社会科学之常识，共产主义之浅释（当与工人以整个的科学的奋斗的人生观）。

4. 普通集会组织的方法。

5. 世界劳动运动史略及现势。

已有的《工人周刊》及《劳动周报》当尽力推销于工人及党员之间。凡能与工人接触之党员当尽力运用《前锋》、《新青年》、《向导》社会科学讲义等之材料，使用口语，求其通俗化(Popularization)。

当尽力编著通俗的问答的歌谣的小册子。

有可能的地方当设贫民学校。

三、农民　农民间之宣传大致与工人中相等，但材料当取

之于农民生活；尤其要指明农民与政治的关系，为具体的经济改良建议之宣传，如协作社、水利改良等，尽可以用外国译语，只求实质能推广农民运动。

四、文化　文化思想上的问题亦当注意，这是吸取知识阶级，使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工具的入手方法。

1. 反对东方文化派（纯粹的东方派是幻想的退步的思想；纯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是个人主义，伪慈善主义；共产派当宣传为斗争而互助，斗争乃为将来全人类之互助；无斗争即无生活）。

2. 文学的及科学的宣传主义。

3. 反对宗法社会之旧教义。

4. 反对基督教的教义及其组织（如青年会）。

5. 健全的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及社会观及“集体主义”的人生观（反对个人主义；各个人当择一宗旨，结为团体，服从其分配工作以达共同目的，亦即自己之目的；个人生活当然因此得一部分的满足，同时亦当自求生活保证，求身心的强健；结团体本是为着各个人的目的；个人的安全亦是为着团体的工作。既有团体（或社会）便有各团员间之相当关系（或新的习俗），非此不能维系；决不应以为共产主义便真是“过激主义”——蔑视一切个人私德）。

共产党员人人都应是一个宣传者，平常口语之中须时时留意宣传，在这一时期，大家都当以上述的方针为标准去实行。至于材料，可以取之于C. P. 、S. Y. 之出版物。出版物及团体内的宣传教育方法亦另定暂时的办法，见教育宣传委员会的组织法。

B. 教育方法

甲、

一、各地方之政治讨论（每次大会由教育委员选择《前锋》或《向导》论文作材料）。

二、各小组之政治讲演（除现时政治问题外，最好每组以党纲草案为根据逐段讨论研究——此于新加入之同志有大益处）。

三、各小组之组织原理讲演（以章程为材料）。

乙、

四、国内劳动运动及各地现实的劳动生活，每小组均当加以讨论（以《工人周刊》等为材料）。

以上各种材料及讲演员之分配当由各地方教育委员负责——每月报告中央教育委员会。

各地 C. P. 及 S. Y. 各推一教育委员合作——可以共同报告——（但 S. Y. 所用材料当注重青年方面，如《中国青年》、《青年工人》及 S. P. 之章程纲领；C. P. 党纲却亦为 S. Y. 所必须研究，此为两团体之政治的共同精神）。

丙、

五、各地有可能时，设社会科学的研究会（任取何名，如哈尔滨之青年学院），大致可如下法组织：——（亦可利用其他学会，掺入自己材料）新青年、社会科学讲义，译著的关于主义之书籍为材料（党员的新译著随时报告中央）；每月召集会员几次，预指材料及问题，或请人讲演或共同问答；结果若有疑问，可寄到名义上的“社会科学会”（即中央教育委员会）

令答复。再则可令会员从事实际调查各种中国现实问题如劳动状况等。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指曹锟、吴佩孚。

PDG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

陈 独 秀

（一）

人类经济政治大改造的革命有二种：一是宗法封建社会崩坏时，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一是资产阶级崩坏时，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此外又有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乃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两个意义。

殖民地的经济权政治权都完全操在宗主国之手，全民族之各阶级都在宗主国压迫之下，全民族各阶级共同起来谋政治经济之独立，这是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半殖民地的经济权大部分操诸外人之手，政治权形式上大部分尚操诸本国贵族军阀之手，全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在外国帝国主义者及本国贵族军阀压迫之下，有产无产两阶级共同起来，对外谋经济的独立，对内谋政治的自由，这是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

殖民地革命的对象是宗主国，固然无所谓民主革命；即在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出版的《前锋》第二期。

半殖民地，一方面因为工商业受外力之阻碍不能充分发展，资产阶级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一方面又因为贵族军阀受外力之卵翼而存在，所以也不能形成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国民革命的性质虽然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他的胜利虽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革命运动中的形式及要求却只是一个国民革命，这种特殊形式的革命，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及经济状况所自然演成的。

无产阶级客观的力量是随着资产阶级之发达而发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既然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无产阶级便是不用说了。

（二）

半殖民地的中国自然也没有例外。领土广大交通不便、经济组织还是地方的、社会组织还是家庭的、文字组织还是半象形的中国，连国民革命完全成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断然不可怀丝毫速成的妄想。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可以说自甲午战败起，过去历史已将近三十年，此三十年中，第一期是戊戌前后的变法自强运动，第二期是辛亥革命运动，第三期是“五四”以来学生及工人运动。这三期运动之成绩虽然都很微末，而加入运动的各阶级都以次扩大，这是不能否认的。第四期运动是什么，我们虽未能预断，而距运动成功的时期仍然甚长，及资产阶级渐渐明确的感觉国民运动的必要并显著的加入此种运动，这两件事是可以推知的。

（三）

经济落后文化幼稚的中国，各阶级还都紧紧的束缚在宗法社会的旧壳内，幼稚的资产阶级，至今没有有力的政党，便是他幼稚之征验，他还未脱离利用敌人（列强及军阀）势力发展他自己阶级势力的时期，所以他时常表现出来爱和平怕革命的心理，这也是他势力薄弱之自然结果；若依据他目前心理之表现，遂一口武断中国资产阶级永远是不革命的，那便未免短视了。

商业工业资产阶级而外，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每每还有一种官僚资产阶级。他的势力原来是依赖外国势力（卖国）及本国贵族军阀政府，利用国家机关（盗国）而存在而发展的，他不但是不革命的，而且是反革命的；他不但不是真正资产阶级，而且是真正资产阶级——工商阶级发展之障碍；中国的新旧交通系即属此类。直皖奉直两次战争，固然是军阀间的战争，而因此打倒了安福部及梁士诒内阁，却算是扫除中国资产阶级发展路程上的荆棘，所以那时扬子江下游新兴的工商业家对于吴佩孚颇表同情；有人说吴佩孚打倒梁内阁是军阀阶级的胜利资产阶级的失败，这完全是梦话。

工商业幼稚的资产阶级，他的懦弱心理，自然不容易赞成革命；但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企业规模超越了地方的而渐成为全国的，同时又遭遇军阀扰乱之阻碍或外货外资之竞争，经济的要求自然会促起他有政治革命必要的觉悟。所以资产阶级究竟革命不革命，当视其经济的历史的发展决定之，不当以其初步积累时懦弱心理决定其全阶级的终身命运。例如在欧战前，全印度除了小资产阶级的知识者外，找不出半点革命倾

向，反之，与大英帝国妥协的空气却充满了全印度的资产阶级；然而欧战后印度的工业得了发展的机会，有了外货外资之竞争，印度的资产阶级便渐渐有了经济政治独立运动的觉悟。中国辛亥革命时，有几个资本家听了革命二字不伸舌摇头，有几个资本家不安心信任北洋派军阀统治中国；然而欧战以来，扬子江下游新兴的工商业家得了一点自由发财的机会，便马上改变从前小视自身的态度，不再说什么“在商言商不谈政治”了，好像乡下土财主，子弟得了几层功名，便胆大起来不怕官府了；同时因为他们的开始发展，便遇着军阀扰乱及关税厘金外货输入原料输出等妨碍他们的发财自由，他们更不老实起来，公然出来做修改税则废止厘金废督裁兵理财制宪等运动，更进而组织民治委员会，反对军阀为总统，否认代表军阀阶级的现国会，上海长沙之商联会更进而加入群众的国民示威运动，即此可以证明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由非政治的态度，发展到和平的政治运动态度，最近更发展到革命的政治运动倾向了。

他们以前非政治的态度，现在半和平半革命的态度，将来更趋向革命的态度，都不是他们主观上的意识决定的，乃是他们客观上的经济条件决定的。社会上每个阶级都有他阶级的利己心，他阶级的力量长养到非革命不能除去他发展之障碍时，他必然出于革命，愿意革命不愿意，始终没有这回事。

有人反对上海的民治委员会，说是希图组织商人政府，又说这是发达资本主义有害于中国社会。唱这种高调的人，他不明白他素所崇拜的美国正是商人政府；他不明白商人政府虽非极则，比起军阀军政府是进化的；他不明白资本主义在欧美虽功过参半，而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却不是受了资本主义发达的害，正是受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害；他一面唱鄙薄商人政府

与资本主义的高调，却一面拥戴军阀，这种人全然不懂得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化是怎么一回事。

在先进国纯粹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虽以资产阶级为主力军，也不能不借助于他阶级的力量以仆当时的暴君及贵族，所以当时革命的口号往往冒称全民利益，不便公然宣告为他们阶级的利益而革命。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力量幼稚的资产阶级，阶级的分化本尚未鲜明，阶级的冲突亦尚未剧烈，各阶级的势力也都尚未强大，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更不能单独革命，他到了真要革命的时候，必然极力拉拢别的阶级，出来号召国民革命，以求达到他自身发展之目的。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

（四）

殖民地半殖民地一部分向上发展的大资产阶级固然可以趋向革命，而一部分向下崩坏的小资产阶级（手工工业家及小商人）亦可以趋向革命。小资产阶级固不及大资产阶级势力集中，然其企业因竞争而崩坏，生活不安，也足造成其浪漫的革命心理。

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级，他本没有经济的基础，其实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因此他对于任何阶级的政治观念，都摇动不坚固，在任何阶级的革命运动中，他都做过不少革命的功劳，也做过不少反革命的罪恶。

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知识阶级特别发达，所谓居四民（士农工商）之首的士，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他介在贵族与平民

（农工商）间，恒依附贵族而操纵政权，所以有布衣卿相之说，其仕宦久而门阀高者，自身且成为贵族。他们在历史上操纵政权尤其自垄断教权的优越地位，比欧洲中世僧侣阶级有过之无不及。即以近事而论，在坏的方面：议员政客们都属士的阶级，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来吸收他们，只得附属军阀作恶；在好的方面：戊戌前后的变法自强运动，辛亥革命运动，“五四”以来国民运动，几乎都是士的阶级独占之舞台。因西方文化输入之故，旧的士的阶级固然日渐退溃，而新的士的阶级却已代之而兴；现在及将来的国民运动，商人工人农民固然渐变为革命之主要的动力，而知识阶级（即士的阶级）中之革命分子，在各阶级间连锁的作用，仍然有不可轻视的地位；而且在无产阶级实行革命和他们阶级的利益当真冲突以前，他们是羞于放弃革命态度的。最近全国学生大会，不但议决了许多国民革命的议案，并且议决了几件为工人阶级利益奋斗的议案，这便是个明显的例证。正因为知识阶级没有特殊的经济基础，遂没有坚固不摇的阶级性，所以他主观上浪漫的革命思想，往往一时有超越阶级的幻象，这正是知识阶级和纯粹资产阶级所不同的地方，也就是知识阶级有时比资产阶级易于倾向革命的缘故。就是一班非革命的分子，他们提出所谓“不合作”、“农村立国”、“东方文化”、“新村”、“无政府”、“基督教救国”、“教育救国”等回避革命的口号，固然是小资产阶级欲在自己脑中改造社会的幻想，然而他们对于现社会之不安不满足，也可以说是间接促成革命的一种动力。

（五）

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

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是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然而外货侵入破坏农业经济日益一日，兵匪扰乱，天灾流行，官绅鱼肉，这四种环境却有驱农民加入革命之可能。历年以来，各处农民小规模的抗税罢租运动是很普遍的，若一旦有了组织，便无人敢说连国民革命他们也一定不能加入。

有人见农民之疾苦而人数又如此众多，未曾看清这只是国民革命的一大动力，以为马上便可在农民间做共产的社会革命运动，这种观察实在未免太粗忽了。共产的社会革命固然要得着农民的同情与协助，然必须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才能够实现此种革命的争斗并拥护此种革命的势力建设此种革命的事业，因为只有强大的无产阶级，才有大规模的共同生产共同生活之需要与可能，独立生产之手工业者及农民都不需此。尤其是农民私有观念极其坚固，在中国，约占农民半数之自耕农，都是中小资产阶级，不用说共产的社会革命是和他们的利益根本冲突，即无地之佃农，也只是半无产阶级，他们反对地主，不能超过转移地主之私有权为他们自己的私有权的心理以上；雇工虽属无产阶级，然人数少而不集中；所以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使目前即作此决不能实现的幻想，则所号召者不适于多数农民之实际的要求，便无法使农民群众加入实际的运动，便使目前所急需的国民革命受最大的损失。

（六）

在普通形势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工人阶级和学生农民不同，有他自己阶级的特殊利害，所以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取何态度，乃是一个极重大而复杂的问题。

工人是社会上有力的阶级，在物质上他的力量自然远不及资产阶级雄厚，而在心理上因为实际生活之压迫，往往易于促进他的决战态度，即在纯粹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中，工人阶级一旦感觉得这种革命于自身亦有利益时，往往成为急进的先锋，况在国民革命，工人阶级更是重要的分子了。

但同时我们要知道：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概括说起来，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起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此时中国工人阶级的理想，略分三类：第一，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家族亲属地方观念还非常之重，这是因为不但多数手工业工人仍然在独立生产者的环境，有许多目前虽是近代产业工人，而他过去未来的生活，并未能与独立生产者（小手艺小商人小农等）的环境绝缘，不感政治的需要，并不脱神权帝王之迷信，产业之发达又多未成全国化，所以工人阶级的运动，犹多是枝节零碎的地方的经济运动而非国家的政治运动，工人阶级的理想，犹是宗法社会的而非国家的，这也是当然的现象。第二，只少数有了国家的觉悟，有了政治的要求，这种觉悟，这种要求，只在最进步的海员及铁路工人罢工

中才表现出来，其余多数罢工都不出日常生活的经济争斗。第三，真有阶级觉悟并且感觉着有组织自己阶级政党的工人，更是少数中的极少数；这极少数纯粹无产阶级分子，固然是将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种子，即在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运动中，也是最勇敢的先锋队，这是拿今年京汉路罢工事件可以证明的。这极少数最有觉悟的工人，在质量上虽然很好，在数量上实在太少，其余的工人更是质量上数量上都还幼稚，所以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之需要与可能，而且连一般的政治争斗之需要甚至于连自己阶级的经济争斗之需要都不曾感觉的工人（如手工业工人），也并不是少数。我们还应该知道：在产业不发达的中国，工人自己阶级的单纯经济争斗，没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大部分产业管理权，不在外人手里便在军阀政府手里，工人经济争斗之对象，不是帝国主义的外国便是军阀，所以经济争斗稍稍剧烈一点，便是一个政治争斗。我们更应该知道：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争斗，只是一般的政治争斗，即全国各阶级共同要求政治上自由的争斗，不是工人们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因为掌握政权者直接的是军阀，间接的是帝国主义的外国，不是本国的资产阶级。所以中国的工人阶级，在目前环境的需要上，在目前自身力量的可能上，都必须参加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意义，就是对外要求民族之经济的政治的独立，对内要求一般国民在政治上的自由。这种一般国民之政治自由，如集会结社罢工等自由，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目前至急的需要。

工人阶级若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其结果是：（一）工人阶级在此革命成功时失去了地位；（二）工人阶级在此革命的争

斗过程中，失去了自己阶级战斗力发展的机会；（三）不参加实际的行动，无论工人阶级有任何急进的主张，都不过是一个主张，实际还是站着一步不动；（四）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目前既不可能，又不参加联合战线，结果必是脱离了政治争斗的战线，躲到经济争斗的空招牌底下去睡觉。这种脱离政治的经济争斗，必然是枝节零碎的，地方的，改良的，使工人阶级萎靡下去的；而不是根本的，统一的，革命的，使工人阶级强壮起来的。

或者有人以为工人阶级加入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便易于发生紊乱阶级和改良妥协的倾向，是一种危险的政策。其实这个想头未免有些幼稚懦弱了。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是随着产业发达阶级分化而发生而强烈起来的，不是人力的提倡可以发生，也不是人力的否认可以紊乱可以消灭的，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只有开门出去参加复杂的争斗可以养成，决不是关起门来取寡妇处女式的防闲政策便可以免得危险。工人阶级只要有了独立的组织以后，只要知道一时期政治争斗的动作联合和经济争斗的主义妥协不同，勇敢的参加国民革命这种复杂的争斗，于工人阶级只有利益而决无危险。反之，关起门来不参加目前所需要而且可能的政治争斗之联合战线，倒有上文所说的危险呵！

（七）

中国社会各阶级都处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两层严酷的压迫之下，而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是目前的需要而且可能。

败坏困苦的中国，须有各阶级群起合作的大革命，才能够

依群众的革命热忱和创造能力，涌现出一个独立的统一的新国家。这个新国家只有在全国大群众革命的狂热中，全国的制度文物思想习惯都受了革命的洗礼，才能够实现，决不是单靠军事行动可以侥幸得来的，更不是个人的暗杀可以成功的。暗杀只是封建时代义烈的行为，其结果不过报仇泄愤，决不能依此方法可以推倒统治阶级。单靠军事行动取得政权，这是墨西哥式葡萄牙式的军事投机，决不是法兰西式俄罗斯式的革命事业。

产业幼稚交通不便的中国，尚未完全达到以整理国家为一个经济单位的程度，地方的民众对于地方政府的革命，也是我们应该赞成的；因为这种地方的革命行动丰富起来，也自然要汇合成功一个全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但是非革命的省宪运动，简直是见鬼；因为没有革命的大群众所拥护之宪法，无论是国家的或是地方的，都等于废纸。

同时，我们也须明白产业幼稚文化落后的中国，目前也只有这各阶级群起的国民革命是可能的。若是贪图超越可能的空想，实际上不能使革命的行动丰富起来，以应目前的需要，不但在本国的革命事业上是怠工，而且阻碍了世界革命之机运。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国民革命，形式上虽是一国的革命，事实上是世界的革命之一部分，而且是重大的一部分。因为压制世界全人类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乃建设在剥削本国工人阶级及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上面，制他们死命的，也正是他们本国工人阶级的社会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状况，又只是国民革命是可能的，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党人，万不可轻视了国民革命的重大意义！

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

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就是一个好例。俄罗斯各阶级各党派的联合革命，本以推倒皇室为共同目标，只以工人阶级在一九〇五年之革命及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中特殊努力，又以当时资本主义的列强因大战而濒于破产，自救不遑，十月革命遂至发生新的政治组织。但是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

陷于半殖民地而且濒于完全殖民地之悲运的中国人，不首先解除列强及军阀之重重奴辱，别的话都无从说起！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劳动问题的祸源*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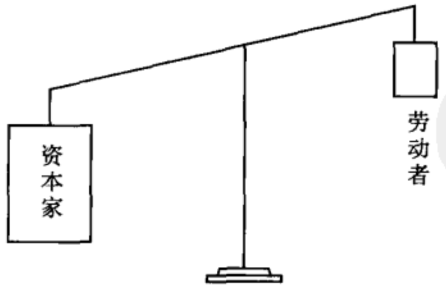
李　大　钊

劳动者为什么发生问题呢？凡是发生问题的，一定是知道不对了，须要设法改良的。譬如说火车发生问题了，那一定是出轨了，或是两辆相撞了，否则，火车好好的在轨道上驶行着，说它有问题了，那不是笑话吗？所以劳动者倘使生活安宁，那就没有问题了。现在为了有意外的事，有病了，但既有病，他的病源在哪里呢？现在且把劳动问题的祸源详细地说一说：

（一）工银制度　工银制度就是卖买劳力，资本家是买主，劳动者是卖主；工银是价格，劳力是商品。固然，卖买劳力，要是双方平等的，那也没有什么反对的，因为互相平等的，可以卖，可以不卖；可以买，也可以不买的。譬如到商店里去买东西，他们的商品和价格相等，那我是可以买，可以不买的。这些平等的卖买，我们原是不反对的。但是为什么要反对卖买劳力的工银制度呢？因为在他制度下面有（一）经济自由、（二）个人订约两个要素的。因为在工银制度下有经济自由的，所以倘使有了一百万的资产，他就要了不得的。那政治、法律又是帮助有产者，保护资本家的。因此，无产的劳动者受到莫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四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大的毒害。因为在工银制度下有个人订约的，不承认团体的，所以一个无财无力的劳动者和一个拥有百万财产的资本家订起合同，哪能够平衡？劳动者哪能不吃亏？一个劳动者不过是一个资本家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和那资本家相比较，不相等势力的订约，结果，都是把劳动者劳力的报酬减削下去，由几千元减至几角钱也有，还有减到不能维持生活的！譬如一个二十岁的工人，他在二十年内至少也要用去二千元吧，倘使每年以一分利率计算，那他也要有每月二十元的工资，可是现在只有二元！这是何等的苛虐呵！劳动者其实只要做六小时工作就可生活了，但资本家要他作十二小时十四小时的工作，才给他生活费，勉强的能够生活！并且资本家有时竟可使劳动者不能生活，因为资本家可以不买劳动者劳力，而劳动者却不能不卖劳力的。所以在工银制度下的劳动者，简直不如牛马！牛马有了疾病，主人还要设法去医治的，因为牛马是主人财产的一部分，失去了牛马就是失去了他财产的一部分。但是对于劳动者呢，一些没有什么顾惜的，合则留，不合则去，随你有什么病，什么患难，和他是没有关系的。劳动者的价值真是牛马都不如呀！在工银制度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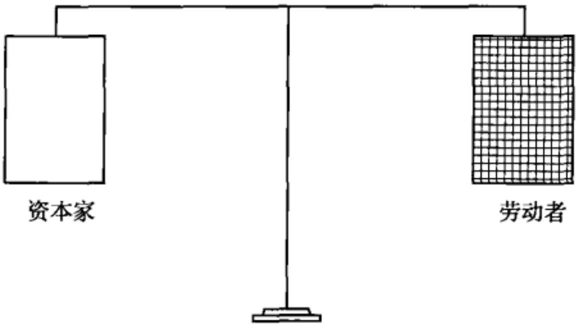


社会主义者，不论最激烈的到最和平的，都反对工银制度，但是有些实际的改革家，好像霍勃孙（J. A. Hobson）这些人，以为工银制度可以奖励人类向上和进取的精神，倘使没

有了奖励，人们就不做工了。要增加人们的工作，不能不实行奖励的工银制度。工银制度虽是有许多坏处，但有一个最有益的好处，就是行奖励作工，使社会上的文明，也一天一天的进步。霍勃孙又主张由工银制度变成合作的性质，这个不是社会主义的主张。社会主义者主张统统合而为一，由国家管理的；那主张合作的，不过把工厂内合而为一罢了。但是这个仍是不能算彻底的办法。

补救工银制度的祸害，只有二个方法：（一）舆论的鼓吹；（二）劳动者的团结。这是无论对付什么问题所必需的方法。美国工人不但和资本家发生买卖关系，并且还要被迫信仰他们所信仰的宗教，赞成他们所赞成的党派。在入一工厂做事的时候，他们有一张表格，内中开列许多问题，强迫你要答出来的，倘使你和他们的信仰不同，意见不同，简直不能工作的。这种不正当的干涉，也惟有靠舆论来改革！

现在那些资本家对于劳动者有些畏惧心，完全是为了劳动者还有一些团结力罢了。劳动者合了几千个或是几万个去和一个资本家争，那也可得到好的结果。譬如右面的天平似的，百个劳动者不及一个资本家，那可加到千个，倘使能够再加到万个，终有平衡的可能了。“合则存，散则灭”，真是宝贵的格言呀！倘使许多团结的劳动者和一个资本家争，那社会必能表同情于劳动者的，因为社会是以多数为是的，一个和许多，许多的终容易得到社会的同情心的，为了得到社会的同情心，更容易和资本家相争得胜了。倘使一个工人和一个资本家争，那资本家在社会上势力当然比劳动者要大的多，社会当然容易同情于资本家了。所以劳动者的团结，实是不可忽略的。



舆论的鼓吹是社会的外力的补救法，劳动者的团结是内力的补救法。这两个方法，都是非常重要的。

（二）资本制度　二十世纪的文明，是从资本制度产生出来的，它的有益于社会，固是很大，可是照现在看来，它的罪过于功了，我们再也用不着它了。资本制度是科学家和劳动者所造成的。它的资本是什么地方来的？简单地说，就是“生之者众，用之者寡”罢了。自从产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勃兴，到现在，在这三百年内，大部分的劳动者生产的很多，在用去的却很少。自然，少数的资本家常常浪费浪用，但终比不过劳动者生产之多。好像一个劳动者，他有十分的生产，他自己只用去零点五分，余的九点五分被资本家拿去，但是资本家也不过用去了一点五分，还有八分余下的。这个余下的，就是资本，造成资本制度的原素。科学家利用劳动者造成的资本，尽力地去研究、发明，造成现代的文明。但是资本制度越发达，在资本制度下的文明越进步，劳动者越受苦痛呢。资本制度发达了，各种大规模的组织日渐增加，各种机械也是一天一天的新发明，于是从前要十百人在长时间内做成的，现在只要一二人在短时间内做好了，无数的劳动者都因此失业了；就是不失业的，也不能不迁就资本家的意志了。不但劳动者受害，就是小资本为了无力购买机器，也不能不附和大资本家了。这样，资

本只是集中于少数的大资本家手里了，其余的人，都是生活漂摇不定呢。从前在独立工作的时候，劳动者非常利便，好像一个皮匠，他挑了一副担子，在人家门口来往，倘使有人要他补双皮鞋，他就停下来，讲了价钱，倘使价钱讲不对，他就挑了担子到别处去了，这是何等自由。但是后来渐渐扩大了，开皮匠店了……设立了工厂了，那时候就不能随皮匠的便了。资本家说，你要来作工，每天二角五分，你不愿意就不必来。但是他不能不到工厂里作工了，否则便可饿死！就是开学校，现在也不容易。从前蒙馆的时候，一个先生随便弄间房子，教教书，可是现在不能了，小学教员要检定，教员要有资格，学校要有设备，而且还要有基金。倘使不能合式，就要勒令封闭呢！现在再说，劳动者生产的资本，被资本家收括去，那我们果然要反对的。但又有些人说，劳动者的生产不是属于资本家，是属于社会的，我们人类是社会中的一分子，那何必去反对自己的社会有资本呢？但是这也不对的。社会，横的方面有许多阶级，纵的方面有许多职业。现在的资本，不是在全社会手里，而在少数的高阶级的某种职业的资本家手里罢了，所以我们也不能不反对的。为了资本集中于少数人手里，就成了利害截然的劳资两阶级的仇疾，酿成现在很难解决的劳动问题。

（三）工厂制度　工厂制度是资本制度下的产物。既然知道资本制度的罪恶，那又何必再说工厂制度呢？不过工厂制度实有特别的罪恶的，不能不详细地说一说：

一、儿童和妇女的工作问题　儿童不去工作，也是要在学校里读书的，现在不过不去读书到工厂工作。妇女在从前的时候，在家庭里也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忙得一天到晚的，现在有了工厂制度，不过舍了家庭里的工作，去到工厂工作。但们的工作仍是一样，那有什么问题呢？可是儿童们为了要工

作，失去读书的机会，失去预备将来的大事业的机会了，而且他们身体没有发育完全，劳力过度，妨碍了身体的健康。妇女们为了要工作，失去家庭的快乐，在家庭里虽是也工作的，但都是互相帮助，快意的，而且为了生活所迫，在孕育期内也不能不去工作，因此有流产的，甚至伤及性命，那不是悲惨的景象吗？儿童们、妇女们，自从工厂制度勃兴了，劳动者失去了讨价的能力，收入骤然减少，为维持家庭经济起见，不能不也到工厂里去作工，但是他们的体力哪能及得男子和成年人呢？那些男子和成年人无论什么粗力的、污秽的事都能够做的，但那些微小而瘦弱的儿童和妇女们要去和他们比较，哪能及得？在学校里读书，同学们是和善的、愉快的、相爱的；在家庭里作工，家人是互相帮助的；可是一到了工厂，和善愉快的空气散去了，相爱相助的精神淹没了，只是满布着刻薄、相竞……的厉气，洁白的儿童、柔弱的妇女，哪能够接受呢？于是佢们精神上都受到不可言状的痛苦了。

二、工业上之危险　工厂里作工比从前家庭工业危险得多，意外的生命危险，在工厂中常常听得的。机器是无情的，一个不留心，就可送命。开矿的也常常有死了许多许多的。化学工厂中的许多药品，都可使人们的生命危险的。不但这样，那些儿童和妇女，常常为了空气的不流通，食物的不卫生……使他们生命发生危险。大概自然的工作是很好的，而那超过人力的工作是容易使人生病的。工人的寿命比农夫要短三分之一呢。在工厂里，四十岁的或是五十岁的工人，很少很少的。田家的白发老农夫，是常在每一村子里能找到的。——中国人常称农夫叫老农的，那可见农夫寿命的不短了。在工厂里的工人，固然为了机器的、空气的各方面，以致危及生命，但工厂设备不完善，也是一个原因。

三、失业问题　资本家只以赚钱为目的，所以有不能赚钱的工厂，不讲这工厂需要不需要，就关起门来，去做别种事了。这样，工人们忽然失业了。上海纱厂工人近来有十几万失业。日本大灾后，中国要想运华工去做工，可是他们却不要我们去，他们说，食粮也好，衣服也好，却不必运工人来。可见日本虽受了大灾，死了许多人，但还没有缺少工人之患，这全因原来失业者太多，工人过剩的缘故。工人过剩了，失业者多了，社会秩序因之愈为紊乱。欧洲有人以为劳动者失业问题，应由政府去负责的。

四、工厂规则的严苛　工厂规则完全是保护资本家的利益的，对于工人们底幸福方面，剥削殆尽！工人的独立人格，工人的自由权，在工厂规则里，完全淹没了！不愿意做的，也要做，有些完全无关于他的工作的事，也要叫工人做，甚至在工厂亏了本的时候，也要在工人身上想法。所以工人在工厂不感觉什么乐处，只是觉得不自由。行动不能自由，衣食也不能自由。吃水是不准的，于是有些人渴得不开交；吃烟也不准的，于是有些人带了烟草来吞下，结果成了肺痨。工厂规则，真严苛呵！

（四）社会上少数人的统治权　商业渐渐地发达了，资本家操纵社会经济权，同时，一切的政权也被他们少数人握住了。因为政治是跟从经济状况而变更的，政权只是有经济权者所执的。经济阶级是直接的或间接的也可以控制我们政权的。中国所以十二年还没有革命成功，因为经济阶级没有受到痛苦，不想去革命。他们——握有经济权的商人——只是唱着和平，所以革命终不能成功。好像辛亥革命时，全国经济阶级都相助了，便能成功。经济阶级可以左右国家最高议会的。一切的政治，都是经济阶级造成的。大家想，美国钢铁大王，在什么选举，他手下常有一百多万的票子，所以选举大总统的时

候，只要几个实业大王不愿选那人，那人就不能当选大总统了。在实业大王下面的人，政治能力都失去了，只是唯大王之命是听的。在资本制度下面的劳动问题所以成为世界上难解决的问题，就是为了资本家有政治上的势力的缘故。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出版的《李大钊选集》刊印。

PDG

国民党改造与中国革命运动*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瞿 秋 白

辛亥革命造成中华民国的，是国民党；历年以来任劳任怨为平民争权利，反对北洋军阀的，也只有国民党。然而人民往往只见国民党主战，以为是扰乱——宁可就地恭请某某军阀，维持治安——以至于有现在的局面。国民党的斗争方法或者一时因为人民不与援助，逼得不能不只偏于军事方面，不能不想运用无聊的政客——结果吃力不讨好，反受人民的漠视。然而国民党的宗旨，国民党的苦衷，经过几十年的苦斗牺牲，至今日已大白于天下。人民的痛苦，人民的受压迫，内内外外不知道有几百重，到现在也应增长了不少见识和政治的经验。因此，为民权而奋斗的国民党已经觉悟，如今决计宣言大改组，号召全国平民来共同组织，共同奋斗：

“凡是爱国的人，都联合起来罢！”

列强欺侮我们——夺取关盐税的管理权，设立租界，割据军港，占领矿山，如今快要攫取全国铁路，置护路军及长江舰队，简直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把中国人变成他们的奴隶牛马。军阀压迫我们——篡窃大总统，伪造宪法，摧残教育，苛征重敛，勾结列强，实行卖国。各省的人民，各界的人民尽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版的《向导》第四十九期。

着受列强和军阀威逼欺罔，仿佛以为事不关己，绝无动作；等到亲身觉到了痛楚——小军阀的就地虐杀苛敛，外国人的横暴淫掠——也只能做漫无组织系统的反抗运动，随起随灭，丝毫没有效果，譬如衡山的农民，水口山的工人，安徽的学生何尝不能反抗；可惜没有全国的政治组织，共同的直接行动，相互间的助力，所以失败。全国的平民呵，大家感受同等的痛苦，大家有共同的敌人，为什么不联合起来？联合起来的第一步，应当赶紧组织国民党，集中我们的政治势力。要知道只有我们自己的力量能取得真正的权利——权利不是天赋的，更不是军阀列强所能赐予的。现在的国民党，便是我们集中势力，运用势力的中心。我们若要脱离列强和军阀的压迫，自己建设真正的平民共和国，真正的独立国家，真正能发展自己的经济，我们必定第一步先要组织平民的政党——我们自己的国民党。

现在这次的国民党改组，恰好有重要的三点：

（一）从此平民的政治运动与军事的革命行动并进。

（二）从此组织群众的民主式的真正政党，肃清腐败分子。

（三）从此实行严格的纪律，作全国有组织有系统的运动，处处时时代表平民而反对军阀和列强。

这正是我们平民自己的国民党；然而要使他能如此，必须我们自己参加。商人、农民、工人、学生、教育界，凡是平民都应当为我们的将来——真正独立自由的中国而奋斗。亲爱的同胞们，快加入国民党罢！以前的国民党，或者有些人怀疑他的组织及行动方法，如今国民党之明确的宗旨，果毅的决心，已经有《改组宣言》及《党纲草案》、《党章草案》表示出来。我们平民自己应当快快的参加，大家尽力来干——建立我们自己的党。否则我们只能做军阀的牛马，列强的奴隶：

“凡是平民都联合起来罢！”

若是我们平民能在这十几年的经验里觉悟到：不能再像从前那样一味的推诿在几个民权运动的领袖身上，自己反在旁边说风凉话，那末，我们便应当积极的加入国民党，共同的实行国民革命运动，中国才有复苏的希望。只有那时，此次国民党的改组才真是中国民权运动的新纪元。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六大以前》刊印。

PDG

中国妇女宣传运动的新纪元*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向 警 予

妇女问题与劳动问题同为二十世纪——新时代的产物。因为妇女问题、劳动问题所必要的物质条件，到了二十世纪才具备。妇女问题和劳动问题虽然并为世界最近待解决的两个大问题，而妇女全般的真正彻底的解放，却必在劳动解放亦即人类总解放之后。因此我们知道妇女问题决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而妇女解放也决不是鼠目寸光的仅仅注射于妇女本身、单做妇女运动所能办到的。

女权运动在欧洲各国唇焦舌敝的宣传，焦头烂额的奋斗，不知经过了多少年载，然而结果仅仅得着比以前妇女较高之地位，揆之“两性权利完全平等”的原则，还是相差很远。异军特起的俄罗斯妇女，于欧美女权运动的程式之外，另辟一条革命的途径。一旦劳农政府成功了，伊们居然不动声色地骤然跻于“两性权利完全平等”的地位，这是欧美妇女温和请愿，激烈抗争，魂祈梦祷亘一世纪而不能得的。就这两件事实对照玩味，便可显然明白于妇女解放究竟是在怎样的天国，妇女运动究竟是应采怎样的方式了。

开始萌芽的中国妇女运动固然幼稚得可怜，然而这种状况

---

* 本文原载一九二四年一月二日《妇女日报》。

决不是偶然的；决不是一般人的所谓中国妇女特别不觉悟，特别不努力，乃是农业社会宗法社会必然的反映。试看全中国妇女的大多数，是过的农村的生活，“三从四德”、“相夫教子”不用说是伊们的天经地义；次多数过的是太太奶奶的生活，伊们的丈夫尽是官僚、军人、学者、教员、商人、买办……伊们都可以在其丈夫的广大的翅膀下偷生过活；至于因生活鞭策感觉到独立自营的必要的只有最少的一部。知识技能完全缺乏的编入劳动的队伍；知识技能稍有基础的不得不挤进男子独占的职业界，而参政运动也未尝不是由此而起。客观的物质条件如此，中国妇女运动的幼稚可怜又何足怪。但同时我们要知道这样的物质条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生活难”的叹声既已普遍了全国，妇女解放的物质条件便日在演进之中。故吾敢断言此后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是必然的趋势。所谓先知先觉的责任，不过是以敏锐的眼光看清此等必然的趋势，因势利导，以宣传组织的力量缩短历史进化的过程，如此罢了。

中国妇女因历史的社会的特殊生活，演成了中国妇女特殊的心理和习性，最缺乏的是“政治的常识”和“社会的关心”。大多数只有饮食、男女、装饰的兴趣；少数虚荣的知识妇女偶尔高兴干一点事也绝无持久耐苦的精神，所以只要是与妇女两字相关联的就甚么都弄不好。各地零零碎碎的妇女团体大都挂的是块空招牌，通全国难找一种彻头彻尾妇女主办的宣传物，这是觉悟妇女提起来人人伤心的一件事！现在好了，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妇女声》虽然短命而死，天津却有了《女星》。此刻天津更有所谓《妇女日报》出版了。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广东不少热心妇女运动的同志，将来发扬蹈厉继起于后，这是可为女界前途预贺的！

《妇女日报》的纪元，是中国沉沉女界报晓的第一声。我

接着这个消息异常欢喜！不能不说几句话。我前面已经说过，中国妇女最缺乏的是“政治的常识”和“社会的关心”。现在有了这个《妇女日报》，使妇女们常常与政治的社会的消息相接触，以养成其“政治的常识”和“社会的关心”，这是再好也没有的。现在中国一般的教育本也糟得不堪，至于女子教育更是下而又下。一班聪明有志的女子，又往往卷入文学、美术、哲学、新诗、恋爱的范围去了，而于本身实际密切有关的妇女问题，社会问题，国家问题反漠不关心，这是环境使然，也是没有得着良好指导的缘故。我很希望《妇女日报》成为全国妇女思想改造的养成所！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于上海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出版的《纪念向警予同志英勇就义五十周年》刊印。

PDG

中央通告第十三号

——国民党改组及收回海关主权问题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各区执行委员会并转各地方同志们：兹有两个重要工作，望同志们努力进行。

（一）国民党改组问题

自大会议决本党同志参加国民党扩大运动以来，以种种障碍未能见诸实行。第一次本党执行委员会开会时，适值国民党有改组之议，遂议决关于国民党进行计划，以冀实行大会之议决案。此时国民党之改组已著著进行，颇有振作之希望；广州已设有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其驻沪执行部亦已成立；广州上海二市，已着手党员重新登记，定期开全体大会，分区组织；明年正月在广州召集全国大会，赴此大会之代表，每省六人，由当地推选三人，由总理指派三人，其曾有组织之处，业已准备推选赴会之代表。中局方努力进行复活国民党之工作，各地方同志在此工作中，望依下列步骤切实进行：

（A）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同志们立时全体加入；没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望即将同志非同志可加入国民党之人数及何人可以负责，报告中局，以便中局向国民党接洽，请其派人

前往成立分部。

(B) 在国民党已有组织之地方，本党地方会应即与 S. Y. 地方会合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以主持目前即应进行诸事。改组分区事竣，即应由两地方会在各区指定我们的同志一人组织国民党委员会，受两地方会之指挥。

(C) 吾党在此次国民党全国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望各区会与地方会预商当选之同志，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明晰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旧国民党员中，我们也应该出力帮助其比较的急进分子当选。代表选定后即报告国民党总部（上海法界环龙路四十四号），川资由总部发给。

(D) 此次国民党大会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讨论党纲章程（其草案均见《向导》）及对于时局之策略，代表动身前各区均应详加讨论，俟各省代表过沪时，我们的同志再集合议决一致的主张。

（二）收回海关主权问题

协定关税制，税则用人均不能自由行使主权，这是国际帝国主义者置我死命的最毒政策，因为在此关税制度之下，不得列强之许可，不能自由增加进口税，以遏外货之输入；不得列强之许可，不能自由增加出口税，以遏原料之输出；如此产业落后的国家，永远不易发展，永远为销行外货之市场。

目前广东海关问题，广东政府原来之目的固然仅在关余，然相持之际已发展到用人问题，吾党此时应一面声援广东政府并督促其根本的收回海关全部主权，勿仅仅争在关余；一面主张收回全国海关主权，废除协定关税制，以排斥英货美货为武

器，若军阀有表同情者，虽与之合作亦所不惜。

各地方同志们应立即尽力之所能设法联络各团体，以地方公团名义，散放传单，通电全国，游行示威，发起抵货。此主张一时未必即能贯彻，然我们断然不能失去宣传的机会。

以上二工作，为本党目前最急要之工作，各同志接到此通告后，拟如何进行，并已进行至何程度，各地方务须随时报告区委员会，各区会务须随时报告中局，中局即以此二项工作进行如何为各地方工作勤惰之标准。

委员长　T. S. Chen〔1〕

秘　书　Leo Dschan—Lung〔2〕

十二月二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注　释

〔1〕即陈独秀。

〔2〕即罗章龙。

PDG

中国工人状况及我们运动之方针*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邓　中　夏

上期我的《论工人运动》一文里，已把工人群众在革命运动中的重要约略说了。但是中国的工人状况是怎样呢？我想青年们一定要急于知道，所以我接着为此文；不过为篇幅所限，也只能说个大概罢了。

要明白中国的工人状况，先要明白中国的产业状况。我们分段略述于下：

（一）江苏区——在中国，新式工业最发达的地方，要以此区首屈一指。此区除上海之浦东、杨树浦、吴淞外，尚有南通、无锡、苏州等处。此区以纺织为主要工业，烟草次之，余如铁工、电气、火柴、玻璃、化学制造、印刷……又次之。以上各业，大半为英、美、日本和中国的资本家所办。此外就是官办的兵工厂、造币厂、造船厂以及电灯、电话、电车、自来水各公司了。

（二）武汉区——此区以铁工为主要工业，纺织次之，其他工业亦有。湖北大冶县之铁，不仅是中国许多大工业，惟他是赖，就是日本也要靠他。汉阳的钢铁厂是中国唯一的大铁厂。纺织工厂除武昌官办之四局外，尚有十余家。汉阳的兵工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十期。

厂规模亦大。扬子机器厂可以自造轮船。

（三）津榆区——此区从天津起至山海关止，皆包括在内。以煤为主要的工业，纺织次之。开滦煤矿，包括唐山、林西、赵各庄、马家沟、秦皇岛是中国有名的大煤矿。天津纺织厂约有七八家，均为官僚资本所办。唐山尚有洋灰窑公司，大沽尚有造船厂。

（四）其他各地——都只有零星的新式工业，而且是矿山居多。如山东之淄川、博山、峄县；山西之阳泉；河南之六河沟；湖南之水口山；江西之安源；奉天之本溪湖、抚顺：都有极大的煤厂。至于广州，以及沿长江一带各口岸，虽有工厂，并不多，故不能各划分为大工业区。

（五）交通——交通事业是发展产业的唯一凭借。可是中国的交通事业却不是“发展产业”，不过是“运输洋货”罢了，可叹！交通约分为二：（1）铁路。铁路已经筑成的，有京汉、京奉、津浦、京绥、陇海、沪宁、胶济。沪杭甬（只沪杭竣工，南段只成宁绍一小段）。粤汉（南北各成一段，南为广韶间，北为武株间）。此外短路尚有直晋之正太，河南之道济，江西之南浔，湘赣之株萍，广东之广九潮汕。余如南满、滇越则为外人所筑。（2）轮船。海运由上海南至香港，北至天津、旅顺，东至日本，东北至海参崴。江运由上海至长江上游之重庆、叙府、嘉定，鄂湘川赣皆有小火轮驶入内地。广东东西北江亦可行轮。天津至道口镇及东三省不冰冻时亦有许多河流可以行轮。在此可附带提及的，便是各通商口岸有不少的码头搬运夫，和通都大邑有不少的人力车夫。

中国产业的大致状况，略如上述。我们可进言工人状况。但是要叙述中国的工人状况，可以成功一部大书，亦只能说一个大略。

中国工人的苦况，可以从外国人赞美“中国人勤苦耐劳”声中反衬出来。外国人这句话的意思，换句话说，便是中国的“劳力廉售”。所以我们可不须列很详细的表，便可知道中国工人的工作时间，至少是十点钟以上，“先鸡鸣而兴，后斗转而息”，一生一世，见不着太阳。便可知道中国工人的工资，平均不过数角，“仰不足以事，俯不足以畜”，一生一世替人作牛马。就中以铁路工人生活比较优裕，海员和市政工人（指电灯电话等）次之，纺织及其他工人又次之，矿工、码头工、人力车夫为最苦。工人知识，亦约略与生活程度相等。

中国工人运动原是近两年的事，可分为两个时期：（一）胜利时期——亦可称为进攻时期，从前年十二月香港海员大罢工起，至今年二月京汉大罢工止。（二）失败时期——亦可称为退守时期，京汉大罢工失败以后至现在。工人运动所表现的只有两事，一是罢工，一是组织工会。有先组织工会然后罢工的，如安源、长辛店等（最多数）。也有先罢工然后组织工会的，如上海邮差等（少数），也有一面组织工会一面罢工的，如开滦煤矿等（次多数）。罢工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有香港海员罢工，汉口人力车夫罢工，长辛店罢工，陇海罢工，汉阳铁厂罢工，粤汉北段罢工，安源路矿罢工，水口山罢工，上海浦东纺织烟草罢工，开滦罢工，京汉全路罢工，前八次罢工都胜利，后三次罢工却失败了。组织工会，已形成一个完全产业组合的，有“汉冶萍总工会”、“中华海员联合会”。筹备将成一个产业组合的，有“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以地方组合的，有“湖北工团联合会”、“湖南工团联合会”、“广东工会联合会”。其余差不多各厂、各路，都有“工会”、“工人俱乐部”等，举不胜举了。不过尚有两种有力的工人，或者组织尚少，如矿工，只安源、水口山、焦作组织了；或者始终没

有组织，如各口岸的码头工人。这以上都是工人运动胜利时期的大概。失败时期是怎样呢？自从上海浦东纺织烟草罢工被外国资本主压服以后，接连着便是开滦煤矿罢工被天津警察所长杨以德和英国的印度兵压服，最后便是京汉全路罢工被直系军阀吴佩孚等和某国领事秘密协商压服了。京汉此次罢工失败，被杀死三十九人，被捕入狱二十四人，被开革失业数百人，还有工会法律顾问施洋被枪毙了。此次失败，军阀乘机将京汉全路和武汉三镇的工会一律封禁，于是影响所及，各地工会除粤湘外，皆由公开的而变为秘密的了。虽然秘密，尚有几处工人猛进，曾联合组织了总工会，月费照收，常会照开，只差悬挂一块牌子。我们在此可告慰青年们的，就是：（一）工人复仇的心极切，精神仍团结凝固，一旦时局变动，可以大举；（二）工人受了这两年新式的教育与训练，知识与技能已经增高，现在并秘密的不断的买看出版物和社会主义者往还交谈，通讯质疑。由此看来，所以我们对于中国的工人运动，应是极抱乐观，认为工人群众终归是中国革命运动最伟大的一种势力。

现在我要把我对于此后工人运动的两项意见贡献在青年的面前了。

（1）我以为此后工人运动在反动政局没有推翻以前，不可放弃了公开的工会运动。公开的工会在有时虽不可能，而且即令可能，亦有“投降军阀”，或是“劳资妥协”，徒然引导工人走上堕落的道路的危险；然我们不提倡公开的工会运动，工人最容易被引到工团主义，只过问经济的要求，忘记了政治的奋斗，结果是工人运动于中国革命完全不相干涉。这却是一重危险。所以我主张应使公开的工会运动，成为工人运动的目标。不断的输送小册子给他们看，保存并激励他们愤慨之气，团结

之力，一旦有事，庶可乘时而起。

（2）我以为工人种类纷繁，固然只要是工人群众我们便当去活动，但是我们的人力有限，精力亦有限，我们应就中择取几种有力量的，于革命事业有大帮助的工人群众去活动，较为经济。我以为海员、路工、矿工、码头工人、市政工人五种工人特别重要，应多下功夫。

亲爱的青年们：我上次说过："中国革命的重担，只有由我们一肩挑着。"但是我现在再找足一语："我们挑着不可放下呵！"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六大以前》刊印。

PDG

附　　编

（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六月）

PDG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一九一九年）

李　大　钊

（一）

一个德国人说过，五十岁以下的人说他能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定是欺人之谈。因为马克思的书卷帙浩繁，学理深晦。他那名著《资本论》三卷，合计二千一百三十五页，其中第一卷是马氏生存时刊行的，第二第三两卷是马氏死后他的朋友昂格思替他刊行的。这第一卷和二三两卷中间，难免有些冲突矛盾的地方，马氏的书本来难解，添上这一层越发难解了。加以他的遗著未曾刊行的还有很多，拼上半生的工夫来研究马克思，也不过仅能就他已刊的著书中，把他反复陈述的主张得个要领，究不能算是完全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我平素对于马氏的学说没有什么研究，今天硬想谈"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僭越的很。但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马克思主义"既然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惹动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的误解。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虽然极其贫弱，而自一九一八年马克思诞生百年纪念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他的兴味复活，批评介绍他的很多。

我们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乘本志出“马克思研究号”的机会，把他转介绍于读者，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吾信这也不是绝无裨益的事。万一因为作者的知能谫陋，有误解马氏学说的地方，亲爱的读者肯赐以指正，那是作者所最希望的。

（二）

我于评述“马克思主义”以前，先把“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占若何的地位，略说一说。

由经济思想史上观察经济学的派别，可分为三大系，就是个人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与人道主义经济学。

个人主义经济学，也可以叫作资本主义经济学。三系中以此为最古。著《原富》的亚丹·斯密（Adam Smith）是这一系的鼻祖。亚丹·斯密以下，若马查士（Malthus）、李嘉图（Ricardo）、杰慕士·穆勒（James Mill）等，都属于这一系。把这一系的经济学发挥光大，就成了正系的经济学，普通称为正统学派。因为这个学派是在模范的资本家国的英国成立的，所以英国以外的学者也称他为英国学派。这个学派的根本思想是承认现在的经济组织为是，并且承认在此经济组织内，各个人利己的活动为是。他们以为现在的经济组织，就是个人营利主义的组织，是最巧最妙，最经济不过的组织。从生产一面讲，各人为自己的利益、自由以营经济的活动，自然努力以致自己的利益于最大的程度。其结果：社会全体的利益不期增而自增。譬如各人所有的资本，自然都知道把他由利益较少的事业，移到利益较多的事业上去。社会全体的资本，自然也都舍了那利益较少的事业，投到利益较多的事业上去。所以用不着

什么政治家的干涉，自由竞争的结果，社会上资本的全量自然都利用到社会全体最有利的方面去。而事业家为使他自己的利益达于最大的程度，自然努力以使他自己制品全体的价增大，努力以求其商品全体的卖出额换回很多的价来。社会全体的富是积个人的富而成的。个人不断的为增加自己的富去努力，你这样作，他也这样作，那社会全体的富也不期增而日增了。再从消费一面讲，我们日用的一切物品，都不是在自己家内生产的，都是人家各自为营利、为商卖而生产的。自己要得一种物品：米、盐、酱、醋，乃至布匹、伞、屐、新闻、杂志之属，都不是空手向人家讨得来的。依今日的经济组织，都是各人把物卖钱，各人拿钱买货。各人按着自己最方便的法子去活动，比较着旁人为自己代谋代办，亲切的多，方便的多，经济的多。总而言之，他们对于今日以各人自由求各自利益为原则的经济组织，很满足，很以为妥当。他们主张维持他，不主张改造他。这是个人主义经济学。也就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的经济学。

以上所述个人主义经济学，有二个要点：其一是承认现在的经济组织为是；其二是承认在这经济组织内，各个人利己的活动为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正反对他那第一点。人道主义经济学正反对他那第二点。人道主义经济学者以为无论经济组织改造到怎么好的地步，人心不改造仍是现在这样的贪私无厌，社会仍是没有改善的希望，于是否认经济上个人利己的活动，欲以爱他的动机代那利己的动机；不置重于经济组织改造的一方面，而置重于改造在那组织下活动的各个人的动机。社会主义经济学者以为现代经济上、社会上发生了种种弊害，都是现在经济组织不良的缘故，经济组织一经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现象都跟着改造，于是否认现在的经济组织，而主张根本改造。人

道主义经济学者持人心改造论，故其目的在道德的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学者持组织改造论，故其目的在社会的革命。这两系都是反对个人主义经济学的，但人道主义者同时为社会主义者的也有。

现在世界改造的机运，已经从俄、德诸国闪出了一道曙光。从前经济学的正统，是在个人主义。现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经济学，将要取此正统的位系，而代个人主义以起了。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这正是个人主义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过渡的时代。

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如何重要，也就可以知道了。

本来社会主义的历史并非自马氏始的，马氏以前也很有些有名的社会主义者，不过他们的主张，不是偏于感情，就是涉于空想，未能造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与系统。至于马氏才用科学的论式，把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证明与从来的个人主义经济学截然分立，而别树一帜，社会主义经济学才成一个独立的系统，故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不能不推马克思。

（三）

“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价值，既如上述，我当更进而就他的学说的体系略为大体的分析，以便研究。

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别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

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离了他的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因为他根据他的史观，确定社会组织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变化而来的；然后根据这个确定的原理，以观察现在的经济状态，就把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为分析的、解剖的研究，预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移入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必然的命运；然后更根据这个预见，断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所以他的唯物史观说："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他的"资本论"也是首尾一贯的根据那"在今日社会组织下的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的思想立论。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为研究上便利起见，就他的学说各方面分别观察，大概如此。其实他的学说是完全自成一个有机的有系统的组织，都有不能分离不容割裂的关系。

（四）

请先论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也称历史的唯物主义。他在社会学上曾经，并且正在表现一种理想的运动，与前世纪初，在生物学上发现过的运动，有些相类。在那个时候是用以说明各种形态学上的特征、关系的重要，志在得一个种的自然分类，与关于生物学上有机体生活现象更广的知识。这种运动既经指出那内部最深的

构造，比外部明显的建造，若何重要，唯物史观就站起来反抗那些历史家与历史哲学家，把他们多年所推崇为非常重要的外部的社会构造，都列于第二的次序；而那久经历史家辈蔑视，认为卑微暧昧的现象的，历史的唯物论者却认为于研究这很复杂的社会生活全部的构造与进化，有莫大的价值。

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物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的要件。自己不能变化的，也不能使别的现象变化。其他一切非经济的物质的要件，如人种的要件、地理的要件等等，本来变化很少，因之及于社会现象的影响也很小，但于他那最少的变化范围内，多少也能予人类社会的行程以影响。在原始未开时代的社会，人类所用的劳作工具，极其粗笨，几乎完全受制于自然。而在新发见的地方，向来没有什么意味的地理特征，也成了非常重大的条件。所以历史的唯物论者，于那些经济以外的一切物质的条件，也认他于人类社会有意义，有影响。不过因为他的影响甚微，而且随着人类的进化日益减退，结局只把他们看作经济的要件的支流罢了。因为这个缘故，有许多人主张改称唯物史观为经济史观。

唯物史观，也不是由马氏创的。自孔道西（Condorcet）依着器械论的典型，想把历史作成一科学，而期发见出一普遍的力，把那变幻无极的历史现象，一以贯之，已经开了唯物史观的端绪。故孔道西算是唯物史观的开创者。至桑西门（Saint－Simon）把经济的要素，比精神的要素看得更重。十八世纪时有一种想象说，说法兰西历史的内容不过是佛兰坎人与加利亚人间的人种竞争。他受了此说的影响，谓最近数世纪间的法国历史不外封建制度与产业的竞争，其争以大革命期达

于绝顶。而产业初与君国制联合，以固专制的基础，基础既成又扑灭王国制。产业的进步是历史的决定条件，科学的进步又为补助他的条件。Thierry、Mignet 及 Guizot 辈继起，袭桑西门氏的见解，谓一时代的理想、教义、宪法等，毕竟不外当时经济情形的反映。关于所有权的法制，是尤其重要的。蒲鲁东亦以国民经济为解释历史的钥匙，信前者为因，后者为果。至于马氏用他特有的理论，把从前历史的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与以创见的说明，遂以造成马氏特有的唯物史观，而于从前的唯物史观有伟大的功绩。

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经济现象虽用他自己的模型，制定形成全社会的表面构造（如法律、政治、伦理，及种种理想上、精神上的现象都是），但这些构造中的那一个也不能影响他一点。受人类意思的影响，在他是永远不能的。就是人类的综合意思，也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就是法律他是人类的综合意思中最直接的表示，也只能受经济现象的影响，不能与丝毫的影响于经济现象。换言之，就是经济现象只能由他一面与其他社会现象以影响，而不能与其他社会现象发生相互的影响，或单受别的社会现象的影响。

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构造，全社会的表面构造，都依着他迁移变化。但这经济构造的本身，又按他每个进化的程级，为他那最高动因的连续体式所决定。这最高动因，依其性质，必须不断的变迁，必然的与社会的经济的进化以诱导。

这最高动因究为何物，却又因人而异。Loria 所认为最高动因的，是人口的稠庶。人口不断的增加，曾经决定过去四个连续的根本状态，就是集合、奴隶所有、奴仆（Servile）、佣工。以后将次发生的现象，也该由此决定。马克思则以“物质

的生产力”为最高动因：由家庭经济变为资本家的经济，由小产业制变为工场组织制，就是由生产力的变动而决定的。其他学者所认为最高动因的，又为他物。但他们有一个根本相同的论点，就是：经济的构造，依他内部的势力自己进化，渐于适应的状态中，变更全社会的表面构造，此等表面构造，无论用何方法，不能影响到他这一方面，就是这表面构造中最重要的法律，也不能与他以丝毫的影响。

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种观察事物的方法是合理的。我们晓得有许多法律，在经济现象的面前，暴露出来他的无能。十七八世纪间那些维持商业平准，奖励金块输入的商法，与那最近英国禁遏脱拉斯（Trust）的法律都归无效，就是法律的力量不能加影响于经济趋势的明证。也有些法律，当初即没有力量与经济现象竞争，而后来他所适用的范围，却自一点一点的减缩，至于乌有。这全是经济现象所自致的迁移，无与于法律的影响。例如欧洲中世纪时禁抑暴利的法律，最初就无力与那高利率的经济现象竞争，后来到了利润自然低落，钱利也跟着自然低落的时候，他还继续存在，但他始终没有一点效果。他虽然形式上在些时候维持他的存在，实际上久已无用，久已成为废物。他的存在全是法律上的惰性，只足以证明法律现象远追不上他所欲限制的经济现象，却只在他的脚后一步一步的走，结局惟有服从而已。潜深的社会变动，惟依他自身可以产生，法律是无从与知的。当罗马帝国衰颓时代，一方面呈出奴隶缺乏，奴价腾贵的现象；一方面那一大部分很多而且必要的寄生阶级造成一个自由民，与新自由民的无产阶级。他们的贫困日益加甚，自然渐由农业上的奴仆劳动、工业上的佣工劳动，生出来奴隶制度的代替，因为这两种劳动全于经济上有很多的便利。若是把废奴的事业全委之于当时的基督教、人类同

胞主义的理想，那是绝无效果的。十八世纪间英人曾标榜过一种高尚的人道主义的宗教。到了资本家经济上需要奴隶的时候，他们却把奴隶输入到美洲殖民地，并且设法维持他。这类的事例不胜枚举，要皆足以证明法律现象只能随着经济现象走，不能越过他，不能加他以限制，不能与他以影响。而欲以法律现象奖励或禁遏一种经济现象的，都没有一点效果。那社会的表面构造中最重要的法律，尚且如此，其他如综合的理想等等，更不能与经济现象抗衡。

（五）

迄兹所陈是历史的唯物论者共同一致的论旨。今当更进而述马氏独特的唯物史观。

马氏的经济论，因有他的名著《资本论》详为阐发，所以人都知道他的社会主义系根据于一定的经济论的。至于他的唯物史观，因为没有专书论这个问题，所以人都不甚注意。他的《资本论》，虽然彻头彻尾以他那特有的历史观作基础，而却不见有理论的揭出他的历史观的地方。他那历史观的纲要，稍见于一八四七年公刊的《哲学的贫困》，及一八四八年公布的《共产者宣言》。而以一定的公式表出他的历史观，还在那一八五九年他作的那《经济学批评》的序文中。现在把这几样著作里包含他那历史观的主要部分，节译于下，以供研究的资料。

（一）见于《哲学的贫困》中的：

“经济学者蒲鲁东氏，把人类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下制造罗纱、麻布、绢布的事情，理解的极其明了。可是这一定的社会关系，也和罗纱、麻布等一样，是人类的生产物，他还没有理解。社会关系与生产力有密切的联络。人类随着获得新生产

力，变化其生产方法；又随着变化生产方法——随着变化他们得生活资料的方法——他们全变化他们的社会关系。手臼造出有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造出有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而这样顺应他们的物质的生产方法，以建设其社会关系的人类，同时又顺应他们的社会关系，以作出其主义、思想、范畴。”

（二）见于《共产者宣言》中的：

“凡以前存在的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希腊的自由民与奴隶，罗马的贵族与平民，中世的领主与农奴，同业组合的主人与职工，简单的说，就是压制者与被压制者，自古以来，常相反目，而续行或隐然，或公然，不断的争斗总是以全社会革命的变革，或以相争两阶级的共倒结局的一切争斗。试翻昔时的历史，社会全被区别为种种身份者，社会的地位有多样的等差，这类现象我们殆到处可以发见。在古代罗马则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则有封建诸侯、家臣、同业组合的主人、职工、农奴，且于此等阶级内更各分很多的等级。由封建的社会的崩坏，产出来的近世的社会，仍没把阶级的对立废止。他不过带来了新阶级、新压制手段、新争斗的形式，以代旧的罢了。

“可是到了我们的时代，就是有产者本位的时代，却把阶级的对立简单了。全社会越来越分裂为互相敌视的二大阵营，为相逼对峙的二大阶级：就是有产者与无产者。

“……依以上所述考之，资本家阶级所拿他作基础以至勃兴的生产手段及交通手段，是已经在封建社会作出来的。此等生产手段及交通手段的发展达于一定阶段的时候，封建的社会所依以营生产及交换的关系，就是关于农业及工业封建的组织，简单一句话就是封建的所有关系，对于已经发展的生产

力，久已不能适应了。此等关系，现在不但不能奖励生产，却妨阻生产，变成了许多的障碍物。所以此等关系不能不被破坏，果然又被破坏了。

“那自由竞争就随着于他适合的社会的及政治的制度，随着有产者阶级的经济的及政治的支配，代之而起了。

“有产者阶级，于其不满百年的阶级支配之下，就造出比合起所有过去时代曾造的还厚且巨的生产力。自然力的征服，机械、工业及农业上的化学应用，轮船、火车、电报，全大陆的开垦，河川的开通，如同用魔法唤起的这些人类——在前世纪谁能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能包容在社会的劳动里呢？

“把这样伟大的生产手段及交通手段，像用魔法一般唤起来的资本家的生产关系及交通关系——资本家的所有关系——现代的资本家的社会，如今恰与那魔术师自念咒语唤起诸下界的力量，而自己却无制御他们的力量了的情事相等。数十年的工商史，只是现代的生产力，对于现代的生产关系，对于那不外有产者的生活条件及其支配力的所有关系，试行谋叛的历史。我们但举那商业上的恐慌——因隔一定期间便反复来袭，常常胁迫有产社会的全存在的商业恐慌——即足以作个证明。……有产者阶级颠覆封建制度的武器，今乃转而向有产者阶级自身。

“有产者阶级不但锻炼致自己于死的武器，并且产出去挥使那些武器的人——现代的劳动阶级、无产者就是。

“人人的观念、意见及概念，简单一句话，就是凡是属于人间意识的东西，都随着人人的生活关系，随着其社会的关系，随着其社会的存在，一齐变化。这是不用深究就可以知道的。那思想的历史所证明的，非精神上的生产随着物质上的生产一齐变化而何？”

（三）见于《经济学批评》序文中的：

“人类必须加入那于他们生活上必要的社会的生产，一定的、必然的、离于他们的意志而独立的关系，就是那适应他们物质的生产力一定的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此等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的构造——法制上及政治上所依以成立的、一定的社会的意识形态所适应的真实基础——物质的生活的生产方法，一般给社会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过程，加上条件。不是人类的意识决定其存在，他们的社会的存在反是决定其意识的东西。

“社会的物质的生产力，于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与他从来所在那里面活动当时的生产关系，与那不过是法制上的表现的所有关系冲突。这个关系，这样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而为束缚。于是乎社会革命的时代来。巨大的表面构造的全部，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或徐，或激，都变革了。

“当那样变革的观察，吾人非常把那在得以自然科学的论证的经济的生产条件之上所起的物质的变革，与那人类意识此冲突且至决战的，法制上、政治上、宗教上、艺术上、哲学上的形态，简单说就是观念上的形态，区别不可。想把那样变革时代，由其时代的意识判断，恰如照着一个人怎样想他自己的事，以判断其人一样，不但没有所得，意识这个东西宁是由物质生活的矛盾，就是存在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冲突，才能说明的。

“一社会组织，非到他的全生产力，在其组织内发展的一点余地也没有了以后，决不能颠覆去了。这新的，比从前还高的生产关系，在这个东西的物质的生存条件于旧社会的母胎内孵化完了以前，决不能产生出来。人类是常只以自能解决的问题为问题的。因为拿极正确的眼光去看，凡为问题的，唯于其

解决所必要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也在成立过程中的时会，才能发生。

“综其大体而论，吾人得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及现代资本家的生产方法，为社会经济的组织进步的阶段。而在此中，资本家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的生产方法之采敌对形态的最后。——此处所谓敌对，非个人的敌对之意，是由各个人生活的社会的条件而生的敌对之意——可是在资本家社会的母胎内发展的生产力，同时作成于此敌对的解决必要的物质条件。人类历史的前史，就以此社会组织终。”

（以上的译语，从河上肇博士。）

据以上所引，我们可以略窥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领了。现在更把这个要领简单写出，以期易于了解。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称这些精神的构造为表面构造。表面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而基础构造的变动，乃以其内部促他自己进化的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为主动，属于人类意识的东西，丝毫不能加他以影响，他却可以决定人类的精神、意识、主义、思想，使他们必须适应他的行程。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社会组织即社会关系，也是与布帛菽粟一样，是人类依生产力产出的产物。手臼产出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产出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生产力在那里发展的社会组织，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的发展，后来发展的力量到那社会组织不能适应的程度，那社会组织不但不

能助他，反倒束缚他妨碍他了。而这生产力虽在那束缚他、妨碍他的社会组织中，仍是向前发展不已。发展的力量愈大，与那不能适应他的社会组织间的冲突愈迫，结局这旧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新的继起，将来到了不能与生产力相应的时候，他的崩坏亦复如是。可是这个生产力，非到在他所活动的社会组织里，发展到无可再容的程度，那社会组织是万万不能打破。而这在旧社会组织内，长成他那生存条件的新社会组织，非到自然脱离母胎，有了独立生存的运命，也是万万不能发生。恰如孵卵的情形一样，人为的助长，打破卵壳的行动，是万万无效的，是万万不可能的。

以上是马克思独特的唯物史观。

（六）

与他的唯物史观很有密切关系的，还有那阶级竞争说。

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把种种社会现象不同的原因，总约为经济的原因，更依社会学上竞争的法则，认许多组成历史明显的社会事实，只是那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各殊异阶级间团体竞争所表现的结果。他们所以牵入这竞争中的缘故，全由于他们自己特殊经济上的动机。由历史的唯物论者的眼光去看，十字军之役也含着经济的意味。当时繁盛的义大利共和国中，特如 Venice 的统治阶级，实欲自保其东方的繁富市场。宗教革新的运动，虽然戴着路德的名义，其时的民众中，也似乎有一大部分是意在免去罗马用种种方法征课的重税（那最后有道理的赎罪符也包在内）。基督教的传布，也是应无产阶级的要求作一种实际的运动。把首都由罗马迁至 Byzantium（就是现在的康士坦丁堡），与那定基督教为官教，也是经济的关

系。这两件事都是为取罗马帝国从来的重心而代之。因为当时的中产阶级，实为东方富有财势的商贾阶级，势力很厚。他们和那基督教的无产阶级相合，以与罗马寄生的贵族政治分持平衡的势力，而破坏之。法国大革命也全是因为资本家的中级势力，渐渐可以压迫拥有土地的贵族，其间的平衡久已不固，偶然破裂，遂有这个结果。就是法国历史上迭起层兴的政治危机，单由观念学去研究终于神秘难解。像那拿破仑派咧，布尔康家正统派咧，欧尔林家派咧，共和党咧，平民直接执政党咧，他们背后都藏着很复杂的经济意味。不过打着这些旗帜互相争战，以图压服他的反对阶级，而保自己阶级经济上的利益就是了。这类的政治变动，由马克思解释，其根本原因都在殊异经济阶级间的竞争。我们看那马克思与昂格思的《共产者宣言》中“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的话，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批评》序文中，也说“从来的历史尽是在阶级对立——固然在种种时代呈种种形式——中进行的”，就可以证明他的阶级竞争说，与他的唯物史观有密切关系了。

就这阶级竞争的现象，我们可以晓得，这经济上有共同利害自觉的社会团体，都有毁损别的社会团体以增加自己团体利益的倾向。这个倾向，斯宾塞谓是本于个人的利己心。他在《社会学研究》中说：“个人的利己心引出由他们作成的阶级的利己心，于分别的努力以外，还要发生一种协同的努力，去从那社会活动的总收入中，取些过度的领分。这种综合的倾向，在每阶级中这样发展，必须由其他诸阶级类似的综合的倾向来维持其平衡。”由此以观，这阶级竞争在社会的有机体中恰与 Wilhelm Roux 所发见的“各不同的部分官能组织细胞间的竞争，在各有机体中进行不已”的原则相当。宇宙间一切生命都向“自己发展”（Self－expansion）活动不已。“自己发展”是

生物学上、社会学上一切有机的进化全体根本的动机，是生物界普遍无敌的倾向。阶级竞争是这种倾向的无量表现与结果中的一个。而在马克思则谓阶级竞争之所由起，全因为土地共有制崩坏以后，经济的构造都建在阶级对立之上。马氏所说的阶级，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就是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有产阶级，与没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无产阶级的区别：一方是压服他人掠夺他人的，一方是受人压服，被人掠夺的。这两种阶级，在种种时代，以种种形式表现出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本家的，这些生产方法出现的次第，可作经济组织进化的阶段，而这资本家的生产方法，是社会的生产方法中采敌对形式的最后。阶级竞争也将与这资本家的生产方法同时告终。至于社会为什么呈出阶级对立的现象呢？马氏的意见是以为全是因为一个社会团体，依生产手段的独占，掠夺他人的余工余值（余工余值说详后）的原故。但这两种阶级，最初不过对于他一阶级，可称一个阶级，实则阶级的本身还没有成个阶级，还没有阶级的自觉。后来属于一阶级的，知道他们对于别的阶级，到底是立于不相容的地位，阶级竞争是他们不能避的运命，就是有了阶级的自觉，阶级间就起了竞争。当初只是经济的竞争，争经济上的利益，后来更进而为政治的竞争，争政治上的权力，直至那建在阶级对立上的经济的构造自己进化，发生了一种新变化为止。这样看来，马氏并非承认这阶级竞争是与人类历史相终始的，他只把他的阶级竞争说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不是通用于过去、现在、未来的全部。与其说他的阶级竞争说是他的唯物史观的要素，不如说是对于过去历史的一个应用。

（七）

马氏的唯物史观及其阶级竞争说，既已略具梗概，现在更把对于其说的评论，举出几点，并述我的意见。

马氏学说受人非难的地方很多，这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算是一个最重要的点。盖马氏一方既确认历史——马氏主张无变化即无历史——的原动为生产力；一方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就是说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一方否认阶级的活动，无论是直接在经济现象本身上的活动，是间接由财产法或一般法制上的限制，常可以有些决定经济行程的效力；一方又说阶级竞争的活动，可以产出历史上根本的事实，决定社会进化全体的方向。Eugenio Rignano 驳他道："既认各阶级间有为保其最大经济利益的竞争存在，因之经济现象亦自可以随这个或那个阶级的优越，在一方面或他一方面受些限制，又说经济的行程像那天体中行星的轨道一样的不变，从着他那不能免的进路前进，人类的什么影响都不能相加。那么那主要目的在变更经济行程的阶级竞争，因为没有什么可争，好久就不能存在了。在太阳常行的轨道上，有了一定的变更，一定可以贡献很大的经济利益于北方民族，而大不利于南方民族。但我想在历史记录中，寻找一种族或一阶级的竞争，把改变太阳使他离了常轨作目的的，是一件无益的事。"这一段话可谓中了要扼。不过这个明显的矛盾，在马氏学说中，也有自圆的说法。他说自从土地共有制崩坏以来，经济的构造都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生产力一有变动，这社会关系也跟着变动。可是社会关系的变动，就有赖于当时在经济上占不利地位的阶级的活动。这样看

来，马氏实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但虽是如此说法，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

这全因为一个学说最初成立的时候，每每陷于夸张过大的原故。但是他那唯物史观，纵有这个夸张过大的地方，于社会学上的进步，究有很大很重要的贡献。他能造出一种有一定排列的组织，能把那从前各自发展不相为谋的三个学科，就是经济、法律、历史，联为一体，使他现在真值得起那社会学的名称。因为他发见那阶级竞争的根本法则；因为他指出那从前全被误解或蔑视的经济现象，在社会学的现象中是顶重要的；因为他把于决定法律现象有力的部分归于经济现象，因而知道用法律现象去决定经济现象是逆势的行为；因为他借助于这些根本的原则，努力以图说明过去现在全体社会学上的现象。就是这个，已足以认他在人类思想有效果的概念中，占优尚的位置，于学术界思想界有相当的影响。小小的瑕疵，不能掩了他那莫大的功绩。

有人说，历史的唯物论者以经济行程的进路为必然的、不能免的，给他加上了一种定命的色彩，后来马克思派的社会党，因为信了这个定命说，除去等着集产制自然成熟以外，什么提议也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以致现代各国社会党都遇见很大的危机。这固然可以说是马氏唯物史观的流弊，然自马氏与昂格思合布《共产者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无论赞否马氏别的学说的人，对于此点，都该首肯。而在《社会主义者评论》（《*Socialist Review*》）第一号揭载的昂格思函牍中，昂氏自己说，他很喜欢看见美国的工人，在于政治信条之下，作出一种组织，可见他们也并不是坐待集

产制自然成熟，一点不去活动的。而在别一方面，也可以拿这社会主义有必然性的说，坚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信他必然发生，于宣传社会主义上，的确有如耶教福音经典的效力。

历史的唯物论者说经济现象可以变更法律现象，法律现象不能变更经济现象，也有些人起了疑问。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承认一阶级的团体活动，可以改造经济组织，那么一阶级的团体活动，虽未至能改造经济组织的程度，而有时亦未尝没有变更经济行程趋势的力量。于此有个显例，就是现代劳工阶级的联合活动，屡见成功，居然能够屈服经济行程的趋势。这种劳工结合，首推英国的工联（Trade unions）为最有效果，他们所争在增加劳银。当时经济现象的趋势是导工人于益困益卑的地位，而工联的活动竟能反害为利。大战起来以后，工联一时虽停止活动，战事既息，他们又重张旗鼓。听说铁路人员总会、交通劳动者（专指海上劳动者）联合会，和矿夫联合会三种工联，联合起来，向政府及资本家要求种种条件，声势甚猛（参照《每周评论》第三十三号欧游记者明生君通信），将来的效果必可更大。这自觉的团体活动，还没有取得法律的性质，已经证明他可以改变经济现象的趋势，假使把这种活动的效力，用普通法律，或用那可以塞住经济现象全进路的财产法，保障起来，巩固起来，延长他那效力的期间，他那改变经济现象趋势的效力，不且更大么？试把英、法二国的土地所有制比较来看：在英国则诺曼的侵略者及其子孙，依战胜余威，获据此全土，而与其余人口相较，为数甚少，故利在制定限嗣财产制与脱拉斯制，以保其独占权，结果由此维持住大地产制。在法国则经数世纪的时间，贵族及僧侣阶级的财产为革命的中产阶级所剥夺，这剥夺他们的中级人民人口的数，又占全体的大部，故利在分割而不在独占，适与英国的诺曼侵略者及其子孙相

反，于是中级人民催着通过特别遗书遗产法，以防大财产制的再见。他们二国的财产法和防遏或辅助田间经济现象趋势的法制，这样不同，所以导致他们经济的表现与进化于不同的境界。一则发生很大的领地财产、隐居主义、为害田禾的牧业、全国的人口减少、农村人口的放逐与财富的分配极不平均种种现象。一则发生土地过于割裂、所有者自治其田畴、强盛的农业、节俭之风盛行、分配平均种种现象。这样看来，经济现象和法律现象，都是社会的原动力，他们可以互相影响，都于我们所求的那正当决定的情状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历史的唯物论者所说经济现象有不屈不挠的性质，就是团体的意思、团体的活动，在他面前都得低头的话，也不能认为正确了。但是此等团体的活动，乃至法律，仍是在那可以容他发生的经济构造以上的现象，仍是随着经济的趋势走的，不是反着经济的趋势走的。例如现代的经济现象，一方面劳工阶级的生活境遇日趋于困难；一方面益以促其阶级的自觉，益增其阶级活动的必要，益使其活动的效果足以自卫。这都是现在资本主义制下自然的趋势，应有的现象，不能作足以证明法律现象可以屈抑经济趋势的理据；与其说是团体行动，或法律遏抑经济趋势的结果，毋宁说是经济本身变化的行程。英、法二国财产制之著效，也是在他们依政治的势力，在经济上得占优势，得为权力阶级以后的事，也全是阶级竞争的结果。假使在英国当时定要施行一种防遏大地产制的法律，在法国当时定要施行一种禁抑小财产制的法律，恐怕没有什么效果。在经济构造上建立的一切表面构造，如法律等，不是绝对的不能加些影响于各个的经济现象，但是他们都是随着经济全进路的大势走的，都是辅助着经济内部变化的，就是有时可以抑制各个的经济现象，也不能反抗经济全进路的大势。我们可以拿团体行动、法律、财产

法三个连续的法制，补足阶级竞争的法则，不能拿他们推翻马氏唯物史观的全体。

有许多人所以深病“马克思主义”的原故，都因为他的学说全把伦理的观念抹煞一切，他那阶级竞争说尤足以使人头痛。但他并不排斥这个人高尚的愿望，他不过认定单是全体分子最普通的伦理特质的平均所反映的道德态度，不能加影响于那经济上利害相同自觉的团体行动。我们看在这建立于阶级对立的经济构造的社会，那社会主义伦理的观念，就是互助、博爱的理想，实在一天也没有消灭，只因有阶级竞争的经济现象，天天在那里破坏，所以总不能实现。但这一段历史，马氏已把他划入人类历史的前史，断定他将与这最后的敌对形式的生产方法，并那最后的阶级竞争一齐告终。而马氏所理想的人类真正历史，也就从此开始。马氏所谓真正历史，就是互助的历史，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近来哲学上有一种新理想主义出现，可以修正马氏的唯物论，而救其偏蔽。各国社会主义者，也都有注重于伦理的运动，人道的运动的倾向，这也未必不是社会改造的曙光，人类真正历史的前兆。我们于此可以断定，在这经济构造建立于阶级对立的时期，这互助的理想，伦理的观念，也未曾有过一日消灭，不过因他常为经济构造所毁灭，终致不能实现。这是马氏学说中所含的真理。到了经济构造建立于人类互助的时期，这伦理的观念可以不致如从前为经济构造所毁灭。可是当这过渡时代，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倍加努力，以图划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这是马氏学说应加救正的地方。

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等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等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

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

总之，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马氏的唯物史观，何以不产生于十八世纪以前，也不产生于今日，而独产生于马氏时代呢？因为当时他的环境，有使他创立这种学说的必要和机会。十八世纪以前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的势力，比经济的势力强，所谓社会势力从经济上袭来的很少。因为原始社会的经济组织是仅求自足的靠着自然的地方居多，靠着人力的地方还少，所以宗教和政治的势力较大。譬如南美土人，只伸出一张口，只等面包树、咖啡树给他吃喝，所以他们只有宗教的感谢，没有经济的竞争。到了英国产业革命后的机械生产时代，人类脱离自然而独立，达到自营自给的经济生活，社会情形为之一变，宗教政治的势力全然扫地，经济势力异军苍头特起支配当时的社会了。有了这种环境，才造成了马氏的唯物史观。有了这种经济现象，才反映以成马氏的学说主义。而马氏自己却忘了此点。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见。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见。十字军之役，固然不必全拿那历史的唯物论者所说，全是经济的意味去解释，但当那僧侣彼得煽动群众营救圣墓的时候，彼得与其群众虽然没有经济的意味参杂其间，或者纯是驱于宗教的狂信，而那自觉的经济阶级，实在晓得利用这无意识的反动，达他们有意识的经济上的目的。从前的历史家，完全把经济的意味蔑视了，也实未当。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就是了。

（八）

我于上篇，既将马氏的“唯物史观”和“阶级竞争说”略为评述，现在要述他的“经济论”了。马氏的“经济论”有二要点：一“余工余值说”，二“资本集中说”。前说的基础，在交易价值的特别概念。后说的基础，在经济进化的特别学理。用孔德的术语说，就是一属于经济静学，一属于经济动学。

今先述“余工余值说”。

马氏的目的，在指出有产阶级的生活，全系靠着无产阶级的劳工。这并不是马氏新发明的理论，从前 Sismondi，Saint—Simon，Proudhon，Rodbertus 诸人，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曾有过这种议论。不过他们的批评，与其说是经济的，毋宁说是社会的。私有财产制及其不公，是他们攻击的标的。马氏则不然，他郑重的归咎于经济科学的本身，特别归咎于交易观念。他所极力证明这私营事业必须存在的理由，就是因为这是交易不能免的结果。——一个经济上的必要，贵族与平民都须服从的。

马氏的“余工余值说”，是从他那“劳工价值论”演出来的。

马氏说劳工不只是价值的标准与理由，并且是价值的本体。从前 Ricardo 也曾有过类似的观念，但他未能决然采用。马氏于此，毅然采取其说，不像 Ricardo 的踌躇。

马氏也决不否认“效用是价值的必要条件”。由效用的价值而论，这的确是唯一的理由，但他以为单拿效用这一点说明交易的价值，理据尚不充足。每在一个交易的行为，两个物品间必含着共同的原素，一致的等级。此种一致，决不是效用的

结果，因为效用的等级，在每个物品中均不相同。而所以构成交易这件事存在的理由的，就是这个不同。在那些性质各异的物品中所含的共同原素，不是效用，乃是那些物品中所含劳工分量的大小。每个物品的价值，应该纯是物品中所含人类劳工结晶的全量。物品价值的分别，全依劳工的分量而异。此等劳工，是于生产这些物品有社会的必要的东西。

例如有一工人在一种产业里作工，一日工作十小时，什么是他的生产物的交易价值呢？这交易价值，应该是他那十小时劳工的等量。他所生产的，是布，是煤，或是他物，都不必问。按工银交易的条件，资本家把处分物品的权保留在自己手中，而按实在的价值出售。这实在的价值，就是十小时劳工的等量。

工人的工力（Labour force）为工银所买，与其本人断绝关系。工银专以代表资本家偿他工力的物价，而资本家即保持自由处分这个物品（指工力）的权力于自己手中。工力价值的决定，与别的可以交易的物品相同。工力恰是一种物品，他的价值也是由那于他的生产所必需的劳工时间数目决定。

生产工力所必需的工量（Labour quantity），是一种稍觉奇异的话，初究马氏学说的人，最难领会其旨趣。但是必须领会，才得了解马氏的经济学说。实在稍加研究，觉得这种见解也并没有什么稀奇。设若拿一个机械的活动代替一个工人的劳工，执一个工程师，问他这架机械要多少维持费？他决不以为奇，并且立答以每时每日需多少吨煤炭，而煤炭的价值，又纯是代表那采掘煤炭的一定人工的总积。我们把煤炭换成劳工去说明他，又有什么难懂呢？

工银制下的工人，纯是一种机械。所不同的地方，维持机械的财物是在他处由他人的劳工生产出来的，维持工人的财物

是由他自己的劳工生产的一小部分。一时间的劳作，或一日的辛苦，其价值均可以在那个时间保持那个工人使他能够完全维持他的生产力所必需的需要为标准。无论资本家以物品以金钱偿他的工值，都是代表那必要费的价值。

维持工力所必要的物品的价值，永不能与那工力的生产的价值相等。例如一日维持工力所必要的物品的价值，决不能与十小时工力的价值相等，或且不抵五小时。在模范状态下的人类工力，常足以生产比他所单纯消费的物品的价值多。

工人所生产的价值，全部移入资本家的手中，完全归他处分。而以其一小部分用工银的名目还给工人，其量仅足以支应他在生产此项物品的期间所消用的食品，余则尽数归入资本家的囊中。生产物的售出，其价与十小时的工力相等，而工人所得，则只抵五小时工力的价值。其余五小时工力的价值，马氏叫作“余值”（Surplus value）。

这样办去，资本家获得工人十小时的工力，而仅以五小时的代价还给工人。其余五小时的工力，在工人毫不值钱。前五小时间工人所生产的，等于他的工值。第五时以后他所做的工，于他什么也不值了。这生产“余值”的额外时间，于工人本身一文不值的工力，马氏叫作“余工”（Surplus labour）。

余值既全为资本家的掠夺品，那工人分外的工作，就是余工，便一点报偿也没有。刚是对工人的能力课额外的汗血税，而为资本家增加幸运，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秘密，这是资本主义下资本家掠夺劳工生产的方式。

因为这个原故，资本家的利益，就在增大余值。他们想了种种方法，达这个目的。解析这些方法，揭破资本主义的秘密，就是马氏学说特色之一。依马氏的解析，资本家增大余值的方法有二要着：

一、尽力延长工作时间，以求增加余工时间的数目。假使工作时间的数目，可以由十小时增至十二小时，这余工时间，自然可以由五小时增至七小时。企业家常谋为此。虽有工场立法，强制些产业限制工作时间，于阻止余值的增长多少有点效果，但推行的范围，究竟限于少数产业，所以“八时间工作”的运动，仍不能不纷纷四起。

二、尽力缩短生产工人必要生活费的时间。假令生产工人必要生活费的工作时间，由五小时缩短至三小时，那余工时间自然由五小时增至七小时了。此种缩短，是可以由产业组织的完全或由生活费的减少作得到的。生活费减少，常为由协力（Cooperation）的影响所生的结果。资本家每依建立慈善院或雇用比成人生活费较少的妇幼劳工以图此利益。妇幼离开家庭，那一切家事乃至煮饭洗衣等等，都留给男子去做。但若有维持女工工银与男工相等的方法或限制妇幼劳工的法律，此种战略，也就完全失败了。

马氏的论旨，不在诉说资本家的贪婪，而在揭破资本主义的不公。因为掠夺工人的，并不是资本家，乃是资本主义，工银交易的条件，资本家已经全然履行。你得一份钱，他买一份货，也算是公平交易。既然许资本主义与自由竞争行于经济界，这种结果是必不能免的。资本家于此，固极愿购此便宜物品，因为他能生产比他自身所含价值还多的东西。唯有这一班可怜的工人，自己把自己的工力像机械一般贱价给人家，所得的价格，仅抵自己生产价值之半，或且不及其半，在法律上经济上全没有自卫之道，而自己却视若固然。这不是资本家的无情，全是资本主义的罪恶！

（九）

前节所述，是马氏“价值论”的要旨。而与其“价值论”最有关系的“平均利润率论”，也不可不略为说明。

今于说明“平均利润率论”以前，须先说一说那余值怎么变成利润的道理。余值本是由劳工生产的价值中除去他的必要生活费所余的价值。这必要生活费就是可变资本。是资本的一部分，不是资本的全部。余值的发生，是单由于可变资本，不是由于资本全部。但因生产物品时支出的费用都出自资本（这些费用，马氏叫作费用价格），而于费用价格的表形，不能认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间有何等区别，就把那仅与可变资本有关系的余值作成与全资本都有关系的样子。工力的价格就变成工银，工力生产的余值就变成利润了。我们可用左列的论式表明这个道理：

1. 全资本（C）由不变资本（c）与可变资本（v）而成，

2. 可变资本生出余值（m），

3. 余值对于可变资本的比例（m/v）叫作余值率，用 m 代他，

4. 因而得 $m/v=m$ 的公式，

5. 又生 $m=mv$ 的公式，

6. 今不令余值仅关系于可变资本，而使关系于全资本，把他叫作利润（P），

7. 余值对于全资本（C）的关系（m/C）为利润率，用 P' 代他，

8. 从而得 $P'=m/C=m/C+v$ 的公式，

9. 若把 m 换成 $m'v$ 又得 $P'=m'v/c=m'v/c+v$ 的新公式，

10. 再把他换成比例式，断得 $P' : m' = v : c$ 的公式，

依此我们可以证明利润率之于余值率的关系，与可变资本之于全资本的关系相等。我们又可断定利润率（P'）常比余值率（m'）小，因为可变资本（v）常比全资本（C）小（$C=c+v$）。

资本主义把那仅与可变资本有关系的余值，变成与全资本有关系的利润，把那对于可变资本的比例的余值率，变成对于全资本的比例的利润率。在这神秘的形态中，把余值用利润的名义尽行掠去的真相，就是如此。

依以上所述的原理，余值随可变资本而增减，全与不变资本的多少无关。但实际上无论可变不变二种资本的比例如何变动，利润率常为同一。这是一个显然的矛盾。为使理论愈益明显，分析解说如左：

1. 余值准可变资本的多少而增减，可变资本多则余值多，可变资本少则余值少。

2. 利润率是把余值以对于全资本（合不变与可变二种）的比例表明的东西，故可变资本多则利润率高，少则利润率低。

3. 然于实际，不拘可变资本分的多少，同一的全资本额有同一的平均利润率。

依马氏可变资本分多则利润率高，少则低的定理，应如左表：

C（全资本）c（不变）v（可变）	m′余值率	m 余值	P′利润率
100＝80＋20	100％	20	20％
100＝70＋30	100％	30	30％
100＝60＋40	100％	40	40％
100＝85＋15	100％	15	15％
100＝95＋5	100％	5	5％

而于实际，这五种产业的利润率都为同一，与价值原则绝不相容。这就是“平均利润率的谜”。

昂格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文中曾说，这个矛盾，Ricardo 已经看出而未能解释，Rodbertus 也曾注意而未能解决，至于马氏，在他的《经济学批评》里，已经解决过这个问题，而在《资本论》第三卷始完全予以解答。故解释“平均利润率的谜”，在马氏书中是一个最著名的点，而因为解释此谜的原故，把他的“劳工价值论”几乎根本推翻。他的学说本身，发生一绝大矛盾，故又是一个最大弱点。

马氏解谜的键，并没有什么稀奇的道理，不过是：

一、商品若能按其价值被买卖，利润率必生种种差别。

二、然于实际，商品不能按其价值被买卖。

三、即于实际，以按不变可变两资本平均结合比例以上的比例结合的资本生产的商品，于其价值以上被买卖。以平均以下的比例的资本生产的商品，于其价值以下被买卖。

马氏以左表说明这个道理：

	资本结合比例	余值	已经消费的资本	商品的价值	费用价格	商品卖价	利润率	价值与卖价的差
Ⅰ	80c＋20v	20	50	90	70	92	22％	＋2
Ⅱ	70c＋30v	30	51	111	81	103	22％	－8
Ⅲ	60c＋40v	40	51	131	91	113	22％	－18
Ⅳ	85c＋15v	15	40	70	55	77	22％	＋7
Ⅴ	95c＋5v	5	10	20	15	37	22％	＋17

我们再把此表细加说明如下：

一、Ⅰ例	不变资本 80	可变资本 20	合计 100
Ⅱ例	不变资本 70	可变资本 30	合计 100
Ⅲ例	不变资本 60	可变资本 40	合计 100
Ⅳ例	不变资本 85	可变资本 15	合计 100
Ⅴ例	不变资本 95	可变资本 5	合计 100

二、余值率（m/v 即 m′）依马氏的定理皆为同一。兹假定余值率为 100%，

三、那么

Ⅰ例，对于可变资本 20 其 100%的余值为 20，

Ⅱ例，对于可变资本 30 其 100%的余值为 30，

Ⅲ例，对于可变资本 40 其 100%的余值为 40，

Ⅳ例，对于可变资本 15 其 100%的余值为 15，

Ⅴ例，对于可变资本 5 其 100%的余值为 5，

四、费用价格，即生产费，应该与恰足收回（1）可变资本的全部及（2）不变资本中被消费的部分二者的数相当。那不变资本中被消费的部分，假定Ⅰ例为 50，Ⅱ例为 51，Ⅲ例为 51，Ⅳ例为 40，Ⅴ例为 10，

五、那么费用价格的额，应如左表：

	可变资本		消费资本额		费用价格
Ⅰ	20	＋	50	＝	70
Ⅱ	30	＋	51	＝	81
Ⅲ	40	＋	51	＝	91
Ⅳ	15	＋	40	＝	55
Ⅴ	5	＋	10	＝	15

六、商品的价值，等于把余值与上表所举的费用价格合算

起来的数。就是

Ⅰ 70＋20＝90　Ⅱ 81＋30＝111　Ⅲ 91＋40＝131
Ⅳ 55＋15＝70　Ⅴ 15＋5＝20

七、商品若能按其价值买卖，其卖价应如左表：

Ⅰ	Ⅱ	Ⅲ	Ⅳ	Ⅴ
90	111	131	70	20

八、而于实际，商品不能按其价值买卖，而以对于平均结合比例所生的余值与费用价格的合计为卖价。用不变资本在平均结合比例以上时，其卖价在上表所列的价值以上。用不变资本在平均结合比例以下时，其卖价在右表所列的价值以下。

九、今为看出这个平均结合比例，应该把第一至第五的资本总括起来，算出不变可变两种资本的百分比例。就是

资本总额 100＋100＋100＋100＋100＝500

不变资本总额 80＋70＋60＋85＋95＝390

可变资本总额 20＋30＋40＋15＋5＝110

把这二种资本总额变成百分比例，得式如下：

390/500＝78％　110/500＝22％

而余值总额为 20＋30＋40＋15＋5＝110

110/500＝22％

十、这 22％就是对于平均结合比例 78c＋22v＝100，所生的余值就是对于全资本额的平均利润率。

十一、那么实在的卖价，应是：

Ⅰ 70＋22＝92　Ⅱ 81＋22＝103　Ⅲ 91＋22＝113

Ⅳ 55＋22＝77　Ⅴ 15＋22＝37

十二、随着资本结合的比例不同，有的得其价值以上的卖价，有的得其以下的卖价。现在把这五个例的卖价与其价值的

差额算出如左：

第一例，卖价比价值多二，

第二例，卖价比价值少八，

第三例，卖价比价值少十八，

第四例，卖价比价值多七，

第五例，卖价比价值多十七，

十三、再把这五个例的差额合算起来 2－8－18＋7＋17＝0 各个的差异正负相消，由全体上看，卖价与价值仍无二致。

这就是马氏的平均利润率论。

由马氏的平均利润率论看起来，他所说的生产价格——就是实际卖价——和他所说的价值全非同物。但于价值以外，又有一种实际卖价，为供求竞争的关系所支配，与生产物品所使用的工量全不相干。结果又与一般经济学者所主张的竞争价格论有什么区别？物品的实际价格既为竞争所支配，那劳工价值论就有根本动摇的危险。劳工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基础一有动摇，学说全体为之震撼。这究不能不算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大遗憾。

（十）

马氏的余值说与他的资本说很有关系。他的名著就是以“资本”这个名辞被其全编，也可以看出他的资本说在他的全学说中占如何重要的位置。我所以把他略为介绍于此。

马氏分资本为不变与可变两种。原来资本有二个作用：一是自存，一是增殖。资本用于生产并不消失，而能于生产物中为再生产，足以维持他当初的价值，这叫资本的自存。而资本又不止于自存，生产的结果，更于他本来价值以上生出新价

值，这叫资本的增殖。马氏称自存的资本为不变资本（Constant capital），称增殖的资本为可变资本（Variable capital）。能生增殖的，唯有劳力。故唯资本家对于劳工所给的劳银或生活必要品，是可变资本，其余生产工具，都是不变资本。

马氏所说的不变资本，也不是说形态的不变，是说价值的不变。在一生产经过中变其形态的资本，为流通资本，不变其形态的资本，为固定资本。然几经生产以后，就是固定资本，也不能不变其形态。没有永久不变形态的资本。永久不变的，只是他的价值。一万元的资本，千百年前是一万元，千百年后还是一万元。这项资本中永久不变的东西，就是这一万元的价值。

不变资本不能产出余值，只能产出他的价值的等值，他的价值，就是生产他的时候所吸入的价值的总额。

不变资本也是由劳力结晶而成的生产物。他的价值也是依劳工时间而决定，与别的生产物全是一样。

马氏为什么分资本为不变与可变二种呢？就是因为以利息普遍率说为前提。利息普遍率说是由来经济学的通说。其说谓凡资本都能自存，不能自存的，不是资本，是消费财。这个自存，不因事业的性质使用者的能力而异，全离开人格超越环围而行。这就是利息所以有普遍率的原故。一万元的资本，用到农业上商业上均是一万元。这一万元因把他用于生产上生出利息。这个利息为资本自存的价值，随时随地有一定普遍的率，决没有甲的一万元生一分利息，乙的一万元生二分利息的道理。有之就是把别的所得，在利息名义之下混合来的。然在实际上，同是值一万元的资本，他的生产效程决不一样。房屋与机器同是值一万元的东西，而房屋与机器的生产效程不同。同是用一万元买的机器，而甲机器与乙机器的生产效程各异。可

是生产分配分的利息普遍均等。有的学者说这个差异不是资本的作用，全是企业能力的关系，富于企业能力的去经营，所得的生产效果多，否则少，故主张以此项差额归入企业的利润。马氏以为不然，他说所以有这个差额的原故，全是因为自存的资本以外有增殖的资本。自存的资本，当然受一定普遍的利率，以外的剩余，都是增殖的资本所生的。增殖的资本，就是资本中有生这个剩余的力量的。有这个力量的资本，只是那用作劳工生活维持料的资本。资本的所有者应该以自存就算满足，应该作不变资本的所得承受利息。那可变资本所得的增殖，全该归生出这个的工人领受，要是把这个归于资本家或企业家，就是掠夺劳工的正当权利，企业的利润，就是赃物的别名。

只有价值决不能生产，必有劳工运用他才能有生产的结果，因为劳工是资本的渊源。可是只有劳工没有维持他们生活的可变资本，还是不能生产。我们从此可以看出劳工与资本也应该有些结合。

于此我们应加特别注意的，就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学鼻祖的马克思与那为个人主义经济学鼻祖的亚丹·斯密氏两人的资本论颇有一致的点，且不是偶然一致，他们实在有系统的立于共同思想上的地方。

马克思分资本为不变与可变二种，亚丹·斯密则分资本为固定与流通二种。亚丹·斯密的固定资本，适当马克思的不变资本，流通资本适当可变资本。其相同的点一。

他们都认随着产业的种类这二种资本配合的比例也不一样。其相同的点二。

马克思主张唯可变资本才能于收回自己的本来价值以外生产余值，余值率常依可变资本的多少为正比例。亚丹·斯密主

张固定资本不能自己生出收益，必赖流通资本的助力始生收益的剩余。其相同的点三。

马克思说唯有用作维持劳工生活资料的资本是可变资本。亚丹・斯密列举流通资本的内容，也以维持劳工生活的资料为主。其相同的点四。

可是马克思的可变资本与亚丹・斯密的流通资本，其内容也并非全同。亚丹・斯密的流通资本中，实含有一、止于收回自己本来价值的，二、以外还生出剩余的二部分。就是把马克思的一、被消费的不变资本的部分，二、可变资本的全部，二者合称为流通资本。那么亚丹・斯密的所谓收益（Revenue），其实也把自己收回分包含在内，就是于马克思的所谓余值以外，并包括有生产费在内。

马克思主张劳工价值说，亚丹・斯密主张生产费价值说，二人的出发点不同。可是马克思终于依了生产费价值说才能维持他的平均利润率说，又有殊途同归的势子。

总之，不变可变资本说是支撑马氏余值论的柱子，余值论又是他的全经济学说的根本观念，这资本说被人攻破，马氏经济学说必受非常的打击。然而他的不变可变资本说与亚丹・斯密的固定流通资本说大致相同。而在亚丹・斯密的固定流通资本说，则人人祖述奉为典型，以为是不能动摇的定理。而在马克思的不变可变资本说，则很多人攻击，甚或加以痛诋，我们殊为马氏不平！

（十一）

宗马氏的说，入十六世纪初期，才有了资本。因为他所谓资本，含有一种新意义，就是指那些能够生出使用费的东西。

这个使用费，却不是资本家自己劳力的结果，乃是他人辛苦的结果。由此意义以释“资本”，十六世纪以前，可以说并没有资本与资本家。若本着经济上的旧意义说资本单是生产的工具，那么就是十六世纪以前，也何尝没有他存在？不过在那个时代，基尔特制（Guild system）下的工人，多半自己有自己的工具，与马氏用一种新意义解释的资本不同。

马氏根据他那“社会组织进化论”，发见这种含有新意义的资本，渐有集中的趋势，就构成了他的“资本集中论”。

请述他的“资本集中论”的要旨。近代科学勃兴，发明了许多重要机械，致人类的生产力逐渐增加，从前的社会组织，不能供他回翔，封建制度的遗迹，遂全被废灭。代他而起的，乃为近代的国家。于是添了许多新的交通手段，辟了许多新的市场。这种增大的生产力，得了适应他的社会组织，得了适应他的新市场，随着公债的成立，又发生了好多的银行和商业公司，更足助进产业界的发展。从前的些小工业都渐渐的被大产业压倒，也就渐渐的被大产业吸收了。譬如 Trusts 与 Cartels 这些组织，在马氏当时，虽未发生，到了现在，却足作马氏学说的佐证。这 Trusts 与 Cartels 的组织，不止吸收小独立产主，并且把中级产主都吸收来，把资本都集中于一处，聚集在少数人的手中。于是产业界的权威，遂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

上节所说，是资本家一方面的情形。工人这一方面呢，因受这种新经济势力的压迫，不能不和他们从前的财产断绝关系，不能不出卖他自己的劳力，不能不敲资本家的大门卖他自己的人身。因为他们从前卖自己手造的货品的日子过去了，封建制度和基尔特制度的遗迹都消失了，他们不卖自己的筋力别无东西可卖了！这些工人出卖的劳力，可以产出很多的余值，一班资本家又能在公开市场里自由购买，这真是资本家们创造

新样财产的好机会。但是这种新样财产的造成，全是基于别人的血汗，别人的辛苦。他们新式财产之成功，就是从前基于自己劳力而成的旧式财产之破灭。少数资本家的工厂，就是多数无产阶级的大营。从前的有产阶级，为了这个事业，不知费了多少心力，奔走呼号了三世纪之久，他们所标榜的“人权”、“工人自由”的要求，正是他们胜利的凯歌。因为他们要想在市场里收买这种便宜货品，必须使这些工人脱离以前的关系，能够自由有权以出售他自己。他们的事业成功了，工人的命运也就沉落在地底了！

资本主义是这样发长的，也是这样灭亡的。他的脚下伏下了很多的敌兵，有加无已，就是那无产阶级。这无产阶级本来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到后来灭资本主义的也就是他。现今各国经济的形势，大概都向这一方面走。大规模的产业组织的扩张，就是大规模的无产阶级的制造。过度生产又足以缩小市场，市场缩小，就是工人超过需要，渐渐成了产业上的预备军，唯资本家之命是听，呼之来便来，挥之去便去。因为小产主的消灭与牧业代替农业的结果，农村的人口也渐集中于都市，这也是助长无产阶级增长的一个原因。无产阶级愈增愈多，资本愈集中，资本家的人数愈少。从前资本家夺取小手工小产业的生产工具，现在工人要夺取资本家的生产工具了。从前的资本家收用手工和小产业的生产工具，是以少数吸收多数压倒多数，现在工人收用资本家的生产工具，是以多数驱逐少数，比从前更容易了。因为无产阶级的贫困，资本家在资本主义下已失救济的能力，阶级的竞争因而益烈。竞争的结果，把这集中的资本收归公有，又是很简单的事情。“善泅者死于水，善战者死于兵”。凡物发达之极，他的发展的境界，就是他的灭亡的途径。资本主义趋于自灭，也是自然之势，也是不可免

之数了。从前个人自有生产工具，所以个人生产的货品当归私有，现在生产的形式已经变为社会的，这分配的方法，也该随着改变应归公有了。资本主义的破坏，就是私有财产制的破坏。因为这种财产，不是由自己的劳工得来的，是用资本主义神秘的方法掠夺他人的辛苦得来的，应该令他消灭于集产制度之下，在资本主义未行以前，个人所有的财产，的确是依个人的劳工而得的。现在只能以社会的形式令这种制度的精神复活，不能返于古昔个人的形式了。因为在这大规模的分工的生产之下，再复古制是绝对不可能。只能把生产工具由资本家的手中夺来，仍以还给工人，但是集合的，不是个人的，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得和他劳工相等的份就是了。到了那时，余工余值都随着资本主义自然消灭了。

以上系马氏“经济论”的概要，本篇暂结于此。

根据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一月出版的
《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六号刊印。

PDG

再论问题与主义

（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七日）

李　大　钊

适之[1]先生：

我出京的时候，读了先生在本报三十一号发表的那篇论文，题目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发生了一些感想。其中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发明，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现在把他一一写出，请先生指正！

一、“主义”与“问题”　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永没有解决的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

不悖的。不过谈主义的人，高谈却没有甚么不可，也须求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无论失败与成功，在人类的精神里，终能留下个很大的痕影，永久不能消灭。从前信奉英国的 Owen 的主义的人，和信奉法国 Fourier 的主义的人，在美洲新大陆上都组织过一种新村落、新团体。最近日本武者小路氏等，在那日向地方，也组织了一个"新村"。这都是世人指为空想家的实验，都是他们的实际运动中最有兴味的事实，都是他们同志中的有志者或继承者集合起来组织一个团体在那里实现他们所理想的社会组织，作一个关于理想社会的标本，使一般人由此知道这新社会的生活可以希望，以求实现世界的改造的计划。Owen 派与 Fourier 派在美洲的运动，虽然因为离开了多数人民去传播他们的理想，就像在那没有深厚土壤的地方撒布种子的一样，归于失败了。而 Noeyes 作《美国社会主义史》却批评他们说，Owen 主义的新村落，Fourier 主义的新团体，差不多生下来就死掉了。现在人都把他们忘了。可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永远存留在国民生命之中。如今在那几百万不曾参加他们的实验生活，又不是 Owen 主义者，又不是 Fourier 主义者，只是没有理论的社会主义者，只信社会有科学的及道德的改造的可能的人人中，还有方在待晓的一个希望，犹尚俨存。这日向的"新村"，有许多点像那在美洲新大陆上已成旧梦的新村。而日本的学者及社会，却很注意。河上肇博士说：他们的企划中所含的社会改造的精神，也可以作方在待晓的一个希望，永存在人人心中。最近本社仲密[2]先生自日本来信也说："此次东行在日向颇觉愉快。"可见就是这种高谈的理想，只要能寻一个地方去实验，不把他作了纸上的空谈，也能发生些工具的效用，也会在人类社会中有相当的价值。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作，都是对的，都是有

效果的。这一点我的意见稍与先生不同，但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

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哪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他那互助友谊的精神，不论是科学派、空想派，都拿他来作基础。把这个精神适用到实际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在清朝时，我们可用民主主义作工具去推翻爱新觉罗家的皇统。在今日，我们也可用他作工具，去推翻那军阀的势力。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那么，先生所说主义的危险，只怕不是主义的本身带来的，是空谈他的人给他的。

二、假冒牌号的危险　一个学者一旦成名，他的著作恒至不为人读，而其学说却如通货一样，因为不断的流通传播，渐渐磨灭，乃至发行人的形象、印章，都难分清。亚丹·斯密史留下了一部书，人人都称赞他，却没有人读他。马查士留下了一部书，没有一个人读他，大家却都来滥用他。英人邦纳

（Bonar）氏早已发过这种感慨。况在今日群众运动的时代，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多半是群众运动的隐语、旗帜，多半带着些招牌的性质。既然带着招牌的性质，就难免招假冒牌号的危险。王麻子的刀剪得了群众的赞许，就有旺麻子等来混他的招牌；王正大的茶叶得了群众的照顾，就有汪正大等来混他的招牌。今日社会主义的名辞，很在社会上流行，就有安福派的社会主义，跟着发现。这种假冒招牌的现象，讨厌诚然讨厌，危险诚然危险，淆乱真实也诚然淆乱真实。可是这种现象，正如中山先生所云新开荒的时候，有些杂草毒草，夹杂在善良的谷物花草里长出，也是当然应有的现象。王麻子不能因为旺麻子等也来卖刀剪，就闭了他的剪铺。王正大不能因为汪正大等也来贩茶叶，就歇了他的茶庄。开荒的人，不能因为长了杂草毒草，就并善良的谷物花草一齐都收拾了。我们又何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

三、所谓过激主义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扎维主义的议论很少。仲甫[3]先生和先生等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据日本《日日新闻》的批评，且说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扎维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当那举世若狂庆祝协约国战胜的时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 的胜利》的论文，登在《新青年》上。当时听说孟和[4]先生因为对于布尔扎维克不满意，对于我的对于布尔扎维克的态度也很不满意（孟和先生欧游归来，思想有无变动，此时不敢断定）。或者因为我这篇论文，给《新青年》

的同人惹出了麻烦，仲甫先生今犹幽闭狱中，而先生又横被过激党的诬名，这真是我的罪过了。不过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所以一听人说他们实行“妇女国有”，就按情理断定是人家给他们造的谣言。后来看见美国《*New Republic*》登出此事的原委，知道这话果然是种谣言，原是布尔扎维克政府给俄国某城的无政府党人造的。以后辗转传讹，人又给他们加上了。最近有了慰慈[5]先生在本报发表的俄国的新宪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几篇论文，很可以供我们研究俄事的参考，更可以证明妇女国有的话全然无根了。后来又听人说他们把克鲁泡脱金氏枪毙了，又疑这话也是谣言。据近来欧美各报的消息，克氏在莫斯科附近安然无恙。在我们这盲目的社会，他们哪里知道 Bolshevism 是什么东西？这个名辞怎么解释？不过因为迷信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日本人把他译作过激主义，他们看“过激”这两个字很带着些危险，所以顺手拿来，乱给人戴。看见先生们的文学改革论，激烈一点，他们就说先生是过激党。看见章太炎、孙伯兰的政治论，激烈一点，他们又说这两位先生是过激党。这个口吻是根据我们四千年先圣先贤道统的薪传。那“杨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逻辑，就是他们唯一的经典。现在就没有“过激党”这个新名辞，他们也不难把那旧武器拿出来攻击我们。什么“邪说异端”哪，“洪水猛兽”哪，也都可以给我们随便戴上。若说这是谈主义的不是，我们就谈贞操问题，他们又来说我们主张处女应该与人私通。我们译了一篇社会问题的小说，他们又来说我们提倡私生子可以杀他父母。在这种浅薄无知的社会里，发

言论事，简直的是万难，东也不是，西也不是。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那些猫、狗、鹦鹉、留声机，尽管任他们在旁边乱响；过激主义哪，洪水猛兽哪，邪说异端哪，尽管任他们乱给我们作头衔，哪有闲工夫去理他！

四、根本解决　“根本解决”这个话，很容易使人闲却了现在不去努力，这实在是一个危险。但这也不可一概而论。若在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个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机会，马上就可以用这工具作起工来。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部解决了。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有许多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很吃了这个观念的亏。天天只是在群众里传布那集产制必然的降临的福音，结果除去等着集产制必然的成熟以外，

一点的预备也没有作，这实在是现在各国社会党遭了很大危机的主要原因。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

以上拉杂写来，有的和先生的意见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异，已经占了很多的篇幅了。如有未当，请赐指教。以后再谈吧。

李大钊

寄自昌黎五峰

根据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七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三十五号刊印。

注 释

〔1〕即胡适。
〔2〕即周作人。
〔3〕即陈独秀。
〔4〕即陶孟和。
〔5〕即张慰慈。

PDG

马克思主义（Marxism）（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月）

杨 匏 安

自马克斯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而德国社会民主党，且去来查尔而归于马氏，在近世社会党中，其为最有势力者无疑矣。马氏以唯物的史观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加之以在英法观察经济状态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此其所以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也。

由发表《共产党宣言》书之一八四八年，至刊行《资本论》第一卷之一八六七年，此二十年间，马克斯主义之潮流，达于最高，其学说亦以此时大成，所谓唯物的史观论，盖由实在一元论而生之历史自然科学的观察，更傅以革命色彩者也。其历史的根源，不在天之创成，而归之地之生产，以技术及经济的因子，为一切政治及精神上之历史原动；生产上之变化，即历史变化所由起；划分历史上之时期者，生产之手段（器具机械）也；演出社会上之阶级者，生产之形态也；而此种阶级

---

* 本文原载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十三日至十五日、十七日至二十二日、二十六日、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十二月三日至四日《广东中华新报》，前后共连载十九次。本文中缺四日次。

之战争，即人类之历史焉。

一国之法律，全视其国之社会经济而定。社会生活之实体，即经济是也。经济犹基础，法律政治犹建筑；若经济的特性有重大变化，则节制此经济之形式，必随之而转移；故社会生活之内，有一种规律，这种规律可以以天然科学的方法探得，盖社会经济的现象，原为一种天然物，其现象之全部，即是社会生活的物质，而其现象之生存毁灭，即物质的运动也。

唯物的历史观，不否认理想的作用，无论过去未来，人之社会理想，皆可以为改变法律及社会秩序之近因，然人于善恶的想象，决非离此物质世界，而为独立存在者也。换言之，人于善恶的想象，决非别有一个因果行列者也；试就历史上之社会变迁察之，一切理想，不为社会变迁之最终的原因，实一种社会经济的影子，以其既有此种社会经济，然后一切理想方能发生也。

唯物的历史观对于社会之理想与经济的关系，有二种说，第一，宇宙之内，但有一个单纯的经验；一切事变，皆从一个时间行列演出。世界无两个时间种类，亦无两个不同性质之因果系；理想与物质，乃联结于一个因果系之中。第二，社会经济与其现象，即社会生活之唯一实在；此外所有社会的理想期望，皆以一种不可易之公例，而随社会的经济以为转移。

于是由第二说之理论，生出一个极重要之断案，社会理想既全为社会经济的影子，而非改革社会制度之最终的原因，是故社会制度之改革，必不能恃其社会的理想，而必由于阶级之战争，盖阶级战争者，经济现象的结果也。

当马克斯之世，哲学的大思想家时代，已属过去。凡研究社会科学及史学者，专探讨单独的事实，注重零碎的考求，此种研究办法，在天然科学固可畅行无碍，至于社会科学，乃不

能适用，因社会生活究以何种规则发展，及与天然界的现象有何关系，此两个重大问题，尚未讨论透彻，故单独零碎者，无原则可准，无方法可循。自马克斯唯物的历史观既出，其于社会科学之意义，固在于提示社会生活的规则，此其所以为极有用之史学方法，又为空前的社会哲学欤！

近世的经济，已渐变而为社会式的经济矣。易辞以明之，则近世的出产，乃由“大经济单位”通力合作而成（大经济单位，如工厂田地商业等，用大规模及大计划、聚集群众而组成者）。此种大经济单位，其量愈大，其数愈少，是则现在社会经济的实状也。顾现行之法律，仍沿袭古代而来。古者工作所用之器械，乃工人所自有，故当时法律，承认工作所出之产物，宜归之作者。然在近世则不然，此法律的经济基础，既已变更，工作之器械，不为自有，而工作者但受佣于人，所得产物，亦不能自有，故曰近世的经济，乃合力共作，为社会式的经济也。

然而现行法律，犹本于古代独作自享的经济（个人式者）而立。其与近代社会相冲突抑亦明矣。法律与其经济基础既不相称，以唯物的历史观论之，法律终必让步，随经济而转移。而私有财产之制度，又基于古代经济的法律而立，今日尤无存在之理。近世的经济制度，犹有一最重大矛盾，盖一个经济单位之中，则有多数人循大计划而为工作，纪律既明，尤能统一；然社会之内，各个经济单位之间，彼此不相统属，无计划，亦无秩序。换言之，一个经济单位的本身，固有完全的组织，至于各个经济单位之并立，乃无一个意志以为支配也。

各个经济单位之间，既无所统一，于是各谋其利，不恤耗费多数人工与材料，由经济发展的趋势观之，此等矛盾的生产法，终归废除矣。

唯物的历史观有二要点：其一乃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之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第一说谓人类社会生产机关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此实为社会之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之政治法制，及种种精神上的构造，皆随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而基础构造，其内部亦有最高动因，以促其自己之进化，此最高动因，即生产力是也。第二说谓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化，社会组织必随之而变动。社会组织即社会关系，与布帛粟米无异，亦人类依生产力而产出者也。手臼产出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产出产业资本家的社会。社会组织即其始亦尝助长生产力的发展，然其发展的力若到社会组织不能适应之程度，则社会组织不独不能为之助长，势必加之以束缚妨碍矣。此时生产力虽受束缚妨碍，然仍发展无已，发展的力愈大，与社会组织之冲突愈迫，其结果非令旧社会组织崩坏不可，是则社会革命也。

自马克斯倡其唯物的历史观以后，举凡社会的科学，皆顿改其面目。昔之学者，咸谓人类特长，在有灵性，能驱驾万类；故以为人类文化史实由于人类之精神所成；人类的精神，不随历史而变化，故文化的根本方向亦无变化，于是立一定之法道，作文化之标准，以一时代一地方之形式，而范围各时代各地方的现象，此其弊在消极的固使多数人不能进步，在积极的仍发生无限痛苦也。然马克斯之论文化史，谓不成于人类的精神，而成于物质的境遇。从表面观之，各种文化，似皆出自人类之努力，惟实际上终由物质而决定。人类处自然支配之下，不过能利用自然，遂较万类为高耳。人类之精神的努力，既由物质的境遇而定，故人类的文化史，亦由物质的境遇而定。宇宙间物质之性质，及其数量，以物理学言，固无绝对的变更，然在经济学上，未尝无相对的转易。又若律以物质不灭

及物质普遍之公例，则物质之性质数量，无古无今，混然一体。然而物质之结合与其位置，苟从新陈代谢周流循环之生理学、化学、社会学、经济学的公例观之，仍有生灭流转；是故物质之结合位置一变，则人类之文化亦不得不一变，如唯物的历史哲学所言，一切道德、法律、政治、宗教、经济、艺术等等现象，皆须随顺时宜，常起变更，固无永远适用者也。

吾人试以唯物的历史观而研究社会的科学，此中殊有兴味。今就道德的历史而言，果详考其沿革，可发见其内容，至少已经四大变动矣：第一时期，人类无多，自然的物质又极充裕，人类但能利用自然的物质，便可生活，不必讲求培养自然物质及结合自然物质之方法也；在此时期之人类，所谓放乎自然，游于天机，故有天然之理法，而无人为之道德。其在第二时期，人类已渐繁殖，自然的物质，亦渐不足用，故讲求培养与结合之方法；然是时人类的智力，殊不发达，其方法弥为幼稚，且无劳动的经验，复无劳动的趣味；而一群之中，有比较聪明而有武力者，遂立为一种绝对服从之人为道德，以强制愚弱之众，为一己戮力，而坐享其物质；故道德始生于是期，其性质则完全屈伏者也。

其后人于第三时期．人类愈益繁庶，物资愈益缺少，欲求足用之生产，不得不用较多之劳力；而生产的方法，又较前此为复杂，欲使人类竭其全力，以复杂的方法而产出物资，非令其自愿劳动，及令其有为自己生活而为劳动之自觉不可；故此时期之道德，以个人人格之独立发展为内容，绝对的强制劳力，已无大效。

第四时期，一切文化较前尤为进步，人类死亡之原因，渐行减少，人类的绝对数愈增，生产物资之方法，纵使突过前时，然亦终不能与人类加增为骈进；加以资本家之抑制生产，

及人类之消费量日多，而物资愈难足用；欲应人人所求，唯有用统筹全局，合最大的生产力、行最大的分配之经济方法而已。故第四期之道德，在于合力互助，而有其社会的性质者也。

若以唯物的历史观而研究法律之沿革，则其时代现象，颇与道德的沿革相同。在第一时期，但有自然法，而无人为法之支配。第二期始有人为法，然既役使愚弱，代豪强者而生产，则其所定法律，皆所以保少数人之利益，法制史上所谓严格法时代之法律，是即以保护强权为内容者也。第三期因欲使人类觉悟自己人格，维持独立生活之故，其法律乃以保护人权为内容；所谓自然法平衡法及自由法时代之法律，皆属于此。第四期生产愈缺，须以经济上之协助方法以为补救，故最近法律之内容，于保护人权之外，犹有社会生存权在焉；此最近法律之处罚未遂犯的规定，及刑事事件兼负民事的责任之种种规定，即其例也。其他政治史、宗教史、艺术史各等之上，皆可以发见其随物质的变化而为转移者，今姑略置不赘。

（以下缺一日）

马克斯谓阶级竞争之所由起，因土地共有制度既坏之后，经济的构造，皆建在阶级对立之上。所谓阶级，即经济上利害相反之阶级。其分别则一方为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之手段者；一方肆其压服掠夺，而一方则受压服掠夺者也。此两种阶级，在种种时代，以种种形式而表现，若亚细亚者、若欧洲古代者，若封建者、若现代资本家者。是等生产方法出现之次第，可作经济组织之进化阶段；而资本家的生产方法，在社会生产方法中，乃采对敌形式之最后者；阶级竞争，亦将随此资本家的生产方法同时告终矣。至于社会何故呈露阶级对立之现象，在马克斯意见，则谓全由一个之社会团体，依生产方法的独

占，而掠夺他人之余工余值（详后）而已。

（以下缺一日）

欲物之生活者，第一须备有生产必需之工具（如机器等），第二须备有若干之生活品（供工作时生活所用）；然近世社会中，但有少数人能具足此二事，多数之劳动者，唯有劳动力一道而已。劳动若图生存，须卖其劳动力于资本家，而资本家则给以若干之工值，至于为值几何，则按以价值公例，凡一物交换之价值，概等于制造此物之劳动；故劳动力之价值，即等于培养此劳动力之劳动；假如一劳动者，每日所需之生活品值六小时，则每日劳动六小时，已产出其人生活之价值矣；然而劳动者之卖其劳动力于资本家，资本家课其劳动时间，必较六小时为多，此则劳动力之价值与劳动力之利用时间不同，而资本家购买劳动力之际，正欲得此种价值之差别，如资本家给劳动者以六小时之工值，而收十二小时之劳动效果，此中有六小时之价值差别，是名“赢余价值”，仍是劳动者自己所制作，顾资本家攫为己有，盖坐享其成者也。资本家既掠取赢余价值，积之愈甚，资本愈增，此则资本制生产法之下，所自然发生之结果也。

资本经济行为的动机，但求扩大此赢余价值，然其所投之资本，原分两部，一部用之于工价，即所以产生赢余价值者，犹有一部，则用于生产的工具，异日物品产成，可以取偿，此一部不经生产手续而有所增益，故曰不变的资本。唯产生赢余之一部，则被称为变的资本云。大凡劳动者每日之工作时间愈长，则资本家所攫之赢余价值愈多；故资本家恒欲延长劳动者之作工时间，而劳动者一面，自然要求减短，是即两方冲突之处也。顾资本家占优胜之势力，劳动者恶能对抗，所以向来冲突之结果，劳动者多归失败，劳动时间曾不见其少减，驯至劳

动者痛苦至极，合全级势力以奋争，此际国家亦不能坐视，始对于势力时间，立为一种限制的法律矣。

（以下缺两日）

近世之社会，经济组织，纯以生产工具为私人所有，其生产力遂涣散而无统一。各经济单位互相竞赛，力谋改良其一己之生产法，故生产之范围日大，而市场销路，又弗相称。盖销路之广狭，不因消费人之欲望而定，乃视消费人之购买力而定者。社会上之购买力有限，固不能与竞逐无厌之生产骈进也。生产太骤，货物未能流通，于是有经济恐慌、市场停滞之现象。以全社会而论，生产事业既如是纷乱，然就一个经济单位观之（参看上述唯物的历史观一节），其组织日益完全，其计划日益周密，是为近世社会经济的矛盾。此矛盾之原因，即在于一面共同生产，而一面乃任私人攫取生产的结果也。

社会上既历一次经济恐慌，则资本薄弱之企业家必受一次之淘汰。资本家欲谋挽救之道，不外开辟新市场，或罗掘旧市面；然此种方法，仅足以为更大的经济恐慌之预备而已。盖经济恐慌不特循环不已，且每次愈益加烈。故资本制的生产法昌盛之后，中级之人，如小企业家及手工等，渐就湮灭，结局惟有大企业继续增长，其势益大。顾此等无数之大企业，仍是互相争并，苟遇较烈之经济恐慌，不能并存，其趋势但留下极少数财力最雄厚之资本家，以操纵社会一切之生产，而社会上大多数之人，只可佣赁图活，无自立希望，境遇愈逼，困难愈重，反抗的意志及反抗的运动愈烈，一旦群起而取得国家之权力，改一切生产工具为国有，脱去资本家之羁绊，恢复各人之经济自由，此为解决社会经济的矛盾之唯一方法，亦即近代社会经济制度所必有之结果，是固循社会演进的程序而自然发生者也。（马氏之言验矣，今日欧美诸国已悟 Bolsheviki 之不能

以武力扫除矣。）

以上为马克斯之经济学说，其大旨不仅指斥资本家之贪婪，而在于揭破资本主义之不公。至其社会主义运动论（即政治论），则见诸《共产党宣言》书中及前所述之“共产主义”，今且从略。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杨匏安文集》刊印。

PDG

蔡和森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给毛泽东的两封信

（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三日、九月十六日）

一

润之兄：

湘局定，想已归。前见改造宣言，如能照行，甚善。来法会友上月在蒙集议一次，详见子升报告。我到法后，卤莽看法文报，现门路大开，以世界大势律中国，对于改造计划略具规模。现搜集各种重要小册子约百种，拟编译一种传播运动的丛书：

（一）世界革命运动之大势。

分四种形势：

1. 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地方——俄。

2. 无产阶级革命已发动或小产地方——中欧及巴尔干战败诸国。

3. 阶级革命酝酿的地方——五大强战胜诸国。

4. 阶级觉悟发生后由爱国运动引导到布尔塞维克上去的地方——诸被压迫之民族、保护国、殖民地：如波斯、土耳其、印度、埃及、朝鲜、中国等。

（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四种利器。

1. 党（社会党或共产党）。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

2. 工团。先的作用为实力的革命军，不可破获的革命机关。后的作用为生产组织。

3. 合作社。先的作用为劳动运动革命运动的经济机关，进而打消贸易主义，为消费组织。

4. 苏维埃。无产阶级革命后的政治组织。

（三）世界革命之联络与方法。

1. 万国共产党（本部在俄）之计划与方法及新旧国际党之经过。

2. 万国工会组织，作用，最近之举动。

3. 万国同盟罢工（如最近万国矿工会宣布如协约对俄再战则下令英法矿工罢工）。

4. 万国同盟绝交（如今年六月万国工会宣布与虐杀工人及社会党之匈牙利反动政府同盟绝交，电、邮、路、船，都不与通，结果被捕之人民委员得减死刑）。

（四）俄罗斯革命后之详情。

这四种东西，现已搜集许多材料，猛看猛译，迟到年底，或能成就。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

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

我认为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故阶级战争质言之就是政治战争，就是把中产阶级那架机器打破（国会政府），而建设无产阶级那架机器——苏维埃。工厂的苏维埃，地方的苏维埃，邦的以至全国的苏维埃，只有工人能参与，不容已下

野的阶级参与其中，这就叫做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革命后不得不专政的理由有二：

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有。换言之，即是不能改造经济制度。

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

因此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证明。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

我想编的“四种利器”，亦是我这一回要与你具体商量的。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但是宜急宜缓呢？我以为现在就要准备。现在红军已打倒波兰而压入波斯，这种情形你必熟悉，而中国摇身一变的政客和武人（如陈炯明）正在准备做列宁，我预料三五年中，中国必有一个克伦斯基政府出现。换言之，必定有个俄国的二月革命出现，主持的人必为一干摇身一变的旧军阀、政阀、财阀，而结果产生一个不牛不马的德奥式的革命政治。这样一回事，我预料有少数的青年也会参与其中，但我不愿你加入。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然则这种党如何的准备组织呢？照旧组织革命机关，是不中用的。我以为要邀一些同志跑到资本家的工厂里去，跑到全国的职业机关、议会机关去。去干甚么？去做工，办事，当代表，做议员。我望你物色如殷柏者百人，分布全国各处，不必

他往，亦不必另组机关，即以中产阶级现成的职业机关，议会机关，做革命机关。这种方法，我得之于布尔塞维克。二月革命后，布党遍布全国各机关，列宁亦入了克伦斯基政府，所以十月革命一举成功。

我在这面业已酝酿组织，将于此早组一整队赴俄工作（二年内）。将来以俄为大本营，至少引一万青年男女长驻工作。拟于今冬联络新民会友、少年学会友、工学励进会友，以及赴德之王光祈、赴英之某某，开一联合讨论会。我将拟一种明确的提议书，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因我所见高明一点的青年，多带一点中产阶级的眼光和国家的色彩，于此两点，非严正主张不可。此意已与曾慕韩深言之，彼甚为感动，预料不久将与少年学会中人发生影响，将来讨论如得一致，则拟在此方旗鼓鲜明成立一个共产党。

木斯哥（莫斯科）万国共产党是去年三月成立的，今年七月十五开第二次大会，到会代表三十多国。中国、高丽亦各到代表二人，土耳其、印度各有代表五人。据昨日报土耳其共产党业已成立。英国于本月初一亦成立一大共产党。法社会党拟改名共产党。现在第二国际党已解体，脱离出来者都加入新国际党，就是木斯哥万国共产党。我意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

徐彦之等赴日，不知如何联络，现在中国不明俄国及各国社会情形，所以一切运动都枝节无大计。朝鲜、日本、波斯、印度、土耳其都应有人去，尤以日本为重要。我意日本要去一个极重要的人，与去俄国一样的重要，望你注意！我意中日间要两国无产阶级联络，革命才能解决。只要有成熟的联络，谁先谁后不成问题。如果中国革命而日帝国政府未倒时，我们量

力之所能采两个方法对他：

（一）我意我们的运动成熟，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如日出而干涉，则如俄之对波兰者对之。

（二）万不得已，则以列宁之对德者对之。

以我观察，中国行俄式革命，反动必较俄大。其因有二：

（一）大资本家大地主少，而十万二十万之身家多，故反动数目必多。

（二）中国自来政治影响于个人经济者很少，个人经济极自由，一旦集产，反动必大。

有人以为中国无阶级，我不承认。只因小工小农不识不知，以穷乏惨苦归之命，一旦阶级觉悟发生，其气焰必不减于西欧东欧。

共产党的原理和方略，我须先研究清楚，现已译“议院行动”（系万国共产党之魁作）一篇，及列宁等重要文字数篇，拟续译《俄国共产党大纲》。

俄十月革命共产党仅万人，现尚只六十万人。一九一七年俄工党只百五十万人，现四百万。

现在内地组织此事须秘密。乌合之众不行，离开工业界不行。中产阶级文化运动者不行（除非他变）。

我拟在此组织一整队赴俄做工。法语于俄甚行，勤工可得川资。将来以俄为大本营，纵少要有青年工人万人在俄。国内往俄难，请先鼓人来法。

你前要我做通信，现因有系统一点的编译计划，无暇作此。

改造地图，请买一部寄我。

你如对上列意见表同情，或即潜在运动，则有两点应注意而不可游移：

无产阶级专政。

万国一致的阶级色彩，不能带爱国的色彩。

叔衡、启民、惇元、殷柏[1]，诸友均此。

彬

一九二〇、八、一三

二

润之兄：

上月寄一长信，大要系主张马克斯主义及俄式革命，而注重于组织共产党。今子升[2]归国，再陈其略。我以为现在世界显然为两个敌对的阶级世界，学说亦显然划了鸿沟。自柏拉图统御以来的哲学思想（人生哲学，社会哲学），显然为有产阶级的思想。其特点重理想轻生活，重精神轻物质。马克斯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结果适与有产阶级的唯理派（ld'eologic）相反，故我们今日研究学问，宜先把唯理观与唯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致堕入迷阵。我对于人性只认为有“可能性”，比如到了饥的境地，性之可能为吃；遇到困难的境地，性之可能为思（想方法）；处现经济制度之下，性之可能为“人剥削人”；处怒或挑剔（如民族主义、军国主义）之时，性之可能为“打”或“杀”。究其极，这种可能性与别的动物一样，没有别的高贵不同。总之，人由低等动物进化成的。道德根于先天之说不能成立，成立也无意思。人是一它物质，人是一个消费（吃、穿、住）才能活动的动物。故人的理想云为乃是吃了饱了之后的物质的化分（或派生）。我以这种直捷简单的理由，肯定唯物观，否定唯理观。唯理观弊病到了化境（助长有产阶级），

唯物观才由马克斯寻找出来。这真是思想史上一桩大喜事！修正派、改良派（即染了有产阶级唯理主义的毒）的考茨基、伯伦斯丁等，好胆大又把中产阶级的唯理主义拿来驳唯物史观，以为“人”、“社会”决不是单由物质的条件决定的，还有内心的理想的支配力，唉！这真是为资本家说法。结果是以唯物史观启发阶级战争的动机为卑下、为薄弱（现张东荪也是这样说），而别寻所谓高尚的动机，及寻一劳资调和的办法，故他们最终的结果，主张改良而不主张革命。中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和威尔逊的十四条，是他们叹为观止的地方！今日俄、德革命之不同，根本即在此点。我今拟二公式：

俄社会革命出发点＝唯物史观。

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

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无阶级，无反动，社会组织完成，世界组织完成（列宁及共产党屡次如此宣传时），取消国家。

德多数社会党立足于＝修正派社会主义及中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之上。

方法＝与帝国政府通力合作（入战时内阁）；利用革命与中产阶级联盟组织政府。

目的＝劳资合组的德谟克拉西。

结果＝延长资本政治的危险，内乱，破产，反革命，压迫工人，闹个不休。

张君劢以中产阶级的反动眼光及贤人眼光观察俄国革命，对于德叛逆社会党（即多数党）一唱而三叹（见《解放与改造》）。他对于中国主张的八条，不马不牛，这种冬烘头脑，很足误人。阶级战争的结果，必为阶级专政，不专政则不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原来阶级战争就是政治战争，因为现政治完

全为资本家政治，资本家利用政权、法律、军队才能压住工人，所以工人要得到完全解放，非先得政权不可。换言之，就是要把中产阶级那架国家机关打破（无论君主立宪或议院政治），而建设一架无产阶级的机关——苏维埃。无产阶级不获得政权，万不能得到经济的解放，比如生长于现政治下的工团主义（经济的，职业的，而非政治的），充其量不过是运动到产业国有，由资本家的“公司”里运动到资本家的“国”里去，这不但于工人无益，而且反巩固“资本家国”的产业组织，以后工人愈难解放。比如三角同盟国有运动，自去年到现在，没生一点效，现在矿工为增加工钱减少煤价争议数月（矿工已发停工预告，定期本月二十五），政府公司丝毫不动，所以我们专门经济的职业的工团运动，经久不能超出“工钱物价问题”，如何能得到解放呢？至于现在俄的工团就不然了，“工钱”、“物价”都由工团自定，生产管理与分配，工团与全国经济最高苏维埃共同执行。这才真算是解放。然而所以能达到这步，因为他获得了政权。现世经济政治早已打成一片，怎么会容许你单做经济解放呢？所以现在有两种说法最足延长现政治之危险而暗杀工人阶级：

（一）反唯物史观。以为以此启发阶级战争的动机太卑下而不高尚！

（二）分离经济与政治，教工人专去做经济运动，做保护职业的运动，使他们永世生息于资本家剥削政治之下！

这两种危险的说法，凡冬烘先生（欧美如此）及资本家御用的改良派社会学者总是瞎眼说去，不怕害死工人！

资本家帝国主义者的大战爆发，于是各国不真实的社会党及工党，尽向军国主义投降（即向资本家投降），尽变为叛逆，爱国的社会党和工党，有两个叛逆的总机关：一为第二国际

党，一为万国工会。

忠于马克斯主义的布尔塞维克，既已把俄罗斯完全彻底的建设其主义，于一九一八年改名共产党，与德李伯克奈希、罗森堡所手创的斯巴达加斯团（不久亦改名共产党），及匈贝拉赓所组的共产党，组织“第三国际党”（即万国共产党），一九一九年三月四日（正资本家分赃会议在巴黎热闹时），在木斯哥成立，加入的团体共三十五个。高丽亦以劳动联合会的名义加入，波斯、印度、土耳其等以东亚民族解放大联盟的名义加入，独中、日没有团体！万国共产党即世界革命的总机关，这是无产阶级极彻底的极真实极具主义方略的真正国际组织，与没气焰的资产阶级的国际联盟针锋对立。俄十月革命成功，各国犯了罪的革命党及工党又疑又怕，去年二月已死的第二国际党，在伯伦死灰复燃，开了一次大会，赞扬俄革命的占多数，诋毁的尽为犯罪已深（入了战时内阁）及执迷不悟的改良派，不久大多数纷纷宣布脱离第二国际党。其中的大党如德独立社会党、法统一社会党、英独立劳动党、西班牙社会党、瑞士社会左党等等，并宣布与第三国际党商议加入条件。故今年七月万国共产党开第二次大会，中西南欧及美社会党都与会，中国亦有两个代表，但无团体名义。现中西欧各代表已返国，正在开全国大会讨论即刻加入。中西欧各社会党战时屈服于军国主义之下，多少违犯了主义，此缘于平日改良派及修正派之恶劣影响，现在完全的马克斯主义及无产阶级专政既在俄罗斯实现有效。于是各国觉悟的工人莫不醉心于红色化。而各国社会党和工党大呈分裂之状，从中把持的无非是几个改良派、修正派、中立派的旧首领，这种首领在各国觉悟的工人阶级中，不久即会遭淘汰。现在英、法、美共产党（英八月成立的）业已成立，加入万国共产党，所以英、法、美的社会党非加入则不

能立足（因违反工人的要求故），我今把美、中西南欧、巴尔干及东亚的已加入或即将加入万国共产党的略举如下：

美，已成立三个共产党，加入木斯哥。社会党（已与木斯哥大会）势力不大，首领为豆伯斯，因反对战争，现还关在牢里。美I. W. W势力亦弱，但主张阶级战争，为美劳工的真正组织，已参与木斯哥大会。美势力最大的劳动联合会的领袖为刚伯斯，极旧极反动（木斯哥指名排斥）。社会党和I. W. W都参与木斯哥大会，与第二国际党及黄色的万国工会脱离关系。

英，不列颠社会党与别的三个团体，自去夏商议组织与俄一致的共产党，今年八月一日成立，加入木斯哥万国共产党。英共产党始拟不令劳动党加入（党员已近五百万），列宁力主可容其加入。独立劳动党已宣告脱离第二国际党与木斯哥商议国际改造，现英劳动党阶级战争的色彩益明，援俄及国际运动甚力（近又派代表参与俄波和议）。三角同盟将与俄工团于今秋、冬发起红色的万国工会，打破死灰复燃之老的、黄色的万国工会（他有七千万会员），反动的工党旧首领将被排斥。

法，统一社会党之极左翼，已组成共产党，为万国共产党之一部。统一社会党今年二月宣布脱离第二国际党，与第三国际党协商加入，此次派二代表与木斯哥万国共产党第二次大会。木斯哥加入的条件极严，大略如下：

1. 改名为共产党，以后一切宣传运动皆为共产党性质。

2. 排除右翼的改良派、爱国派、中立派、入阁派的首领，然后才准加入。

二代表已返国，即将开全国大会，讨论加入条件。法工党首领为霞华，木斯哥指名排斥，要法工人将此人驱逐。

德，独立社会党去年十一月大会，宣布脱离第二国际党，与木斯哥商议加入，昨派四代表与木斯哥第二次大会。加入条件与对法略同，要他排除右翼首领才准加入。独党十月将开会讨论此事。斯巴达加斯团改名共产党，为万国共产党主要分子之一。德工党旧首领为莱琴，木斯哥指名排斥。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已于前二月脱离第二国际党，正式加入万国共产党。

比利时，社会党为爱国、入阁、卖国主义的首领所把持。共产党已成立。

意大利，社会党左翼已正式加入万国共产党，劳动联合总会亦加入。社会党左翼的改良派将于下次大会被除名。意近日劳动运动占领工场，管理生产，绝非国有运动可比。

匈奥，其社会民主党与德多数党一样的与中产阶级联盟揽政权，在社会主义上已宣布死刑。匈共产党为发起万国共产党之一，奥共产党也是其中一员。

雅各斯拉夫，共产党运动极得势，此次城邑选举大获胜利，中产党皆失败，去年三月即加入木斯哥。

捷克斯拉夫，共产党去年三月加入木斯哥。社会党团体有八，现组织政府，此次不应法命助波攻俄，社会党政府与有力。

保加利亚，战后破产，共产运动极盛，上次国会选举获选五十名之多。与中产阶级联盟的社会党一败涂地。现俄共产党的党纲，在保销行八十万卷。去年三月即加入木斯哥。

罗马尼亚，战后军国主义大盛。共产党运动亦盛，去年三月加入木斯哥，此次多瑙脑河流域三小协约国，不听法命助波攻俄，即三国共产党之力。

东亚，印度共产党已成立，去年即加入木斯哥，我在法报

见其宣言。

土耳其，共产党于今年八月成立。昨波斯、印度、埃及、土耳其代表于参与木斯哥二次大会之后，又在巴库开东亚民族解放大同盟的大会。印度又于八月成立八百万工人的联合会。法统一社会党及《人道报》派代表赴印度祝贺。高丽去年三月以高丽劳动联合会名义加入木斯哥，此次又有二代表与第二次大会，中、日亦有代表，但不见团体名义。

以上所举系荦荦大者，观此亦可知世界大势所趋。而中国民众运动幼稚如此，将怎样呢？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否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

布尔塞维克与门色维克（先同属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开首是争党员加入的条件，布派主张极严格，门派主张宽大。其后布党主张极端的行以下公式，即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Soviets，而门派还主张与中产阶级联盟，所以十月革命不得不起。现在布党改名为共产党，加入条件仍极严格，所以十月革命时的党员仅万人（极确实的分子），现在不过六十万。现在入党条件如下：（1）二人介绍于地方支部。（2）入党的实习所受训练三月，作为后补入党之期。（3）实习所的指导员一步一步引导他们到共产主义的生活上来，并令他们到共产主义的学校去听讲。（4）不能确信主义及遵守的除名。（5）如指导员认训练未成熟，须再受训练三月。（6）然后具愿书三份，须守党的“铁的纪律”。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现全俄政府每部的事纵多不过十余人担任，全国劳动联合总会五人担任）。党的最高机关为中央委员会。党中设宣传运动部、组织教育部、调查统计部、义

务劳动部（此部专为党员做星期六下午的义务劳动，以为社会倡率而设）。在十月革命前，党的方略为多方面的，无论报纸、议院、团体以及各种运动，绝对受中央委员会的指挥和监督，绝不准单独自由行动。所以议院行动在各国社会党弊端百出，以致工人不信任政治行动，而在布党适得其反，他第一从根本上否定中产阶级的议院主义；第二以为应入到里面去打破他。一面党的群众在外面酿革命风潮，一面党的议员在议坛上酿风潮，议员亦须参与群众行动，利用选举战争为宣传运动，而不在得票多少。第三党的议员一言一语，皆须依中央委员会所授命的态度（革命的），一面在议院内做合法的工作，一面又在议院外做非法的工作，一等运动成熟，即打倒议院和政府，而做完全的革命行动。十月革命时，俄工团分子约百五十万，大多数反对布党的主张。不及数月布党在各工团中都组有党的团体，将反动的首领驱逐，一变而为多数赞成布党的主张。即如十月二十五日，乃是一种定期的革命，是日开全俄苏维埃第二次大会，列宁所提出的议案为将临时政府的政权移与全俄苏维埃。门党及中产阶级各党和克伦斯基都到会投票，结果工人与兵尽赞成将全政权移与苏维埃。于是克伦斯基只得跑了，这完全是一种组织的革命，绝不是流血的革命。革命的标准在客观而不在主观，有一干人生怕革命，其实是错了，凡社会上发生了种种问题，而现社会现制度不能解决他，那末革命是一定不能免的了。你看中国今日所发生的问题，哪一种能在现社会现制度之下解决？所以中国的社会革命，一定不能免的。不趁此时加一番彻底的组织，将来流血恐怖自然比有组织要狠些，有了强有力的组织，或者还可以免掉，所以我认党的组织是很重要的。组织的步骤：（1）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2）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求集

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取消治安警察法及报纸条例。（3）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4）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现在组织研究宣传之外，更可组织一调查统计部，研究宣传部、调查统计部与出版物三者现在可打成一片而潜在从事。比如我在外国可调查俄国及各国的情形，你在国内可调查各省情形，将人口、土地、产业、交通、劳动状况、经济、教育等列为统计，此种材料与研究的著作，皆在一种出版物上发表，出版物又须组织一个审查会，凡游移不定的议说及与主义矛盾的东西，皆不登载。

没有纸了，我的意见一时不能写完，再笼统说几句：我以世界革命运动自俄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这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不懂的人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以暴易暴的，不知列宁及万国共产党已再三宣言。专政是由资本主义变到共产主义过渡时代一个必不可少的办法，等到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世界组织完成了，阶级没有了，于是政权与国家一律取消。故现在各国的无政府党与工团的见到了的分子业已改了倾向，我不信这种倾向会错的。无政府党最后的理想，我以为列宁与他无二致。不过要做到无政府的地步，我以为一定要经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一个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试问政权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怎样去组织共产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们以为迟一点就会了，殊不知迟一点儿资本家的大战又起了，伏尸流血又不知几千百万，而战死与破产及生活昂贵的大祸，都是无产阶级受了，战胜的中产阶级又不知道要得到好多的赔款和殖民地，而战胜的国际的托辣斯的组织（指国际联盟）将越发巩固，工人真是动也动不得了！第二次资本家的大

战战场必在中国。我们还不应准备么?

叔衡、惇元、殷柏、启民、章甫[3],均此。

彬

九月十六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新民学会资料》刊印。

注 释

〔1〕即何叔衡、陈书农、周世钊、彭璜。

〔2〕即萧子升。

〔3〕即陈章甫。

PDG

《劳动界》发刊词*

（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五日）

李 汉 俊

为什么要印这个报？因为工人在世界上是最苦的。无论是热天，无论是冷天，天还没有亮就扒起来，上的上工场里去，到的到田里去，做的做事情去。天黑了，大家都睡了觉的时候，方才能够休息。天天顶少也要做上十五六点钟的工，睡觉顶多也不过五六个钟头。他们就是这样苦，这样做得多。他们还是住的没有得好的住，吃的没有得好的吃，穿的没有得好的穿。设若一旦害了病，一天不做工，第二天就要饿起来了。弄得不好，房东还要来赶他们出去。衣服被卧也要当干净。没有小孩子的人，自己还可以做叫花子去，免得饿死冻死。如果有小孩子，喊的喊饿，叫的叫冷，哭的哭，号的号，那就只好看着他们饿死冻死了。

我们再看那做东家，有钱的人，一天到黑一点事情也不做，天天睡到多时候了才起来。起来了之后，不是叉麻雀，就是谈天。不是跑马车，就是坐汽车。不是逛窑子，就是抱小老婆。不是逛大世界，就是逛戏园子。他们虽然这样一天到黑一点事不做，他们反有大房子住，好东西吃，好衣服穿，有马车

---

* 本文原载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五日出版的《劳动界》第一册，题为《为什么要印这个报?》。

坐，有汽车坐，有小老婆抱，有大世界逛，有戏看。

工人同他们这些不作事的东家、有钱的人比起来，已经是苦得不好说了。又还要无热无冷的一天做到黑，那自然是更要苦了。所以工人在世界上是最苦的。工人在世界上已经是最苦的，而我们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人还要苦。这是甚么道理呢？就因为外国工人略微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中国工人不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印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他们的事情。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他们的事情了，或者将来要苦得比现在好一点。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的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刊印。

PDG

谈 政 治

（一九二〇年九月一日）

陈 独 秀

（一）

本志社员中有多数人向来主张绝口不谈政治，我偶然发点关于政治的议论，他们都不以为然。但我终不肯取消我的意见，所以常常劝慰慈、一涵[1]两先生做关于政治的文章。在他一方面，外边对于本志的批评，有许多人说《新青年》不讨论政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我对于这个批评也不能十分满足，曾在《我的解决中国政治方针》演说中回答道："我们不是忽略了政治问题，是因为十八世纪以来的政制已经破产，我们正要站在社会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我们不是不要宪法，是要在社会上造成自然需要新宪法底实质，凭空讨论形式的条文，是一件无益的事。"因此，可以表明我对于政治底态度，一方面固然不以绝口不谈政治为然，一方面也不愿意和一班拿行政或做官弄钱当作政治的先生们谈政治。换句话说，就是：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但我们要认真了解政治底价值是什么，决不是争权夺利的勾当可以冒牌的。

以上的说话，虽然可表明我对于政治底态度，但是过于简

单，没有说出充分的理由，而且不曾包含我最近对于政治的见解，所以现在要详细谈一下。

（二）

我们中国不谈政治的人很多，主张不谈政治的只有三派人：一是学界，张东荪先生和胡适之先生可算是代表；一是商界，上海底总商会和最近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可算是代表；一是无政府党人。前两派主张不谈政治是一时的，不是永久的，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他们所以不谈政治，是受了争权夺利的冒牌的政治底刺激，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政治。后一派是从根本上绝对主张人类不应该有一切政治的组织，他们不但反对君主的贵族的政治和争权夺利的政治，就是民主的政治也要反对的。

我对于这三派的批评：在消极的方面，我固然很有以他们为然的地方；在积极的方面，我就有点异议了。

前两派只有消极，没有积极的缺点，最近胡适之先生等《争自由的宣言》中已经道破了。这篇文章开口便说："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要除去这妨害，自然免不了要谈政治了。

后一派反对政治，从消极的方面说起来，也有一大部分真理。他们反对政治，反对法律，反对国家，反对强权，理论自成一系统，倒没有普通人一面承认政治、法律、国家，一面反对强权的矛盾见解。强权是少数人的或多数人的，广狭虽然不同，但若是没有强权便没有法律，没有法律还有什么政治国家呢？因此我们应该明白强权、国家、政治、法律是一件东西底四个名目，无政府党人一律反对，理论倒算是一贯。古代的社

会契约（Social contract）和中世纪的自治都市（Commune），不但不是普遍的，而且是人类政治组织没有进化到近代国家的状态。近代国家是怎样？Franz Oppenheimer 说：国家底唯一目的，就是征服者支配被征服者底主权，并且防御内部的叛乱及外部的侵袭。这主权底目的，也就是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经济的掠夺（详见 Christensen's Politics and Crowd Morality P. 72 所引）。Christensen 说：国家是掠夺别人并防止别人来掠夺的工具。他的目的并不是制止每人和每人间底战争，乃是使这战争坚固而更有效力（见前书七三、七四页）。罗素说：国家底骨子，就是公民集合力底仓库。这力量有两个形式：一是对内部的，一是对外部的。对内部的形式是法律及警察，对外部的形式是战斗力所表现的陆海军。国家是一定区域内全住民底集合体，依政府指挥，用他们联合力所组织起来的。国家底权力，对内仅限于叛乱的恐怖，对外仅限于战败的恐怖，所以他阻止这两样是绝对的。在实际上他能够用租税名义夺人家底财产，决定结婚和继承底法律，惩罚他所反对的意见发表，因为要把一种人民所住的地方划归别国，他能置人于死地，并且他想着要打战，便命令一切强健男子到战场去赌生命。在许多事件上，违反了国家底目的和意见，就是犯罪（见 Russell's 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P. 45、46、47）。过去及现在的国家底作用实在是如此。我所以说无政府党反对国家、反对政治、反对法律、反对强权，也有一大部分真理。

从消极方面说起来，无政府党否认国家政治，我们固然赞同；从积极方面说起来，我们以为过去的、现在的国家和政治，过去的、现在的资本阶级的国家和政治，固然建筑在经济的掠夺上面，但是将来的国家和政治，将来的劳动阶级的国家和政治，何人能够断定他仍旧黑暗、绝对没有进步的希望呢？

反对国家的人，说他是掠夺机关；反对政治的人，说他是官僚底巢穴；反对法律的人，说他是资本家私有财产底护符。照他们这样说法，不过是反对过去及现在掠夺的国家、官僚的政治、保护资本家私有财产的法律，并没有指出可以使国家、政治、法律根本摇动的理由，因为他们所反对的，不曾将禁止掠夺的国家、排除官僚的政治、废止资本家财产私有的法律，包含在内。

或者有人说：就是将来的禁止掠夺的国家，排除官僚的政治，废止资本家私有财产的法律，仍然离不掉强权，所以不从根本上绝对废除国家、政治、法律这几种强权，实现自由组织的社会，不能算彻底的改革。

我们对于这种意见，可以分开理论和事实两方面的讨论：

从理论上说起来，第一，我们应该要问：世界上的事理本来没有底，我们从何处彻起？所以懂得进化论的人，不应该有彻底不彻底的观念。第二，我们应该要问：强权何以可恶？我以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由此可以看出强权所以可恶，是他的用法，并不是他本身。我们人类文明最大的效果，是利用自然征服自然。例如水火都可以杀人，利用水便得了行船、洗濯、灌溉底效用；利用火便得了烧饭菜、照亮、温暖身体底效用；炸药和雷电伤人更是可怕，利用他们便得了开山、治病及种种工业上的效用。人类底强权也算是一种自然力，利用他也可以有一种排除黑暗障碍底效用。因此我觉得不问强权底用法如何，闭起眼睛反对一切强权，像这种因噎废食的办法，实在是笼统的、武断的，决不是科学的。若有人不问读书底目的如何，但只为读书而读书，不问革命底内容如何，但只为革命

而革命，自然是可笑。现在若不问强权底用法如何，但只为强权而反对强权，或者只为强权而赞成强权，也未免陷于同一的谬误。

从事实上说起来，第一，我们要明白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那班资产阶级仍旧天天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法国底工团派，在世界劳动团体中总算是很有力量的了，但是他们不热心阶级战争，是要离开政治的，而政治却不肯离开他们。欧战中被资产阶级拿政权强迫他们牺牲了，今年“五一节”后又强迫他们屈服了，他们的自由在哪里？所以资产阶级所恐怖的，不是自由社会的学说，是阶级战争的学说；资产阶级所欢迎的，不是劳动阶级要国家、政权、法律，是劳动阶级不要国家、政权、法律。劳动者自来没有国家、没有政权，正因为过去及现在的国家、政权，都在资产阶级底手里，所以他们才能够施行他们的生产和分配方法来压迫劳动阶级。若劳动阶级自己宣言永远不要国家、不要政权，资产阶级自然不胜感谢之至。你看现在全世界底国家对于布尔塞维克底防御、压迫、恐怖，比他们对于无政府党利害的多，就是这个缘故。

第二，我们要明白各国底资产阶级，都有了数千年或数百年底基础。站在优胜的地位，他们的知识经验都比劳动阶级高明得多。劳动阶级要想征服他们固然很难，征服后想永久制服他们，不致死灰复燃，更是不易。这时候利用政治的强权，防止他们的阴谋活动；利用法律的强权，防止他们的懒惰、掠夺，矫正他们的习惯、思想，都很是必要的方法。这时候若反对强权的压迫，若主张不要政治、法律，若提倡自由组织的社会，便不啻对资产阶级下了一道大赦底恩诏，因为他们随时得着自由，随时就要恢复原有的势力地位。所以各国共和革命后，民主派若失了充分压服旧党底强力，马上便有复辟底运动。此时俄罗斯若以克鲁巴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不但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政复兴也必不免。克鲁巴特金《国家论》中所称赞的中世自治都市是何以失败的，他所指责的近代资本主义的国家是何以发达起来的？这主要的原因，不用说一方面是自治都市里既不是以劳动阶级为主体，又没有强固的政治组织，因此让君主贵族们垄断了政权；一方面是新兴的资本家利用自由主义，大家自由贸易起来，自由办起实业来，自由虐待劳动者，自由把社会的资本集中到少数私人手里，于是渐渐自由造成了自由的资本阶级，渐渐自由造成了近代资本主义自由的国家。我们明明白白晓得中世自治都市是放弃政权失败的，是放任那不法的自由（Unconscionable Freedom）失败的，劳动阶级底枷锁镣铰分明是自由主义将他戴上的。现在理想的将来的社会，若仍旧妄想否认政治是彻底的改造，迷信自由主义万能，岂不是睁着眼睛走错路吗？我因此相信许多人所深恶痛绝的强权主义，有时竟可以利用他为善；许多人所歌颂赞美的自由主义，有时也可以利用他为恶。万万不可一概而论，因为凡强权主义皆善，凡自由主义皆

恶，像这种笼统的大前提，已经由历史底事实证明他在逻辑上的谬误了。

第三，我们要明白人类本性的确有很恶的部分，决不单是改造社会制度可以根本铲除的。就是社会制度——私有财产制度，工银劳动制度——所造成的人类第二恶性，也不是制度改变了，这恶性马上就跟着消灭的。工银劳动制度实在不应该保存，但同时若不强迫劳动，这时候从前不劳动的人，自然不会忽然高兴要去做工；从前受惯了经济的刺激（Economic Stimulus）才去劳动的工人，现在解除了刺激，又加上从前疲劳底反动，一定会懒惰下来。如此一时社会的工作效率必然锐减。少数人懒惰而衣食，已经酿成社会上的不平等，若由少数增至多数，这社会底生活资料如何维持呢？人类诚然有劳动的天性，有时也自然不须强迫，美术化的劳动和创造的劳动，更不是强迫所能成的，自来就不是经济的刺激能够令他进步的，所以工银制度在人类文化的劳动上只有损而无益。至于人类基本生活的劳动，至少像那不洁的劳动，很苦的劳动，既然没有经济的刺激，又没有法律的强迫，说是人们自然会情愿去做，真是自欺欺人的话，凡有真诚的态度讨论社会问题的人，不应该说出这样没有征验的话来。制度变了，制度所造成的人类专己自私的野心，一时断然不易消灭。倘然没有法律裁制这种倾向，专制的帝王、贵族就会发生在自由组织的社会里。若要预防他将来发生，抵抗他已经发生，都免不了利用政治的、法律的强权了。更有一件事，就是人类底性欲本能和永续占有冲动合起来发生的男女问题。这问题是人生问题中最神秘不可思议的部分，不但社会制度革命不能解决他，并且因为解除了经济的、政治的压迫和诱惑，真的纯粹的男女问题更要露骨的发生。这时候的男女问题内，并不夹杂着政治的、经济的影响和

罪恶。倘由这种问题发生了侵犯个人及损害社会安宁的罪恶，也应该有点法律的裁制才好。

据以上的理论和事实讨论起来，无政府党所诅咒的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们也应该诅咒的。但是劳动阶级据以铲除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们是不应该诅咒的，若是诅咒他，倒算是资产阶级底朋友了。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把国家、政治、法律看做一种改良社会的工具，工具不好，只可改造他，不必将他抛弃不用。

（三）

不反对政治的人也有两派：一是旧派。他们眼中的国家，就是“我国家数百年深仁厚泽”的国家，“学生这样嚣张还成个什么国家”的国家；他们眼中的政治，就是“吴佩孚只是一个师长不配参与政治”的政治；他们眼中的法律，就是“王法”、“国法”、“大清律”的法律。这派底意见，我们犯不着批评。一是新派。他们虽不迷信政治、法律和国家有神秘的威权，他们却知道政治、法律和国家是一种工具，不必抛弃不用。在这一点上我很以他们为然。但是他们不取革命的手段改造这工具，仍旧利用旧的工具来建设新的事业，这是我大不赞成的。这派人所依据的学说，就是所谓马格斯修正派，也就是Bebel死后德国底社会民主党，急进派所鄙薄、所攻击的社会党也就是这个。中国此时还够不上说真有这派人，不过颇有这种倾向，将来这种人必很有势力，要做我们唯一的敌人。

他们不主张直接行动，不主张革那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底命，他们仍主张议会主义，取竞争选举的手段，加入（就是投降）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府、国会，

想利用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治、法律，来施行社会主义的政策。结果不但主义不能施行，而且和资产阶级同化了，还要施行压迫劳动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政策。现在英、法、德底政府当局哪个不是如此？像这样与虎谋皮，为虎所噬，还要来替虎噬人的方法，我们应该当做前车之鉴。

他们主张的国家社会主义，名为社会民主党，其实并不要求社会的民主主义，也不要求产业的民主化，只主张把生产工具集中在现存的国家——现存的资产阶级底军阀官僚盘踞为恶的国家——手里。Wilhelm Liebknecht 批评这种国家社会主义道：这种国家社会主义，实在说起来只可叫做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取其貌似，投时所好，来冒牌骗人罢了。德国底国家社会主义，严格说起来就是普鲁士底国家社会主义，他的理想就是军国的、地主的、警察的国家，他所最厌恶的就是民主主义（见 Wilhelm Liebknecht：No Compromise，No Political Trading，P. 15）。这种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里面，劳动阶级底奴隶状态不但不减轻，而且更要加重，因为国家成了公的、唯一的资本家，比私的、多数的资本家更要垄断得多。这种国家里面，国家的权力过大了、过于集中了、统一了，由消灭天才的创造力上论起来，恐怕比私产制度还要坏。这种国家里面，不但无政府党所诅咒的国家、政治、法律底罪恶不能铲除，而且更要加甚，因为资产阶级底军阀、官僚从前只有政治的权力，现在又假国家社会主义的名义，把经济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这种专横而且腐败的阶级，权力加多，罪恶便自然加甚了。若是把这名义与权力送给世界上第一个贪污不法的中国军阀、官僚，那更是造孽不浅。

他们反对马格斯底阶级战争说很激烈，他们反对劳动专政，拿德谟克拉西来反对劳动阶级底特权。他们忘记了马格斯

曾说过：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用那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但是同时阶级对抗的理由和一切阶级本身，也是应该扫除的，因此劳动阶级本身底权势也是要去掉的（见《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之末）。他们又忘记了马格斯曾说过：法国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底著作，到德国就全然失了精义了，并且阶级争斗底意义从此在德国人手中抹去，他们还自己以为免了法国人的偏见……他们自以为不单是代表无产阶级利害的，是代表人类本性底利害，就是代表全人类利害的。这种人类不属于何种阶级，算不得实际的存在，只有哲学空想的云雾中是他存在的地方（见前书第三章）。

他们只有眼睛看见劳动阶级底特权不合乎德谟克拉西，他们却没眼睛看见戴着德谟克拉西假面的资产阶级底特权是怎样。他们天天跪在资产阶级特权专政脚下歌功颂德，一听说劳动阶级专政，马上就抬出德谟克拉西来抵制，德谟克拉西倒成了资产阶级底护身符了。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修正派社会主义底格言，就是："从革命去到普通选举！从劳动专政去到议会政治！"他们自以为这是"进化的社会主义"，殊不知 Bebel 死后德国底社会民主党正因此堕落了！

（四）

我的结论是：

我承认人类不能够脱离政治，但不承认行政及做官、争地

盘、攘夺私的权力这等勾当可以冒充政治。

我承认国家只能做工具，不能做主义，古代以奴隶为财产的市民国家，中世以农奴为财产的封建诸侯国家，近代以劳动者为财产的资本家国家，都是所有者的国家。这种国家底政治、法律，都是掠夺底工具，但我承认这工具有改造进化的可能性，不必根本废弃他，因为所有者的国家固必然造成罪恶，而所有者以外的国家却有成立的可能性。

我虽然承认不必从根本上废弃国家、政治、法律这个工具，却不承认现存的资产阶级（即掠夺阶级）的国家、政治、法律，有扫除社会罪恶的可能性。

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后事如何，就不是我们所应该所能够包办的了。

根据一九二〇年九月一日出版的
《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刊印。

注　释

〔1〕即张慰慈、高一涵。

PDG

《共产党》月刊短言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七日）

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坏了，在中国才开始发达，而他的性质上必然的罪恶也照例扮演出来了。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方法最大的最新的试验场。意大利的社会党及英美共产党，也都想继俄而起开辟一个新的生产方法底试验场。

中国劳动者布满了全地球，一日夜二十四小时中太阳都照着我们工作。但是我们无论在本土或他国都没一个是独立生产者，都是向资本家卖力。我们在外国的劳动者固然是他们资本家底奴隶，在本土的劳动者也都是本国资本家底奴隶或是外国资本家底直接的间接的奴隶。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什么劳动者选议员到国会里去提出保护劳动底法案，这种话本是为资本家当走狗的议会派替资本家做说客来欺骗劳动者的。因为向老虎讨肉吃，向强盗商量发还赃物，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我们要逃出奴隶的境遇，

我们不可听议会派底欺骗，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致发生。无政府主义者诸君呀！你们本来也是反对资本主义反对私有财产制的，请你们不要将可宝贵的自由滥给资本阶级。一切生产工具都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权都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你们若非甘心纵容那不肯从事生产劳动的资本家作恶，也应该是你们的信条。

根据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七日出版的
《共产党》第一号刊印。

PDG

论社会主义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恽代英

社会主义的一个名词，向来在中国是干犯法律骇人听闻的。其实许多人还没有明白社会主义是个甚么东西，中间包含几多派别，大家以讹传讹，便硬指一切暗杀革命是社会主义，一切社会主义是暗杀革命，因此一听见社会主义四个字，便联想到许多破坏事业的危险与恐怖起来。其实所谓社会主义这名词，本体便向来没有甚么很精确的界说。高到安那其、布尔塞维克，低到安福系王揖唐所称道，都有些可以合于通行所谓社会主义的意义。我在这一篇中，不想把通行所谓社会主义的派别与意义叙述出来，我宁想就我自己的意见，综括以叙社会主义应当的旨趣，供一般所谓社会主义者乃至非社会主义者的讨究。

除了迷信神权的学说以外，论到个人行动社会组织，大概可大分为有三种学说：一个人主义，二国家主义，三社会主义。

个人主义学理上的根据，以为宇宙间唯一的真实，只有个体的存在。其余一切家庭、国家、法律、道德等等，都是为个体的利益而生。倘若不能为个体的利益，或反为他的祸害，那便他们都是谬误的组织与法式。总之，这是承认宇宙间一切事

物，都得以个人为本位的。

国家主义学理上的根据，以为国家既是因人类的需要而自然产生，那便国家的存在，乃是争存的人类不可不十分珍护的。由这样推衍下去，因之他们主张国家有独立人格，是人类最终义务的对象，是可以违背大多数国民的意思以行他所谓有益国家的事的一个怪物。

社会主义学理上的根据，以为人类是共存的，社会是连带的。我们要求个人的幸福，必不可不求全人类的幸福。那便是说，只有人群，只有社会，是唯一的自然的实在，亦只有他配得上做宇宙间一切事物的中心。

但是社会主义不是从学理上产生的，是从事实上产生的；不是从知识上产生的，是从感情上产生的。依我的见解，历史本不定要随着物质变迁。但人类通常是浅见的惰性的，非受物质的驱策，不肯自动的有些改进。超物质的一二伟大的心灵，是历史上罕见的事。然而便令有几个非常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亦每不为囿于物质生活的群众所乐承受。因此所以理性的社会主义很不易于产生。现在的社会主义，初不过一般受掠夺者的阶级，因为得了许多不堪忍受的物质的痛苦，遂认识了地主资本家的罪恶，要求一个改善的法子罢了。群众的心理，易受感情的激发，难受理智的启示，这种浅见的感情的社会主义，不但易于提倡，而且易于传布。这样，所以理性的社会主义反得不着适当发展的机会。

依我的大胆，我要说现在的社会主义，仍旧可以分为三派：一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二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三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

先说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这便是一般政治家所谓社会政策。他们一切对于社会的设施，全然以国家利益为着眼。所以

他这并不是真诚的社会主义，只是一种国家主义。因为他只要欺骗得社会，而无害于国家，他们必无惮于欺骗社会。

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通常不被人承认为社会主义之一种。还有一种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主张利用国家的组织，以谋社会利益的，这便是通常所称的国家社会主义。因他们所主张，多近似政治家的社会政策，亦为一般自命为纯正社会主义者所唾弃。

但若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不配称为社会主义，那便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亦不配称为社会主义。然就我的偏见，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都几乎是以个人为本位的，都只是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这又是怎样说法呢？

现在所通行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有两种：一新村运动，一阶级革命运动。新村的运动，虽不纯然起源于寻求个人幸福的动机，但因为利己的本能得了个合宜孳生的场所，利他的本能因为遇不着适当的刺激，遂得不着适当的生长，所以精神每易太趋重了对内的完成，太疏忽了对外的发展。结果一部分的成功，无益于全世界的改造。而这一部分的生机，亦每为别部分恶势力所摧毁挫丧，不能继续存在。

许多反对个人主义的新村运动的人，都是主张个人主义的阶级革命的人。怎样说阶级革命是个人主义的呢？因为现在所通行的阶级革命学说，都只注意唤起劳动阶级与资本阶级的嫌怨，使劳动阶级为他个体的利益，联合，抗拒，奋斗。我信阶级革命的必要，与新村的必要一样真实。但我信这样的福音，只可从社会主义上宣传，不可从个人主义上宣传。我信人类的共存，社会的连带，本是无上真实的事。那便与其提倡争存的道理，不如提倡互助的道理。因为人类只有知道人群的真意义，才能为社会福利去求社会的改进。这才可盼望是社会上长

治久安之道。

人群的幸福，自然是要在每个人的努力，但这种努力，须以求社会福利为目标。他不应以求个人福利为目标，与不应以求国家福利为目标一样。因为国家固然不过是在某一种经济状态中人类因他的浅见所建设的一种经济组织，他本没有永久的真实的价值。至于个人，虽然粗忽看来，像是宇宙间唯一的真实，然而就生物学理上说，就经济状况上说，个人只是人群的一个分子，一个细胞。离了人群，个人不能生存，亦似乎没有生存的意义。说简直些，在我们所踪寻得的宇宙大法中，个体是为全类存在的，全类不是为个体存在的。这样，所以人群比个人在宇宙中更有个真实的地位。

若不是人类有了这样的社会自觉，每个人看他个体的利益，总会比人类全体的利益更重要。这样，将总不免于群己的利益上发生些冲突。虽然有些人想得个人的利益与人类的利益是并行的，是一致的，然而事实上这样的调协，实在有些是没有的事。所以要图世界的长治久安，必须使每个人看清社会福利的重要，每个人能抱着社会主义的精神，去做社会主义的运动。不然，便令资本家打倒了，人类各部分的利益，仍然得不着他的平衡，又要生出别的冲突来。

生物学理上告诉我们甚么呢？从细胞分裂的简单生物，一直到极复杂组织的人类，可以看出凡有生命的东西，都有几种特质。用生物学的名词说，一是化学组织，二是代谢作用，三是内长，四是分殖，五是适应。化学组织是生物躯体所由构成，与无生物一样，姑且不论。其余四桩可约而看出生物的两种特性：一是求生，一是传种。代谢作用，内长，适应是为求生。分殖与适应，又是为传种。生物为甚么要求生？本是一个奇秘的事。这并不是出于个体的意识，乃是由于宇宙的安排。

生物为甚么要传种？更是一个奇秘的事，而且更奇异的，生物的求生，便只是为的传种。昆虫多产卵即死，高等动物生命虽似较长，但亦以其第二代发育期的长短，发育的难易，以为等差。又动物均天赋有爱第二代的天性。这种天性，在第二代最需帮助时最显现。这些地方，都可看出宇宙的法则，他只注意全类的生存，并不注意个体。个体的生存，说明白些，只是传种的一个必需的方法。由这看来，个人只是人群的一分子，人种绵延的一个阶段。许多人太看重了个人，以为人群的存在，只是为的个体的幸福。这便他错看了他个体在宇宙中真正的地位，把他放到人群上面去了。

我这样蔑视个体的说法，必定有许多人看了不高兴，其实我便是最不高兴这种说法的人。然而无奈这是不可争的事实。我的意思，常想假如真有个以万物为刍狗的上帝，他戏弄我们令我们勤劬一生不过只落得辛苦颠连，替他留下几个第二代开心的人类而死，那我必定要顺着他的安排？何不自杀？何不避孕？亦求他奸计无所逞施。我不能信主持这宇宙法则的，定有个三位一体的上帝，但我不能不信这里实在有如此如此的宇宙法则。至于自杀避孕呢，看来似乎极易做到的事，但是证之实地情形，这种与宇宙安排相反的行为，每每为贪生，怕死，遂性欲，爱后代的心理所胜过。总之，我们虽然在理论上没有甚么不应不遵守宇宙法则的理由，却在事实上有不能不遵守宇宙法则的状况，那便宇宙法则究竟是甚么样子，我们不可不注意研究，而且不可不遵循着他的轨道走。

我信生物学上这种法则，正如信一种神意。我以为个人的利己心，是自然的，是宇宙安排的。个人的利他心，亦是自然的，亦是宇宙安排的。宇宙安排，唯一的目的，只在求全人类的幸福。个人的生存，只是全人类生存的一种方法。个人的幸

福，只是全人类幸福的一方面表现。凡损害全人类去谋个人利益的，心灵上每不平安，因为这个心灵，是与宇宙合一的。所追求的幸福，亦每得不着，因为宇宙的安排，若能令个人损害全人类而得着他小己的幸福，那便全人类将不能照他预定的轨道进行了。

从经济状况中，亦告诉了我们几件事。便是人类越进化，分工越精密，人类各部分相需为用的关系越密切重要。粗浅些的比方，不妨把人类社会比作一种有机体。譬如人的身体，便是无量细胞所组成。一处有些病痛，别处自然要去护卫。若不护卫，全身体各部分都会感到痛苦，设若每个细胞是每个人，他亦许如我们社会中浅见的人一样，以为别处细胞受了病痛，与我何干？这样将成个甚么景象呢？我们现在政治，教育，农，工，商，贾，各执一业，要求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已眼见是断不可能的事，那便个人主义在经济状况中，已失了他立脚的根据了。社会各方面的关系，交互错综，其实不但各业彼此之间是这样，一种实业其各部分亦是这样。马格斯派经济学者大呼说，私有制度破产了，因为私有工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以这一样理由，我们亦可以大呼说，个人主义破产了，因为独立自给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所以我们就生物学理说，社会主义是当然的，因为宇宙的大法是注重大群，不注重小己的。就经济状况说，社会主义是必然的，因为分工的结果，人类生活是互助共存的，不是独立自给的。这样可知所谓社会主义，不仅是劳工的不平之鸣，不仅是被掠夺者的企谋报复的举动。这是在学理上，事实上，有圆满根据的一种人的运动。

一切社会主义的运动，都须从这一点着眼，才可谓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人类若不知宇宙的大法，不知经济的趋势，徒

然恃物质的逼迫去盲动，结果成甚么样子，还很难说。私产制所以发生，实系在共产时代以后。个人主义所以发生，实系在群居 Horde 时代以后。倘若我们说私产与个人主义是谬误，为甚么人类好端端的从共产群居陷于这种谬误的呢？依我的相信，这无非物质的缺乏，使共产群居有些恐慌，人类因为他是浅见懒惰，不知全盘筹划，遂走入这种歧途。然而历史虽则经了几千万年，人类的浅见懒惰，大致并没有长进。今天凭着阶级战争的激励，资本家固然一定可以推翻，私有制固然一定可以打破，但是这种社会意识未经相当启迪的人类，是不是又会因一点恐慌，一点便宜，堕入几千年前人类祖宗的覆辙，这是谁敢担保的事？

人类若不是受了物质的限制，社会上不得发生这许多事变出来。最小限度的物质恐慌，是食料供给的缺乏。这大概是古代共产社会崩坏的大原因。我们若合全世界的生产同消费一计划，人类只须都有每日三四小时生产的工作，世界固不应有食料缺乏的忧虑。然而这不是全世界有个自治与互助的完密组织，亦不许说是太容易做到的事。以强力资本为根据的政府，不但无益于全人类，反因而增加了人类阶级界域的嫌隙，这固然是不宜存在。但是人类既然为他物质的限制，无论他愿意与否，有不可避免的工作。这工作的时间与方法，非受外界强力的支配，便至少要得他自己因社会的自觉大家契约的立一种规定。这样所以世界的未来，不应归于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乃应归于共存互助的社会主义。

但是这中间并没有说现在社会主义的运动有甚么不应该。军国主义是应该打破的，因为国家是离间人与人的恶魔。资本主义是应该推倒的，因为资本家是以少数人利益荼毒大多数人的劫星。新村运动是应该的，因为这样可以制造出共存互助社

会的雏形。工作时间的限制是应该的，因为这样可以于必要工作以外，多留时间使人自由活动，减少因分业愈精，而夷人类于机械的危险。然而总之这都是社会主义的运动，不是个人主义的运动。那便是说，这都是为社会福利而提倡的社会主义，不是为个人福利而提倡的社会主义。

若承认上面所说的话是不错，那便凡说社会主义的人，不可对于未来的世界存太多了无限的幻想，不要以为将来的世界真可以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取之无尽，用之不竭。人类一天不能超出于物质限制以外，一天少不了必要的工作，亦便一天少不了一个相互裁制的一种契约、一种组织。我以为社会主义的旨趣应当如此。

这一篇不是读书的心得，只是由经验思考而得的一些教训。我想或者值得大家考虑。有些地方，我知道这里所说，与我从前所说相矛盾。但这，我信或者是进一步的觉悟。我很觉得谈社会主义是应该，太容易的谈社会主义是不应该。因为人性不是如我们理想的纯善，社会力的关系亦不是如我们理想的简单。要根本的为世界求个长治久安，必须看清社会的真性质，社会主义实际的必要，为社会福利主张，传播，实行社会主义。这是我自信的一点心得。但是请问读者，这里面有几多的可研究的价值呢？

根据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的
《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五期刊印。

PDG

中国共产党宣言*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

亲爱的同志们！这个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在去年十一月间决定的。这宣言的内容不过是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这宣言之中文原稿不能在此地找到，所以兄弟把他从英文稿翻译出来。决定这宣言之时期既然有一年多了，当然到现在须要有修改和添补的地方。我很希望诸位同志把这个宣言仔细研究一番，因为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得要注意这种重要的文件——共产党宣言。并且会提出远东人民会议中国代表团中之共产主义者组讨论。讨论的结果，将要供中国共产党的参考和采纳。

Chang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日

1. 共产主义者的理想

A. 对于经济方面的见解　共产主义者主张将生产工

* 本文是一九二一年根据英文稿转译成中文的，保存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里，译者是参加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张国焘。

具——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共用。要是生产工具收归共有共用了，私有财产和赁银制度就自然跟着消灭。社会上个人剥夺个人的现状也会绝对没有，因为造成剥夺的根源的东西——剩余价值——再也没有地方可以取得了。

B. 对于政治方面的见解　共产主义者主张废除政权，如同现在所有的国家机关和政府，是当然不能存在的。因为政权、军队和法庭是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压迫多数劳动群众的；在生产工具为少数人私有的时候，这是很必要的。要是私有财产和赁银制度都废除了，政权、军队和法庭当然就用不着了。

C. 对于社会方面的见解　共产主义者要使社会上只有一个阶级（就是没有阶级）——就是劳动群众的阶级。私有财产是现社会中一切特殊势力的根源，要是没有人能够聚集他的财产了，那就没有特殊阶级了。

2. 共产主义者的目的

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但是要使我们的理想社会有实现之可能，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要铲除资本制度，只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劳动群众——无产阶级——的势力正在那里发展和团聚起来，这个势力是会使资本主义寿终正寝的。这种势力是在那里继续增长，这正是资本家的国家内部阶级冲突的结果。这个势力表现出来的方式，就是阶级争斗。

所以阶级争斗就是打倒资本主义的工具。阶级争斗从来就存在人类社会中间，不过已经改变了几次状态，因为这是以生产工具的发达为转移的。在封建国家的时候，阶级争斗也是一

样的存在；但是与在资本家的国家下面的阶级争斗是有分别的，因为资本家的国家下面阶级争斗是格外紧迫，其势足以动摇全世界。这种势力的增长，日见坚实，终归会把资本主义铲除了去。这种争斗的增长，是历史的法则。

共产党的任务是要组织和集中这阶级争斗的势力，使那攻打资本主义的势力日增雄厚。

这一定要向工人、农人、兵士、水手和学生宣传，才成功的；目的是要组织一些大的产业组合，并联合成一个产业组合的总联合会，又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这政权是维持资本家的国家的；并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人的手里，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

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产业组合定要用大罢工的方法，不断的扰乱资本家的国家，使劳动群众的敌人日趋软弱。要是到了可以从资本家手中夺得政权的最后争斗的时机，由共产党的号召，宣布总同盟罢工，这就是给资本制度一个致命的打击。

并且当了资本家被打倒了之后，这些产业组合就变成了共产主义的社会中主管经济生命的机关。

资本家政府的被推翻，和政权之转移于革命的无产阶级之手；这不过是共产党的目的之一部分，已告成功；但是共产党的任务是还没有完成，因为阶级争斗还是继续的，不过改换了一个方式罢了——这方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3. 阶级争斗的最近状态

照现在看来，全世界可视为一个资本家的机关，所以一国

的阶级争斗可使其他国家受同一的影响。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结果，使俄罗斯的阶级争斗变作劳农专政的方式。所以在其他国家内的阶级争斗也日见紧迫，他的趋向是向着与俄罗斯的阶级争斗一样的方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俄罗斯的阶级争斗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状态，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自然状态。当着资本家正被打倒，开始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的时候，这种状态是自然的。在一定的时期，这种俄罗斯的政况是必然的，所以这种政况在各国也是会必然的。因为我们从生产和分配的方法上看起来，这些国家都是一样的——都是资本主义式的。

俄罗斯的无产阶级的专政仅仅表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势力和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的势力争斗，现在在世界上有一部分已经战胜了。当着各国的无产阶级还在和资本主义争斗，还没有得到胜利的时候，我们设想俄罗斯在她领土之内，单独可以造成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这是大错而特错的。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既即时不能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又已经推翻了，她便不得不保卫自己，抵抗国内外的仇敌，这是很显明的。所以只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抵抗国内外的仇敌的目的。这就是说要用一个阶级的力量来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而这个阶级是要造成将来的世界，并受历史的使命，要成就这件事业。

再说罢，这并不是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征，也是全世界历史发展的特征，而且这种阶级争斗的状态，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得要经过的。

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不过是说政权已经被革命的无产阶级获得了，但是决不是说，资本主义势力的余迹，如反对革命的

势力，都已消灭了。也不是说推翻资本主义政权的结果，共产主义就很容易很简单的实现了。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一面继续用强力与资本主义的剩余势力作战，一面要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这种建设法是由无产阶级选出来的代表——最有阶级觉悟和革命精神的无产阶级中之一部分——所制定的。

一直等到全世界的资本家的势力都消灭了，生产事业也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开始活动了，那时候的无产阶级专政还要造出一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

社会革命底商榷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七日）

李　　达

一、时机的问题

社会革命！社会革命底呼声，在中国大陆一天一天的高了。有许多走狗学者也讲起社会主义来了。可是他们只是口头讲，心里未必赞成，也只是胡乱的讲，却未必十分懂，恐怕这班不久便会连口头赞成都要取消。他们不说中国人要准备知识，学会了社会主义，好行社会革命；便说要助长资本主义的发达好谈社会主义。这类的话，在最近的新闻杂志上登载得非常的多。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最易淆惑人心。他们是社会主义的障碍，是我们的敌人。所以我不得不说几句话纠正他们，然后把我的主张写了出来，同大家讨论。

法兰西的大革命，在现代人心理中看起来，都说是发源于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可是我试问当时巴黎数十百万参加革命的人民，都已学会了卢梭的学说吗？俄罗斯的大革命，人都说是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可是我又问圣彼得堡、莫斯科那无数万参加革命的劳动者和兵卒，都已学会了马克思主义吗？他们不过是受了当时绝大的经济上政治上的压迫，他们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总想打破现社会的压迫，脱离现政府的铁锁，就是

他们想求生存求自由方行革命的。所以卢梭马克思的思想，人人头脑中都有的，不过首先被他们两人道破罢了。

社会构成的基础，成立在支持人类生活的物资生产和生产交换之上的。一切革命的原因，皆由生产交换的方法手段而生，不是人的智力发明出来的，也不是抽象的真理产生出来。简单说，社会革命不是在哲学中探求而得的，乃是发生于现社会的经济状态之变动。

“一切过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不懂社会主义的人，只说中国无地主无资本家，没有阶级的区别，不能倡社会革命。其实他们不过闭着两只眼说说罢了，中国的社会中何以没有阶级呢?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土无立锥”，这两句话不是说明中国贫富两阶级的悬隔吗?中国的田主佃户两阶级，自古以来就有的了。田主每日毫不劳力，专门掠取佃户劳力所得的结果，度最奢侈的生活。佃户无论如何含辛茹苦的劳动，他们的命运总是铸定的。他们每年劳苦所得的收获，要缴纳一半多给田主，年岁好的时候，他们还可以穿点仅仅冻不死的衣，吃点仅仅饿不死的饭，住点过风漏雨的屋。倘若年岁不好，他们不是冻死，就是饿死。

每届凶荒他们之中冻死的饿死的何止数千百万。所以中国大多数做佃户的农民，从古以来，都在这种朝不保夕生活不安的状态之中，并没有得到丝毫幸福的。他们的苦痛，有眼的人都会看见的，用不着我来描写。可是一般人看惯了，觉得他们之中也还有饿不死冻不死的，殊不知离远一点看起来，就晓得佃户阶级的贫困了。

现在再就工业一方面说：中国现在已是产业革命的时期了。中国的工业虽不如欧美日本那样发达，却是在这产业革命

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还要大。中国劳动资本两阶级的对峙，在表面似乎与欧美日本不同，在实际上却无有不同的。

中国的资本阶级，是国际的。资本家差不多都是欧洲人、美洲人、日本人——也有最少数的中国人在内。那些资本家所办的大工厂，都在欧美和日本——中国各大都市中也有几处。在那些工厂中做工的，都是欧美日本人，中国人得不到工做。那些大工厂中造出的商品，输入到中国来，中国的手工制造品，受了打击，不能和他们竞争，于是手工业的人，把自己的手工废了不做，到工厂中去做工，充机械的奴隶去了。还有更甚的，就是想充一个机器的奴隶犹不可得。所以多数的家庭工业手工业和农业的生产人，现在受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的压迫，都变为失业的人，非饿死非冻死不可的了。这种缺陷在最开通的都市中，尤其容易看得出来的。所以中国是劳动过剩，并不是没有劳动阶级。在这一方面说起来，是国际资本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

中国田主佃户两阶级的分立，是固有的。现在受了产业革命的影响，又形成了资本劳动两阶级。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的对抗越发显明，无产阶级的贫困增大，有产阶级的财富增加，社会革命的机会到了。

最近数年以来，中国的武人强盗，争权夺利连年打仗骚扰不已。川粤的高山踏成了平地；湘鄂的地皮铲出了赤土；直鲁豫晋陕甘的平原，变成了沙漠；无产阶级冻死饿死的何止数千百万；农业的、工业的小生产机关，毁破了的何止数千百万；武人强盗助国际资本阶级，驱逐了中国旧有的生产机关，武人强盗掠夺搜括我们的手段，一天一天的恶辣，国际资本阶级的侵夺和压迫，也跟着一步一步的厉害。

中国的无产阶级呵！我们受了武人强盗经济上、政治上的掠夺和压迫犹不算数，还要受国际资本阶级经济上、政治上掠夺和压迫，我们果能得了丝毫平等和自由没有？民主主义破产了！我们的希望成了一个空，我们求生存求自由吗？我们应该怎样做？

二、生产和分配

现社会推倒之后，新社会中怎样生产、怎样分配呢？这是一件最紧要的事情，首先要研究的。

社会主义的派别很多，主张复杂。我趁先提出两个主潮，就是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两个主潮，就是在生产和分配的法则上分别的。

先就生产组织说：共产主义的生产组织是集中的，无政府主义的生产组织是分散的。共产主义的原则主张把一切农业工业的生产机关，都移归中央管理，有时因生产机关的种类不同，或移归地方管理。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却不然，主张破坏中央的权力，要将一切生产机关，委诸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管理。在这种地方看起来，无政府主义的生产组织，有一种最大的缺点，即是不能使生产力保持均平。要使各地方各职业的生产力保持均平，无论如何，非倚赖中央的权力不可。我们可以拿现时的资本制度作比，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是无政府的状态，讲自由竞争，对于生产力绝对不保持平均，供给与需要不能相应；资本家专顾投机，增加生产力，谋生产多量的商品，一时需要减少，生产过剩，其结果资本家别谋妙法填补，而劳动者却因此受了恐慌的影响，招来失业的苦痛。这就是资本主义产业组织不受政治力支配的恶结果。所以无政府主义派主张的生

产组织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差不多，若一地方或一职业的生产力供过于求，他地方或他职业的生产求过于供，就不能使他保持平均了，供给与需要不能相应，岂不是生产组织的混乱状态么？

生产的目的在供给社会全体的消费，并不是生了产就完了的。所以由这种意味说起来，新社会的生产组织，非有中央权力去干涉不可，各地方的各职业的单位非绝对服从中央权力不可。无政府派不主张有集中的权力，那么生产力怎能调剂呢？社会各员的消费生活不是有受侵害的危险吗？所以我是主张共产主义派的生产组织的。

其次研究分配制度。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以自由平等为根据。可是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分配制度对于自由平等很有不同的地方。分配制度分收入和消费两项，共产主义主张用一种方法调剂各个人的收入，用货币经济，借助货币的形式，分配生产物。各人消费的物资有一定的限制，不得超过自己收入所得的价值。消费的时候，各人必须支出自己收入所得的一部分，所以各种物资都须依一定的价值单位定一个价格。无政府主义的分配制度则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原则，全不调剂各人的收入，并且也没有收入不收入那种观念，只是调剂各人的消费，甚至连消费都不调节的。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是在分配上主张平等的，不过共产主义的平等关于收入，无政府主义的平等关于直接消费，可是两者之中，更有一个区别。

先就无政府主义说，卞倍巴布福等一派人主张分配底客观的平等，说各个人在年龄男女的界限内，应当分受同质同量的物资。福里耶克鲁泡特金一派人主张分配底主观的平等，即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两种主张，在我看起来都有些不妥。客观的消费、平等的主张，未免蔑视各人的个性，阻碍各人的

自由。又使消费的自由都得平等的主张，由正义、自由、平等的见地说起来似乎可行，可是非待世界的产业发达到极境的时候，不能办到。譬如今日行了社会革命、明日组织新社会，而新社会都是继承旧社会的生产力，继续发展的。这生产力是有一定的限制的，生产力既有制限，生产物当然也有制限了。以这有限制的生产，听各人消费的自由得其平等，是绝对办不到的。若果社会的生产力发达到无限制的程度，生产物十分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是很可实行的。只是在生产力未发达的地方与生产力未发达的时期内，若用这种分配制度，社会的经济的秩序就要弄糟了。

再就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说，生产力既有限制，生产出来的物质当然也有限制，我们分配这有限的物质要求其平等，就不可不行使货币经济，对于各人所收入的货币额加以限制。还有一事，物质的价格不可不用一个标准来测定他，生产物对于需要的关系，若其分量比较的多，则定价从廉，否则定价从高。照这样办起来，那么在人类的道德程度没有达到至圣至神的地位时，对于有限的生产物要行公平的分配，再没有比这种制度还好的了。所以我是主张采用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的。

三、革命的手段

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说：劳动阶级的革命，第一步在使无产阶级跑上支配阶级的地位。无产阶级就用政治的优越权，从资本阶级夺取一切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国家手里，即是集中在组成支配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于是全部生产力就可用大速度增加起来了……若照这样的发达起来，阶级的差别自然消灭，全部的生产，必然集在全国民众大联合的手中，公的

权力自然失掉政治的性质。政治力本来是一阶级压服从他阶级的一种组织力。无产阶级若和资本阶级战斗，迫不得已，自己不得不组织一个阶级，用革命的手段，把自己造成一个支配阶级，并且用权力扫除旧生产条件，于是阶级对抗的存在和一切阶级的自身都要扫除的，于是无产阶级的优越权也是要废除的。

社会革命底目的，在推倒有阶级、有特权的旧社会，组织无阶级、无特权的新社会。旧社会中有拥着生产机关的资本阶级，有特权阶级，有缺乏衣食住的资料而为他资本阶级所利用的劳动阶级。新社会中，没有资本阶级也没有劳动阶级，也没有特权阶级，生产机关为真正的生活机关，为社会全体的所共有个人和全体都能够自由发达。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概括的说起来，就是厉行非妥协的阶级斗争，以下专就具体的手段讨论一个大概。

社会革命底具体的手段大约可分数种：一、议会政策；二、工会运动；三、直接行动。议会政策的手段，是主张劳动者组织团体为参政的运动，劳动者要选议员，送到国会或地方议会去，参加立法的机关。这些代表劳动者的议员，可以在国会或地方议会提出改善劳动状态或抑制资本阶级的法案，务期循序渐进，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德英美等国社会党，多采取这种议会政策作为社会革命的手段。可是理想与事实相反，难以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在现社会组织之下资本阶级的势力最大，议会中的议员属于资本阶级的必然占绝对大多数，议会中通过法案是用多数表决的。劳动阶级没有金钱运动，得几名议员已不容易了，而今有几名劳动阶级的议员提出来的法案，当然要陷于否决的命运。所以无产阶级的议员要想在议会中成立一种除去自己阶级痛苦的法案，是断然办不到的。这时候就是

不唱高调只求贯彻自己阶级的几分之一的主张，非与资本阶级妥协不可，非得资本阶级的同意不可。照这样成立出来的法案，无非哀求资本阶级政府行非驴非马的社会政策。社会革命的目的，简直成了一种空想。现在有一班承袭德国社会民主党旧计的人，主张无产阶级要求普通选举。这件事本可以网罗大多数无产阶级的人，加入这种运动，可是这也是难得好效果的。依照各国的先例看起来，大凡最初运动普通选举的时候，资本阶级的现政府，是决不许可的，不说人民“程度未齐”便说“时机尚早”，平民只管请愿，资本阶级的政府是不睬的。这时候若果无产阶级能够真正有觉悟，一致结合起来，举行示威运动，使政府晓得他们的力量，政府若依然顽迷不悟，无产阶级就可借口争自由、争平等，或者可以革起命来。可是有一层，假若资本家政府能够见机行事，于革命未爆发以前，实行普通选举，那么，到这时候，无产阶级就没有口实可借了。结果又怎样呢？不过无产阶级能够选出几名议员送到国会中和资本阶级妥协，立几条使政府行社会政策的法案就完事了。要求政府行使社会政策，与要求资本家倡办慈善事业，究有何种区别呢？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就是一个先例。

其次研究工会运动的得失。工会运动是劳动者想借团体的力量谋劳动阶级的解放的一种手段。其内容大概可分两种：第一种是改良的，是社会政策的，采用阶级调和主义的手段，承认现制度，谋劳动阶级地位的向上。第二种是革命的，是社会主义的，采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改造现制度，创立劳动者本位的社会的。工会运动的武器就是同盟罢工。可是同盟罢工之中也有许多区别：第一种所行的同盟罢工，在要求改善劳动的条件。第二种所行的同盟罢工，其目的不在改善劳动条件，而在真实的解放劳动阶级，绝灭劳动阶级对资本阶级的关系。

同盟罢工底性质，有经济的，有政治的，有社会的。政治的总同盟罢工底目的，是劳动者利用产业上的地位，在政治上贯彻一定的目的，如扩张选举权，要求立法部通过一定的法律之类。可是这种罢工在原则上是承认现社会制度的经济组织的，只可当作劳动阶级一种示威运动的手段，若想利用他行社会革命是办不到的。

经济的总同盟罢工，其目的一般在减少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工资，与现在社会的经济组织，并无何种关系，决不能当作社会革命的手段。

社会的总同盟罢工，其性质与前二者大不相同，其目的在推倒资本本位的现社会制度，创设新社会的。这种是很彻底的，这种罢工的动机有主张借用一种特别的事故使全劳动阶级突然罢工，使资本阶级手足无措，乘机扑灭资本阶级从新建设无阶级的新社会，这种主张是很对的。又有主张使一般劳动者受适当的教育和训练，准备待时而发，这种主张是难于实现的。一般劳动者既有这种教育和训练，其结果当然新社会要实现的，不过百年河清难待罢了。此外还有一种理想，最初由各地方全体劳动阶级举行总同盟罢工，推而至于全国劳动阶级举行总同盟罢工，再推而至于全世界的劳动阶级举行总同盟罢工，到这时候全世界的资本阶级都要铲除了。这种理想，固然是好，恐怕非同时所能办到的，所以也只能作为一种理想罢了。

由以上的研究，归结到中国的劳动界来。中国是劳动过剩的国家，大多数都是失业者，所以中国的工会运动是不易行的。工会运动要依那一国家、那一地方的经济状态为转移。假如某一地方的经济发达，工厂办得多，劳动者都有工作，这时候劳动者很可以行工会运动和资本阶级奋斗的。可是经济界不

发达的地方，劳动者失业的多，要求一个卖劳力换饭吃的地方都不能得，哪能够举行罢工惹起失业的危险呢？不说远了，就把日本作比，去年日本经济兴旺的时候，罢工的运动，非常流行。到今年经济恐慌的时候，工厂倒闭的非常之多，劳动界失业的不下数十百万，罢工的运动，差不多断了影子。中国的工厂本是少，而劳动者无工作，与日本劳动者失了业的是一样。所以中国多数无产阶级都是失了业的劳动者，所以工会运动在现在的中国，是不容易发达的。可是也有一种事要注意的，我们虽不能全靠工会运动行社会革命，而为增加阶级斗争的速度起见，劳动界却不能不结合一种团体和资本阶级对抗，所以工会还是要从速组织、积极进行的。工会组织之后，然后开始和工会以外的无产阶级极力结合，等候时机到来，好和资本阶级开战。

直接行动是什么呢？这是一种最有效力的手段，要仔细讨论的。阶级斗争的手段，以最普遍、最猛烈、最有力量的为好。无产阶级，包括最广，所以革命运动，非网罗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在内不可。参加运动的人越多，力量越大，运动越猛烈，奏效越迅速。我很主张无产阶级为突发的群众运动。譬如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法国地方自治团在巴黎干的猛烈运动，一九〇四年意大利工人干的突然发生的大运动，一九一七年俄国无产阶级在圣彼得堡干的大示威运动，一九一八年八月日本无产阶级干的米荒骚乱，都是很有效力的。中国“五四”、“六三”两大运动在形式上也是有力量的，可惜他们走错了方向。又今年北方八省无数千万的饥民，若果自己不甘冻死、不甘饿死，一致起来把经济上、政治上的压迫打破了，也是很好的。中国政治上、经济上的混乱恐慌，达到极点，社会上的大缺陷，随时暴露出来，可乘的机会很多。所以我主张我们要在各大都

会，结合工人、农民、兵士及他种属于无产阶级的人，组织一个大团体，利用机会，猛然的干起大规模的运动来，把那地方的政治力，夺在我们手中，凭着政治上的势力，实行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完全管理社会中经济的事业。所以这种直接行动，可以称为社会革命的唯一手段。

此外还有相辅而行的手段，就是宣传。宣传的办法，无论是公开的或秘密的，总要普遍，要能激动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的敌忾心，亦能发生效力。

现在我简单的说几句，作为这篇文章的结论：照社会主义的原则说，社会革命在资本制度发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自然要实现的，然而也可以用他种人为势力——非妥协的阶级斗争——促进他的速度。英、美的资本制度比俄国的要发达得十数倍，英、美两国的工会比俄国的也要发达得十数倍，何以社会革命不在英、美两国发生，反在俄国实现呢？这就是因为俄国社会革命党实行的力量比英、美两国的大的原故。所以我国在中国运动社会革命的人，不必专受理论上的拘束，要努力在实行上去做。

根据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七日出版的
《共产党》第二号刊印。

PDG

马克思还原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李　　达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已经在俄国完全实现了。可是还有许多人正在那里怀疑，实在有替他们解释的必要，所以特意的写点出来看看。

这篇文字的大意，第一要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本体，其次要说明马克思主义堕落的原因和历史，末了要说明马克思主义复活的事实，使世人了解真正的马克思。

马克思社会主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最难于简单的答复，可是这里也为省篇幅起见，特就马克思所述社会革命的原理、手段、方法及其理想中的社会，列举大概如下：

一、一切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宗教、哲学、法律、政治等组织，均依这经济的基础而定。

二、社会的物质的生产力，发展至于一定程度时，就与现社会中活动而来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发生冲突。资本家利用收集生产物的剩余价值，坐致巨富，劳动者仅赖工钱以谋生。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遂划分社会为有产者、无产者两大阶级。

三、人类的历史是阶级争斗的历史。资本制度发展到了一

定阶段，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就与少数的有产阶级互相对峙起来。劳动者发生阶级的心理与阶级的自觉，互相联合组成一大阶级，与有产阶级为猛烈的争斗。

四、资本主义跋扈，渐带国际的倾向，而无产阶级的作战，亦趋于国际的团结。于是全世界一切掠夺、压迫、阶级制度、阶级斗争，若不完全歼灭，全世界被压迫、被掠夺的无产阶级，不能从施压迫、施掠夺的有产阶级完全解放。

五、无产阶级的革命，在颠覆有产阶级的权势，建立劳动者的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六、无产阶级借政治的优越权，施强迫手段夺取资本阶级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劳动者的国家手里，用最大的加速度，发展全生产力。

七、国家是一阶级压迫他一阶级的机关，若无产阶级专政，完全管理社会经济事业，把生产工具变为国家公产以后，则劳动阶级的利益，成为社会全体的利益，就没有奴隶制度，没有阶级差别，生产力完全发达，人人皆得自由发展。国家这种东西自然消灭，自由的社会自然实现了。

以上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概观。综合起来说，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性质，是革命的，是非妥协的，是国际的，是主张劳动专政的，这就可以明白了。

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科学的，其重要原则有五：一、唯物史观；二、资本集中说；三、资本主义崩坏说；四、剩余价值说；五、阶级斗争说。马克思的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均详备于此五原则之中。

马克思是理论家又是实行家，实具有二重资格。学者的马克思与实际运动家的马克思或不免略有出入的地方，马克思的门徒就因为这种关系，发生了许多误会出来。固守师说的人则

拘泥不化，自作聪明的人就妄加修改，把一个马克思的真面目弄湮没了。什么正统派、修正派也就发生了。

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堕落，可以从两方面说明：一是从实际的方面的说明；一是从理论的方面的说明。

马克思社会主义在德国本不甚流行，可是现在一般的论者，却多指德国社会民主党为马克思社会主义的代表。所以要说明马克思主义堕落的原因，无论如何，非说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本体及变态不可。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马克思派的国际劳动协会和拉塞尔派的德国劳动协会并合而成的。当时马克思派以威廉里布克勒为代表，他们最初标榜纯马克思主义。对于拉塞尔派的国家主义，带有国际主义的色彩。所以社会主义的政策，从理论上说，马克思派较为彻底。可是从当时的实际问题上说，拉塞尔派反占有力的地位。再严格的说，拉塞尔派并不能称为社会党，只可称为自由党，他们承认国家、承认战争、承认国家的活动。而当时马克思派的主张却与此完全相反对的。可是德国民族有崇拜国家万能的根性，所以为时不久，马克思派所信奉的主义就渐呈变态了。拉塞尔派主张经济改善，须俟政治改善，以为一切社会改革非行普通选举使全体人民参政不可，所以要纠合全国无产阶级组织一个大政党。马克思派本来标榜彻底的主义，可是到了一八六九年，马克思派的国际劳动协会，组织了民主劳动党，以实现所谓自由民国为标帜。而实现这自由民国的手段，则以获得政治的自由为政纲，说政治的自由是经济的自由的基础，所以也主张行直接的普通选举。到这时候，民主劳动党所标举的政纲，已极其保守，与拉塞尔派极相接近，马克思派国际主义，鉴于周围的形势已经放弃了。两派既无根本不同之处，而合同之机运已到。所以两派于一八七五年在哥达合

并，而社会民主劳动党于是产生了。当时该党在哥达所订的政纲，在理论上虽采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而在实际政策上则采用拉塞尔派的劳动资本两阶级的协和主义了。国际主义派与国家主义派互相提携结为一党，实是一种变态。这是马克思主义堕落的第一步。

社会民主劳动党自经俾士麦施镇压令以后，该党颇受挫折，且因受当时社会状态的影响，于是理论上与政策上的见地，于有形无形中发生变化，把该党一八九一年爱尔弗尔特政纲一看，就可知道的。该党在理论上原来反对议会政策的，从前党员被选为议员出席国会的时候，常有一种标语说："我们到议会非参与立法事宜，乃是妨害议场并宣传主义的。"又说："我们不是赞成资本阶级的立法，不是卖同志。"所以他们虽然做国会议员，口头上还有几分强硬态度。可是自一八九〇年以后，该党不称"社会民主劳动党"，改称"社会民主党"，表明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相结合，简直要与权力阶级妥协了。威廉里布克勒简直承认了议会政策。他说："主义与战术有别，我在一八六九年本反对过议会政策的，可是在今日则事实与前大变了。"于是从前反对预算、关税、立法、军备、殖民政策的，此时却不惜加以协赞了。帝国议会书记八名中也有一名的社会党员加入了，社会党自己也提出法案了。兵士增饷的法案，施行社会政策的法案，责任内阁的法案，保险官办的法案等等，或径由该党提出，或加以协赞了。从前主张阶级斗争，此时主张阶级调和，从前反对议会政策，现在反赞成议会政策了。这是马克思主义堕落的第二步。

其次关于社会民主党的变态及堕落更堪注意的，就是该党对于战争的态度。社会民主党本来极力反对战争的。因为国际战争是资本阶级国家与国家间的战争，是资本阶级利益的冲

突，劳动者是没有祖国的，国家虽亡，而劳动者除失掉铁锁以外并无他种损失的。劳动者若承认资本阶级国际的战争，就是承认资本主义，所以社会党是根本的、绝对的反对战争的。可是由国际主义变而为国家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后来对于战争的态度也改变了。一九〇七年贝贝尔在帝国议会的演说，说明对于战争应取的态度。他说："本国侵略他国的战争，本可反对，若本国受他国的侵略则须应战"，是已明白承认了战争了。这种主张，支配了社会民主党大多数人的心理，直至此次欧洲大战发生的时候，该党党员因此大中其毒。在欧战将开始的时候，该党犹装腔作势，极力非战，言论鼓吹，不遗余力，可是战端开始以后，该党的态度就大变了。战费案也协赞了，党员也从军了，并且人人都努力为国牺牲，好像殉教者一般。昨日的社会党，今日已成了国民党、自由党了。欧战五年间，德国除加尔里布克勒、连休修达、哈艮三人及卢森布尔克、泽特金二女士外，差不多没有社会主义者了。马克思社会主义至此时已完全消失了。这是马克思主义堕落的第三步。

由以上所述考察起来，马克思社会主义，经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蹂躏，精彩完全消失，由国际主义堕落到国家主义，由社会主义堕落到自由主义，由革命主义堕落到改良主义，由阶级斗争堕落到阶级调和，由直接行动堕落到议会主义，马克思的真面目被威廉里布克勒、贝贝尔、柏伦斯泰因、柯兹基一流人湮灭殆尽了。

这是从实际上说明马克思主义堕落的原因，而在理论上又是如何变迁附会的呢？也有详细叙述的必要，再说明于下。

依唯物史观所说，新社会的组织，是旧社会组织中各种固有势力发展的结果。资本制度发达至于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发生一种"自身解体的物质上的动因"，资本制度自己掘自己

的坟坑。可是某种社会形式中固有的生产力，若在可以充分利用发达的期限以内，决不会倒灭的。这种社会形式发展的结果，内中新生产力的利用和发达，当然要与这社会形式发生冲突。资本的独占成为生产关系[1]的桎梏。于是生产机关的集中与劳动的社会化，遂与资本主义不能两立，而新社会组织于是起来代替了。可是这里所述的“新生产力”和“资本制度自身解体的物质上的动因”，究应如何解释呢？若说资本制度的解体是资本集中的结果，则由旧社会推移到新社会的途径，完全可以离却人的精神的要素和意识的行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变为机械的史观了。若是这样解释，社会党无须干社会革命，只听资本主义自然发展好了。社会主义者也无须鼓吹革命，只努力去开发实业好了，国家当然可以利用，阶级当然可以调和了。因为资本集中的结果，自然要发生革命的。所以照这样说，马克思一面运动革命，一面唱这种机械史观的宿命论，不是自相矛盾吗？这是使人易生疑窦的地方。马克思派主义者的变态，未始不从这种怀疑点出发的。他们这种误入歧路的地方，早已有许多学者出来纠正了的，可是这种错误，一般普通人都可以看得出的。就是上面所说的，资本制度发达到了一定程度，资本阶级收集掠夺劳动者的血汗的剩余生产，增加自己的私有财产，劳动者仅依工钱谋生。于是社会截然分为有产者、无产者两大阶级。无产阶级受了资本阶级的掠夺和压迫，久而久之，就会发生一种阶级的觉悟。有了这种阶级的觉悟，就发生一种阶级的心理。有了这种阶级的心理，就会有一种阶级的组织和阶级的运动，就自然有一种团体的结合，成为阶级斗争的行动。阶级斗争的结果，无产阶级得最后的胜利，自然要废止私有财产，推倒资本制度。所以唯物史观一方面说明资本制度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注重现社会中新兴的无产阶级的力

量。若忽视这种阶级的心理和阶级的自觉，不去助长阶级斗争的运动，社会革命是不可期待的。

过信资本集中论的人，对于马克思的学说，便生出一种根本的怀疑点。因为马克思的先见，是说明资本集中的结果，一资本家压倒多数的资本家，收夺者复遭收夺。且此时应受收夺的人已非为自己作工的劳动者，反是利用多数劳动者的资本家。照这样说，马克思的革命观，当然要跟着资本制度发达的程序益增显著。可是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至十九世纪末叶，数十年间，资本集中的步骤，并未证实马克思预言的确实。而且在他一方面看来，资本制度的范围扩大，公司会社日见增加，中产阶级的人数因亦增多，小资本家依然存在。资本并未集中，反形分散之象。而收夺者的收夺亦未成就。马克思的预言至此竟成空想。于是马克思派主义者，对于资本集中和社会自然革命的先见，怀起疑来，以为资本集中的学说，资本制度倒坏的学说，都是不可靠的了。于是不相信革命的必然主义，以为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的过程，只有进化而无革命，只有运动而无目的，而所谓修正派的运动，于是盛行了。加以当时思想界的倾向，在文艺方面已由自然主义转入新罗曼主义，在哲学方面已由实证主义转入新理想主义，所以社会主义也不能超过这范围独立存在。所以新理想主义，渐至代替唯物史观的位置。同时修正派运动发生“新马克思派的康德化，新康德派的马克思化”的现象，愈增显著了。于是柏伦斯泰因的修正主义，遂支配了社会民主党员大多数的心理，都放弃革命主义流而为进化主义、改良主义了。

其须最堪注目的，就是马克思派的政治运动。一部《共产党宣言》，差不多纯粹讲革命的，可是把那十大政纲看起来，却很平易而且是利用国家的。这种地方就含有所谓“二元的性

质”。这种二元的性质，就被他们附会到议会主义去了。从实际上说起来，一切社会问题，不尽是一阶级的问题，也有阶级与阶级间的共通问题。这种阶级间共通的问题，关系阶级间共通的利害。无产阶级对于这种问题的解决方法，有时也无定要推倒有产阶级的必要，而且有时也可以和有产阶级携手的。所以无产阶级对于革命运动以外，凡有可以与有产阶级协同行动的，只有阶级共通的问题。这种协同的行动，就是政治运动。政治运动当然要利用国家，这也是必然的趋势。马克思派误会了这种地方，重视了这类阶级间共通的问题，专行政治运动，而且把阶级对抗的运动也附属于政治运动的范围以内了。于是社会党议会主义的大旗帜，在世界上招展起来了。马克思主义一入议会主义的范围，立刻就由革命主义堕落到改良主义，失却了本来的面目。

要推倒资本主义，必须厉行阶级争斗。所以劳动团体阶级的运动，最关紧要。劳动团体阶级的运动，决不可附属于政治的团体。马克思也曾说，劳动组合要达到本来的目的，决不可附属于政党。劳动组合若失其独立，劳动组合立即死亡。劳动组合是社会主义的学校，劳动者在这学校里和资本阶级争斗，其结果要达到社会主义。一切政党无论其倾向如何，只不过唤起劳动阶级的狂热，而劳动组合，则在劳动阶级之间造成有力而且永久的团结。所以只有劳动组合能够造成真的劳动阶级的党派，能使劳动者的势力抵抗资本家的势力。所以由这一点看起来，劳工运动是不能把来附属政党的。社会民主党也把政治运动和阶级运动并为一事，公然要借议会政策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不过是一种梦想罢了。

以上是从理论上说明马克思主义堕落的原因的。我们从上述实际上理论上观察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的变迁，就可以知道标

榜马克思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牵强附会的，是堕落的了。

马克思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是完成了的，在事实上也可以完成。只有一事与马克思的预言略有不符，就是十九世纪后半期四五十年间，各国的资本主义虽日见扩张，劳动阶级的人虽日见增加，而劳动者阶级的心理与阶级的自觉，十分幼稚，所以劳动组织和运动，都不甚发达。当时的德国固不待言，即如英国劳动组合虽日见发达，然仍不能离去地位改善运动的范围，很带保守的倾向。这种地方是与马克思的预期相反的。一般马克思派主义者，窥见当时的形势，以为与其求速成而无效，不如取渐进主义，愈改变而愈离奇，竟弄出非驴非马的马克思社会主义来了。

可是最近二十年来，各国劳动运动的发达，一一与马克思的预言相符合了。劳动组合已由职业的组合变为阶级的组合了。劳动运动已由同业运动变而为阶级的运动了。更有一种新劳动组织，已经创造了新生产组织了。阶级的觉悟与阶级的心理，愈益增大，而阶级斗争的运动，亦日增剧烈了。“一切工业社会化!”的声浪，几于无处不闻。所以说到这里来，我们就不能不佩服马克思的先见了。

更举实例说明，就是劳农俄国的缔造。世间以耳代目的人，都说劳农俄国所行的主义是一种什么过激主义，看作蛇蝎一般。其实劳农俄国的施设，在我的眼光看起来，并无新奇的地方。就是俄国所行的，各国最怕的“劳动专政”，都是数十年前马克思所倡导，所主张的，用不着大惊小怪。列宁并不是创造家，只可称为实行家，不过能将马克思主义的真相阐明表彰出来，善于应用，这便是列宁的伟大，世人都要拜服的。

被威廉里布克勒、贝贝尔、柏伦斯泰因、柯兹基等弄堕落

了的马克思社会主义，到今日却能因列宁等的发扬光大，恢复了马克思的真面目了，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实。

所以我要大声疾呼地说："马克思还原!"

一九二〇，一二，二六，于上海。

根据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出版的
《新青年》第八卷第五号刊印。

注　释

〔1〕这里的"生产关系"应为"生产力"。

PDG

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二日）

毛 泽 东

一

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

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

* 这篇发言标志着毛泽东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道路。新民学会长沙会员新年大会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三日举行，热烈讨论了一九二〇年七月新民学会旅法会员在法国蒙达尔尼会议上提出的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以及改造的方法、目的等问题。本篇一是毛泽东一月一日的发言，本篇二是毛泽东一月二日的发言。

二

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

1. 社会政策[1]；
2. 社会民主主义；
3. 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4. 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
5. 无政府主义。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

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社会政策，指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一种社会改良主义，后流行于欧美以及日本，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社会政策的提倡者主张阶级协调，由国家或其他社会力量制订劳动法规，实行社会保险，成立工人组织，兴办福利、救济事业等等，来维护资本主义经济。

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

（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日）

李 大 钊

中国今日是否能行社会主义？换言之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在中国今日是否具备，是很要紧而且应该深加研究的问题。我且简单的把我的意见陈述于下：

要问中国今日是否已具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须先问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实现社会主义的倾向的经济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势力之外。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中国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而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苦痛。中国国内的劳资阶级间虽未发生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再看中国在国际上地位，人家已经由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地位，我们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发点，按人家

* 本文原是李大钊给费觉天的信，标题是在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日出版的《评论之评论》第一卷第二号发表时费觉天加的。

的步数走。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在这种势力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所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出版的
《李大钊选集》刊印。

PDG

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

（一九二一年四月八日）

李　　达

近来讨论社会主义的人渐渐多了，这确是一个好现象。因为社会主义的真谛若能充分的阐发出来，批评者就不会流于谩骂，信仰者就不会陷于盲从。而且知识阶级中表同情于资本家的与表同情于劳动者的两派，旗帜越发鲜明，竭智尽力，各为其主，而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两方面，皆可同时发展，以待最后之决胜。所以我说现时讨论的人越多，越是好现象。

《改造》杂志二月号特辟“社会主义研究”一栏，一时知名之士如梁任公[1]、蓝公武、蒋百里、彭一湖、蓝公彦、费觉天、张东荪一班人，均有长篇文字，表明对于社会主义的态度。他们的文字均有点研究，我读了非常感佩。但是这几篇文字之中，也有误解社会主义的，也有同情于社会主义的，也有积极赞成资本主义的，也有恐怖伪劳农主义的。我觉得这种地方，却也应该详细研究分别讨论，只是我没有许多闲暇作从容的论辩，所以只就梁任公一篇代表的文字，讨论一个大概。

梁任公是多方面的人才，又是一个谈思想的思想家，所作的文字很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意见，很能博得一部分人的同情。就是《复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篇文字，虽然明明主张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而立论似多近理，评议又复周到。凡

是对于社会主义无甚研究的人，看了这篇文字，就不免被其感动，望洋兴叹，裹足不前。我为忠实主义起见，认定梁任公这篇文字是最有力的论敌，所以借着这篇文字作一个X光线，窥察梁任公自身和梁任公所代表的智识阶级中一部分人总括的心理状态，试作一个疑问质询梁任公，或者对于主义上有些少的阐明补正也未可知。这也许是梁任公所说“冀普天下同主义之人有以教之”的一点反应了。

梁任公本文的旨趣，约分五层，兹摘录大概如下：

（一）误解社会主义。梁任公首先误解社会主义为社会政策派的劳动运动，所以说：“吾以为中国今日之社会主义运动，有与欧美最不相同之一点焉。欧美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因此推论中国产业不发达，生产机关极少，不能行均产主义。所以又说：“我虽将国内资产均之又均，若五雀六燕，铢黍罔失其平，而我社会向上之效，终茫如捕风。”于是又论到社会主义运动，说：“故吾以为在今日之中国而言社会主义运动，有一公例当严守焉。曰：在奖励生产的范围以内，为分配平均之运动。若专注分配而忘却生产，则其运动可谓毫无意义。”此一层是梁任公误解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议论。

（二）提倡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梁任公又以为中国生产事业极其衰落幼稚，中国人消费所需之生产品，皆仰外人供给。而制造此类消费品的资本家、劳动者和工厂，均在外国而不在中国，中国人受不到外国资本家的恩惠，中国无业人民又不能到外国工厂做工，中国国内未梦见工业革命之作何状，工厂绝少，游民最多，并无劳动阶级。既没有劳动阶级就不能行社会主义运动。所以说，“欲行社会主义生产方法，必须先

以国内有许多现行之生产机关为前提。若如今日之中国，生产事业一无所有，虽欲交劳动者管理，试问将何物交去?”社会主义既不可行，则为改造中国社会计，当然不能防止资本阶级之发生，而且要借资本阶级以养成劳动阶级，做实行社会主义的准备。此一段是梁任公提倡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立言。

（三）高唱爱国主义，排斥外国资本家。梁任公看见国内无业游民过多，贫困日甚。加以受外国产业革命影响，“我国人之职业直接为外国劳动阶级之所蚕食；而我国人衣食之资，间接为外国资产阶级之所掠夺。”所以中国生产事业，必须由中国资本家自己开发，以便造成多数生产机关，吸收本国多数无业游民使为劳动者。所以说：“中国生产事业若有一线之转机，则主其事者，什九仍属于‘将本求利’者流。吾辈若祝祷彼辈之失败耶？则无异自诅咒本国之生产事业，以助外国资本家张目。”末了又说：“欲使中国多数人弃其游民资格而取得劳动者资格，舍生产事业发达外其道无由。生产事业发达，凡吾国人消费所需，皆由吾国人自生产而自供给之，至少亦须在吾国内生产而供给之。”若对于本国资本家采抗阻态度，“必妨害本国生产，徒使外国资本家得意而匿笑。且因此阻碍劳动阶级之发生，于吾辈之主义为大不利”。“然则所当采者为何？则矫正态度与疏泄态度是已。所谓矫正态度者，将来勃兴之资本家，若果能完其‘为本国增加生产力’之一大职务，能使多数游民得有职业，吾辈愿承认其在社会上有一部分功德，虽取偿较优，亦可姑容。”由此一段可推知梁任公爱本国、爱本国资本家、劳动者之热情，故发而为排斥外国资本家、劳动者之言，也许是爱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结合的一种表现了。

（四）提倡温情主义，主张社会政策。梁任公既然主张用

资本主义开发本国产业，而资本制度发生的恶果，当然要循外国资本制度的旧径，发出无穷的弊害。要想补救此种弊害，只有采矫正态度与疏泄态度，不可抗阻，亦不可坐视。所以说："唯当设法使彼辈（资本家）有深切著明之觉悟，知剩余利益断不容全部掠夺，掠夺太过必生反动，非彼辈之福。对于劳力者生计之培养，体力之爱惜，智识之给与，皆须十分注意。质言之，则务取劳资协调主义，使两阶级之距离不致太甚也。至所用矫正之手段，则若政府的立法，若社会的监督，各因其力之所能及而已。"又说："所谓疏泄态度者，现在为振兴此弃毙之生产力起见，不能不属望于资本家，原属不得已之办法。却不能恃资本家为国中唯一之生产者，致生产与消费绝不相谋，酿成极端畸形之弊。故必同时有非资本主义的生产，以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相为骈进。"此一段是他提倡温情主义，施行社会政策的主张。

（五）误会社会主义运动。梁任公误解社会主义运动为劳动者地位改善，所以反对；又误解为均产，所以反对；又误解为专争分配，所以也反对。又误解社会主义运动为利用游民，所以说："劳动阶级运动之结果，能产出神圣之劳动者。游民阶级运动之结果，只有增加游民。"又说："游民阶级假借名义之运动，对于真主义之前途，无益而有害。"这是梁任公反对中国社会主义运动最精刻的地方。但是依他所主张的运动方法却不外以下两层。即对于劳动者，"第一，灌输以相当之智识。第二，助长其组织力。先向彼辈切身利害之事入手，劝其办一两件（如疾病、保险之类）。办有成效，彼辈自感觉相扶相助之有实益，感觉有团体的好处，则真正之工会，可以成立。"工会次第成立，有组织完善之工会，然后可以行社会主义运动。但梁任公所主张的工会运动，不在敌抗本国资本家，而在

敌全世界资本家，所以说："全世界资本主义之存灭，可以我国劳资战争最后之胜负决之。"又说："谋劳动团体之产生、发育、强立，以为对全世界资本阶级最后决胜之准备。"他主张运动的规模非常之大，而所用的手段又非常之小。未知是否有效，实有讨论之余地。

以上梁任公论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概，以下逐条讨论：

第一，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运动又是什么？我以为这应该首先在这里说明。

社会主义成了现实的势力活动而来的，还是十八世纪以后的事情。瓦特发明蒸汽机关以来就引起欧洲产业革命的导火线，新机械陆续发明，归特权阶级所有与利用。家庭工业变成工厂工业。手工业者骤然失业，不得不到特权阶级的大工厂中，做机械的奴隶。新机械不须劳动者多年的练习，又不须专用男性，而吸收妇女与少年。劳力供给过多，惹起男女的竞争，助长工银的低落，占大多数的消费者无产阶级，不能消纳工厂中的生产品，资本阶级不得不向海外觅销场，于是惹起国际战争；于是惹起经济恐慌；于是贫富的悬隔愈甚；于是欧洲的劳动者觉悟他们实在是被引到错路上来了。他们觉悟他们自己的正当权利，于是觉悟到以共同生产共同消费为原则的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资本主义给了他们一个好教训——但这教训的代价不小——使他们知道以自由竞争及私有财产为根本的社会组织是毕竟要使他们陷于资本主义的迷途而把自身做他的牺牲的；要谋社会全体的福利只有把这种自由竞争和私产制度永远除去，而建设永久的共产社会。阶级由对峙而斗争，而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势以成，这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由来。

所以社会主义在根本改造经济组织谋社会中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实行将一切生产机关归为公有，共同生产共同消费。

社会主义运动，就是用种种的手段方法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至于所采取的手段，有急进缓进的分别，然就现时最新的倾向而言，一方面在联合一切工人组织工会，作为宣传社会主义的学校，学习管理生产机关，一俟有相当组织和训练，即采直接行动实行社会革命，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他一方面则联络各国劳动阶级为国际的团结，行国际的运动，以期扫荡全世界资本阶级。

中国现在已是产业革命的时期了。中国工业的发达虽不如欧美、日本，而在此产业革命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更甚。先前恃丝业、茶业、土布业、土糖业，以至制钉业、制铁业谋生的劳动者，今皆因欧美、日本大工业的影响，次第失业，又不能赴欧美、日本大工场，去充机械的奴隶，得工资以谋生。加以近年来，国内武人强盗，争权夺利，黩武兴戎，农工业小生产机关，差不多完全破坏。中国无产阶级的厄运，实不能以言语形容。所以我说中国人民，已在产业革命的梦中，不过不自知其为梦罢了。

中国旧有的小生产机关，既然受了欧美、日本产业大革命的影响，差不多完全破坏，而新式生产机关又非常的少，因此之故，中国大多数无产阶级的人民，遂由手工业者变而为失业者，专成为欧美、日本工业生产品消费的失业劳动者了。所以中国的游民，都可说是失业的劳动者。

我并不主张利用游民实行革命，但是劳动者不幸失业而成游民，若有相当的团体训练，何以绝对不许他们主张自身的权利？梁任公一定要他们回复到了赁银奴隶的地位以后，才准他们发言，是何道理？

至说中国现时社会实况与欧美略有不同，这是我们所承认

的。但是不同的地方，也只有产业发达的先后不同，和发达的程度不同，而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原则，却无有不同，而且又不能独异的。

所以在今日的中国而讲社会主义运动，在如何设法得以造出公有的生产机关，如何方能避去欧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所生的弊害，而不专在于争生产品的分配。梁任公既误认了这对象，而主张“在奖励生产的范围内，为分配平均之运动”。这明明是主张贫人丐富人恩惠以谋生的运动，只可说是乞丐的社会主义运动。梁任公这公例，我就首先不承认了。前提既然不当，以后因此前提演出来的推论，当然也是不对。

照以上所述看起来，我们晓得欧美社会主义运动，决不是梁任公所说的“劳动者地位改善”，也不是他所说的“均产”，也不是专在于争分配了。

第二，要想为中国无产阶级谋幸福而除去一切悲痛，首先就要使他们获得生活必需的资料。要使他们获得生活必需的资料，首先就要开发生产事业。所以发达生产事业的一件事，无论是资本主义者，或是社会主义者，都是绝对承认的，只不过生产方法不同罢了！

资本主义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社会主义有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今就这两种生产方法分别比较于下。

资本主义生产组织，一切生产机关，概归最小数资本阶级所私有，最大多数的劳动者，均为劳银的奴隶，完全受资本阶级所支配。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关系是人与物的关系。劳动者制造出来的剩余生产尽归资本家，自己仅得些小工资过活，还不能赡养一家。资本家专讲自由竞争，对于生产力绝对不谋保持均平，供给与需要不能相应，只顾盘算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增加生产力，谋生产多量的商品，增加自己的私产。一时需要减

少，生产过剩，其结果资本家别谋妙法填补，劳动者却因此大受恐慌，招来失业的苦痛，这就是产业组织不受政治力支配的恶果。社会主义生产组织却不是如此，一切农工业生产机关，概归社会公有，共同劳力制造生产物，平均消费。商品生产可以全废，生产物不至于压迫生产者。人与人的生存竞争完全消灭。生产消费完全可以保持均平。一人利用他人、压迫他人的事实绝对不会发生，也没有经济恐慌、人民失业的危险。所以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是无政府、无秩序的状态，社会主义生产组织是有秩序、有政府的状态。这两者的利害得失，我想无论何人都容易判别出来。

世间不懂社会主义的人，把社会主义看作洪水猛兽一般，当着这社会主义潮流澎湃而来的时候，这类人就大惊小怪，好像对于项城称帝、张勋复辟一样，纷纷议论顺逆的态度。他们以为一旦实行社会主义，就破坏生产机关，或者将生产机关分散，生产事业就要永远停止，人民就得不着生活资料了。梁任公误解社会主义为均产主义的说法，也就是因为忘记了社会主义更有很好的生产方法的缘故。他或者不是不知道社会主义有很好的生产方法，而以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必不可免的过程。那么，我就要告诉梁先生，若忧劳动者不经过资本主义不能自觉，这是个教育的问题；若忧劳动者自己没有发达生产的资本，那时资本却在劳动者自己身上。资本家要雇劳动者，共产的劳动者只须自己出气力。若说劳动者在起初毕竟少不得金钱的资本，那么资本家的金钱本来是要归还给劳动者的。

将来社会的经济组织必归着于社会主义，我想无论何人都当承认的。中国生产事业虽十分幼稚，远不如欧美、日本，然在稍远的将来，中国的社会组织必有追踪欧美、日本的一日。据现时趋势观察起来，欧美、日本的社会改造运动，已显然向

着社会主义进行，中国要想追踪欧美和日本，势不得不于此时开始准备实行社会主义。

就中国现状而论，国内新式生产机关绝少，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譬如我们要建造新建筑物，只好按着我们的理想去造，不必仿照他人旧式不合理想的式样暂时造出不合理想的建筑物，准备将来改造。欧美各国的经济组织，正如旧式不合理想的大建筑物一样，规模太大，转换不易，要想根本改造，实在是最难之事。请看欧美社会改造运动家，那样的努力，那样的牺牲，犹然达不到改造的目的，这就是最好的实例。梁任公说："吾辈畴昔所想念，总以欧美产业社会末流之弊至于此极，吾国既属产业之后进国，正可惩其前失，毋蹈其覆辙……及至今日，而吾觉此种见解什九殆成梦想。"然据我的推想，梁任公所说的不过是没有经验的"梦想"，因为他并未向着这个目标进行，并没有努力运动，又岂能期望社会主义自然实现吗？

梁任公主张要设法使中国国境以内建设适当之生产事业，以吸收失业游民，使不致冻馁而死，资本阶级纵掠夺剩余生产亦可姑容。这样说来，我们的目的若果是专在使游民得衣食资料，那就有两条近路可走：第一，设法不开发工业，极力奖励旧式手工业生产，或者提倡国货，排斥外货，依梁任公所说："凡吾国人消费所需，皆由吾国人自生产而自供给之。"照这样办，我国的生产事业也可望发达，游民可以减少，劳动阶级可以成立。社会运动得有主体，新社会亦可以实现了。第二，就是完全抛弃国家主义，主张将中国全土交各强大之资本国家共管。各国就可以用最大的加速度的生产力在中国开发产业。此时中国游民，不患不能得生活资料了。中国全国人民若尽成为劳动者，则以劳动阶级资格和世界资本阶级为最后之决战，世

界的社会主义就可实现了。单凭思想，这两条办法，或者也可以试办。只有一层，就第一办法说，现在已不是闭关自守的时代，而且受不起外部的压迫，要维持旧式生产事业是绝对难办到的；就第二办法说，是爱国主义者所绝对不肯承认的。除了这两法以外，若一方面要采用欧美式资本主义，一方面要固执国家主义来谋本国实业的发展，那就是大大的烦闷了。我们有件事应当注意的，就是资本主义的背面，存有军国主义。若美、若英、若法、若德，都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也是军国主义最强盛的国家。欧美姑且不说，就说新具工业国的日本，日本的工业发展的路径，不皆是海陆军助长而成的吗？中国是万国的商场，是各资本国经济竞争的焦点，是万国大战争的战场。各资本国在中国培植的经济势力，早已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当着产业万分幼稚的时代又伏在各国政治的、经济的重重势力之下的中国，要想发展资本主义和各资本国为经济战争，恐怕要糟到极点了。梁任公认此是唯一可行之道，我看这唯一可行之道，反不免是空想罢。

至于梁任公说，中国现在没有劳动阶级，不能行社会主义运动，若要行社会主义运动，唯有奖励资本家生产，“有资本阶级然后有劳动阶级，有劳动阶级然后社会主义运动有所凭借”。若照这样说，简直是为实行社会主义，才造劳动阶级；为造劳动阶级，才奖励资本主义，梁先生就有故意制造社会革命的嫌疑了。

中国境内的资本家是国际的，全国四万万人（由某种意义说，都可算是劳动者），虽然有许多无业的游民，然而都可以叫做失业的劳动者。所以就中国说，是国际资本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中国是劳动过剩，不能说没有劳动阶级，只不过没有组织罢了。

若依梁任公说，中国若是没有劳动阶级，当然就没有资本阶级了。政治方面没有贵族和平民阶级的中华民国，又没有资本、劳动阶级，就可以算作无阶级的国家了。社会主义运动就是要实现消除阶级的国家，中国既无阶级，又何须制造阶级？若因为行社会主义运动才提倡资本主义以制造劳动阶级，是梁先生有意制造社会革命，就不应非难社会主义运动的人了。我有一句好笑的比喻，譬如一个天然足的女子，就用不着我们说缠足的解放。若是因为要解放伊，故意为伊缠足，使伊得着有被解放的资格，然后再替伊解放，岂不是陷于“循环定理”吗？

诚如梁任公所说，资本主义可以达到社会主义，因而我们一面去“挖肉做疮”，那么，梁先生亦觉此法迂缓否？若是梁先生不怕亡国，我看还是照我前边说的话，让外国资本家到中国来开发实业，到了程度，中国社会革命自然也可以成功的。否则，索性慷慨点，也不要讲什么主义。世界的趋势，是必须要实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必须灭亡的。让他们外国的资本家来到中国做逋逃薮，爝火余光，也必须熄灭的，等他将熄灭的时候，中国的劳动者一齐起来，联合世界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同扑灭此荧荧余烬共建社会主义的天下，岂不省事！

第三，资本主义在今日的中国并不是赈救失业贫民的方策。我们要知道劳动者的失业，就是因为新机器发明产业革命招致而来的。一架机器可抵数十百人的劳力。在资本制度的社会里，新机器增多一架，就增多失业者数十百人。所以在今日产业革命正在开始的中国，若更奖励资本制度的生产，并不曾将产业革命的流弊根本除去，产业革命还是产业革命，不过将外国人的资本家变成中国人的资本家罢了。若果中国提倡资本主义生产，效力速，则一时间产业革命的影响烈，旧工业之下

的失业者亦愈众，而能“丐余沥以求免死者”不过千分之一二而已。然而同时外国商业的掠夺不能说就可以抵制得了的，则又无非使中国的劳动者受一个两重的压迫罢了，救济一语还是空谈。效力迟咧，不消说了，梁先生对于资本主义所抱的希望都成泡影！要等中国的资本主义发达到一面可以和外资抗衡，一面可以尽数吸收国内的劳动者，其中要经过如何长的时日，恐怕那个时期未到，“而我中国的四万万同胞，且相索于枯鱼之肆”了！我们在这里做梦，外国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且将匿笑于其后”了！只有抱着国家主义的人，听见自己国内也有资本家，也有兵强国富，才眉飞色舞罢了。

其次讨论温情主义。梁任公既然主张资本主义，其当然的顺序，要归结于施行社会政策的。这种滑稽的办法，我们实在不敢苟同。现社会中经济的组织，不外两个大原则，就是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这两大原则就是现社会中万恶的根源，社会主义运动就是要把这两原则完全撤废。讲社会政策的大都不然，只主张借资本阶级的国家底立法，施行几项温情政策，略略缓和社会问题，并不是想根本的解决社会问题的。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还是依然存在，资本家仍可以行自由放任主义，积极的发展自由竞争，无限制的扩张私有财产；无产阶级呻吟于资本家掠夺支配之下，绝对得不到丝毫的幸福。简单说，社会政策就是处理社会问题的结果，并不是要铲除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梁任公正在欲实行资本主义，却就提倡社会政策，在方法上已是南辕北辙。还有一层，社会政策在欧美各国说起来，是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极端发挥以后所生的必然的结果，若果在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未发达的国家说，社会政策就行不去，而且也不能一一见诸实行的。就中国说，资本主义正在萌芽时代，人民因产业革命所蒙的苦痛尚浅，若能急于此时实行社会

主义，还可以根本的救治；若果要制造了资本主义再行社会政策，无论其道迂不可言，即故意把巧言饰词来陷四百兆无知同胞于水火之中而再提倡不彻底的温情主义，使延长其痛苦之期间，又岂是富同情者所忍为？资本主义是社会的病，社会主义是社会健康的标准，社会主义运动是治病而复于健康的药。只要问中国现在的社会病不病，什么病便下什么药。一定要把中国现在的病症移做资本主义的病症而后照西洋的原方用药，这种医生是不是庸医？“庸医杀人！”中国人民的元气已经丧到不能再丧了。梁任公对于资本主义所取之矫正态度说：“唯当设法使彼辈有深切著明之觉悟，知剩余利益断不容全部掠夺太过，非彼辈之福。”梁先生以为靠这一句空话，资本家便能奉行，劳动者便能安乐了么？资本家若果能有著明深切之觉悟，他们一定能觉悟到他们的最后命运——就是他们终于不能存在而必须让给社会主义的世界。若是没有觉悟，他们一定唯利是图。他们宽待劳动者，无非是免得受罢工的损失，而可以安稳的扩张资本势力。换句话说，即是使劳动者安于奴隶状态而不思反抗。况且谁可以矫正资本家？国家是受资本家维持的，绅士式的智识阶级是受资本家豢养的，社会改造论者的空言是无补的，有实行力者唯有劳动家，而劳动家却被温情主义缓和了。梁任公要想在温情主义之下使劳动者觉悟，是不明社会问题的真相。要想由资本主义而温情主义而社会主义是不明欧洲社会进化的历程。

提倡某种步调与社会中事实有某种步骤是不同的。因为社会实况的中间，实行温情主义的时候，就有反对的呼声。反对的呼声，就是促劳动者觉醒的。提倡的人可不能自己反对自己。所以我说由梁任公的温情主义的主张是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

第四，资本主义是国际的，并无所谓国界。资本主义既是侵略，所以无论何种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国际的势力必须采用国际的对抗方法。

资本家在各国蔑视国境，并且超越国境营国际的生活。如所谓银行团国际信托等等，均有国际的生活，为国际的行动。各国资本阶级驱使劳动阶级如牛马。所以在现时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必须厉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支持国际的方针，和资本阶级国际的行动挑战。

劳动者没有祖国。社会党划分人类，以阶级不以国。若要假设一些纵线将国与国分开，就可另引一横线与各纵线相交，将资本阶级和劳动阶级截为两段。社会党只注重这横分线，不注重纵分线。社会党因为要增加本阶级反对别阶级的力量，想把所有的垂线取消，因为这些垂线纷乱劳动阶级的心理，妨扰劳动阶级的自觉，阻碍自己主义的进路，所以要谋国际劳动者的团结。

所以就社会主义者的立场而论，不论本国外国，凡见有资本主义，就认为仇敌，总要尽力扑灭他；也不论在本国或外国，凡见有掠夺压迫的资本阶级，就认为仇敌，总要出死力战胜他。社会主义没有国界，资本主义也没有国界。我们不能说外国资本家所行的资本主义应该反对，本国资本家所行的资本主义就不应该反对。我们不能说本国资本家对于本国劳动者有所爱护，别国资本家对于本国劳动者更加虐待。资本家务必掠夺劳动者然后方能大行其资本主义，我们不能说本国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所生的弊害比外国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的弊害少。外国资本家把商品舶到中国卖，席卷金钱，存在自己衣袋里；中国资本家造出商品在中国卖，席卷金钱，也是存在自己衣袋里。同是一样的藏在自己衣袋里，中国的无产阶级不能向他们领取

分文使用，在劳动者有什么区别?

况且就现在的资本家说，他们并不排斥外国劳动者，不但不排斥，而且非常欢迎。资本家雇用劳动者，不问国界，也不问是亡国奴或是未开化的人民，只要他们甘愿受低廉的劳银做工，资本家无不欢迎。中国的劳动者遍布世界，各国资本家很欢迎他们，而且对于本国的劳动者反不愿雇用，因为本国劳动者要求高价的劳银，并且有时不肯受虐待。总而言之，资本家是虎，我们不能说，本国的虎比外国的虎不会食人；我们也不能说，只可抵抗外国的虎，不必扑杀本国的虎。资本主义是流行世界的瘟疫，瘟疫的菌能够流播全世界，我们不能说，本国的瘟疫不可怕，而外国的瘟疫可怕；我们也不能说，只可消灭外国传来的瘟疫，不必消灭本国的瘟疫。劳动者没有祖国，所以要谋国际的团结，要扫灭全世界所有的资本主义，这是马克思的教训。要谈论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人，至少要了解这一点，不然就要说门外汉的话了。

第五，梁任公要谋中国劳动阶级的产生、发育、强立，以为对全世界资本阶级最后决胜之准备。梁先生的目的，可说是非常远大，可是所主张的手段，只说要对劳动者灌输智识，助长组织，而先从疾病保险入手以促成真正的工会，借工会以与世界资本阶级作战，以期达到那远大的目的。这种手段，如何的迂缓固不待言，而且这也并不算是什么革命的手段，实不过是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派的劳动运动罢了。我想借此机会把社会主义运动的手段略述一个大概。

社会主义运动的手段很多，我只举出最重要的三种：一为议会主义，二为劳动运动，三为直接行动。这三种手段，究竟哪一种宜于中国，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下。

先就议会主义说。议会主义主张劳动者组织团体为参政的

运动，想借立法机关成立改善劳动地位或矫正资本阶级的法案，慢慢的改造社会。这种手段，没有多大的效果，我们看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先例就知道了。社会党要和作对的资本阶级在议会中妥协，试问能够得到什么利益么？不过要求资本阶级的政府行使社会政策倡办慈善事业罢了。社会根本改造事业，永远不能达到。欧美各国社会党，得了多年的经验，受了俄国革命的提醒，多能觉悟到议会主义已经破产而倾向于有效的急进的方面了。

再说劳动运动。劳动运动是社会运动最大的武器。可是劳动运动是社会运动的一部而不是全部，社会党若专靠行劳动运动，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工会本是社会主义的学校，是劳动者学习支配管理生产机关的教场，学会了组织训练，准备组织劳动者的国家。可是不能利用罢工的手段来举行革命，因为举行总罢工实行革命，劳动者非皆有相当的教育和训练不可。劳动者既然有如许的教育和训练，其结果当然要实现新社会了。然而事实上决不能与理想相合的。所以劳动运动只可作为一种必要的手段，却不能算作社会运动唯一的手段。

现在说直接行动。现代各国进步的社会党都觉悟了直接行动是社会革命的最有效的手段，都晓得采用了。直接行动是什么呢，就是最普遍最猛烈最有效力的一种非妥协的阶级争斗手段。直接行动，可分两种：一种是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一种是工团主义的直接行动。工团主义的直接行动，主张用突发的总罢工的手段，实行革命。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主张联合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增加作战的势力，为突发的猛烈的普遍的群众运动，夺取国家的权力，使无产阶级跑上支配阶级的地位，就用政治的优越权，从资本阶级夺取一切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无产阶级的国家手里，用大速度增加全部生产力，这

就是直接行动的效验。

以上三种之中，中国社会主义运动者究应采取何种手段，我却不大留心这事。可是就我的推测而言，或者不得已要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因为议会主义的手段，在欧美曾经实验过，并没有多大的效果，可说是已经破产了。劳动运动的手段，只于工业国相宜，而于农业国不相宜。其理由俟有机会再行详述。所以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专恃劳动运动恐怕不甚容易。除了这两种手段以外，只有采用直接行动的一法。而直接行动的两种之中，我看或者要用劳农主义的。工团主义的直接行动，专靠总同盟罢工的武器，也只能适用于工业国，所以俄国的革命运动，就要采取另一种方式，即劳农主义的方式了。俄国是农业国，中国也是农业国，将来中国的革命运动，或者有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的可能性。

所以中国社会党人，若也抱着与梁任公同一的宗旨，想组织中国的劳动阶级和世界资本主义宣战，我看还是不必去办疾病保险式的工会，不如采直接行动，和各国劳动阶级为适当之联络，共同努力运动，反为有效。我并不是不主张劳动运动，只我不过不认劳动运动为社会运动的全部罢了。

我的讨论说完了，现在我把这篇讨论文字的大旨，简单明了的条陈于下：

一、中国社会运动者，要联络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的人民，在社会主义上会合。

二、为中国无产阶级谋政治的经济的解放，作实行社会主义的准备。

三、采社会主义生产方法开发中国产业，努力设法避去欧美资本制产业社会所生之一切恶果。

四、万一资本主义在中国大陆向无产阶级磨牙吮血，则采

必死之防卫手段，力图扑灭。

五、联络世界各国劳动阶级，图巩固的结合，为国际的行动，与世界资本阶级的国际行动对抗。

为达到上列的计划，采必要之运动手段：

一、网罗全部劳动者、失业的劳动者，组织社会主义的工会，为作战之训练。

二、培养管理支配生产机关的人才。

三、结合共产主义信仰者，组织巩固之团体，无论受国际的或国内的恶势力的压迫，始终为支持共产主义而战。

四、社会党人不与现政党妥协，不在现制度下为政治活动，要行有效的宣传为具体的准备。

一九二一、四、八、于上海。

根据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刊印。

注　释

〔1〕即梁启超。

PDG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一九二一年六月十日）

张　太　雷

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小组是一九二〇年五月在上海和北京成立的。从那时起，中国其他地方也出现了许多小组。在一九二一年三月以前，中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在许多地方我们不得不同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共事，但是在这些共同组织中我们有自己的同志进行监督和领导，我们曾作过努力，要使这些组织变成纯粹的共产主义组织。然而后来我们确信，要继续同这些无政府主义分子一起合作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已开始以共产主义组织的名义发表宣言，宣扬他们自己的宗旨和原则，而他们的宗旨和原则则与我们对共产主义的基本概念相矛盾。

为了阐明我们的宗旨、原则和策略，为了把无政府主义分子从组织中清除出去，我们认为有必要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召开各组织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发表了关于我们的宗旨和原则的宣言，并制定了临时性的纲领。这个纲领确定了我们组织的工作机构和工作计划，表明了我们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同业公会、行会、文化教育团体和军队的态度，也表明了共产党对工

* 本文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提交的书面报告的第八节。

PDG

会的态度。

迄今为止，我们所做的还只是准备性质的工作，我们的通讯部向中国报刊提供关于苏维埃俄国和工人运动的消息，以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民主”实质的一般材料。组织部在许多大城市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建立了工人学校和工人俱乐部。这个部还在各工业部门建立了许多工人工会，并把它所建立的上海五金工会的代表派往各城市去建立当地的五金工会。组织部还竭力打入同业公会和行会的组织中去瓦解它们，并由这些组织中的无产阶级分子建立像印刷工会那样的新的纯粹的阶级工会。几乎所有的罢工都是我们的党员同志组织或领导的。

我们的出版部为工人群众出版了一系列周刊，如上海的《劳动界》、广东的《劳动者》、北京的《劳动音》周刊，还有《来报》周报。这个部还为工人印行了许多小册子和传单，如《一个士兵的故事》、《工人的对话》、《工会》、《共产党人是什么样的人》等。中国共产党还把《苏维埃俄国》、布哈林的《共产党纲领》以及一套《社会主义者袖珍丛书》译成了中文。这套丛书中首先译成中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导言》。

我们还出版了一些杂志，如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青年的杂志《曙光》、《新青年》以及日报《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还着手把马克思的《资本论》译成中文。

截至今年五月一日止，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七个省级地方党组织，它们是：

1. 北京组织，其主要成员最初是青年学生，近来已开始大量吸收京汉铁路修配厂的铁路工人。这个组织现在有一所工人模范学校，学员一百五十名，教师是两名工人共产党员和两

名来自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党员。

2. 天津组织及其唐山站分部，该分部的成员是这个津浦铁路最大车站的铁路修配厂的工人。党特别重视唐山地区，因为它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工业中心。这里有：(1) 二千五百工人的京奉铁路修理厂；(2) 两千工人的启新洋灰公司；(3) 一万四千工人的开滦矿务总局。我党在这个地区正竭力通过开办工人学校、工人俱乐部以及建立各产业工会发起小组的办法来巩固自己。我们在这里除了共产主义组织外，还有两个小组，一个是五金工人小组，另一个是铁路员工小组，在它们周围，我们团结了一批相应的工会。

3. 汉口组织，它同城市工人，特别是同印刷工人保持着牢固的联系。

4. 上海组织，它有三个分部，它在工作中不仅像初期那样依靠青年学生，而且还依靠不久前建立的工会。在去年广州召开的五金工会代表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最有威望的共产党员之一，当地工人好德说得好："我们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不依赖于资本主义社会并公开敌视这个社会的、按生产原则组织工人的工会，现在，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进行斗争的日子已经不远了。"目前这个工会已有近五百名会员。

5. 广东组织，它依靠当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一些工会。

6. 香港组织，它不仅依靠香港三十个工会组织中的十二个，而且还同汕头、福州、澳门等市的工人建立了联系。

7. 南京组织，它虽是最年轻的组织，但已经同周围工人建立了牢固的联系。在我们党的队伍里有一批具有理论素养的著名的工作人员，我们党在精神方面是足以使中国所有的资产阶级集团艳羡的。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夸大个人在无产阶级群众斗争中的

作用，但是我们认为，在我们队伍中还有卓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好处，党必须利用这一点，以争取共产主义思想在我们这个远东最大国家的领土上获得胜利。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刊印。

PDG